

马克思主义者

(供内部参考)





馬 克 思 主 义 者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供内部参考)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前登记证字第107号)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 3017·87

1965年7月初版

开本: 850×1168¹/₃₂

196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42千字

印张: 15²/₁₆

印数: 1—1,000册

定价(9)1.90元

出版說明

这本以《马克思主义者》(The Marxists)为标题的书,系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编写,于1962年3月由纽约德尔出版公司(Dell Publishing Co.)出版。

赖特·米尔斯是美国社会学家,著有《有权力的新人》(The New Men of Power, 1948)、《白领工人:美国的中间阶级》(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1951)、《有势力的集团》(The Power Elite, 1956)、《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1958)、《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设想》(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1959)、《听吧,美国佬:古巴革命》(Listen, Yankee: The Revolution in Cuba, 1960)等书。

在《马克思主义者》这本书里,米尔斯表面上恭维马克思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同时胡说他的著作里包含着很多错误、含糊或不足之处,说什么历史事实的发展已经推翻了他的许多具体理论和预言,借此为资本主义社会粉饰辩解。米尔斯又把马克思主义者分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诡辩马克思主义者和朴实马克思主义者,恶毒地贬低和诋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吹捧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并恬不知耻地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资产阶级伪马克思主义者归入所谓朴实马克思主义者一类,妄图使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合流。全书共十四章,半数由米尔斯自己编写,半数选录一些作家的著作片断,这些作家有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的是修正主义者和叛徒,有的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当代革命斗士,而编者一概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流派,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鱼

目混珠的意图。

我馆现在把这本书翻译出版，供内部参考批判之用。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5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理想和意识形态·····	1
本章说明了何以“自由主义”和“社会科学”都不足以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指出了用以考察一切政治哲学的四种标准；讨论了一种政治哲学在成功或失败以后往往会发生的情况，并阐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不仅都已变成了意识形态，而且都具有西方文明的世俗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简略地谈到了保守主义的特点；指出了自由主义之不足以应付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第二章 马克思的贡献·····	26
本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给人的启示及其思想力量，说明了马克思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同当前社会思想的关系。	
第三章 古典思想家·····	39
本章选载了马克思——从作为批判哲学家的青年马克思到共产主义未来的设想者——著作的若干片断，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智力的广阔和丰富。	
第四章 马克思的主要思想·····	81
本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各种主要思想；不加批评地列举了他的社会模型、历史理论以及各种特定的概念和预测。	
第五章 批评准则·····	97
本章辨明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相干的批评依据，并且说明了本书使用的批评术语。	
第六章 对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108
本章根据现代社会的种种有关倾向，从批评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各种主要理论作了考察；指出了它的思想结构的漏洞、错	

误和暧昧之处。

- 第七章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138
- 本章从政治思想方面简要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古典思想家、社会民主党人、作为革命中枢的布尔什维克、斯大林主义的巩固、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新修正主义者、苏联集团以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情况，全都得到了简要的介绍。
- 第八章 社会民主党人…………… 169
- 本章选载了代表第二国际最重要的政党的一些主要倾向的人物如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卢森堡等讨论革命和改良问题的文章。
-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轴心…………… 215
- 本章选载了列宁论述帝国主义世界、政党、国家和工农合作等问题的文章以及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著述，还说明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主义问题上怎样取得了一致。
- 第十章 斯大林主义的巩固…………… 302
-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斯大林在1924年给他所说的“列宁主义”作了什么样的解释，在他去世前不久的时期怎样评论了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问题。
- 第十一章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318
- 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罗莎·卢森堡很早就提出的警告，托洛茨基如何分析了斯大林主义社会的性质，希法亭如何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本章还选载了弗朗茨·博克瑙说明第三国际所属各国共产党的特点的文章，以及艾萨克·多伊彻对《破了产的上帝》一书的评论。
- 第十二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和新修正主义者…………… 380
- 本章选载了……[略]陶里亚蒂对有关斯大林主义的九个问题的回答，以及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上的部分发言。
- 第十三章 苏联集团以外的马克思主义…………… 410

在本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德尔怎样对南斯拉夫道路作了全面的考察，柯尔怎样重新考虑社会党人对共产党人所应采取的态度和斯大林死后的其他问题，格瓦拉怎样对意识形态、革命以及其他有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十四章 新开端..... 461

本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今昔变化的错综情况；简要地说明了各种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背景；谈到了苏联集团内外部的某些新开端，并且提出了有关未来的一些问题。

译名对照表..... 469

第一章 理想和意識形态

本书是一部“入门书”，是一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作品，主要是为那些并不真正了解和并不自以为了解这类哲学的人而写的。本书也是为这样一些人而写的（这只是作者的设想）：他们有的已经熟悉马克思主义，但认为马克思主义整个说来既然已经“被共产党视为禁裔”，因此就不是他们所应该研讨的对象；有的则以为马克思主义毕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尤其是在今天——已经是或者理当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东西了。此外，那些讨厌政治和政治哲学、隐退到个人生活小天地中或是从未跳出过这个小圈子的人，也是我们的读者对象。如果本书只起到一种作用，即使得这样一些人能够稍许接近于做一个完美公民的经验，就可以说它已经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

(一)

在从切合于当前时代的角度来重新研究各派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我打算在本书中首先有系统地列出我所认为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然后对它们逐条加以批评。接着，再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和应用趋势的历史轮廓作一些简短介绍。由于我不想使这种说明为冗长的引文所打断，我特地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选出若干片断，把它们另外编成了独立的几章。不言而喻，我在进行批评时自然要借助于我所熟悉的那些社会科学领域中业已取得的有关研究成果。为了不使本书的篇幅拉得过长，我没有以任何明确的和系统的方式谈及其他评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

阐释和批评。但是我已竭力注意以这些阐释和批评为借鉴，我希望自己始终没有忘记它们当中若干最重要的论点。

我在全书中尽量争取做到客观，但我并不以超然物外者自居。没有一个政治哲学研究者能够是超然物外的；他只能假装成这样。而我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作为一个政治哲学研究者来写作本书的，这只能意味着我同读者一道在探索政治方向。因此，我将尽量做到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和伦理观点。

当我们阅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时，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大多数人的心目中事实上都存在着一种政治比较：我们一般都倾向于使用我们认为是“民主的”、“自由主义的”或“自由世界”的标准来判断优劣。因此，要想有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先说明和考察一下这些标准。我们必须对“政治自由主义”（这是政治哲学和世界现实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替物，是我们的各种评价、假设和理论的来源）和“社会科学”（它所用的名辞术语提供了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基础）都来作一番考察。我对自由主义的评论将不得不是简短的，因为我在本书中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①但我希望以这样的方式来写作，即清楚地阐明自由主义读者对各项问题的假设，从而使他们更便于澄清他们的政治立场。

许多人反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忽视）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考察人类事务，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对他们自己所研究的那些学科的古典传统。人们借用其名义忽视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往往很少或根本不涉及现代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加速的现象和

^① 关于在我看来是可以成立的各种自由主义观点，我已经作过详尽的批判。例如，请参看下列著作：《有权力的新人》1948年；《白领工人》1951年；《有势力的集团》1956年。

各种重大事件。这是一种研究范围狭窄、只注意琐碎细节和极不重要的零星事实的社会科学。^① 只要举出马克思的作品风格和当代社会科学的几种主要类型之间的一些差别，就足以说明它们的性质了。当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时候，他们指的是(或理当指的是)以下这些情况：

社会科学家所研究的是小范围的环境的细节；马克思也研究过这类细节，但他总是把它们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来考虑的。社会科学家对历史懂得很少，充其量只研究短时期的趋势；马克思运用历史材料的技巧则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往往以整个历史时代作为他的研究的着眼点。社会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一般导致他们完全接受他们所处的现实社会，而马克思的价值观念则导致他彻底地谴责他自己所处的社会。社会科学家把种种社会问题只看作是“社会解体”问题，而马克思却把这些问题看成是现存社会结构中的固有矛盾。社会科学家认为他们的社会将以一种进化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在结构上不会发生质的变化，而马克思则认为这种社会将来一定要发生质的变化：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事实上是一个新时代——将通过革命产生出来。

然而，今天并不存在任何具有重要思想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我们只有这样的一种社会科学：它没有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就不会发展成今天的这种模样；同时，如果单单依靠他们的作品，这门学问也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一个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有能力的社会科学家；而一个只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后真理的人，也会遭到同样的失败。

^① 关于这一观点的详细论述，请参看《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设想》1959年；关于“社会学思想方法的古典传统”的例证，请参看《人的意象》1960年。

在维贝尔^①、凡勃伦^②和曼海姆^③(我们只提三个人)出现以后,关于这一点还能有任何值得怀疑的地方吗?同单单依靠马克思相比,我们现在确实有了研究和了解人类、社会与历史的更好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马克思的著作,我们很难想像这三个人能够写出他们的作品。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往往是无形的;许多人的思想范畴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却往往觉察不出他们自己的方法和概念的来源。如果更仔细地注意一下作为社会科学主要来源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许多“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就会做出更有意义的工作来。另一方面,许多苏联学者又往往无视其他国家的人根据马克思的概念和理论所作的发展。如果不去了解或者由于被迫而不能去了解古典社会学的新发展,那么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的历史眼光就会流于狭隘,从而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残缺不全。

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东西方研究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学者都将以更客观的方法来考虑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留下的能使我们得到巨大收获的问题。在此以前,尽管苏联世界的人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却应该努力去了解使得世界发展成今天这样的一切事物,不应当因为任何国家的政治姿态而产生顾虑。

就像目前许多其他的人一样,我也不安地意识到我们所继承的政治哲学的不足之处。不论是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它们的身上都打着一个行将结束的人类历史时期的烙印;它们都由于沒有充分注意到目前世界舞台上所出现的重大事实和问题而受到了损害。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研究出一种能充分适应于我们正在跨

① 马克斯·维贝尔(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译者

② 奈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译者

③ 卡尔·曼海姆(1893—1937),德国人种学家、民俗学家。——译者

入的新的历史时代的政治哲学。但我的确希望它能有助于引导读者和我本人去进行这样一种努力。

(二)

各种政治哲学都是理智和道德情感的创造物：它们包含着崇高的理想、动听的口号、可疑的事实、浅薄的宣传和诡辩的理论。它们的信徒总是挑选出某些事实而抹杀另一些事实，鼓吹某些理想的可取之处和某些事变的不可避免性，向这种理论提出质疑，对那种理论进行驳斥。由于在一切政治哲学中通常都大量搀杂着这类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选择 and 整理。要达到这一目的，认识以下四点也许是有用的：

第一，政治哲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实，它是一种据以拥护某些制度和攻击另一些制度的**意识形态**；它为人们提供了用以表述要求、进行批评、展开宣传、拟制宣言和有时决定政策的标语口号。

第二，它是一种**伦理**，是一种对理想的表白，往往在不同程度的生搬硬套和牵强附会的情况下，被用来评价人物、事件和运动，并且当作愿望与政策的目的和指导路线。

第三，政治哲学表明**动因**，也就是实现改革、革命或是起保守作用的力量。它包含着既体现目的又体现手段的各种策略和纲领。一句话，它指出借以实现理想或维护已经实现的理想的历史杠杆。

第四，它包含着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理论**，或者至少是关于如何形成和维持社会、关于什么是它的最重要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典型地发生关系、关于其最主要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如何解决等等的假定。它提出了适应于它的各种理论的研究方法。根据这些理论和运用这些方法，便能得出各种预期的结论。

政治哲学告诉我们如何弄清楚自己目前是在什么地方，今后可能走向何处；它使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一部分答案；它使我们为未来的可能发展作好准备。因此，要考察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我们都必须把它当作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对理想的表白和动因的说明，当作一整套社会理论来研究。在本章中，我将主要讨论意识形态和理想问题；我打算说明的论点有以下几个：

作为意识形态来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已经流于庸俗和陈腐；任何一方都为维护一个强权国家和辱骂另一个集团及其一切活动提供了许多陈词滥调。

作为理想的表白来说，它们都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世俗人文主义。只有这些理想才能够既是一种包罗广泛的政治哲学的一部分，同时又为世界上几个最强大民族国家的领袖和被领导者所信仰。

古典式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体现着近代的自信和希望、惶惑和恐惧。把它们的一切类型总括起来看，它们在当前构成了我们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选择。然而，它们还不仅是政治哲学；它们本身就是头等重要的政治现实，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所公开宣布的信仰。全世界其余的部分都根据这些信仰来看待美国和苏联（以及围绕着它们的国家集团）；不发达的国家都把这些信仰看成供自己选择的发展模型。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政治哲学的古典说法之间的差别往往没有它们的共同点来得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是为共同的理想、为那些在西方文明的前进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主要世俗理想所鼓舞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体现着希腊、罗马和耶路撒冷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考察马克思主义或自由主义就是考

察这种人文主义传统的政治；如果认为它们当中的一种或两种内容模糊，那就等于说这种传统的内容是模糊的。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都为人类社会的性质提供了博大精深的见解，指出了历史变化的动因，提出了实现这些目标的纲领。好几十年以来，这两种主义在每一个先进国家中都构成了敌对的营垒，对于双方的专家认为是事实的那些方面以及对于他们认为是达到既定目标所不可缺少的方法方面，始终抱有不同看法。但是这些目标却一直没有多大改变。起初，它们是英国、美国和法国革命的目标；然后，它们又成了——说法上当然有了改变——俄国革命的目标；很快，作为对这一革命获得巩固的反应，人们——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又以新的方式把这些目标提了出来。^①

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共产党人的道德和政治窘境，同自由主义者进退维谷的处境非常相似。他们都怀着伟大传统的理想；他们也都沒有能使这些理想充分实现。而好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这些理想以及某些理论上的假设所抱的态度，要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自由主义者都更为彻底、一贯和认真。我认为，我们所以在决定政治方向的问题上发生了危机，其根源正在于这种人文主义传统本身发生了危机。全面对付这一危机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的命运。

古典自由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古典马克思主义最令人信服地和最富有成果地加以吸收了。不去正视各式各样的马克

^① 关于十八世纪的几次革命，可参看帕麦尔：《民主革命的时代》(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普林斯顿 1959 年版，该书对有关问题作了剖切、生动和富有学术价值的阐释。

思主义,事实上大都是一種不重視自由主义本身的理想的表现,因为尽管马克思的思想受到了种种歪曲和庸俗化,尽管他自己的思想也有种种错误、模糊和不足之处,可是他仍然是最明晰地——和最危险地——阐述了同样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些基本理想的思想家。因此,正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就是正视这一道德传统。

(三)

不言而喻,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各自自成一体的。在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一直是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后来的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主义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推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作为批评自由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同样也为批评苏联的政治和经济——提供了主要的思想基础。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一部分往往难以分辨地打成了一片,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公有物。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内容都有所变更,它们原有的色彩都有所冲淡:马克思主义受到修正,吸收了若干自由主义的因素;自由主义也根据受到的批评和变化的现实作了调整,吸收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因素。这些变更和相互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近代和现代的政治哲学史乃至政治史。一百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马克思主义的非革命性形式——社会民主主义——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里一直是主要的反对党运动。它实际上以冲淡的形式代替了自由主义作为内部反对派和批评者的地位。

今天,在这些社会里,政治信念的不坚定和政治希望的破灭,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主义世界观和自由主义情绪的危机的一部

分。在苏联世界的许多地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情绪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虽然程度较轻和方式不同。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历史事变的影响，对事变的产生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以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的危机正是当今这个时代——它仍然被奇怪地称为“现时代”——趋于没落的征兆。这种没落或许也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

不管它此外还可能有什么特色，未来的新时代将肯定是一个世界性的新纪元，因为当代两种主义的应用和意义，今天都已经传遍了世界。从俄国革命和苏联集团获得巩固以来，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冲突已经变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性冲突。在现实政治中，苏联集团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变种，目前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形式，而美国所信奉的自由主义的北美变种，现在则是自由主义的主导形式。

这两个国家以及它们组成的集团，目前都掌握着缔造历史的强大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代表着当今乃至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两种组织公共和个人生活的方式。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研究它们所宣布的主义，也就是解释、比较和批评这些主义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空谈思想”（姑不论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所谈论的是近代、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有些什么重要特征，还有那些继承了和将要继承这个世界的男女是些什么样的人。只有通过这两种政治哲学的一种或另一种的三棱镜来观察问题，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世界情况和明确我们自己的方向。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保守主义的情况怎样呢？是啊，它的情况怎样？或者不如说，它存在于何处？

第一，凡是在“保守主义”成为一个专横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地方——例如佛朗哥的西班牙、维沃尔德的南非、萨拉查的葡萄

牙或特鲁希略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个国家主要依靠的是警察统治而不是意识形态上所得到的拥护。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不发达世界的这种政权已经朝不保夕。

第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十九世纪的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精神上所起的作用，现在一般都已为自由主义所代替。事实上，凡是不彻底的保守主义都是自由主义的变种，埃德蒙·伯克^①的主张的再现，或者只是一种反常的念头而已。总之，保守主义在美国只是向那些大可称之为“想入非非”的人——如果不说他们是疯子——提供了一种倒退的乌托邦。如果不是这样，保守主义也只是那些希望维护现状而又说不出很多理由来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们的一种防御姿态。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保守主义“恐怕只是这样一种本能的信仰，即认为今天的社会是经过几千年的时间发展起来的，在这样长的时期内，人类已经找到了不少他们应该牢牢保持住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大家都是保守主义者，而这一事实却并没有什么意义。^②

(四)

对于那些真正被一种政治哲学迷住的人来说，他们生活于其

^①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反动政论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代表自由贵族阶级的观点，鼓吹镇压法国革命，但又反对以武力对付北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译者

^② 上述引文见彼得·维里克：《保守主义》(Conservatism)，纽约1956年版，第186页。该书是企图说明“新保守主义”的最佳著作之一。关于当今各种保守主义的批判性介绍，可参看威廉·纽曼：《悲观主义的社会》(The Futilitarian Society)，纽约1961年版。

在本书中，限于篇幅和为行文便利起见，我有意识地省去了对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它们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任何讨论。这两种理论现在并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重要性，这一事实也许能证明我的省略是有理由的。

中的这个世界上的情况似乎是十分明确的。一个问题刚一出现或是刚一被提出，正确的和适当的看法就立即会在他们的脑海中浮现。他们通过自己的哲学有了明确的方向。他们所抱的观点是易于传达给别人的。在带有不同程度的诡辩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的启示”似乎是一目了然的和使人不得不信服的。他们所信奉的理想似乎和他们所选择的动因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理想和动因也都同他们的社会理论、同他们所想像的社会内部情况相吻合。

这种幸福的状态在当代似乎并不多见。在那些已经同历史混合起来并且为千百万人所信仰的主义中，政治哲学四因素——意识形态、理想、动因、理论——中的每一种往往都发生奇怪的变形，并且同另外三种因素、同它的信仰者和历史事实的进程形成奇怪的联系。

一般说来，在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意识形态经过一定时期就会流于庸俗；现在有庸俗的自由主义，也有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不论是庸俗还是诡辩，意识形态的特征看来却是任何政治哲学的应用最广和最驳杂的因素。许多人只知道这一种因素，以及它也许结合得不太紧密的理想、动因和理论方面的一些特征。往往有这样的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门面，意识形态完全变成了神话或民间传说；也往往有这样的事：连最低限度的一点意识形态的内容都逐步消失了，结果只剩下了一套不着边际和空空洞洞的漂亮辞藻。这样，一度风行过的意识形态的启示便不再具有说服力。事实上，甚至要把它说清楚都变得困难起来。于是，人们便往往这样来谈论政治哲学：“它主要毕竟是一种笼统的见地或感受，而不是什么教条式的指导路线。”

特别重要的是，在成功的情况下，理想——尤其是比较有反抗性的理想——往往易于同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结成一体，而且在

实际生活中时常同行动的动因等同起来。于是，保持这些动因就成了唯一有效的理想；其余的理想完全变成了“空洞的辞藻”——不管它们是宣传性的还是革命的。作为理想，它们同任何可能使其实现的动因都是没有联系的。然而，即使只是作为美丽的辞藻，它们也可能受到严格的控制，被紧紧束缚于意识形态的统一体之中。

我们往往难以从其他因素中把理论单独划分出来，因为它们动辄就会变成讨论迫切目标时使用的单纯假定，变成不可缺少的手段，变成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的空洞辞藻。理论既然经常同其余这些因素混淆不清，便日益丧失其明晰性。化为单纯的假定，它们就容易变成“完全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并且往往——同理想一道——成为当代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奇谈怪论的一部分。作为理论，它们变成了非常死板的东西，很难看出它们同宣布的理想、信奉的意识形态以及历史行动的动因有什么关系。因为在现今的社会内部和它的历史运动中，这些理想、意识形态和动因并没有被理论“找出来”。

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社会里，上述这一切情况在各种自由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中全都发生过。但我们还必须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一种政治哲学的追随者已经为历史所漠视，当他们已经变成没有力量的小集团而还坚持自己那一套哲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在那种情况下，政治哲学本身就会变得几乎完全只关心理想。它将变成仅仅是一种道德观。譬如说，在许多疯狂反苏而又抱住“社会主义”不放的激进派集团中间，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他们怀着厌恶的心情回避一切“意识形态”。他们对大“理论”不感兴趣。他们既不掌握也不想指出行动的动因。他们只关心“实用主义”的和“零碎”的问题。他们可以承认事实，但只是零零碎碎地加

以承认；他们不论是彼此之间或是同大理论都没有联系——当然更不会同明确的纲领有什么关系了。在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各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集团中，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所发生的情况正与此类似——我想这是很明显的。

此外也出现了其他一些情况。在一切意识形态阵营中，政治上最有用（也最容易把人搞糊涂）的一种语法语气就是“希求语气”：把所希望的东西说得好像是真的一样。在沒有实际力量的集团中间，往往广泛应用政治语汇中一个最难捉摸的名词——这个名词当然是“我们”——来表达这种语气。有力量的集团也应用这种语气——经常是在可以称之为理想与理论的意识形态结合体中加以使用。

因此，政治哲学家的处境就像是傻子掷钱猜字背——反正都是输。一种政治哲学成功以后要倒楣，失败了也要倒楣。

这当然是政治哲学的紧张所在。这意味着，同时作为一项理智的和道德的事业，政治哲学是永不会终结的。至少可以说，只要人们还在探索着政治方向，它就不会有终结的时候。但是，不言而喻，大多数人都是不会进行这种探索的：他们只是按照自己出生在什么地区的偶然决定，接受流行的自由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民间传说。

（五）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具有反抗性的信仰，它们的各种表现形式曾经是争取掌握政权的运动、政党和阶级所打出的动人旗号。而经过相当时期，它们又都变成了保守的主义，成为业已巩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意识形态和官样文章。

自由主义者曾经以他们的具有反抗性的信仰，谴责了作为一

种社会制度的封建主义及其残余；他们谴责了一切形式的政治专制。马克思主义者也谴责了封建主义和工业时代以前的专制主义；但是他们更进了一步，对于在他们看来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基石的一种经济类型、即自由资本主义作了猛烈的抨击。

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说，现在已变得保守了。自由主义者以这种意识形态为根据，为主要存在于北美和西欧的比较富庶的国家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民主解。而斯大林主义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已成为苏联以及通过各种方式隶属于它的国家的官方辩护士。

作为一种政治的“乌托邦”，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是特别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上升期间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和政党公开宣布的信仰。但是在取得政权以后，这两种政治哲学全都变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全都以不同的方式染上了民族主义色彩。超等国家间的世界性冲突，是根据这两种政治哲学划分界限的，而且每一方都要使自己的政治哲学获胜。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得到巩固并且受到官方的控制；在美国，自由主义已经日益变成官样文章而不再成为一种意识形态。

所有在公开场合讲话的人，尽管他们抱着彼此矛盾的和不同的目的，却都普遍利用自由主义的语汇来修饰文辞。在一系列范围广泛的政治主张上截然对立的两个发言人，能够都是自由主义者。企业家和劳工领袖，民主党和共和党，将军和士兵，接受津贴的农夫和接受津贴的钟表匠——所有的人都以动听的自由主义语汇讲话，维护他们的利益和提出他们的要求。这意味着：公众所讲的自由主义是没有连贯内容的；它的目标已经如此流于抽象和形式化，以致不能提供任何明确的道德标准；使用它的语汇，人们已不再能清楚地说明真正的利益和理想的冲突。在几乎被一切利益

集团、阶级和政党利用的情况下，它缺乏政治的、道德的和思想上的明确性；一切利益集团所利用的也正是这种缺乏明确性的缺点。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人们往往指出的那样，自由主义的自由职业者、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往往盲目崇拜优柔寡断（他们把这叫做“心胸坦率”）、缺乏道德准则（他们把这叫做“容忍”）和形式主义的标准，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的不着边际（他们把这叫做“具有概括性”）。

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整个政治思想危机——之所以造成，正是由于自由主义变成了一切公开声明和争论所使用的官方语言，一切群众沟通思想的政治语言。此外还必须加上另一事实，即从新政时期以来，自由主义是一直用来作为行政理论的：在同政权发生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已经越来越带有行政性质而日益丧失其政治特色。它已经变得实事求是、随机应变、讲究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如自由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而丝毫不再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了。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意味着：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套漂亮的辞藻，自由主义已经变得往往同具有道德内容的政治观点毫不相干。

在苏联集团内部，马克思主义的各项内容已经变成听凭官方解释的一种官方信仰的基本要素，以及全部文化和政治生活的官方指导路线。在这种形式下，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成了一切公共交易所使用的唯一钱币，成了一架复杂的、旨在维护一党国家的假定利益的政治和文化机器的基本前提。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居于垄断地位，精神自由便为官方对它的解释所限制。这样，马克思主义就从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对未来的设想，一变而为苏联集团的意识形态。

苏联国内外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转

折，都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一致和理论上的强求一律。这类转折已经有过许多次，而每一次都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名正言顺地作出的。政治和理论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方向是经常变动的，这就无怪乎理论本身也日益流于陈腐，逐渐丧失了它的大部分道德感染力和思想上的中肯性。它往往变成一种道德奇妙和思想空虚的意识形态——一种真正是官样文章的、必须为向上爬的共产党人所精通的意识形态，他如果想有所作为，就必须亦步亦趋地随着这种意识形态而改变。

此外，苏联集团在这样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用它作为整个苏联文化机器的一种基本理论。这个文化机器必须紧紧追随政策的每一步变化。在这种曲折前进的过程中，不少文化工作者被野蛮地消灭了。在文化和政治——它们都为党和国家的官员所控制——发生紧密联系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科学家像在斯大林时代那样，在政治上和地位上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

现在，这两种民间传说——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抽象自由主义的美丽辞藻——正在彼此对峙着，分别向世界公众宣传美国和苏联的种种美好的前景，各自为本国的领导人和被领导者提供歌颂自己的社会和咒骂敌方社会的语汇，而且经常是双方都使用相同的语汇。

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全世界范围内，巨大而复杂的宣传机器正在日夜开动，声嘶力竭地宣传这类民间传说，使它们适应于事变的每一个转折和假想出来的事件，配合威胁和反威胁，适应各种政策和缺乏政策的局面。

按照自由主义的民间传说来讲，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那里，一般人民在真正管理着自己的事务；苏联是一个实行专制暴政、一党独裁和极权主义的国家，在那里，人们受到暴力的压制，既

没有自由也没有欢乐——而且它也是侵略成性的，竭力想把全世界都置于它那非基督教信仰的统治之下。

而按照共产主义的民间传说来讲，苏联是人类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巨大进步；美国是一个反动的落后国家，在那里，只有形式民主的虚伪性同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的结合。它的统治者是一些战争贩子，竭力想通过军事力量和其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来残酷地进行扩张和巩固他们的帝国主义统治。

在这个民间传说的王国里，马克思及其精神信徒的思想确实已处于一种可悲的境地。

在苏联集团的社会里，人们对马克思的著作——再加上列宁的著作——总是加以吹捧，并且往往把它们庸俗化。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变成一套官样文章，被用来维护一党专制国家的权力，掩饰它的野蛮的权宜措施和吹嘘它的成就。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马克思的思想则遭到忽视，或者更糟的是，被人们无知地扣上“纯粹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帽子。因此，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著作在这里也变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种遭受胡乱的和无知的攻击的官方目标，而不是一种被认真研究的对象。

(六)

但所有这些终究是民间传说而已。两方面都是如此。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方面。当然，就连每一方的民间传说也是包含着一些真理和对于现实的说明的，但是主要问题在于它们的背后所隐藏的一系列思想，对于这些思想我们必须认真看待，如果我们想了解哪怕是这类民间传说的应用情形的话——更不用说想了解今日世界的状况和可

能有的命运了。在这两种意识形态的每一种的背后，都存在着大量政治思想和道德理想的世界遗产。

我必须说明一点：凡是本书中提到“西方”或“西方文明”的地方，都包括俄国——历史上的和今天的——在内。我并没有把“西方”或“西方的”当作同“共产党集团”或“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字眼来使用。^①苏联的领土当然伸展到了亚洲，但是它的主要历史发展是在这个国家的欧洲部分进行的。俄国在文化上同欧洲社会有相当密切的联系，虽然在历史上落到了它们的后面。

而且，马克思主义本身便是欧洲文化的一部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欧洲人，俄国革命的领袖也并不是真正的东方农民；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在西欧各国首都长期生活过的第一流知识分子。

最后，俄罗斯人和苏联大多数其他主要民族——例如乌克兰人——都认为自己是欧洲人。而且，亚洲人——例如印度尼西亚人——通常也都把俄国看作“西方国家”。地理学家柯尔的结论是：俄国“可以作为一个把欧洲征服和文化带到非欧洲世界去的国家，而同西欧的海上帝国建设者并列”。^②

就理想而论，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马克思主义几乎都已用尽

^① 这种分类法的政治目的，是要把目前结成反苏联盟的各国和“西方文明”等同起来。至于“自由世界”一词，我们可以引用某位人士在1955年3月所说的一段话作为说明：在共产党集团以外的七十一个国家中，大约有四十九国的制度是“公开的或实质上的独裁或近于寡头专政……另外二十二个国家，就它们的政治制度而言，大部分的确都有几分资格被冠以‘自由的’这个形容词，但是就其中某些国家的经济控制而言，则肯定是寡头统治，一小撮人靠盘剥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生活”。见众议员托马斯·柯蒂斯的发言，载《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1955年，第1481页。此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立法参考服务部”编纂的材料。

^② 柯尔：《时事地理》(Geography of World Affairs)，伦敦1959年版。关于这一问题的令人信服的讨论，可参看该书附录I。还可参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1960年版，第29—35页。

了西方文明的政治遗产。自由主义者曾经多次肯定过一种世俗的人文主义，一再强调个人人格的宝贵价值，强调个人的这样一种权利，即应该根据凌驾于一切权势之上的、合理的和可以了解的法律来对待每一个人。他们把人看成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政策和事变按照它们对人的影响而定其好坏；制度和社会应当按照它们对个人具有的意义而判其优劣。自由主义者认为人应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认为有合理的求知方法存在，而个人的实际智力如能自由地加以运用，就能为人们提供出路。他们对服从权威的关注和普遍反对暴力的态度，正是应该根据这些价值标准来理解的。

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仅是“一般的自由”，而且是具体的个人自由，甚至给自己规定了不向任何组织无条件地承担义务的责任。对任何运动或组织、政党或国家的一切忠诚表现，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都要取决于他自己的原则和信仰。^①

马克思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明显地、一贯地和系统地体现了西方世俗的人文主义那些深刻的和深入人心的道德主张。正如自由主义的情形一样，我们所以很难指明这一点，要归因于人们在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应用和歪曲。另一个专门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困难同马克思本人的某些守旧作风和信念有关。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痛恨时髦的标语口号和虚伪做作，养成了一种以“具有冷静头脑和现实主义眼光的”知识分子自居的习惯。他不喜欢空谈崇高的理想；他把自己的理想同他对于他认为违背了这些理想的社会分析以及这个社会内部有希望实现

^① 参看伦纳德·霍布豪斯：《自由主义》(Liberalism)，伦敦1911年版。这是我所知道的二十世纪阐述自由主义理想的最佳著作。这里有必要指出，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冷战时期对美国民族主义进行教条式的颂扬，显然有违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要求人们举行保证效忠美利坚合众国的宣誓仪式，既表明了以理服人的民主象征的没落，也反映出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已不再像以往那样有说服力了。

这些理想的动力密切地结合起来。但是，他的著作和这些著作的每一行话里所体现的主张，都流露出了他的道德立场。

一、马克思是一个世俗的道德家、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一切宗教都是精神骗局和政治陷阱，是另一种精神的和物质的剥削手段。在他看来，宗教使得人们不能对他们自己、对他们的社会处境和作为人的真正利益有正确的自我认识。一种以人代替上帝本身的激进人文主义的理想，伴随着一种为人类正义献身的旧约热情——这些就是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工作动力的一部分，也是他谴责在他看来是使人堕落和摧残人的资本主义影响的道德根据。

二、马克思是一个理性主义思想家：“要求人们放弃关于他们自己的地位的幻想，就是要求放弃一种需要幻想的地位本身。”我们没有理由否认，马克思在他整个一生的工作中都确实在身体力行这句格言。他相信人类的理性，相信自由是人类运用理性的一个条件和后果——这就是他的道德力量的泉源，思想的中枢和乐观主义的关键，正是这种信仰使他认为：那种“不成其为人”的人必将消失，人们必将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

三、马克思是一个彻底的和坚定不移的人道主义者。他对于在他看来是违反人性的社会所作的分析，每一行话里都体现了他对人的形象、人可能有的发展的肯定。单是他的“异化”概念——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意义的分析——便足以表现出他的人道主义。如果这还不够，我们只要再考虑一下他对金钱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高价值的无穷流弊所作的分析就行了。在马克思看来，正因为无产阶级如此脱离了人类本性，如此彻底地异化于他们自己的真正本性，他们才愿意为解放自己以及同时解放全人类而斗争。马克思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也就是说，人道主义的激进派。事

实上，直到今天为止，还有谁曾在这方面走得像他那样远呢？他甚至希望消灭一切陈旧的职业类型。他的理想是，每一个人并不只从事一门职业，而是从事多种多样的活动。现在只是片面发展的畸形的个人，应该变成“充分发展的个人……对他来说，他所履行的不同的社会职能不过是使他自己的先天和后天的能力得以自由发挥的许多方式罢了”。^①

四、马克思相信人类自由，既相信它本身，又认为它是运用人类理性的一项条件。譬如说，他曾经用一种可以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相媲美的措词谴责过“受检查的出版物”：“最大的罪恶——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② 他不止一次地谈过和鼓吹过“人的自由活动”。

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社会是“实行真正的民主，国家本身以及一切阶级全部消亡的一个政治社会”。他的理想是“自由的王国”，他借助这一概念接受和推进了古典“城邦”的想法。奴隶和主人将成为“真正的人——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人类尊严的人”。^③ 马克思所孜孜不倦地从事的工作的主要项目，就是揭示出能使这种自由真正化为人类现实的具体条件。

马克思从他当时所处的自由主义精神环境中吸收了这些理想——但有一个不同的地方。他批评自由主义社会的道德根据，正是那个社会本身宣布的理想——这些理想受到了认真的看待，并

① 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97页。——译者

②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译者

③ 关于马克思这些理想的文献根据，可特别参看《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哥达纲领批判》。并可参看本书第三章所载马克思的著作片断。

且被具体化了。他接受了从十八世纪启蒙主义继承下来的自由平等的理想。他从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手上接过了对进步本身所抱的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想法，并把它移植到自由主义社会的底层。

简言之，马克思所具有的一切积极的理想都是对人文主义传统的巨大贡献，而这个传统又体现了古典时期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对人的地位所抱看法的思想遗产。从道德上看，马克思所奉行的原则显然是西方文明那些鼓舞人心的原则的一部分。

我不打算作这样的暗示：仅仅因为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已被变成陈腐的官样文章和庸俗的意识形态，我们就可以不去研究它们。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所显示的理想的力量渊源于共同的西方传统，这种力量实在是太伟大了。它们被广泛应用这一事实本身，便限制了当权者选择政策的范围，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们的决策指导。因为人们在运用自己的权力时，往往为他们觉得有必要利用的漂亮言辞、为他们互相交易时应用的意识形态钱币所影响。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以至受雇于人的神话制造者和辩护士，都要为他们给自己做宣传的那套官样文章、为那种流行的意识形态统一体所影响。事实上，从一个不全面的角度来看，这种受影响的程度就是思想和理想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程度。

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最初，具有这些思想的人只是十九世纪欧洲各国首都一些反抗当时社会的学者，一些看来是微不足道的、对社会发展很少有关系的小集团——一种我们今天很不了解的人——后来，这些思想便逐渐成为工会、政党、群众运动、国家乃至巨大的国家集团的指导路线。在参加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和革命政治家以及广大群众的头脑中——后来也在各级官僚和国务活动家的头脑中，马克思的思想和根据这些

思想提出的口号指导着他们干出了翻天覆地的事业。整个整个的社会和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按照这些思想和口号作了根本的改变。今天，这些思想已经成为一系列国家的官方信仰，这些国家曾经是欧亚两洲最落后的成员，现在却已成为欧亚大陆上蒸蒸日上的强国。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成了最刻毒地攻击那些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立足根据的国家的张本。

(七)

本书所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我仍感到有必要简短地评论一下作为动因和理论的自由主义，因为我在本章中主要讨论的是理想和意识形态。^①

作为对理想的表白，自由主义仍然是动人的，但是就政治哲学的其他三方面——作为意识形态、作为对历史动因的指示以及作为一套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理论——而言，它的作用今天已大都变成了历史陈述。

自由主义在美国已成为大家公用的政治和道德口头禅，这一事实证明了自由主义理想之能够打动人心。但它也证明这些理想已经日益同促使它们实现的任何历史动因脱离关系。不言而喻，在抽象的和一般的目的上取得一致意见是比较容易的，而要在实现这些目的的各种具体手段是否必要和适当的问题上有一致看法，就要困难得多。自由主义所以在今天主要变成了官样文章，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我们很怀疑自由主义是否还能指出它所宣布的理想赖以实现

^① 为了不离开本书的主题，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讥为教条主义的危险，非常简略地谈一下自由主义。我在其他著作中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过自由主义的各种特点；因此，并不一定要读者接受这段对自由主义的简短评述，本书的主要论点才能成立。

的条件。它已经脱离了一切站得住脚的社会理论和任何有效的行动手段。因此，不管这些理想作为一套理想来说是如何美妙，它们即使在其抽象的和形式的条件下，也不再是有用的指导路线，很难有助于我们判断当前的世界情况，很难为那些打算凭人的意志有意识地变更历史事件进程的人提供帮助了。

作为一套理论——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系列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假定——自由主义今天已走到末路。“希求语气”已经如此流行，以致自由主义者往往显得完全脱离了当前的现实。我们所以很难弄清楚自由主义理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自由主义往往看不到那些大声要求人们承认的事实，因此同世界上许多地区发生的许多事情毫不相干。看待这些事实的自由主义方式也往往变得抱残守缺，使自由主义者不去考虑社会生活的结构状况和改变它们的必要。事实上，关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观点，往往只有一个把它看作某种巨大平衡体的模糊概念。他们对于当代历史、对于他们的国家或他们这一代人在当代历史中所处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坚定的看法。

自由主义曾经是我们时代中的一个阶级——都市企业主中产阶级——的坚定的意识形态。今天，这个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往往根本不起作用，他们的时代大部分已成为明日黄花。如果说自由主义的道德力量还能够抽象地鼓舞人心，它的社会学内容则显然薄弱已极：它的政治行动手段是前途无望的、不能令人信服的、没有想像力的。它没有关于社会中的人、关于作为历史缔造者的人的理论。它没有足以配合它所宣布的道德理想的政治纲领。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往往过分强调理想而忽视理论和动因。但他们所做的还不止于此。他们还往往这样来强调当前的动因和制度，

以致竟把它們变成了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理想。

作为一种动人的乃至有用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属于已经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各国中产阶级叱咤风云的那个时代；今天，作为意识形态和美丽动听的言辞，它的最主要用途已经是维护现状——少数富裕国家的现状——以及在全世界其他国家的面前维护这些国家，而不再是有意识地变更历史的一种信仰了。

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巨大问题，自由主义的回答只是拜物教式地大谈其“自由”和采取一系列反复无常的机会主义措施。世界正在挨饿，自由主义者却大喊“让我们使它自由！”世界已倦于战争，自由主义者却大喊“让我们武装起来保卫和平！”世界各国人民没有土地，自由主义者却只限于宣传“让我们祈求地主寡头分一点土地出来！”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及其保守主义变种今天最可悲的过错就是：它们过于偏狭，从而也就同当代世界的许多地区必须应付的种种重大问题毫无关系。

第二章 馬克思的貢獻^①

馬克思的著作在他的生前並沒有廣泛流傳。但是從他死後到現在，他的思想和道德感情、他的語匯，乃至他的一些偶然想法，都已經對世界歷史的進程產生了影響。不管馬克思主義此外還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它肯定是當代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現象——所以說是精神現象，是因為它的學說在政治上得到了應用。由於同樣的理由，它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現象。馬克思主義把思想和政治合而為一：知識分子、政治家、激情、設想、最冷靜的分析、最激動的道德控訴——所有這一切都結合了起來。它們迅速地、戲劇性地結合起來之後，便創造了歷史。

古典的馬克思主義或者一般地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價值，並不僅僅是歷史性的。它在今天還有直接的思想脈絡可尋。即使完全拋開政治或意識形態不談，馬克思的著作還包含着關於必須注意的社會成分和結構的廣泛說明。

不考慮馬克思的思想及其遭遇，我們便不能了解任何重要國家的歷史。它們在世界範圍內是如此重要，以致關於那些即使它們在那裡很少或者沒有起作用的國家，我們也要問一問：為什麼沒

① 為了便利起見，我在本書中沒有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分開，除去恩格斯在馬克思死後作了可疑解釋的很少幾個問題以外，我把他們當作“一個人”，統稱為“馬克思”，他們的著作一概稱為“古典馬克思主義”。我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把他們兩人的貢獻分別清楚，但是我覺得做這種嘗試沒有多大用處。不管怎麼說，以本書這樣短的篇幅而論，總是不可能進行這一工作的。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自貢獻以及關於其他許多方面的介紹，可參看他們的标准傳記：弗蘭茨·梅林：《馬克思傳》，紐約1935年版；古斯塔夫·邁耶爾：《恩格斯傳》，倫敦1936年版。

有起作用；而提出和回答这样的问题，则是最富有成果和启发性的研究工作。

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不管它是青年马克思的学说还是往日莫斯科的口号，我们都必须正视：（1）现代世界的一切人人皆知的争端；（2）社会科学中的一切大问题；（3）敏感的人今天感到的一切道德苦恼。而且，当我们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思索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看到这些争端、问题和苦恼都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将不得不对世界、对我们自己同世界的关系采取一种全面的观点。

（一）

在本世纪的目前二十五年中，苏联集团包含着可以同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相媲美的多种民族。但是，这些民族正在以过去大英帝国的成员望尘莫及的历史速度和彻底的方式发展着。一百年来，在世界的每一个地区，许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曾并且正在以马克思的名义思索和行动。在参加这些集团、运动、政党和国家活动的传奇式的人物中，有狂热分子，但也有谨慎的学者；有投机分子，但也有完全忠实的人；有生活放荡而思考严谨的人，但也有生活严肃而不重视正统思想的分子；有讨厌的学究，但也有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和极高明的政治家；有胆大无比的领袖，但也有由于怯懦而沉默的消极的胁从者。

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的共同之处肯定不是什么“阶级地位”：这方面的差别是很大的，尽管他们都以“工人阶级”来自我标榜。也肯定不是什么普遍的头脑聪明：许多人的智力都低得可怜。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信奉一套不断变化着的思想。

不论过去和现在，对于某些人说来，这种信仰不过是为追求权

力、地位和特权而权且披上的外衣。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有这样的男女，他们是如此认真地信奉这些思想，以致他们的外部历史同内心生活全是由这些思想形成的。即使是那些最带有投机性的人，在同事们的压力下，也不得不从原则角度来考虑权宜手段。“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句马克思主义口号，是它的一切理论家和实践者都必须奉行的。因此，不管动机和应用情况如何，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说来始终有重大意义，而这些思想则都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得来的。

他的著作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思想曾经——而且正在——对背景如此不同的男女产生如此深刻和广泛的吸引力呢？虽然对于大部分生活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说来从没有因为缺乏照顾和由于贫困而挨饿和长期患病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很少受到欢迎的，但是人类的大多数今天还处在这种贫苦的生活状况和死亡的威胁之中。对他们来说，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饥饿政治学；对他们来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内容”。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启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过去和现在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和思想力量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理想和动因、理论和意识形态能够联系得非常密切，甚至完全打成一片；它的前三种因素——理想、动因、理论——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下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启示：

你们毋需再贫困下去了。过去，不论何时何地，人们都是作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生活的。只要生产手段还不能为一切人提供足够的产品，这种不幸的状况也许就不可避免。

现在，这已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你们毋需再贫困下去了。

你们所以贫穷，并不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事或是没有能做什

么事，也不是因为什么“原罪”、什么“上帝的意志”或运气不好。你们的贫穷是由一些经济和政治状况造成的。这些状况就叫做资本主义。最初，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巨大的进步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为生产自己需要的一切东西建立了巨大的设施。

你们是贫穷的，你们是受剥削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你们还一直被剥削下去。因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种进步的力量了；它已阻碍人类的进步，阻碍你们的发展。它渗入了人类公私生活的一切方面，使它们都受到了腐蚀。资本主义是剥削你们的制度。

你们毋需再贫困下去了。给你们带来贫困的那些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它们就要被改变。资本主义本身就埋藏着毁灭它自己的种子。不论你们是否已意识到这一点，肯定将会发生的事情是：你们就要掀起一场革命。那些统治你们和使你们贫穷的人将要被推翻。这是人类向前迈进的下一步。你们就要迈出这一步。通过革命，你们能够彻底推翻资本主义。通过革命，你们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人对人的一切剥削；你们能够进入一个人类征服自然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时谁也不会再知道什么叫贫困，什么叫剥削了。

这段话是很难不一口气把它说完的——这段启示实在太有力了！它也理应如此。这段话里的事实、理论和预言现在姑且不谈，它所表达的希望和理想却肯定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无怪乎牧师们时常抱怨说共产党人讲的那一套“是从我们这里偷去的”。^①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讲，与其说是启示，倒不如说是“福音”——地地道道的“好消息”。

要了解这种福音，必须了解它所吸引的是些什么人。今天对

^① 例如可参看詹姆斯·派克主教的文章，刊于《纽约时报》，1961年2月24日。

这个问题的重要回答是：它在贫困的国家中吸引了许多头脑聪明而机灵的人。世界人口的大多数都生活在这类饥饿的国家之中，而这些国家目前正处于一种非常动荡不安的境地。今天已不再有什么“不变的东方”、什么“停滞不前的原始的非洲”和懒洋洋地坐着晒太阳的拉丁美洲了。这些大陆上的各个民族正在吵吵闹闹地要求享受工业化的果实，而且有许多民族出于充足的历史理由，拒绝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获得它们。在可以供他们模仿的工业化范例中，就有几种马克思主义的货色。

布尔什维克革命提供了一种谋求发展和走向现代化的动人范例。它目前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至少是，如果我们认为世界政治中的头等长远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将选择什么方式的话。马克思主义向这些人并且为这些人说话，于是，它在这样做的时候便同自由主义展开了竞争。

马克思的著作整个说来乃是对一种所谓不公平现象不断提出的愤怒控诉，这种现象就是：一个人的利得、舒适和奢侈，是以另一个人的损失、痛苦和匮乏为代价而获得的。如果说，在以他的名义建立的社会以及当初他决不会知道的一种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把这种不公平的形式和由来弄错了的话，那么，此外也还有千百万人相信他的控诉。即使它不得不再重新加工、扩大、修正乃至完全改造，它在许多人看来仍然是伟大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我已经指出过的特点：在它身上，理想和动因是密切结合着的甚至难以分辨的。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空谈理想，而是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发展——以无产阶级革命为高潮的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这些理想现在就要开始实现。关于这一论点，我们将在以后几章中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指出：作为一种精神战略来说，这种坚持宿命论的做法是意识形态的

启示所以具有道德力量和令人信服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

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现在是中苏政治世界的一个官方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们也是一切诚实的学术世界非官方的一部分。由于它的思想范围的广阔、理论内容的精彩以及它的意识形态启示的政治力量，马克思的思想已经真的成为一个既作祟于又吸引着非马克思主义世界的怪影。

如果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就无法了解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思想史。毫无疑问，马克思是属于社会学思想的古典传统之列的；事实上，在这个传统之中，我们很难再举出另一个像他那样有影响和居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家了。几乎所有重要的近代社会思想家都在研究的那些范畴本身，就是马克思提出的。正如人们时常提起和时常忘掉的那样，近百年来社会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或多或少是一种同马克思进行的长期答辩。这种社会学答辩往往是隐蔽的，甚至没有为卷入其中的几代思想家所意识到；但是不管它是否被人们意识到，这的确是现代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中的一条主要线索。

这并不等于说：过去一百年的社会学思想在政治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不是这样。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最精湛阐释的马克思·维贝尔，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索尔斯坦·凡勃伦的许多著作都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能干的再加工，为他那个时期的美国学术界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新政提供了不少启发。凡勃伦对谈论理想抱着嘲笑和厌恶的态度，因此我们不大看得清他的政治观点，但是他骨子里很可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卡尔·曼海姆用他那关于认识论问题的社会学，在发挥意识

形态理论的工作中比任何人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他把马克思未经琢磨的若干创见变成了一套不可缺少的深奥的研究方法。曼海姆最初在匈牙利是一个革命者，但在法兰克福期间以及后来在伦敦期间，政治上却逐渐转向左派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始终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每一代从事精神活动的人都从他们继承的思想中吸取所需要的东西，这对马克思的思想说来也不例外。每一个能够自由接受和拒绝的人，将自己作出选择。我们需要说的话非常简单，这就是：马克思是十九世纪最出色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家。在古典社会学的传统内，他为我们提供了据以考虑政治和文化问题的一套最基本的统一体系。马克思不是这个体系的唯一泉源，他并没有完成一个像今天这样完备的系统。他没有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有许多问题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

然而，如果今天先研究一下他的著作，然后再回过头来考虑我们本身的问题，这就会使我们受到启发，增加获得用以处理问题的有用的思想和解决办法的机会。如果我们掌握了马克思的作品主体，明确地接受、拒绝或修改我们在其中发现的东西，肯定也就会通过我们自己的思想发展，把握住过去一百年来所发展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各个中心主题。

(三)

马克思设想出了一种真正包罗万象的社会科学；事实上，他也的确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他设计的模型在理论上是无所不包的，涉及到所有的社会现象；许多一般都不认为是——甚至现在也不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东西，全被包括在他的概念和理论之中了。马克思留下的遗产对于现时代

具有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此：在于他的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在于他企图提供解释的范围的广泛。我认为，在很大一部分社会研究——尤其在美国——最近已日益流于繁琐偏狭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当是一种特别吸引人的挑战。

马克思不受任何学科或专业界限的束缚。在他的著作中，现在在叫做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那些东西全都被用上了。马克思利用它们建立了一套关于以下各个问题的完整理论：(1)一个社会的整个结构；(2)这个社会的历史的例行程序；(3)具有一切细微心理差别的个人的作用。

此外，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还构成了一种社会研究模型。这些因素并不只是以松散而模糊的方式相互制约着的。在这个模型中，它们——姑不论是否符合事实——彼此之间具有密切的特定联系，并且各自具有决定历史的重要意义。这些被认为存在的联系和重要性，当然是马克思特有的理论。总起来看，它们构成了马克思最一般的社会理论：关于历史变化和革命在历史变化中的地位的理论。

这种从结构上看整个社会的做法，是应用一种古典社会学思想方法的结果。借助于这种办法，马克思把当时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化成了关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具体说法。这样，他就把经济学概念和社会学概念结合起来，建立了一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模型。然后，他再利用这一研究模型，发展出一系列关于这个社会的内部情况和未来前途的理论。^①

模型和理论之间的这种分析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当我

^① 此处所采取的关于结构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观点，可参看《人的意象》(Images of Man)有几个论点就是从该书得来的；还可参看《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的设想》。

们想了解某种事物的时候，总是需要注意一些因素，而模型就是对这些因素的一种多少具有系统性的全面介绍。模型是谈不到真伪问题的；我们所着眼的只是它的有用和完备程度。与此相反，理论则是一种能够证明其真伪的关于模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决定历史的重要意义的说明。

只有根据这种区别，我们才能够理解马克思的著作何以是真正伟大的，又何以包含着这样多的错误、含糊或不足之处。他提出的模型是马克思主义中伟大的、也就是有生命力的部分。他提供了一种考查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古典工具。后来所以有这样多彼此迥然不同的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其原因就在于此。马克思的观点之所以往往是错误的，部分原因是他在1883年就去世了，部分也要归因于他没有能像我们今天这样仔细地运用他自己的工具，而且这种工具本身就有一部分需要改进乃至重新设计。然而，历史上终究要有一部分事物逐渐陈旧过时；就这一点而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也在所难免。

不论马克思的理论真伪与否，这都不能证实他的模型是完善的。这个模型可以被用来构成许多理论，也可以被用来纠正它帮助构成的那些理论中的谬误。它本身就有许多可修改的地方，有种种方式能使它变成更有用的分析工具，并且在经验上更接近于事实的进程。

(四)

马克思认为，要有效地研究人类和社会，就决不能脱离历史。他不仅这样想，并且这样做了。在他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研究模型中，他指出了一切制度和心理方面的特点，也说明了他所认为的每一个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他应用这一模型时，并不仅仅把它

当做“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而且以一种积极的历史方式来从事研究，指明构成模型的各种因素和力量之间的变化关系。因此，他的著作所包含的模型不仅显示出整个社会的结构，而且展现了那个结构的历史变动情况。

他所研究的不是转瞬即逝的现在，也不是静止不动的模型。他所研究的是具有一段特定历史时代——当时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趋势。他根据自己的社会结构模型和历史理论，设想了在他看来是“世俗的”并且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发展趋势。这样，他就提供了一幅可能出现的未来图景。这一历史具体性原则首先是社会研究与思考的法则，其次是一种在论战中批评其他理论和概念的方法，最后它也是一种关于社会生活本质和历史本质的理论。

(1) 作为一种研究法则，它指导我们依据一个特定的时代来阐述我们发现的趋势和规律，警告我们不要超出这个时代的范围作一般的概括。我们并不研究“一切社会生活的一般状况”；我们只研究“它们在今天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具有的具体历史形式”。^①因此，根据这一原则，我们是无法预测从现在到未来的具体数量变化的，也不能按照今天的时代回过头去解释过去的时代。我们必须“以时代眼光”去考虑问题。每一个时代都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它创造了新型的男女；而不论是新社会或新人，都是不能从旧时代的角度来理解的。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研究目前的时代，努力从中辨识出导向下一个时代的那些趋势。

(2) 作为一种批评其他概念的方法，历史具体性原则引导我们认识到，概念和范畴并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同它们所涉及的时代

^① 参看卡尔·科尔施：《卡尔·马克思》，纽约1938年版，第38页。

相依存。它们在历史上是具体的：譬如说，“财产”在一个小企业主社会中是一回事，在一个由大公司统治的社会中则是另一回事。与此相似，“自由”、“地租”、“劳动”、“人口”、“家庭”、“文化”等等，都随着它们所涉及的时代的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含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最根本的指责，也许就是他们的思想范畴本身的非历史性。

(3) 作为一种关于社会和历史本质的理论，历史具体性的原则表明，人类历史可以而且也必须划分为若干个时代，每一个时代都为它具有的结构形式所规定。我们所说的“规律”，只是意味着这个或那个时代所特有的结构变化的例行程序。在一个时代的内部，变化是一步步发生的；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则是通过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从一次革命演变到另一次革命，每次革命都造成了一个新时代。而我们在研究每一个时代的时候，也就必须根据适合于该时代的范畴，把它当成一个独立的历史形态来考察。

(五)

马克思对“人性本质”的看法，关于人目前是何物和应该成为何物的观点，是紧密联系着一定的社会类型和具体的历史时代得出的。他的人性观在我看来是不完整的，但他在人性问题上的大部分看法，都同现代社会心理学最有说服力的论点相符合。他强调指出，单从“人性”的固有限制或能力出发，很少能解释社会和历史。马克思认为，对于任何现存的或可能出现的制度来说，人性都不是不变的和不可避免的决定性支柱。它同特定社会的性质——以及社会内部的阶层——有很大关系。历史具体性的原则也适用于人性本质的问题。

譬如说，马克思曾这样谈到杰雷米·边沁：“边沁……用他的极干燥无味的素朴性，把近代的买卖人、特别是英国的买卖人看作是标准的人。一切对这种奇怪的标准人及其世界有用的，就绝对是有用的。他还用这个码尺来衡量过去、现在和将来。”^①

马克思在别的地方还进一步指出：“一边是现代的工业与科学，一边是现代的贫困与腐败，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这种当代的生产力和状况之间的矛盾，是一桩十分具体的、触目惊心的和无可否认的事实。某些政党可能也希望消除现代的冲突……[但是]我们知道，为了实现美好的生活，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只需要‘新人’。”^②

“人”几乎具有无限的潜能。在他的假设和思考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从伦理哲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本性的十八世纪传统。在人性中，自由和理性是相互一致的，而等到进入“人”征服自然的共产主义，当人们赖以生活与发展的一切手段已为每一个人所享有的时候，二者都将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发扬光大。正如亚当·斯密的《道德感情论》使我们想起了乔治·赫伯特·米德^③的“社会行为主义”一样，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其他早期著作，也使我们想起了最晚近的社会心理学。

单是马克思关于社会研究的适当内容及其目标和方法的理论，就足以使他的著作成为有助于现代社会研究分析的骨架。如果说有效的哲学是能够帮助人们从事研究的哲学，那么，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便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哲学。通过利用他的指导路线，

① 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65页。

② 转引自卡尔·勒维特：《历史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芝加哥1950年版，第36—37页。

③ 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美国哲学家、社会心理学家。——译者

特别是历史具体性的原则，我们将在以下各章中说明古典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如何有助于批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总之，马克思的思想在他自己的理论体系中确实是如何容易被修正。

第三章 古典思想家

马克思在 1883 年去世时留下的著作是比较芜杂的，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完整地 and 系统地总结过自己的思想。而且，马克思的不少著作都是同别人进行论战的文字，其中有许多今天只剩下了一点点历史意义。正如大多数复杂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统一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作出什么样的说明，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比较一下后世各政党各学派的思想家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选择和强调的东西，一定是十分有趣的。我们很容易写出一部关于这一问题的有价值的著作。马克思有他作为鼓动家的一面——于是人们纷纷编纂他在意识形态上给人以启示的那些作品，马克思有他作为经济学家的一面——于是人们纷纷重印和缩写《资本论》；马克思还是一个历史学家——也许这是他最经常为人忽视的一面。最近，作为历史哲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的马克思，以及作为人道主义者和道德家的青年马克思也受到了重视。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

然而，如果读者要求从短短几句话中了解马克思的思想要点，那么，恐怕没有一个人更能像马克思本人那样使他们感到满意了；下面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总结”的一段话——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片断。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各种名词将在下一章中予以解释。

卡尔·马克思：唯物史观^①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卡尔·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①

这位作者^②，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自序——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论基础——中引用一段话之后，接着说：“马克思认为唯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他从事研究的现象的法则。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就这些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具有明确的形态并相互联系这一限度内支配着这些现象的法则。他认为更重要

① 参阅《第二版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4—17页。

② “这位作者”指评论家考夫曼。

的,是现象变化的法则、现象发展的法则,即由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由一套关系转变到另一套关系的法则。

这种法则一经被他发现,他就详细地研究这种法则在社会生活上表现出来的结果。所以,马克思只关心一件事:通过严密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状况前后相继的一定序列的必然性,并尽可能公正地证实他当作基本出发点的种种事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只要证明现在的秩序有其必然性,同时又证明另一种秩序也有其必然性;不管人们是否相信,也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现存的秩序总是一定要推移到另一种秩序中去的。马克思把社会的运动看作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支配这个过程法则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却反而决定着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如果说意识因素在文化史上起着次要的作用,那就不说自明,以文化为论题的批判探讨尤其不能以意识的任何形态或结果来作为它的基础。这就是说,只有物质现象而不是观念才能成为这种批判探讨的出发点。这种批判探讨将限于拿一个事实同另一个事实比较对照,而不是同观念比较对照。对于这种探讨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两个事实必须尽可能正确地加以研究;它们实际上彼此相对地成为一种演变的不同的发展要素。但最重要的是要严格地分析各种秩序的序列、这种演变的各个发展阶段赖以出现的次序和联系。

可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法则是完全相同的,既适用于现在,也适用于过去。但这正是马克思所否定的。据他看来,这种抽象的法则是不存在的。正好相反,他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法则。……当社会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而陷于停滞,并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时,它就立刻开始也受其他一些法则的支配。总之,经济生活上表现的一种现象同生物学其他领域

内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的经济学家把经济法则比之于物理学或化学的法则时，误解了经济法则的性质。更深刻地把现象分析一下，就知道各种社会有机体同各种动植物一样，彼此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由于各种有机体的全部构造不同，由于它们的个别器官有差别，由于那些器官在不同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等等，同一个现象须受完全不同的法则的支配。例如，马克思就否认人口法则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相同的。相反地，他主张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它本身的人口法则。……随着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不同，社会条件和支配那些条件的法则也有所不同。当马克思从这个角度去从事研究并说明由资本的势力所确立的经济制度时，他不过是以严格的科学态度表述了经济生活的每一种正确的研究所必须抱有的目标。

这样一种探讨的科学价值，在于说明一定社会有机体的发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它由另一个更高级的社会有机体来代替的事实，是受着怎样一些特殊的法则支配的。马克思的这部书实际上就具有这种价值。”

既然这位作者如此惊人地和〔就他谈到我自己对方法的应用而言〕好意地描述了他认为确实是我的研究方法，他所描述的不是辩证法又是什么呢？

说明的方法在形式上当然要与探讨的方法有所区别。后者必须掌握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的发展形态，探索出那些形态的内在联系。不先完成这项工作便不能恰当地说明实际的运动。如果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如果论题的生命像在一面镜子里一样无可疵议地反映出来，那就可以看出，好像我们的面前有着一个纯粹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法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是它的直接的

对立面。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他甚至用“观念”这一名称把它转化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是现实世界的造物主，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外部的和可以认识到的形式。相反地，我认为观念不外是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出来的并变成思维形式的物质世界。

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①

一个怪影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怪影。旧欧洲所有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探，都为神圣地驱除这个怪影而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那些当权的敌人咒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骂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的敌人呢？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了。

现在，共产党人已经应该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出自己的党的宣言来对抗那关于共产主义怪影的神话了。

为了这个目的，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共产党人就集会于伦敦，拟定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兰德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 资产者与无产者

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5—491页。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地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简短些说，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抗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不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就是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可以看到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地位构成的整个阶梯。在古代的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和农奴，并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特殊的等级。

从灭亡了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矛盾。它不过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罢了。

但是，现今的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使阶级矛盾简单化了：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即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间产生了初期城市的自由居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间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和环绕非洲的航路的发现，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资料 and 一般商品的增加，给予了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未有的刺激，因而也就促进了崩溃着的封建社会内部所产生的革命因素的迅速发展。

以前封建的或者行会的工业组织已经不能再满足随着新市场的扩大而增加的需求了。于是，就有工场手工业取而代之。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层等级排挤掉了；各个同业公会间的分工也就从此消失，由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所代替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这种需求了。于是，蒸气和机器就引起了工业中的革命。现代的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批批产业军的统领，即现代的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层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引起了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工具的大规模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范围的扩大，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发展，资产阶级也越发发展了，它越发增加自己的资本，越发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了。

由此可见，现代的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和交换方式多次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这样每发展一步，都伴随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它在封建主统治时期是一个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面是一个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又组成君主国中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的君主国里或专制的君主国里与贵族相抗衡的势力，并且是一切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确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揽的政治统治权。现代的国家政权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凡是资产阶级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它就把所有封建的、宗法的和纯朴的关系统统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那些使人依附于“天然的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即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高尚激昂的宗教虔诚、义侠的血性、庸人的温情，

一概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冷水之中。它把个人身价溶入交换价值，它把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都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来代替了。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冷酷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素被尊崇景仰的职业的庄严光彩。它使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受它雇用的仆役。

资产阶级撕破了笼罩在家庭关系上面的温情脉脉的纱幕，把这种关系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中世纪那种深受反动派称许的蛮悍勇武举动，自然是和怠惰因循习气相辅相成的。它首次证明了，人类的活动能够取得怎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同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哥特式教堂根本不同的艺术奇迹；它举行了同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完全异趣的远征。

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瀆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

由于需要不断扩大产品的销路，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奔走全球各地。它不得不到处钻营，到处落户，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

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既然把一切生产工具迅速改进，并且使交通工具极其便利，于是就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都卷入文明的漩涡里了。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已经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规模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了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依赖于城市一样，它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

资产阶级一天天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等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原先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是由联盟联系起来的，各有其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税则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制、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统一的税关的民族了。

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和交换资料，都是在封建社会里面造成的。在这些生产和交换资料发展到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制造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促进生产而是阻碍生产了。它们已经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们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和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治。

现在，在我们眼前又发生着类似的运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和交换关系，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象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象一个魔术师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所以，几十年来的工商业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

代生产关系的历史，即反抗那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周期性的而且愈来愈凶猛地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每次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也被毁灭掉了。在危机期间，发作了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好象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转瞬间回复到突如其来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大饥荒、一场毁灭性的大战争，完全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规模太大。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是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的呢？一方面是破坏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榨取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了封建制度的那个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可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同时它还造就了将运用这武器来反对它自己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的工人阶级也就愈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能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但是他

们又只有当他们的劳动还能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能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如同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也不免要受到竞争方面一切偶然情况的影响，也不免受到市场方面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采用范围的扩大和分工程度的增加，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就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已变成机器的简单附属品，他所担任的只不过是一些极其简单的、极其单调的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也就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命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一切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都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但如此，机器的采用范围愈广，分工愈细，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操作过程的加速，等等。

现代的工业已经把宗法性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编制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小兵，受着整批士官和将校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者阶级的奴隶，不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本厂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横制度愈是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发财，那末它就愈显得刻薄、可憎和令人痛恨。

手工劳动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的工业愈发达，那末男工劳动也就愈受到女工劳动和童工劳动的排挤。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是劳动工具，仅仅因为他们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而需要有多寡不一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們的剝削告一段落，工人們终于領到了用現錢支付的工資的時候，馬上就有資產階級中間的另一部分人——房東、店主、高利貸者等等，紛紛奔向工人們了。

中層等級的下層，即小工業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業者 and 農民——所有這些階級都降落到無產階級的队伍里來了，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小資本不夠經營大工業，經不起大資本家競爭；有的是因為他們的專門技藝已經被新的生產方法弄得一錢不值了。無產階級的队伍就是這樣從居民中間的各個階級補充起來的。

無產階級經歷了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是從它開始存在的那一天開始的。

最初是個別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廠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某一勞動部門的工人，同那直接剝削他們的個別資產者作鬥爭。他們攻擊的對象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並且是生產工具本身；他們毀壞那些來競爭的進口貨，搗毀機器，放火燒毀工廠；他們力圖用強力恢復已經失去的中世紀工人的地位。

在這個階段上，工人們還是分散在全國各處、因為相互競爭而聯合不起來的人群。這時候，工人群眾的團結，還不是由於他們自己的聯合，而僅僅是資產階級聯合的結果，當時資產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曾經不得不發動、並且暫時還能夠發動整個無產階級投入運動。所以，在這個階段上，無產階級還不是同自己的敵人作鬥爭，而是同自己的敵人的敵人作鬥爭，即同君主專制的余孽、地主、非工業資產者和小資產者這些人作鬥爭。因此，這時的全部歷史運動都操在資產階級手里；在這種條件下取得的每一個勝利就都成了資產階級的勝利。

然而，隨着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集合成為廣大的群眾了。它的力量日益增加，它自己也日益感覺到

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各种劳动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少，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变本加厉的竞争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得工人们的工资愈加摇摆不定；由于机器日益迅速的发展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得无产者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工人们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一致起来保卫他们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时使自己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成为起义。

工人们有时也得到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实成果并不是直接得到的成效，而是工人们的越来越大的团结。促进这种团结的，是由大工业所造成的愈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因为这种交通工具使各地工人彼此有了联系。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只在地方范围内发生而性质又都相同的斗争汇合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阶级的斗争了。本来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中世纪的市民因为交通梗阻而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无产者因为铁路交通便利而只消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这样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因工人们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生，并且每一次都显得更加强大，更为坚固，更有威力了。它乘资产阶级各个阶层互相争执的机会，迫使他们用立法手续承认工人个别利益。英国颁布过十小时工作日法律就是一个例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的发展。资产阶级进行不断的斗争，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抵触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

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免要向无产阶级呼吁，不免要向无产阶级求援，因而不免要把无产阶级卷进政治运动里。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一部分知识授予了无产阶级，也就是把反对自身的武器授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知识。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显得非常强烈，非常尖锐，这就使得统治阶级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主人翁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间有一部分人曾经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间也有一部分人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这就是已经提高到在理论上认识全部历史运动进程的一部分资产者思想家。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层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他们将来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的观点。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腐化的消极产物，他们虽然间或被无产阶级革命卷进运动里，但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条件却使他

们更甘心被人收买，去干反动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间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私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是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完全不同的；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也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已经使无产者失去任何民族性了。法律、道德和宗教，在他看来全都是掩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权之后，总是力图把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巩固起来，使全社会都服从那保障它们的占有方式的条件。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现有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至今存在的占有方式，才能获得社会的生产力。无产者本身并没有什么必须加以保护的东_西，他们必须打破至今保护过和保障过私有财产的一切。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_最下层，它如果不摧毁压在自己头上的、由那些组成官方社会的阶层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腰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那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总是民族的斗争。每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首先当然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以及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的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有过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

压迫阶级的对抗上面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某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农奴制度下的农奴曾经挣扎到公社社员的位置，正如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下的小资产者曾经挣扎到资产者的位置一样。相反，现代的工人却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每况愈下地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水平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上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全社会了。资产阶级再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再使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般的生活的水平了，因为它不能不让自己的奴隶们落到这样的地步，以至它必须养活奴隶，而不是由奴隶来养活它了。社会再不能在它的权力下面生活下去了，也就是说，它的生活再不能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者阶级赖以生存和统治的基本条件，是财富积累在私人手里，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制。雇佣劳动制是全靠工人自己的自相竞争来支持的。但是，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却使工人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与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并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一个特殊政党。

他们并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并不提出什么想用以限制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的原则。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

所以，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是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某一个世界改革家所臆想或发现的思想或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当前进行着的阶级斗争的真实关系的总的表述，不过是现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历史运动的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更替，都遭到了经常发生的历史的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

出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人们亲自获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消灭那种构成一切个人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所得的、自力挣得的、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所有制吗？那种所有制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早就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还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什么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亦即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演进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也只有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动作起来。

由此可见，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

所以，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不过是所有制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为工人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结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直接

供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我们决不算消灭它，因为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我们要消灭的仅是这种占有的悲惨性质，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的劳动只不过是扩大、丰富和促进工人的生活过程的一种手段。

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着现在，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则是现在支配着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

但是，资产阶级却硬说消灭这种关系就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呢；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个性，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独立性和资产阶级的自由。

在现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只不过意味着贸易的自由，买卖的自由。

可是，买卖一旦消灭，自由的买卖也就会随之消灭。我们的资产者高谈自由买卖的论调，也如同他们其他所有一切高谈自由的大话一样，本来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些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要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消灭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今社会里，私有制在十分之九的成员中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在十分之九的成员中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

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是的，我们确实要这样做的。

你们声明说，从劳动不能再变为资本、货币和地租的时候起，简单地说，从劳动不能再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即从个人的所有制不能再变为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那末，你们自己承认，你们所认为个性的，不外是资产者，即不外是资产阶级的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该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旦消灭，一切活动都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代之而兴。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应该早就因为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一切顾虑，都归结为这样一句同义反复语：一旦没有了资本，也就不会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于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同时又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消灭阶级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消灭生产本身，同样，消灭阶级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变为机器的附属品罢了。

然而，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的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见解来衡量我们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末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吧。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资产

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奉为法律的你们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颇观念，驱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生产发展过程中暂时的历史性的关系夸大成为永久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而你们的这种偏颇观念原是从过去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一谈到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敢去理解你们在谈到古代的所有制和封建的所有制的时候能理解的那种道理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恶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完全发展的形态，只有在资产阶级中间才存在着，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

资产阶级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逝而消逝，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灭而消灭。

或者你们责备我们，说我们要废止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吧？我们甘愿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却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难道你们的教育不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教育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阶级中间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因为大工业的发展而陷于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被变成简单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那末资产阶级的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亲密关系的那一套大话，就愈是令人听来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把自己的妻子仅仅当作一种生产工具看待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联想到妇女也会遭遇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连想也想不到，问题正在于要消灭妇女被当作简单生产工具看待的这种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对于共产党人要实行莫须有的正式的公妻制表示惊骇，那是再可笑也没有的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因为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就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享乐呢。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所以至多也只能这样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可是，只要现代的生产关系一消灭，那末从这种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娼妓制，自然就会随之而消灭。

其次，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什么他们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

个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孤立性和对立性日益消逝下去。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联合的努力,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努力,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而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哲学和一般思想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我们详细地探讨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这一点难道需要有什么特别的深奥思想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岂不是证明,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人们说,思想能够促使整个社会革命化,其实人们这样说只不过是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解体与旧生活条件的解体是同时进行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击败了。当十八世纪基督教思想在启蒙思想的打击下陷于灭亡的时候,封建社会曾经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知识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然而”,——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和法的等等观念,当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改变过的了。但是,宗

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不断的改变的过程中却是始终保存着的。

“此外，还存在着一些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却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把他们革新；可见，共产主义是同过去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

这种责难究竟有什么意思呢？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演进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又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这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一切世纪所共有的事实。所以，毫不奇怪，各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定的共同的形态中演进的，也就是在那些只有随着阶级对立的彻底消逝才会完全消逝的意识形态中演进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不谈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

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1. 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

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卡尔·马克思:资本主义的革命转变^①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它的历史起源究竟归结为什么呢?只要它不是由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工资劳动者,从而不仅仅是形态的变化,那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也就是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与社会的集体的所有制相反,私有制只存在于劳动手段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所有的地方。不过,看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不劳动者,私有制会有不同的性质。私有制乍看起来表现出来的无数色调,是符合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各个中间阶段的。

劳动者对于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农业、手工业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小经营的基础;而且,这种小经营是社会生产和劳动者自己的自由个性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然,这种小的生产方式也存在于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一些从属关系之中。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他本人使用的劳动手段的私有者(譬如农民是他所耕作的土地的私有者,手工业者是他以专家资格操纵的工具的私有者)的地方,这种小的生产方式才会繁荣,才会发挥它的全部力量,才会取得适当的典型的形态。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各种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排斥这些生产资料的集中,同样地,它也排斥合作,排斥同

^① 参阅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962—965页。

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于自然力的控制和用之于生产，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生产方式只能适合于在狭隘的和比较原始的范围內活动的一种生产制度和一种社会。要使这种生产方式永世长存，那就像珀克尔正确地指出的，等于是“颁布实行普遍的平庸之道”。这种生产方式只要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就会带来破坏它自身的物质手段。

从这时起，社会的内部就有新的力量和新的热情迸发出来；但旧的社会组织束缚着它们，压抑着它们。它必须被消灭；它被消灭了。它的消灭，个人化的和分散的生产资料之转变为社会所有的集中的生产资料，许多人零碎的所有权之转变为少数人大规模的所有权，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土地、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之被剥夺——人民大众所受的这种可怕而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历史的前奏。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暴力的方法，其中我们只能考察那些作为资本原始积累方法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方法。直接生产者的遭受剥夺，是以残酷的蛮风在最可耻最丑恶最卑劣最可厌的欲念的冲动下进行的。靠自己的力量挣到的私有制，即以个别独立的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融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就被以剥削别人的名义上自由的劳动、即工资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了。

只要这个转变过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足以分解旧社会，只要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独立存在，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被社会所利用的、因而是共同的生产资料，以及私有者的进一步被剥夺，就要采取一种新的形式。现在要加以剥夺的，不再是自己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劳动者的资本家。

这种剥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由资本的集中来完成的。一个资本家经常杀死许多资本家。和这种集中或许多资本家为少数资本家剥夺的现象在一起，劳动过程的合作形式、科学的有意识地用于技术方面、土地的有计划的发展、劳动手段的变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手段、一切生产资料由于用作协作的和社会化的劳动的生产资料而产生的节约、各国人民的卷入世界市场的巨网，从而资本主义统治的国际性质，就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发展起来。篡夺并垄断这一转变过程的一切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人数在不断减少，同时，穷困、压迫、奴役、退化、榨取的总量却在增加。但与此同时，人数始终在增长的、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的作用所训练、统一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在加强。资本的垄断变成和这种垄断一起产生、繁荣并在其统治下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终于会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种外壳会四分五裂。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将被剥夺。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产生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对于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规律的必然性招致它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并不是为生产者重新确立私有制，而是给他那种以资本主义时代已有的造就——合作以及共同占有土地与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

由个人劳动产生出来的分散的私有制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比起那种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的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之转化为社会化的所有制，自然是一个远为持久、残酷和艰苦的过程。在前者的情况下，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大众；在后者的情况下，是人民大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①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维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关于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所附《关于费尔巴哈》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8页。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分离，并在云霄中为自己建立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族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 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 所以，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七)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①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5—209,217—218,228—229,245—247页。

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

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大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

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现在，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 and 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就发现新制度不论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统治。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

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主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式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

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是他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庞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

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桎梏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

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过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 **中世纪社会**: 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 **资本主义革命**: 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些矛盾的基本矛盾。

(a) 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 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 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罪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 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 **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

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第四章 馬克思的主要思想

在我看来，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特色就在于：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同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实际运行情况联系着的。他从实际发展着的现社会中看出若干趋势以后，便根据他对这些趋势的设想勾画出了一幅未来社会——他希望在资本主义灭亡后出现的社会——的图景。他所以拒绝——至少是在他的思想已经成熟时——宣布自己的理想，其原因就在于此。在道德方面，他当然是谴责现状的。在社会学方面，他指出了他所谴责的那些东西造成的后果。在政治上，他使人们注意到历史变化的动因——无产阶级——并且以各种事实和数字、理论和口号来证明：人的动因和他所暗示的目标之间这种日益发展的联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趋势。因为通过这一内部动因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就会被推翻，社会主义社会就会被建立起来。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产生，是资本主义必然王国内部的主要动力。这个力量正在推动资本主义通过革命跃入社会主义时代，跃入自由的王国。

这种把理想或目标同动因联系起来的做法，既是一种道德上的策略，也是一种思想上的策略。它使馬克思同那些被他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区分开了。这种固有的动因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之间的联系，成了一根政治枢轴，他的社会模型的各个重要方面以及与该模型内部的历史趋势有关的许多特定理论，都围绕着这根枢轴而旋转。此外，它还为社会愿望所体现的道德不满提供了一个集中表现于社会理论中的机会，有时也为自由主义理想

提供新的集中表现途径。结果，这便导致马克思的学说极其暧昧不明；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不断地重新审查他的学说，对之加以重大修正或为之发生玄而又玄的争论，都是由理想与动因之间的这种联系引起的。

解释这种固有的历史动因借以发展的经济和心理作用，说明这种发展如何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被推翻——这些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而解释这种发展被推迟的原因，寻求加速和推动发展或耐心等待的方法——这些则是后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起点。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高度有条理，它的各项原理之间的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在主要动力——推动无产阶级发展和投入革命行动的力量——问题上有始终一贯的看法。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便不会歪曲整个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必须暂时不加评论地扼要罗列一下古典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概念和命题。^①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整个结构，也决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心理。

政治、宗教和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借以了解他们所居住的世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和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所有这一切都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

这一命题所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社会模型内部的一项重大区别：经济基础（又称为经济生产方式或基础）不同于社会的其余部分（称为上层建筑或制度和意识形态）。马克思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包括在经济基础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主要指的是私有财产制度和由此形成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关

^① 本章没有直接引用马克思的话，但我相信读者自会看出这些内容的出处。

系。生产力是一个更复杂的概念，既包括物质因素也包括社会因素：(a) 用作劳动对象的自然资源，如土地和矿藏；(b) 工具、机器、工艺等物质装备；(c) 科学和工程学，发明或改进这种装备的人们的技艺；(d) 利用这些技术和工具实际劳动的人；(e) 劳动分工——就这种社会组织能提高生产率而言。

(二) 历史变革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关系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资本家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再也找不出比马克思的《资本论》更热烈的颂扬了。但是，经过一定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生产关系——就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它们同生产力客观上发生了矛盾。据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矛盾”指的是一个社会所固有的、如果不变更或“越出”这个社会的基础便不可能解决的问题。而对马克思来说，所谓“基础”就是指资本主义经济。

技术的不断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充分应用，同有产者的利益发生了矛盾。于是，资本家便阻挠新发明的应用，收买发明，把它们隐藏起来，以避免损失他们在现有设备上的投资。只有在能够维持或增加利润的时候，他们才关心提高生产率和改进技术。这样，资本本身便成了“资本增殖的真正历史障碍”。

(三) 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客观经济矛盾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反映。

这种矛盾在资产阶级社会不同阶级的成员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应。简言之，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客观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中有它“主观的”对应部分。在这一斗争中，工资劳动者代表扩大的生产力，资本家则要维持原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财产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对无产阶级的剥削。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个客观的序列、一种辩证法、一系列矛盾

和矛盾的解决。同时，历史也是阶级斗争史。这两种看法在马克思主义中是十分一致的。因为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力在发展过程中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就会引起革命，而革命则将通过阶级斗争、一种由客观的经济矛盾引起的斗争来实现。

这个问题也可以按照“辩证”法作更抽象的说明。在马克思看来，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现实，从一开始就都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并且会变为自身的反面。辩证法是一种通过考察它的矛盾而不是它的和谐来了解社会结构演变史的方法。用普通话简短地说，“辩证法”包括以下各项内容：(a) 如果事物变到足够的程度，它就会发生和原来的事物根本不同的质变；(b) 一个事物由另一个事物中产生，然后成为它的对立面；(c) 因此，历史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和矛盾的解决而不是仅仅通过细微的和逐步的变化向前发展的。

(四) 作为收入来源的财产是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在资本主义内部，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基本阶级。

马克思没有提出完整的社会分层范畴。只是在《资本论》中，伴随着他对历史事件所作的阶级分析，以及在比较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型中所说的一些话，他提出了几条定义和说明。根据所有这些议论来看，他的概念和理论似乎包括以下内容：

划分阶级的基本标准是人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是一项主要只涉及经济和法权事实的客观标准。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是资产阶级，那些为工资而受他们雇佣的人是无产阶级。在这种定义下，上述名词所指的是人数众多的集团，而不是社会组织或心理方面的东西。

正是在这种客观的意义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阶级对每个人来说是独立的，因此每个人可以看到自己

的生活条件是早已确定了的：阶级决定他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决定他们的个人命运，使他们受它支配。”^①

这段话的意思也可以像马克斯·维贝尔后来所做的一样，以一种不会歪曲马克思原义的方式从经验方面来说明。一个人能取得他认为有价值的那些东西的机会，乃至价值本身，都取决于他客观上所处的经济阶级地位。至少是对于统计学上的人群来说，情况就是这样，而不论这些人在心理方面有着什么样的看法或态度。

(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状况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自然的”或其他方面的和谐。

马克思否定任何自然和谐论，也就是肯定利益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基本的事实。所谓“基本的”也就是说在制度内部是无法消除的：满足了一方的利益，就满足不了另一方。在马克思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普遍的和基本的利益冲突根源于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区别。不论这些阶级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由于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各不相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它们的基本利益始终是矛盾的。

(六)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争取到种种法律的或政治的权利，并不能摆脱他们的被剥削处境和革命命运；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只能作为革命的训练场，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保证。

中产阶级的民主经常是、而且必然是以经济不平等和剥削为基础的。因此，马克思不断警告人们不要产生改良主义的幻想，并且提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客观矛盾来揭露这种幻想。出路只有一条：工资劳动者必须通过无产阶级反对有产阶级的成功斗争，自己来解决这一客观矛盾。他们必须以自己的力量推翻植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1页。

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的全部上层建筑，从而使建设性的生产力获得解放。现在受到资本主义僵硬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以后，就将以无比加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七)剥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现象，这就增加了革命的机会。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论工资多寡，工人在经济上总是受剥削的。这就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实际意义。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然而，工人运用自己的劳动力以后生产的价值，却大于雇佣他的资本家付给他的报酬。这样形成的“剩余价值”是被资本家阶级占去了，因此，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遭到剥削。

(八)阶级结构愈来愈两极分化，从而增加了革命的机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将经历以下这些变化：(a)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人数将日益减少；(b)工资劳动者的人数将日益增加；(c)随着社会日益分化为处在对立两端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切其他“中间阶层”都将逐渐退出政治舞台。一般说来，马克思所讲的“中间”阶层指的是小资产阶级或小有产者，而不是靠薪金生活的雇员。

(九)工人的物质贫困化和异化的程度将日益加深。

工资劳动者的处境日益悲惨这一点，所指的不仅是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的贫困，而且包括他们在劳动中的异化造成的心理贫乏。我们有必要把这两者区别开，并且不要忘记：在马克思看来，后者似乎是更重要的；即使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异化问题依旧会存在和加深。不过，他还是认为工人的两方面苦难都将日益加重，虽然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只强调心理贫乏，即人在劳动中的异化问题。

如果把异化概念同美国今天的工业心理学家所说的“工作苦闷”等同起来,在我看来那就是误解了马克思。在马克思的这个艰深的异化概念背后,存在着他认为劳动理应具有而且到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具有人情意味的理想。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劳动是一种谋生活动。这是一种为了外部的目的而从事的活动,它本身并不能给人以满足。人们同劳动过程本身疏远化了,劳动对他们来说成了社会条件强加给他们的外在的东西。这不是一种自我满足的来源,而是痛苦自我否定。劳动并不能使他们“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只能使他们在肉体上筋疲力尽,在精神上趋于低劣。

而且,工人在劳动中还得让资本家控制自己的活动:“劳动不是劳动者自己的而是另外一个人的……劳动者在劳动中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①人在劳动中是不安适的,只有在闲暇时才感到安适。

最后,劳动的结果是形成了私有财产;劳动的产品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了产品;他劳动得愈努力,生产的东西就愈多,但这些东西并不为他所有。因此,私有制造成了他的自我异化。这样,劳动的异化和私有制便互为因果。

劳动中的异化加上经济剥削,使工人的处境愈来愈困苦,这样,经过一定时期,就会使无产阶级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

(十)工资劳动者这一自在的阶级将转化为无产阶级即一个自为的阶级。

第一阶段——一个自在的阶级——指的是一个大的集团由于

^①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其经济地位而形成阶级的客观事实。

第二阶段——一个自为的阶级——指的是这个阶级的成员意识到了他们同属于一个阶级，意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地位以及他们在改变或保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这种阶级意识并不包括在“阶级”一词的客观定义之内；这是一种期望，而不是一种定义。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会在各个阶级的成员中间发展起来的某种东西。至于阶级意识将如何发展，并没有像阶级意识何以会发展那样被马克思说清楚。就后一点而论，按照他对阶级状况的分析，既然两个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和不可调和的，它们的成员最终就必然会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思想和意识形态如命题(一)所述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也不例外。人们具有什么样的思想，一般都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们在这个时代中所占的阶级地位。不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普遍的，更不是直接的和一对一的。一定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就是那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那些并不属于这个统治阶级但接受它对现实和他们的自身利益的解释的人，是被“虚假意识”蒙蔽了。但是，经过一定时期，真正的阶级意识就会在无产阶级的当中产生。

工人将日益具有阶级觉悟和国际主义观点。这些经济的和心理的发展，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和发展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将抛弃祖国观念，只效忠于自己的阶级而不论他们的国籍。因为就像生产关系一样，民族主义也妨碍了他们解放生产力的真正利益。

(十一)只有在客观条件和主观准备同时兼备的时候，才存在革命的机会。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促使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或是无产阶

级本身的革命要求，都不是不断地发展的。它们随着客观条件的发展和由此造成的政治和心理状况而变化消长。马克思有时强调革命阶级战争的主观因素，有时又强调作为其基础的客观发展。譬如说，在 1850 年：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①

无产阶级必须通过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来完成这一使命，但只有在适当的客观条件之下才能取得成功。而革命愿望和客观条件同时具备的那一天迟早总是会到来的。已经显示出来的许多倾向正在推动它的实现。此外，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另一条规律：

(十二)一个阶级在经济体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职能，就会导致这个阶级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

马克思没有明白说出的这一前提，在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的基本假定。正是在这个前提下，资本家代替了贵族，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主义。与此类似——马克思这样推理——无产阶级也将代替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其职能一度是不可缺少的旧统治者，现在已不再是那样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像在它以前的贵族一样，资产阶级已经变成寄生的阶级。他们不得不如此。这是他们的命运。因此，他们注定要灭亡。

(十三)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都是所有主阶级的镇压工具。

这当然是从上述政权理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概念演

^① 《国际述评(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13—514 页。

绎出来的。国家被看做是一个阶级手上的工具。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则是一个经济上已趋于没落的阶级掌握的工具。以国家为镇压工具的那个阶级，今天在经济上已不再是进步的了，其职能已不再是必不可缺的了，但它还掌握着政权。因此，它一定会日益加紧运用它的镇压手段。

(十四)资本主义处于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之中。这些危机越来越严重，使资本主义一步步走向它的末日——终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

在无产阶级主观上作好准备的同时，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过程也使得这个制度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矛盾必然会使危机日益加重。除非资本主义的基础被废除，否则这种现象就不会停止，因为危机是这个制度的本性所固有的。

(十五)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将首先经历一个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然后再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即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说出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将是什么性质。只有空想家和梦想家才去设计未来社会的详细蓝图。正如他不愿意宣布理想一样，马克思也不愿意明确谈论关于未来的细节。这两种讨论在他看来都是“理想主义的”，也就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或“不现实的”。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在他的有关著述、主要是《哥达纲领批判》中，找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描绘：

过渡时期可以同革命等同起来。剥夺者阶级本身将要被剥夺，资产阶级的国家将被打碎，生产设施将交给社会，以实现合理的计划经济。在这个第一阶段，将通过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来管理社会和保卫它免遭敌人的侵犯。这多半和他所说的1871年的

巴黎公社代表的东西差不多。由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新产生的社会“在各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

但历史并不就此为止。接着还要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共产主义阶段，其特点是：第一，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而不仅仅是一群工资劳动者），无产阶级将构成人口的“绝大多数”。无产阶级将组成整个国家；因此，在国家内部将不再有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而且，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本身的专业化及其给人造成的畸形发展，也都将不复存在。过去遗留下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城乡之间的矛盾等等都将消失。

第二，国家将逐渐消亡，因为国家的唯一职能就是镇压被剥削阶级。既然无产阶级实际上已构成全部人口，从而不再成为无产阶级，他们便不需要国家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合理的和系统的全面计划所代替。只有在第二阶段，只有在它消灭了资本主义残余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后，社会才能实行迥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原则。只有那时，人才不统治人。到那时候，人类将控制自然，公共当局将代替国家政权。只有那时，共产主义社会的统治原则才将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十六）虽然历史要由人们自己来创造，但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缔造历史的方式和历史的发展动向却是已经被决定了的。历史的进程在结构上受到限制，以致成为不可避免。

我已经指出过，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模型中，变化的动因同社会主义理想有着内在的联系。他的各项主要命题和预测，都要涉及历史动因的发展和这种发展的革命结果问题。当我们考虑这一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1页。——译者

主要观点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两个理解方面的一般问题：(a) 一般说来，马克思是否相信历史必然性？(b) 在主要动力的作用方面，他是否认为经济因素是资本社会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两个问题已经被反复争论过许多次，人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对于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列宁——来说，它们在政治上具有最主要的迫切意义。对党的重大策略的争论，就是根据对它们的不同回答来进行的。

我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个“是”字。古典马克思主义只包含一种关于人如何创造历史的一般理论。只有以这种理论提供的说法为根据，马克思的所有特定概念和理论才有意义。这一历史创造论的内容可以简短地表述如下：

“……各人都在追求自己的、自觉抱定的目的，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行动的意向及其对外部世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影响的总和，就是历史。……在历史上行动的许多个别意向，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引起的后果并不是所期望的，而完全是另一种的、往往是恰恰相反的，因而，这些动机对于最终结果说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动力？行动者的头脑中采取这些动机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①

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历史的必然性和人的意志创造历史这两个论点之间是经常存在着矛盾的。我认为，“重新理解”或“解释”马克思在有关问题上明白写出的论点，并不会缓和这种矛盾。必须引经据典为自己的决定辩护的政治家，也许需要这样做。但我们却无此必要。我们最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

好是老老实实，把背离古典马克思主义就叫做背离。

除文献证据以外，我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宿命论者，这有以下几项理由：

(a) 历史动因问题显然是同历史必然性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理想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各式各样的引证可能使这一点显得多么含糊，古典马克思主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地方，恰恰就是在这一点上。情况也许是，在驳斥空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时候，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必然性思想。不过，即使情况可能是这样，我所关心的主要并不是他何以持这种观点，而是他持有这种观点的事实。

(b) 如果他不是一个宿命论者，就无法解释马克思何以拒绝谈论理想和讨论未来的社会。正由于他相信自己心目中的历史必然性，他才不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理想、纲领或手段的选择，当成一项政治决定的问题或对象，而能够把它看做是科学研究问题。

(c) 他无意于劝说人们接受任何新的道德目标，因为他相信，无产阶级是必然会接受它们的。“归根到底”，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历史的发展将把这些目标移植到人们的意识之中，然后人们将对它们发生影响。个人很少有选择余地。即使说他的意识不是完全被决定了的，通过他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由此而受到的一切限制和影响，他的选择也是受到严重限制和不容他自主的。

(d) 从历史上讲，“进步”这一概念已经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特色的一部分。马克思把这一概念和无产阶级的发展结合了起来，使之成为从道德上衡量进步与倒退的准则。一般说来，在他的感情方面以及他的关于没落资本主义主要趋势的理论方面，马克思都是十分乐观的。^①

^① 尽管自由主义早期包含着进步概念，它今天已不再和历史必然性思想相投

(十七)如命题(一)所述,社会结构是由它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也是为这些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决定的。

我直到最后才谈到这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引起很大争论的问题。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倾向于冲淡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从而“捍卫”这一论点。他们往往仿照恩格斯后来的做法(如他的通信所表明),谈到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或是拿经济决定论同一种模糊的社会学多元论相对立——按照这种多元论,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起作用,结果很难决定出一个因果序列。然而,即使是使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奥妙术语,这两种议论似乎也都沒有多大说服力或帮助。而且,以这类方式来冲淡经济决定论,就等于是把它从一种明确的——姑不论其是否适当——理论,变成一套模棱两可的、仅仅指出了问题的遁辞。

马克思明确地提出了经济决定论。这反映在他对词汇的选择上;他的全部著作——特别是他的政权理论、他的国家概念、他的相当简单的阶级观念以及他对于这些观念的应用(包括作为缔造历史之动因的无产阶级)——都说明了并且吻合于这一理论。我们当然可以同意恩格斯的说法,即认为马克思允许若干相互作用的因素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活动余地,并且提供了一个经济原因在其中起作用的有伸缩性的时间表。但是,到最后——而且这种最后的时刻一般都是不太远的——经济原因仍然是历史变动的“基本的”、终极的、一般的和造成革新的原因。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经济决定论”并不意味着:追求金钱、财富和经济利得的欲望和算计就是决定个人生活道路和历史的主要

合。它的关于个人自由的基本原则以及对志愿结合的尊重,同这种思想的矛盾实在是太明显了。后来的自由主义者——至少是它的比较有知识的发言人——对进步概念本身往往抱相当悲观的态度;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不是这样。

力量。事实上，它同任何**动机**都没有直接关系。它必须涉及社会——阶级——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动机本身会自动产生，并对个人生活道路和历史发生影响。马克思谈到的**原因**，是隐藏在刺激人们行动的动机背后的原因。我们必须依据他的历史创造模型来理解这一点：“马克思考察了个人意向总和决定历史的性质，但并没有考虑个人意向本身；他研究了决定**社会现象**的法则，但并没有注意它们同个人意识的现象的关系。”^①

以上就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大致轮廓。归总起来说，它包含着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型，以及关于这个社会和社会中的人如何变化的理论。在这个社会中，生产设施属于私人所有，并被用来为私人谋求利润；其余的人则为这些占有生产设施的人所雇佣。这是一个正在变动的社会，因为它的生产力已经日益同资本家及其国家组织社会经济的制度发生矛盾。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特别是它的经济矛盾——的发展，正在促使它的一切制度和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些矛盾越来越多地引起危机，越来越加深人对人的剥削，从而促进了历史动因的发展，而这个历史动因一旦成熟，就注定要推翻资本主义本身。这个动因就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内部，这个阶级正在从一群单纯的工资劳动者转变成一个统一的和有觉悟的、意识到自己的共同利益并且时刻准备以革命方式实现它们的自为的阶级。

客观的或制度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但可能还没有充分反映为所有主和工人的阶级斗争。工人现在还是少数，只关心他们自己的眼前利益，但他们正愈来愈受剥削，愈来愈

^① 布哈林：《有闲阶级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纽约1927年版，第40页。

异化、贫困和有组织；在他们的队伍中，人们日益关心他们的真正利益；工人的数目日益增多。他们正在构成追求自己的真正长远利益的“绝大多数人的自觉的独立运动”。他们正在产生真正的自我意识，因为自我意识本身也正在被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改变着。而在具有了自我觉悟以后，他们要想追求自己的利益，要想挺起腰来，“便不得不把整个上层官方社会完全推翻”。^①

所以，当时机到来，当资本主义业已成熟和无产阶级业已作好准备的时候，就一定会由无产阶级当中最有政治觉悟的一部分发动革命。那时，资产阶级制度及其一切机构都将被打碎。接着，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又将进一步发展，进入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

马克思的概念把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人本身的和人以外的方面都包罗无遗，其中充满了真正的智慧和丰富的想像力；它既是分析又是预言，既是政治倾向的表白，又是历史和纲领。这是“迄今以来针对整个社会秩序，针对它的统治者、支持者、思想家、温驯的奴仆以及一切依靠它的存在生活的人提出的最可怕、最精巧和最有事实根据的控诉”。^②

马克思的学说刚刚粗具规模，就开始受到了另外一些急于想做出惊天动地事业的人们的修正。这样一来，在政治行动家的愿望和历史事件难以逆料的影响下，它在结构方面表现出的智慧便开始失去原有的光彩，在主要动力问题上流露出来的政治激情也就开始低落了。

① 卡尔·勒维特：《历史的意义》，第41页。

② 艾塞亚·伯林：《卡尔·马克思》，纽约1959年版，第21页。

第五章 批評准則

批評家們時常把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同後世馬克思主義者的馬克思主義混淆了起來，並且往往不去區別哪些是他們的政治觀點，哪些是他們的思想觀點。本章將分別提出幾種關係到“一個人對馬克思主義如何認識”的不同的情況和論點，這樣也就說明了我自己的批評的依據。

(一)

從它的實踐者和批評者來看，馬克思主義似乎至少有三種思想類型：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詭辯的馬克思主義和朴實的馬克思主義。

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往往是抓住馬克思政治哲學中的一部分思想內容不放，硬把這些部分同馬克思的全部學說混為一談。在馬克思的追隨者和批評者當中，都有這種情況。關於這一類馬克思主義，我們毋需在這裡多談。

詭辯馬克思主義者的情況要複雜得多。他們所關心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模型，以及借助於這一模型發展出來的理論。理論的違背事實之處被放到了次要地位；為了替這些與事實相矛盾的地方辯解，他們在避免修正一般模型的情況下另外製造了若干新理論，然後再把这些理論硬說成是馬克思的原意。人們總是能夠用補充許多假設的辦法來挽救一種理論；如果認定理論是正確的，當然總可以給違背事實的地方找到解釋——從而使這些事實看上去並不“真正”和理論相矛盾。毫無疑問，這種做法有一

些是无可非议的：它们只是进一步发挥了原来的理论罢了。但往往有这样的情况：补充的假设和违背事实的地方竟多到这种程度，以至整个理论甚或模型都变成了漏洞百出的强辩。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诡辩的”，也就是无益的和蒙昧主义的东西了。

举例来说：(1)固然，诡辩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资劳动者并不是革命的；他们甚至还不是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2)但他又辩解说，情况所以如此，这要归因于资本家的大力宣传、工会领导人对工人的欺骗、被帝国主义势力收买的“工人贵族”和社会民主工党领袖的背叛。

对事实的承认即(1)项的说法，似乎否定了工人两极分化的基本理论，但它们究竟是理论本身包含的补充性解释(2)呢，还是构成了新的理论？我们知道，上述解释暗示了以下这些问题：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机器对于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延续所起的决定性的并且可能还是自发的作用；调和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政治和社会组织在经济阶级的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垄断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持久性和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政治稳定性；对马克思关于工资劳动者中间的职业和收入分化所作的预测的影响，以及对阶级范畴本身作更精细的修正的必要等等。由此可见，这至少是对基本理论的极大修改。

最诡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风，导致他们不是把马克思的预言看做是可以检验的对未来情景的推测，而是把它们同他的模型密切联系起来，经常加上“假设其他条件相同”这句话作为保留。譬如说，他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看到，马克思的做法是先提出了不断贫困化理论的抽象模型，然后再向里面补充更具体的东西。因此，他们便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在不断贫困化问题上并没有真正弄

错。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策略。如果这种说法仅仅被用来评价或赞扬马克思这一历史人物和细心的思想家，它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如果用它来肯定或暗示马克思的推测在今天的社会中还有任何具体的现实意义，那就是不正确的和骗人的了。

一般说来，诡辩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政策的拥护，除去思想上的理由以外，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因此，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以前和以后的整个社会学传统都并入了“马克思主义”。有的人除马克思外，简直一无所知；他们并没有利用整个社会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同马克思进行的大辩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也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很有价值的“社会科学”；有的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所以，为了符合新的事实，他们往往牵强附会地解释马克思的思想，并且倾向于把马克思的一般模型和种种具体理论混淆起来。即使在马克思的用语显然非常含糊和不适当的时候，他们也往往不愿意把它放弃。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方式也是枯燥乏味的，并且给分析工作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妨碍。在最坏的情况下，它会变成一种代替思考和研究的诡辩式的玩弄口号。

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论他们是否同意马克思）遵循着马克思自己的传统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马克思以及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肯定是古典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部分。他们以一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像对待任何一个十九世纪的伟人那样来对待马克思；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后来的每一个阶段，都从历史具体性的角度来考察。他们普遍同意，马克思的著作虽然带有十九世纪社会的烙印，他的一般模型和思想方法却都在他们自己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并且迄今还有助于他们了解今天的社会。譬如说，艾萨克·多伊彻在他的传记作品和他对苏联世界的分析中，乔

安·罗宾逊在她的《论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Essay on Economics and Marxism)中,所持的就是这种观点。这当然也是本书所持的观点。

说明朴实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的其他名词,还有爱德华·汤普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乔治·莫斯的“有马克思主义倾向者”以及许多作者所说的相对于任何严格的或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而言的“马克思传统”等等。在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有以下这些形形色色的——虽然只是他们当中的极小一部分——思想家:威廉·摩里斯、安东尼奥·葛兰西、罗莎·卢森堡、G. D. H. 柯尔、格奥尔格·卢卡奇、克里斯托弗·考耳德威尔、让-保罗·萨特、晚近的约翰·斯特拉彻^①、乔治·索列尔、爱德华·汤普逊、列兹洛·柯洛考夫斯基、威廉·威廉斯、保罗·斯维济和埃里克·弗罗姆。

在政治上,朴实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是失败者。他们可能都参加过这一种或那一种的“党”,然而作为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实际上却始终总是置身于党之外的;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朴素本色。他们可能只是理论家,而不是政治行动家。此外还有另一点不同,思想上的不同(这当然因人而异):在他们的著作中,朴素马克思主义者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一面,以及上层建筑在历史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低估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缔造历史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就是把人变成马克思本人曾为此批评过费尔巴哈的那种抽象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运用是“灵活的”(相对于教条主义而言)。他们着重指出,归根到底,经济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决定性作用,并认为马克思在他自

^① 约翰·斯特拉彻(1901—1963),英国经济学家,此外还有一个约翰·斯特拉彻,是英国名记者,早已于1927年去世,所以前者被称为“晚近的”。——译者

己的著述(特别是史论)中,就是以这种方式应用“经济决定论”的。他们强调了人的意志对创造历史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人能够自由创造历史,以有别于任何宿命的历史规律和由此产生的个人毋需负责论。

一言以蔽之,他们正视了马克思著作中存在的——也是历史本身存在的——没有解决的矛盾:人道主义和宿命论之间、人类自由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矛盾。

朴实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打着马克思旗号进行活动的人之间的区别,丝毫也不是绝对的:一个人可以既是前者又是后者——在不同的时期或同时,按照他所从事的不同活动(譬如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和理论方面的)而分别是前一种或后一种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列宁和托洛茨基在这方面就特别暧昧不明。斯大林则不然:不论在任何方面或任何时候,他都不是一个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另一方面,当代许多有学者风度的朴实马克思主义者,其色彩同样是很鲜明的:他们是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此外——不论在政治上或思想上——便什么也不是。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虽然在精神上非常痛苦,却敢于正视今日世界的各种问题;他们不容易找到出路。但他们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对象。在本书中,我着重选载的是那些已经取得或接近于取得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这并不意味着我对那些失败者缺乏尊重,因为一本书的篇幅有限,只能做到这样。

(二)

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所持态度的一个基本区别,就在于他们对斯大林主义的看法:斯大林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究竟是马克思学说的延续呢,还是对马克思学说的道德上与政治上的背叛和思

想上的一系列歪曲？“社会主义”一词本身便时常成为争论的中心。今天的苏联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吗？更普遍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是社会主义，什么东西不是社会主义？

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定义时，前面提过的考察政治哲学的两项标准可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如果我们指的是一整套复杂的理想，其中塞进了各式各样的价值——道德的、政治的、人的——和形形色色想像中的社会和经济安排，那么，当这些理想仅仅有一部分实现或是有人只打算部分实现它们的时候，便容易被我们斥之为名实不符，乃至完全是反社会主义的歪曲。因此，许多仅仅从理想方面给社会主义下定义的批评家，都认为苏联实行的决不是社会主义。

处在对立的另一个极端的批评家，以制度方面的动因为标准。在革命以前，这个动因意味着工人阶级，革命以后则意味着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建立集中的计划经济。从这种角度来看，苏联实行的完全是社会主义。在它们各自使用的具体定义下，以上两种说法都不能算错。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一个拥护苏联的人能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或者说，一个不拥护苏联的人能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吗？要想找出最终的定义，就要参加一场只是和那些既得利益要求他们谴责或维护苏联的人们有关系的争执。在大多数这样的争执中，争论各方都力图把“社会主义”或“马克思”这类名词具有的威望窃取过来，作为给自己的观点装门面的独占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于维持正统的意识形态有着个人需要；迫切的政治考虑也需要这种保证。相对于其他许多政治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史是很奇怪的，因为它同实践的关系是如此密切，结果便具有了极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最富有成果的研究是设法回答这样一些问题：(1)由于经常变动的当权集团以及苏联人民其他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的思想，是否就能说苏联的事变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呢？(2)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目前的社会性质是否必然将保持不变呢？(3)苏联的事变进程是否证明，其他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活动会以同样的方式告终呢？

我对这几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他希望读者看到本书的后一部分，自会明白我的理由。我知道，许多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会对我感到失望，他们想知道的是：在马克思死后发展起来的各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中，究竟哪一种最接近于他的原意？斯大林是不是马克思的唯一（甚或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是列宁吗？是社会民主党吗？不言而喻，他们谁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

但是，从马克思作品的整体来看，我认为这些解释都是对马克思的“背离”。尤其是列宁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是“以马克思为根据”的，却和马克思学说的其余部分、和他所预期的政治行动范围以及十分明显地宗法于他的政策大相径庭。可以肯定地说，斯大林主义也是如此。社会民主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同样都不例外。在我看来，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推论出，在从他去世的 1883 年到今天的各个时期，他会赞成哪些观点和政策，这是十分不可能的事。

我们可以拿马克思所写的东西，同政治上打着他的旗号的那些人的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取得的结果相比较。从别人所做的事情上得到的这些教训向我们表明，不管那些实践者如何固执和如何可厌地以“正统”自许，古典马克思主义已经遭到了他们的修正。

只有那些幻想历史会按照固定不变的路线发展以及出于政治上的迫切需要而不得不这样说的人，才会认为马克思或马克思和

列宁能够有洞察未来的睿智，会预见到今天存在着的和正在斗争着的中国、美国、俄国、古巴、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澳大利亚的理论需要。就思想史而论，“永远不变的正统”这一概念是荒谬的，虽然有时——例如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并没有真正的思想史，存在着的只是一套过去遗留下来的思想，以及根据国内外的权宜需要而对它们所作的官方解释。

(三)

此外还有许多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譬如说，有这样一种社会思想，它否定了整个社会学古典传统——因此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即使被考虑到，也不过是“社会哲学家”之一而已，在令人厌倦的教科书中，他们被列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的“先驱者”。或者，更不客气的是，这类社会科学家干脆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完全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而他们自己的著作则是在政治上守中立的和具有纯洁道德的——一句话，是客观的。社会科学真正是（也就是说，只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真正是（也就是说，只是）意识形态。

人们还因为另一点而忽视马克思：他“只是一个哲学家”，因此不是“经验性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当然，人们可以认为马克思的著作基本上是师承黑格尔的，特别是从他使用的语汇上看是如此。但人们也可以认为，他的工作是经验性社会研究和最谨慎的社会观察的延续。因为他既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注重经验的社会学家。

此外，他还是一个革命家、道德家、非常有学问的人等等。他是一个几乎涉及历史上人和社会的一切领域的大胆的思想家。他也充满着真正的阴暗。我不知道“真正的马克思”是什么样子，但

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真正的马克思”的问题不是一个必须服从政治决定的教条主义问题。对于他的学说,我们能够自由地利用我们感到需要的一切,而摒弃我们所不需要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既是理智的批评,也是道德的抨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从它的各种概念本身来看,这两者往往是很难区别的,但**它的确是一种政治哲学,同时也肯定是一种社会科学。**

我们可以拿马克思所作的预测或是根据他的著述所作的推论,同实际发生的和没有发生的事情相比较。(对于任何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可如法泡制。)在做这种比较时,我们不禁又要问:马克思的推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验了呢?它们现在有什么预言性的或是指明方向的价值呢?它们今后又可能有什么预言性的价值?

要从历史事变中总结出这类教训,并不像许多批评家想像的那样容易,因为历史事变的意义一般都是暧昧不明的。而且,就一种针对一个时代的理论来说,由于在何谓长远何谓短期的问题上存在着某种含糊色彩或伸缩性,要对它作任何批评也就有了困难。然而,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有了足够长的时间,使得我们可以来判断马克思的预测,而不致于每一次都遇到这样的反驳:“再等一会儿;它也许不久就会应验的。”要解决时间的长短问题,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自己的方法:具体规定出一段历史时期。我们应该经常牢记住两点:

第一,马克思的分析对象,一般都是从长远看来将会表现出来的力量和趋势。我们不应该把最近这段时间(譬如说,1945至1965年)看做是“正常的”,或是能据以判断其预测的结账时期。这样做就规避了本世纪的许多重大事实: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大萧条,从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和两次世界大战。

不过，在历史步伐已日益加速的情况下，如果对未来的预测超过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很难有任何用处。

第二，经常同理论相矛盾的历史事变，就像任何事实一样，并不能为本身提供解释；要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考察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探讨产生和维持这些变化的历史过程的性质。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马克思不仅关心将来会发生或不会发生哪些事，而且关心其原因，关心隐藏在历史事变和趋势背后的结构机制。因此，要想充分地把握他的理论，我们也必须探究“原因”；在这样做时，我们必须考虑是否有必要修改马克思规定的社会模型，或是只修改他的若干种理论之一。

(四)

因此，我将竭力遵循若干明显的批评准则：我不打算辩论定义本身、特别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定义，而准备把它们化成清晰的、可以根据事实给予解答的一系列问题，并且使用意义明确和色彩中立的名词。我将从历史具体性的角度出发，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类型，区分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的各个阶段；只是在这样做了以后，我才开始考虑——并且是谨慎地——整个运动。总之，我将努力做一个朴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尽量避免诡辩马克思主义者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作法。我将公开承认和表明自己的价值观点。我要尽量避免使用“希求语气”。在接受或拒绝某种理论时，我将按照一切政治哲学的通行准则（意识形态、理想、理论、动因）区别开它的各个方面，并仔细说明马克思主义每一个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在批评马克思或任何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时，我将密切注意为理解他的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幅度。如果有关思想家没有指明时间幅度，我将告诉读者这是一种非马克

思主义的疏忽，然后再把他的预言对于当前现实的意义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另行研究。我将提出同预测相反的事实、同理论相反的实际趋势；但我也要考虑隐藏在事实或趋势背后的结构机制。

所有这一切准则也许都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从马克思本人的做法中总结出的下列座右铭：要始终如一地理解和应用历史具体性原则。任何人的思想都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期；但人们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延伸到过去和未来，从而扩大“自己所处的时期”，利用它提供的材料构想出一个时代概念。卡尔·马克思正是这样做的，而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的著作表现了时代意识。从思想上说，他为当时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模型。这也许是当时最接近于反映当时现实的模型。它在细节上的有失准确，它的具体理论的不足之处，反而可以使后人得到很大启发。

马克思的著作所以至今还有生命力，其原因就在于此。活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非马克思主义者或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近年来都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多少生动的研究，这主要并不能归咎于马克思思想本身的贫乏，而要归咎于政治权宜考虑以及其他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关的外部因素。这种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能够存在的社会科学的一个活泼部分。

僵死的马克思主义则恰恰相反。它把马克思（或列宁、或托洛茨基、或其他任何人）奉为“权威”，把他们的著作乃至每一句话都视为神圣的经典，认为其中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且包含了人们需要知道的一切东西。

因此，我认为最主要的批评准则就是：对于朴实的和活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朴实的和活的批评。

第六章 对馬克思学說的批評

批評的中肯程度要取决于对被批評的东西是否有一致看法——这是一个理解問題。中肯与否也要取决于批評时遵循的准则——批評者理应把它们陈述清楚。下面就是根据我所说明的批評准则（第五章），对我所理解的馬克思学说（第四章）进行的批評。^①

（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整个结构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心理。

（二）历史变革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三）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客观经济矛盾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反映。

“经济基础”究竟包括哪些和不包括哪些东西，并不完全是明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定义也是不精确的，并且不能始终保持一致。特别是，“科学”似乎漂浮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而且，是否能够（像馬克思那样）把基础或上层建筑当作构成单位来使用也是成問題的，因为它们都是许多种力量和因素掺在一起的杂烩。对馬克思来说，上层建筑成了一个剩余范畴，一切无处安置的东西的收容所。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别本身也毫不明确。包括生产关系在内

^① 在这里，我将按照第四章的次序逐项列出论点，然后给予或详或略的初步评论（或反驳）。这段简短的批評本身就能成立，并不一定非要有正面的新论点不可。因此，我只打算提出一个更加适合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适合于它的历史趋势和动力的社会模型。

的社会的制度组织，必然会深深浸透到包括生产力在内的技术工具及其科学发展之中，决定它们对历史变革具有的意义和作用。许多不能被明确认为是“经济性的”因素，都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基础”之内。马克思主义者在有关问题上的解释各不相同，似乎也证实了我的看法。而且，二者的调和问题——究竟基础是如何决定上层建筑的——并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阐述。经济冲突究竟是通过何种过程和在什么情况下“反映”为心理和政治冲突的，这是一个我们还要谈到的问题。考虑到这些概念的基本性质，它们的有失严密确实使整个模型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精确性。

(四)作为收入来源的财产是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在资本主义内部，资本家和工人是两个基本阶级。

在现代，中世纪社会的“等级”一般都被经济上的阶级所代替。这代表着目前社会分层原则的转变，也正是两个时代之所以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从等级到阶级的转变的许多特点，经过归纳之后，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具有典型意义。

现在，马克思的模型扫除了一切等级残余，只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按照收入来源规定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部分说来，这一观点是由他的抽象方法形成的，部分也要归因于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预测。作为方法来说，如果“阶级”这个概念只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方面来使用，这是一种有益的简单化。作为实际预言来说，它已经遭到事实的驳斥。

后来的思想家以类似方式对地位、权力和职业等其他方面作了抽象思考和强调，也更精细地发挥了经济阶级的概念本身。这些理解社会分层的方法全都得到了最有效的运用——它们起初是作为彼此有区别的分析工具，继此以后，又被用来对上述各个方面

之间若干变化不定的关系进行经验性的和 historical 的研究。

但马克思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这类问题。在他谈到阶级概念的不多几处地方，正如他的一般推测一样，他总倾向于简单化。他的历史研究比较精湛，但整个说来，他的简单化方法是贻误人的和成效不大的。

作为一项划分阶级的客观标准，财产是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分层状况的必要因素。可是，如果只着眼于财产这一点，即使对了解经济分层来说也是不够的和易于引入误解的。因为，除去按照人们所拥有的财产的种类和多寡来划分阶级以外，通常还可以按照收入为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们方便地划分阶级。

不言而喻，收入来源和数量的许多特定组合，对于各个阶级——不论是上层或下层——的政治心理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譬如说，虽然经理逐渐代替资本家直接控制公司财产这一点并未削弱财产的重要性，这种变化却造成了一个不能单从财产占有关系上去理解的“公司富有者”阶层。

财产对工资的简单区别，甚至不能使我们透彻了解今天社会分层的经济事实。假如马克思关于赤裸裸的两极分化阶级结构的预言真的实现了，我们也许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而且将来也多半不会实现。即使说能够实现，单单依据这一区别也会使阶级概念变得更加片面。

关于“阶级意识”及其他“主观因素”同客观物质环境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所以有混乱的——或者至少说是含糊不明的——看法，与上述情况有关。不应用财产以外的其他标准，便不能说明产生（或缺乏）“阶级意识”的原因，也无从理解意识形态对政治觉悟和阶级觉悟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财产，但在他们当中，正由于社会地位和职业的差别，马克思

所预计的经济分层的心理和政治后果虽然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在存在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却并不存在。只要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行了：领薪雇员同工厂工人一样没有财产，许多人的收入还少于工人；然而，如果只依据财产标准把他们统统看成是一个阶层，那就是不想真正努力去了解一切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社会分层事实之一。

(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状况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自然的”或其他方面的和谐。

在为资本主义和他们希望社会进步的观点申辩时，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曾经使用过“自然的和谐”一词。无可否认，这种说法的确是一个神话。然而，我们也并不能由此就认为阶级斗争是正常的或不可避免的。肯定前者只是作出了一种道德判断，而并没有说明任何经验性的命题；肯定后者则是无视经济利益冲突已日益趋于制度化的事实。事实是，在很长时期内，人们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把阶级斗争化为行政管理问题，正如有可能以经济、军事和政治手段来弥补资本主义的缺陷和不合理，从而使资本主义本身稳定化一样。总之，经济冲突不一定就是马克思所理解的“矛盾”，它们不一定就会导致阶级之间公开的政治斗争。

工会的性质和作用也许最便于用来证明这一点。就工会代表“阶级”、劳资争议代表“阶级斗争”而言，斗争的目的已经变成争取分到更多的产品，而不是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所理解的或是其意义可以作合乎情理的解释的阶级斗争，并不一定会愈来愈尖锐、愈公开和愈多地采取政治形式。与此相反，它往往被日益复杂的职业分工弄成了五零四散的局面。在不景气-繁荣周期中，阶级斗争是时断时续的，有时几乎

全不存在。特别重要的是，在整个政治经济学中，它已经被制度化了，并限于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可以实现的目标。同斗争一样，在阶级发展的历史上，合作也是一个重要事实。斗争和合作的方式是形形色色的，原因也多种多样——除经济状况以外，还有种种具体的历史原因。

(六)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争取到种种法律的或政治的权利，并不能摆脱他们的被剥削处境和革命命运；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只能作为革命的训练场，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保证。

目前的普遍事实是，经济和政治权利都已经争取到手，工会和群众性的工人政党一般都没有起到这种“训练场”的作用。工资劳动者的组织已被并入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的日常结构。它们的宗旨、职能和取得的成就都已被稳定化。它们并没有“正常地”表现出——像马克思预料的那样——自发地反资本主义的倾向，更谈不上打算组织一个新社会了。它们是在资本主义内部起作用的经济组织，它们的政策不会超越它们那种事务主义的职能。

再者，在某些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普遍成立工会的时间非常晚，而且在很大一部分地区，这是在国家——一个通常由中上层阶级利益集团统治的国家——的法律和政治保护下取得的。工会在成立阶段显示出来的战斗性变得缓和了，它们很快便被资本家普遍接受。事实上，工会已经成为工厂、公司乃至整个行业中维持秩序的因素，参与管理劳动力已经成为它的职能之一。它们已经变成一种官僚组织，其主要工作就是稳定工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及管理者的关系。^①

(七)剥削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现象，这就增加了革命

① 为了行文方便，这里暂不讨论工党问题。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将在我们讨论社会民主主义时予以说明。参看本书第七章。

的机会。

撇开“价值学说”不谈，我认为上半句话作为道德判断来说是正确的。但这是一种伪装成经济原理的道德判断。然而，主要的和相当明显的一点是：迄今为止，可以被说成是（姑不论是否正确）剥削的状况，并没有在任何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增加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

（八）阶级结构愈来愈两极分化，从而增加了革命的机会。

两极分化的现象并没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阶级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言的那样，简单地分化为两个阶级。与此相反，阶级结构普遍倾向于复杂化了：资本主义愈“先进”，社会分层就愈加复杂和多样化。

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工资劳动者的人数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已趋向平稳——例如在美国，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出现。随着自动化的展开，我们可以指望这种现象将继续下去。中间阶层并没有缩小。他们的内部成分已经发生引人注目的急剧变化。他们主要已成为新的领薪雇员中间阶层，而不再是旧的企业主中间阶层。整个说来，他们同劳动人口的比例已大大增长。

这是二十世纪一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普遍现象。经营农场主的人数急剧下降了；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则保持平稳；小企业主的总数也没有多大变化，但他们的周转额很大，经常有许多人破产，和许多新的人补充进来。最重大的变化是新的领薪雇员中间阶层的扩展：领薪自由职业者、经理、职员和推销人员已经组成一个日益扩大的阶层。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白领雇员只能被认为是“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们并不占有他们所主管的生产资料，而是

为工资或薪金工作。但是，如果把他们归入这一范畴，那就大大限制了对他们这个新阶层的理解。他们是一种新的二十世纪金字塔结构，凌驾于和重叠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旧的企业主-工资劳动者金字塔结构之上。他们当中的高级成员即经理已经加入财产所有者的队伍，同他们一起构成了一种马克思所不知道的公司富有者。他们当中的中下级成员也不能“仅仅”被看成一种新的无产阶级，这样做决不可能对他们有充分的了解。^①他们根本就套不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图式，其他任何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图式也对他们不适用；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两个阶级趋向两极分化的预言。

(九)工人的物质贫困化和异化的程度将日益加深。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的或物质的贫困并没有加深。与此相反，事实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一般说来，工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已经得到改善；他们的劳动时间缩短了；马克思熟悉的使用童工这类残酷的做法被取消了；通过工会，他们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中的劳动条件取得控制，而且，由于机械化的发展，他们的劳动已经比十九世纪的工人轻松得多。

当然，不景气时期的大量失业严重限制了上述进展，而且，即使在普遍繁荣中间，也还存在着相当多的经济贫困现象。但整个说来，二十世纪先进资本主义的长期趋势同马克思的不断贫困化预言是相矛盾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肯定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模型所没有触及的。

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原因是：(a)政治性的制度改革：国家推行的福利计划和福利国家本身的发展，弥补和减少了资本主

^① 参看拙著《白领工人》。

义制度的经济缺陷。(b) 工会和——在某些国家中——工党在资本主义内部所起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工资劳动者的这些机构一直是奉行改良主义的，它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相当可观的改革。繁荣的原因还在于(c)似乎是持久的军事经济的发展，虽然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纯粹是巨大的浪费。最后，生活水平的保持或提高当然还要取决于(d)二十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的稳定所依赖的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情况。(关于这些问题，将在下文第十四点中加以讨论。)

不言而喻，关于这些原因的孰轻孰重以及资本主义繁荣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其他原因，人们是可以有不同看法的，但是总起来看，它们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马克思的关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活不断贫困化的预言。此外，它们在马克思关于这一社会的理论模型中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重点，正在从物质贫困问题转移到心理贫困或异化的问题上。这种强调是非常符合马克思、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心意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它现在却失去了过去伴随着它的物质剥削的坚实基础。现在已需要加上新的“剥削”作用。譬如说，增加的闲暇时间都被娱乐机器占去乃至剥夺了。真正体验人生和推理的机会，以及——经过一定时期后——推理的能力，也往往被剥夺了。

如果我们按照今天对它们的详细了解，硬说马克思原来已经具有这些思想，那就未免有些太过分。马克思并不了解这些问题。虽然马克思知道精神剥削的微妙过程，他的认识并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丰富。现代异化的过程、范围、场所和效果，不一定和马克思所写的一切都是矛盾的，但是马克思肯定没有谈到过它们。而且，这种精神剥削恐怕也不单单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东西。在非资本

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中，同样有这种情况。不论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或国有制，都不一定是产生精神剥削的根源；它们也许是伴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事实本身而俱来的。

但是，不管情况如何，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就和阶级意识一样，其唯理主义色彩还是十分浓厚的（虽然它们也是杰出的和富有启发性的）。这些概念中都掺杂着道德判断；事实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体现了他心目中人的最高贵的形象，以及他对资本主义使人变成畸形这一点的最愤怒的谴责。他强烈倾向于以一种一厢情愿的方式认为这些判断就是人们生活 and 劳动中的心理现实。可是，这些往往不是人们体验的现实。在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待自己的劳动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在这方面，我们了解得还远远不够。总之，马克思所遗留下来的异化概念虽然杰出，但至少可以说是十分不完全的和意义暧昧的。

因此，异化理论比物质贫困化理论的说服力大得多，虽然异化的种类和原因还不只是马克思神秘地和含糊其辞地谈到的那一些。而且，异化并不一定甚或常常造成革命的冲动。与此相反，伴随着它的看来往往是政治冷漠，而不是左的或右的反抗情绪。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的心理选择并不比阶级结构更为两极分化。他们当中并没有呈现出一种非保守主义即反抗现状、非无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思想分野，事实上，决定性的心理状态倒往往是社会冷漠、即一种得到发展的和成熟的不关心政治的态度。无论是从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和阶级觉悟的唯理主义模型来看，或是从他的异化概念来看，这种冷漠都是很难解释的。

（十）工资劳动者这一自在的阶级将转化为无产阶级即一个自为的阶级。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只是局部发生的插曲。这种情

况往往是在工业化初期——而不是晚期——和一种政治镇压与经济剥削同时存在的形势下发生的。但是，不论是这种转化的一般作用过程或是它经常具有的全部复杂状态，都没有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说明。事实上，以他那种（经济的）分层范畴也不可能对它们作出充分的说明；因为它们还涉及到某些（专制的）政治状况以及有关经济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职业成分的考虑。

可是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发展——工厂的发展、它们规模的扩大和集中程度的加强等等——必然会促成无产阶级的心理和政治发展，促成它的团结、觉悟和革命反抗。他显然是大错特错了。

“意识”并不能全部决定“存在”，“存在”也不能全部决定“意识”。它们——正如马克思有时知道的那样——是相互制约的。此外，各种“干涉变因”也在起作用：群众通讯工具、娱乐机械、文化机器等等，一句话，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各方面也在起作用。这些变因调整着“存在”与“意识”的关系；它们影响着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种，并且影响着二者的相互作用。对于阶级意识的获得或不获得发展，它们能够而且往往自动起着作用。存在本身就要为文化机器造成的现实所限制。意识本身，甚至是自我认识，也要受到这些固定程式和解释的影响。

在他的阶级概念中，马克思往往把阶级的客观事实、即一个统计学上的人群和阶级成员中间可能有的心理发展混淆了起来。他似乎认为，阶级意识是客观经济发展（包括工人和所有者的两极分化）的一个必然心理后果。对马克思来说，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暧昧之处的，因为人们的心理和政治倾向本来就是经济变化的产物。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充分说明这一论断的根据。作为经验性的问题，经济事实和心理变化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解释。

马克思心目中的那种阶级意识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还没有全部了解，但可以肯定，这一过程所包括的决不仅限于一般的经济发展或特殊的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使我们假定经济发展是一切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因素，情况也是如此。经济基础中的这些变化导致心理变化的作用，并没有被马克思（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揭示出来。

如果我们同意马克思的看法，认为思想必须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必须变成辩护或批评——才能具有影响，这并不等于同意思想因此就仅仅是这些利益的“反映”。在一个能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构模型中，我们必须承认思想的形成和作用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在探究思想如何同个人和制度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把问题看得比马克思的一般模型更复杂一些。在进行这种考察时，我们不能只认为经济阶级（不管给它们下什么定义）是产生思想的社会基础，更不能只局限于两个这样的阶级。

马克思的“阶级利益”观念的局限性，具有很重要的道德意义。他没有考虑到（a）按照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分析来看与他们有利的东西和（b）人们按照自己的看法对之感兴趣的東西之间的区别。他也沒有充分估计到在政治上利用这一区别的道德意义。（这是列宁主义和自由民主的意义产生种种问题的道德根源。因此，在列宁主义业已出现的今天，我们必须对它作充分估计。）

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分层范畴本身就含混不明，加上他在说明中又使用了希求语气，他本人便得以迴避上述种种成问题的所在。据我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有利”只意味着长远的、一般的和合理的利益。在他看来，对这种利益的认识就是革命的阶级意识。所有别的东西都是暂时的、局部的、不合理的、还没有发展成熟的。

但事实是，人们所关心的往往是暂时的而不是长远的利益，是

特殊的——譬如说，某个行业的——而不是本阶级更一般的利益。此外，要决定什么是暂时利益什么是长远利益，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决定什么是“合理的”东西、决定阶级利益是否是唯一的乃至主要的合理利益，则肯定是道德判断的一部分。可是，马克思的阶级意识观念却具有和杰雷米·边沁的理论相同的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谈到的“阶级意识”，就相当于“作为公民的人”这一自由主义概念。

我们必须考虑两种可能性。首先是革命的阶级意识，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对人们有利的东西也就是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客观条件和主观发展取得了一致。这种经济趋势和心理趋势相一致的状态，正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它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必然产物。

但还有第二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于他们自身的合理利益（姑不论是怎样判断的）并不感到兴趣，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感兴趣的东西又并不符合自身的利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一些为“虚假意识”所蒙蔽的人，他们所以陷入这种不合理的状态，是因为主客观的发展还没有取得一致。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一定会消灭虚假意识。事实显然证明他错了。

（十一）只有在客观条件和主观准备同时兼具的时候，才存在革命的机会。

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也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老生常谈。如前所述，在任何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遭到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的最先进国家——本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这两种过程从来都没有取得一致。

（十二）一个阶级在经济体系中具有必不可少的职能，就会导

致这个阶级在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

马克思的政权理论赖以成立的这一论点，似乎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历史发展情况得出的。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内部具有了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之后，便打碎这个制度另行组成了资本主义新社会。与此相似，据马克思推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内部，随着资产阶级的变成寄生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日益充满矛盾，工人也将变成其职能为社会所必需的阶级。因此，他们也将打碎那个妨碍它自身起作用的制度；他们也将成为上升的阶级。一句话，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论背后，存在着一个官冕堂皇的但也是不真实的历史类比，即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比，拿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相比。

事实上，正如博贝尔教授指出的那样，“封建制度并不是古代的奴隶建立的，农奴或帮工也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者。历史并未证明，一个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就是下一个社会组织的建筑师。”^①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不是由被剥削的农奴和贵族之间或帮工和剥削他们的行会师傅之间的阶级斗争造成的。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是作为一个独立结构在封建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经强大到足以控制政府，粉碎贵族的社会地位和法律特权，并且按照扩大自由市场和重新分配赋税负担的资产阶级利益来改造社会结构。但是，中等阶级的这些成功正是由他们的财富造成的，由于他们有钱，终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任何政府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便不可能维持下去。

^① 博贝尔：《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观》(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1948年第2版，第340页。

与此相反，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则是同一个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内部，工资劳动者不代表任何独立的经济制度。如前所述，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所争的是产品分配，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本身。法国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的人数和重要性是一直在不断增长的，而二十世纪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资劳动者则和他们相反，其人数和重要性都比以前下降了。

除去它所依据的历史类比是不正确的以外，这种政权理论似乎也太僵硬了，因此不能成为有用的研究指导。它不仅是沒有用的，而且能把人引入迷途。它模糊了阶级和政治制度之间的组织联系，抹杀了政治思想、理想和军事力量在夺取和利用国家政权方面所起的作用。

譬如说，纳粹德国的事实便否定了这个概念。在那里，不管怎么说，德国社会中那些寄生的和职能上无用的部分毕竟取得了政权。不言而喻，关于以军事力量夺得和以政治手段维持国家政权的例子，此外还可以举出很多。经济上的不可缺少性并不一定导致、当然更不会自动导致取得政权。在经济上沦于寄生状态也不会自动导致丧失政权。

(十三)在一切阶级社会中，国家都是所有主阶级的镇压工具。

这句话只有部分正确性，而且只是在某些时候才正确。它肯定沒有全面反映出这样一件事实：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职能和所服务的利益集团是多种多样的。拿存在着有产阶级的社会来说，如果认为国家“仅仅”是这些阶级手上的工具，那就未免流于片面。拿不存在有产阶级的社会来说，国家看来也沒有消亡，并且沒有仅仅因为通过国家统治社会的那些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大谈其国家所服务的阶级“利益”，它就奇迹式地改变了自己的一切职能和意义。

伴随着马克思的国家概念和政权理论的，还有“统治阶级”一词。正如国家概念一样，这个名词使那些应用它的人利用下定义的机会偷偷运进了一种理论：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必然是政治统治集团的理论。我所以说“偷偷运进了”，是因为应用“统治阶级”一词是否恰当还有待考察。要考察和检验这方面的理论，我们必须应用更加明确的语汇。作为一个有用的、意义精确的术语，我曾在别处提出过“当权集团”一词，虽然提出它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批评马克思。

“统治阶级”和“当权集团”的说法并不仅仅是用语问题，它们当中有很大的区别。后一个概念使人们能够依据实际经验去考察经济决定论的问题，以及上层经济阶级在上层集团内部的相对重要性。如果在强调经济制度的同时，也给予政治秩序和军事机构以应有的地位，我们就必须把资本主义社会上层集团的概念看得更复杂一些，而不能像马克思尤其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只把它简单地理解为“统治阶级”。

这并不是拿一种叫做“集团论”的东西来对抗“阶级论”的问题。它们都是结构的观念，其内容都涉及人们在政权机构中占据的位置，从而也都涉及他们所拥有的权力工具。我们需要研究的正是这类机构的形式、种类、关系和重要性，以及人们在这类机构中占据的位置。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单靠下定义就能解决的。

在马克思的国家论中，他对于财富权力的一般理解是正确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正确部分）。的确，财富不仅造成了对物的控制，也造成了对人的控制。这种权力在生活的许多不同方面发挥了出来，其中有一部分肯定是通过国家起作用的。但我们必须考虑两点。

第一，财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受到了工会的限制，而工

会也是通过国家起作用的；此外，确实还有若干其他力量同财富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赤裸裸表现出来的力量相抗衡。

第二，把财产收归国有并不一定能消灭“财富的权力”。事实上，它甚至会加剧一切社会领域中人对人的剥削，使得反对或消灭剥削更为困难。马克思的一般看法是：随着有产阶级的消灭，民主化就将和集体化齐头并进。今天对我们来说，这至少也必须被看成是一个尚未决定的问题。

总起来看，这两点使我们对马克思的国家概念是否全面产生了严重疑问。他的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经济决定论，以及他对于政治军事机构作为独立的和创造性的因素的忽视。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在后文讨论。这里只指出一点就够了：如果我们把国家解释为“经管统治阶级或有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我们便不能很好地考察出不同社会内部经济阶级和政治形态之间的关系有多少变化。但是，如果我们首先明确地单独突出政治统治工具，像马克思·维贝尔那样给国家下一个定义，即认为国家只是一种“在一定领土范围内垄断合法暴力”的组织，我们在考虑问题时便能从历史具体性出发，进行广泛的经验性探索。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使国家成为一种研究对象，而不是以一句口号偷运进一种理论。

这是一个从历史角度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但是，即使不进行这种详细的分析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类似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能够产生而且确实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本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纳粹德国、本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今天的瑞典等等。肯定地说，把所有这一切国家统统看做是“经管有产阶级事务的委员会”，那实在是太草率了。

（十四）资本主义处于连续不断的经济危机之中。这些危机越来越严重，使资本主义一步步走向它的末日——终于发生无产阶

级革命。

不景气-繁荣周期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一项突出的经济事实。但是，以目前组织成为各个民族国家的或整个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来看，这种周期究竟是不是它的固有现象还很成问题。直接或间接采取经济行动的国家、工会、工党以及通过扩军备战在经济上玩弄崩溃边缘政策所起的政治作用——这些以及其他的发展使危机问题从一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机制问题，变成了若干国内外的政治和军事问题。

关于一般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化问题，我想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这种稳定化还没有得到某种证实，目前的形势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我们丝毫不能摒除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提出的一般危机模型是富有教益的。但是，要证明卡尔·马克思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是否正确，单单指出资本主义有什么困难甚或指出它要遭遇严重危机，都是不够的。那样做就等于把马克思只当做预言家看待，而忽略了他的社会分析家身份。我们必须问：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危机是什么性质？它们会引起什么后果？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实际出现的这种稳定——以及不稳定和可能的崩溃——的机制，并不是由马克思预料的内在经济发展促成的。目前的稳定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一种马克思没有预见到的帝国主义机制，特别是一个马克思对之显然没有发言权的经济发达、政治巩固和军事力量强大的非资本主义结构——中苏集团的竞争威胁。

从内部考虑，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其实是政治和军事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经济上必须做的事情往往在政治上遭到最有力的资本家利益集团的反对。在更多的情况下，通过扩军备战在**经济上**玩弄崩溃边缘政策，要更合乎

他们的口味一些。

今天，不论从政治、军事或经济方面来看，先进的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都已经获得稳定。目前，不仅在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且在各国之间，都在从政治上推动一种消除经济弊端的工作。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国际援助和支持——提供这些援助无疑是为了政治和军事理由，但是在经济上却取得了北美和西欧资本主义共同繁荣的结果。第二次大战以后，大部分美援都被用来帮助恢复原来已经先进的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并没有用来使落后地区工业化。先进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战后复兴（原来的盟友和敌人都一样），推动它们组成了一个有高度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集团，并在国际范围内从政治上和军事上稳定这个集团。从美国和苏联采取的军事姿态上，便可以看出这一活动的重大政治意义。在采取这种姿态的情况下，美国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援助使世界资本主义得到了恢复和繁荣——直接的支持是给予军事援助，间接的支持则是承担了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军事“负担”。

与此同时，姑不论是什么原因，先进资本主义并没有在经济危机中崩溃；确实发生过危机或不景气，但它们看来大都是一种插曲，而不是长期的痼疾。而且，在以种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克服危机的过程中，马克思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改变了面目，它所具有许多新特点是它从未料想到的。目前，普遍呈现出一种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已组织起来的资本主义。它的管理人已经成功地缓和了经济危机，使我们看到了——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一种规模空前的经济繁荣。

对于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在政治和军事上获得巩固的方式，马克思了解得是不够清楚和不够全面的。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完全处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中。通过私人公司、工会和国

家的干预,它的很多部门都变得高度合理化了。简言之,资本主义和机关政治并不是两个对立的极端。它们已经打成一片。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没有普遍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人们已经做到使生产合理化。

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保持高水平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人为刺激的需求”造成的;以一种连马克思也没有完全想到的巨大规模有步骤地浪费财富,是这种经济活动的固有现象。明明还非常完好的商品会被视为“陈旧”就是一个例子;底特律汽车式样的变更所耗费的钱,比好几年“印度生产投资计划的全部金额”^①还要大。大量广告活动(更不用说扩军备战了)的经济浪费是另一个例子。

但问题正出在这里:马克思不了解,尽管有这些浪费(而且部分地正由于有这些浪费),资本主义生产活动和生产率却仍然能够保持原状,甚至有所增长。他看到了浪费、诈骗和矛盾,但他低估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像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样)惊人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能力。

正如马克思清楚地看到的那样,先进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实际生产状况之间的差距确实是很大的。客观地说,这种矛盾已经比过去扩大,而且还多半会继续扩大,因为浪费、诈骗、缺乏效率和追求眼前的利润确实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经济矛盾”,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差距。它愈来愈变成了一个道德估价的问题和政治决定的对象,即使是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它也并没有引起“无产阶级起义”作为解决它的手段。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主要由内部起作用的经济力量

^① 见托马斯·巴洛夫所写的文章,载《新政治家》,1959年12月12日。

决定的活跃制度。从这种观点来看，他的模型是一种杰出的描述、分析和预言。但事实是，“其他力量”已经在干预经济作用。其中有一些是内部的——特别是政治的和军事的力量；有一些是外部的——特别是中苏集团作为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在世界范围内的巩固。现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既取决于它自己的内部经济机制，又取决于这些力量。

(十五)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将首先经历一个过渡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然后再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

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马克思心目中的那种无产阶级革命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打着他的旗号”的革命，是在那些和马克思的设想迥然不同的社会中发生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考察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时讨论。

(十六)虽然历史要由人们自己来创造，但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人们缔造历史的方式和历史的发展动向却是已被决定了的。历史的进程在结构上受到限制，以致成为不可避免。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缔造历史的一般模型乃是(a)把古典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模型——在这种模型中，事变是由无数作出决定的人(例如决定价格的买主和卖主)无意之中造成的——加以普遍化而应用于整个社会。它也是(b)把一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主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加以普遍化而应用于整个资本主义时代，乃至应用于在此以前的人类全部历史。

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到的历史事实表明，我们还需要有别的模型。这些事实是：在社会制度的每一个重要方面，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军事的，权力工具的范围和集中程度都扩大和加强了。由于有这些事实，我们必须构想出这样一种模型，它能使我们更密

切地和更有意识地联系当权集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的得失去理解事变。我们必须应用这一模型——经过适当的修正以后——来理解苏联类型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以及先进资本主义社会。

因此，对于分析和理解现时代来说，和经济阶级的机制以及其他更加不具人格的历史缔造力量相比，政治、经济和军事当权集团的范畴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或者说更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模型构想得很出色，而且，对于一种特定社会的一个阶段来说，它通常也是最适当的解释。但是，如果只依据这一个模型来看问题并且把它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种概括便是过分的和不恰当的了。在这个模型所设想的社会中，各个典型单位的规模是不大的，相互作用的方式是自发的，就像自由市场经济的活动方式一样。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这样一种社会叫做“必然的王国”。当然，马克思也提到了“自由的王国”，也就是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将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人的意愿将和事变的结果更趋于一致。今天，必然的王国仍然存在；因此，马克思的模型在一切类型的社会——在大部分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和不发达世界——中都是有用的。同时，自由的王国也还仅仅是一个理想；今天，马克思所设想的这一种社会并没有在任何地方出现。

但是，缔造历史的模型决不止限于这两种；我们不能认为，第二种就是第一种的唯一更替者。对考察先进资本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来说，我们需要有新的模型。

马克思想像的时代序列不一定就会发生。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以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序列，是马克思的理论和预言的巨大历史框架。但我们现在却必须对它加以修正：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产生出任何一种可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主义；而从封建主义社会中，则直接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而且，在这种社会中，假定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致——自由的王国——也是很成问题的。

因此，这些时代概念——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本身就需要修正：目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今天出现的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也不是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不论是从起源上或性质上看）。在中苏集团统治地区，从一种封建主义制度中产生的社会肯定不是马克思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社会，更谈不上是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了。

（十七）如命题（一）所述，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也是为这些经济基础的变化所决定的。

经济手段只不过是权力手段的一种，它们本身就可能是按照政治和军事的目的和利益考虑由政治和军事手段形成或决定的。对于解释二十世纪中叶的许多重大事变来说，“政治决定论”和“军事决定论”的作用往往不亚于“经济决定论”，甚至比它还要有用。

人们在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以及同它有密切联系的历史必然性学说）时，通常都把它置于同自由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决定论”相对立的地位上。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历史具体性的限制，它们是在法国大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产生的，并且都特别以英美两国为考虑对象。每一种都不能被认为是普遍真理。每一种都必须结合目前和不久的将来的事态发展来重新考虑。而且，不言而喻，我们并不仅限于必须在道德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之间择取其一。

从马克思那时到现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到这种程度，以致需要对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它们同其他制度的因果关系作新的说明。考虑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先进资本

主义的发展以及不发达世界的状况和前景，经济决定论似乎已成为马克思著作中一个基本的（虽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错误了。认为经济原因是资本主义内部最重要原因的观点，同关于工资劳动者作用的错误预测、过分僵硬的政权理论以及过于简单化的国家概念有直接联系。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事实便日益清楚地表明，政治形式可能急剧地改变——有时甚至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面貌。起决定性作用的很可能并不是经济生产方式，而是政治行动方式。由于公私社会生活中已经有愈来愈多的方面成为政治组织的对象，因此我们必须认为：为实现政治理想、为争取政治的和军事的行动与决策手段而进行的斗争也和经济手段一样，同是人类缔造历史的关键性因素。

这并不等于说经济力量是不重要的，或是它们不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但这的确意味着：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展，经济力量现在往往处于防守的和被限制的地位，对于理解政治权力或形成整个社会结构来说，它们已不能提供充分的解答。

二十世纪的许多经济发展本身，就必须以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变化来解释。在这里，我并不想以“政治决定论”或“军事决定论”来代替“经济决定论”，而只是表明这些力量中的每一种并不是在一切历史情况下都普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在一定的社会中，它们的重要性必须视具体的历史环境而定。

在许多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上的种种措施已经大大调整了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因素对一切居民阶层的社会影响。福利国家并不是由经济生产方式“决定”的，虽然它的得以实现不用说要归功于经济的发展。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经济范围内能够从政治上做的事情，无疑地要比马克思的学说所预期的广泛得多。这方面

的机会究竟有多么广泛，我们还难以预测，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肯定没有什么固有的障碍，会使人们不能以政治手段缔造历史（包括改革和有意识地变更经济本身）。

在当前的资本主义时代，斗争舞台和历史变化的动力主要并不是经济基础，而是结合成一个政治经济整体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种政治资本主义是马克思所未见过或预料到的。马克思没有设想到它所采取的几乎可以称为新重商主义的形式，或是通过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和改善的资本主义的范围与效果。人们已经采取了各种直接的和间接的、福利性的和军事性的改善措施。即使说它们是针对资本主义经济缺陷采取的改善措施，这也无碍于我的论点：资本主义终究得到了加强。

在某些国家中，调整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改良；在另外一些国家，例如在新政时期，起作用的则是自由主义力量，它们往往是由上层阶级集团领导的，同时受到“中间阶层”——按照马克思的预测，他们是应该逐渐消灭的——庞大压力的强烈影响。部分地说来，这些调整当然也是垄断资本家为本身利益着想而作出的让步。资本家已经对经济力量有了更多的政治控制，从而能够长期保持他们在政治资本主义中的作用，这就否定了马克思对经济危机及其预期后果的设想。

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对经济的看法加以扩大。这样，我们便一方面会注意到——像马克思那样——不断变化的经济生产技术，同时又注意到——像马克思·维贝尔那样——军事暴力、政治斗争和行政管理的技术及通讯工具，一句话，注意到一切权力手段以及在各种特定社会状态下这些手段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

这样，我们便能以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方式谈论取得和鞏

断这类政治和军事手段的问题。我们必须认为，对经济的强调只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我们必须经常辨明经济对决定整个社会的面貌所起的作用，但我们也必须比马克思更多地承认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独立作用。

对于马克思提出的一般社会模型来说，我认为这是一种必要而有益的加工和发挥。在此以后，通过论证和研究经济决定论，便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者希望阐明的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决定论就变成了一种需要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中加以检验的假设。军事决定论和政治决定论也可以如此检验。从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来看，在一切社会中，即使只是在一切类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三种力量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被无条件地目为最主要的、永远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缔造因素。

经济决定论暗含的一个内容，即关于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问题，严重限制了马克思的著作的现实效用。马克思曾认为，在工资劳动者奉行的政治方针和意识形态中，民族主义将日益衰落，国际主义将居于统治地位。但事实证明这种预期是大错而特错了。在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国家内部，在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地和不发达地区，都表现了这种情况。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思潮，国际主义的力量自马克思死后一般都削弱了。工资劳动者的民族主义情绪肯定并不比中上层阶级逊色。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第二国际非常戏剧性地——特别是在德国——给了“国际主义”思想以一记耳光。1914年8月4日，欧洲“社会主义”一下子便全盘让位于“民族主义”。

这种事实对马克思主义模型具有的一个意义是：阶级不过是形成利益意识——特别是强烈的意识——的原因之一；不论它的影响有时会多么巨大，此外还存在着其他许多原因。民族主义只

是表明这种更普遍的事实的最明显的例子。但它也是一个会使马克思感到伤心的例子。同马克思的一般假定相反，民族主义作为一支政治和经济力量，作为一种军事形式和决定意识的基础，它的重要性已经增长。在当代历史的缔造过程中，民族国家——以及超民族的国家集团——是组织、政治意识和军事意志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不用说，阶级、特别是阶级联盟肯定是通过民族国家起作用的，但是，以这类政治结构和民族主义意识为基础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却往往能改造阶级和阶级联盟。一个民族国家和另一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别，要大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之间的经济差别。不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践中可能有什么表现，这种思想并不是卡尔·马克思作品中一个有系统的部分。

总的来说，马克思学说——事实上是一切流派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思想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因素和力量中，工资劳动者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成熟和没落时期最活跃的政治动因。事实上，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对这一过程何以会发生以及何以必然发生的解释。

在思想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我们在第四章中举出的关于社会发展趋势的各项理论，是这种形而上学的劳工作用论的直接基础，它们都证明它是关于先进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状况的中心命题。

在道德上，马克思主义也是对工资劳动者正在变为革命无产阶级这一过程的肯定，并且歌颂了他们将要演出的伟大的革命戏剧。

在政治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活动史实际上就是促进这种过程，从而保证这幕戏剧得以上演的一系列战略和努力。

在指出上列各点以后，我们必须立即说明，马克思关于先进资

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政治预测已经落空了：他所指出的主要动因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发展；他指望这支力量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成为事实。预定会推动这支力量起作用和发展的趋势一般并没有出现——即使是偶然地和部分地出现了，也并没有带来他所预期的后果。

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工资劳动者变成“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事例是不多见的；他们并没有成为任何时代性革命变化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已经同民族资本主义合为一体——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心理上都是如此。在这样合并后，他们便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了一个依赖性的而不是独立的变因。工会和工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这些组织只是以改良主义方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发生作用。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那种阶级斗争并没有普遍出现；经济利益冲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已经制度化了：它们大都通过间接的行政途径来解决，而没有化为公开的政治斗争。当然，基本的阶级利益冲突是存在着的。但是，它们却很少引起阶级斗争。

这些问题构成了对马克思的严重挑战；它们说明马克思提出的范畴和模型是成问题的。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期望不仅没有在任何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而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言，将来的事态也不会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方式和规模发展下去。这并不单纯是一个与事实不符的问题：这要归咎于他使用的范畴和资本主义的一般模型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

不过，考虑到马克思的整个模型、乃至他的全部理论都是以形而上学的劳工作用论为依归的事实，它也只能遭遇到上述命运。既然这种形而上学的劳工作用论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主要的动力和政治预测，它的破产当然会导致马克思学说中很多别的部

分一同破产。

在形而上学的劳工作用论和历史趋势促成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观点背后，隐藏着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不足之处：社会分层范畴的缺陷；在经济基础的发展造成的心理和政治后果问题上，看法的模糊和不正确；关于经济原因在社会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的错误；唯理主义心理学理论的不适当；一般政权理论的不符合事实；国家概念的片面等等。

如果我们运用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具体性原则来考察他的著作，即使尽可能做到宽宏大量，也会发现他的错误实在是太多和太大了。显然可以从他的著作中推出的政治、经济和心理预测，看来已日益遭到事实的驳斥，他的整个模型已经呈现出愈来愈多的漏洞。他的各种理论都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这本来就是它们的内容。只怪他没有完成自己的研究，在1883年就去世了。

不言而喻，根据二十世纪的事态发展去驳斥十九世纪的理论是不费气力的——从马克思写作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对于他的这些著作进行这样不费气力的事后批评，也许会使我们觉得很无谓；但社会科学研究如果想获得任何进展，便必然要进行这一工作。今天，古典马克思主义已不再能确切地说明先进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而只是一种使用“希求语气”的政治空谈。

但我们现在必须要问：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否已失去价值？我的回答应该是读者已经明白了的：并没有，对于现代最卓越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说，马克思确实作出了价值重大而持久的贡献。^①

^① 我指的并不是那种从未被马克思解释明白、但却被他的信徒奉为至宝的神秘的“辩证法”。局外人一定会注意到，那些大谈其辩证法的先生们对辩证法的意义并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让我们暂且看一看以下的“三大规律”：

第一，量变引起质变，反之亦然。马克思的这条“规律”是针对这样一些人提出的，

但是，由于历史事态发展已经推翻了他的许多具体理论和预

这些人认为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突变”(也就是革命)，而只有一系列细微的和逐步的变化。其实，这种观点在当前的革命时代已不攻自破，毋需再引证一些煞有介事的“规律”来“驳斥”它了。谁都看得出来，如果事物变化到足够的程度，它自然就变成了同原来不一样的东西。

第二，“否定之否定”：一种事物从另一种事物中产生，接着便和原来的事物进行斗争。反过来，新产生的事物本身又“孕育着毁灭自己的种子”。马克思的文章中充满了生殖周期和医院产房方面的譬喻：孕育着的胚胎、已经结过婚的女子、子宫和助产士，直至流血的分娩等等应有尽有。譬如说，无产阶级是从资本主义的子宫中产生的，又反过来使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着革命”。但是，我们并没有一种辨识出“否定”现象的明确方法；我们不应该把增加文彩的譬喻错当作思想方法，更不能把它视为“自然界的一般科学规律”。它的实际内容只是：事物(有时候)是从另一种事物中产生的，并且(有时候)在经过相当时间后会代替原来的事物。

第三，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最看重的一条规律，即“对立面的互相渗透”。据我的理解，这意味着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客观的矛盾以及这些矛盾的解决。这显然是把逻辑和形而上学混淆起来了；我们可以说，人们对事物的说明往往是相互矛盾的；但我们却不能说，树木、岩石或——就这一点而言——阶级是彼此“矛盾”的。人们可以认为阴阳电荷是相互矛盾的，但这显然是把电拟人化了。

马克思所发现的“辩证法”，拆穿了说，不过是谈论那些已经通过普通的论证途径得到解释的问题的说话方式。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辩证法”解释过任何问题，虽然他有时并不避免使用神秘主义的辩证法语汇。不过，“辩证”一词终究是对黑格尔哲学钻研有素的人使用的语汇，而马克思也的确很好地利用了它：他依据辩证的观点驳斥了十八世纪“自然和谐”论的荒谬，意识到了历史发展的变化无常和多面性，看到了一切历史力量的“普遍内在联系”，从而始终不忘记每一种历史形势的无休止的变化、真正的矛盾和难以逆料的发展前景。

我们或许还会有这样的看法：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如果不是对马克思来说的话)，单是依赖“辩证法”就能帮助一个人跳出宿命论的陷阱。但是，对于那些自封的“内行”来说，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变成了在思想上玩弄神秘见解的廉价方法，变成了艰苦研究的代替物。他们所以坚持使用这种语言，主要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读上几本书就变成了信徒。而在我们看来，“辩证法”则是一大堆陈词滥调、一套自相矛盾的说法或一种自命不凡的神秘主义——或是三者兼而有之。“辩证唯物论者”的基本错误，就是以一种无所不知的神气硬把逻辑同形而上学混淆了起来；如果说辩证法的各项规则真的是“最一般的运动规律”，那么，所有的物理学家都会每天运用它们了。另一方面，如果说辩证法是“思想科学”，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就是心理学主题，而根本不是什么逻辑或方法了。作为思想指导，“辩证法”只能弊多于利，因为假如一切事物都是彼此辩证地联系着的，那么，要了解任何一个事物就必须了解“一切事物”，这样就难以看明白因果序列了。

言，他用以研究社会和历史的一般模型是否也失去其价值了呢？我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已经失去了。马克思留下的模型是有漏洞的。今天，运用这种模型必然会在思想上流于僵硬，必然要为诡辩而徒费口舌，而且时常要陷于自相矛盾之中。今天对我们来说，马克思的研究只是一个起点，而并没有为我们力图了解的人类社会提出尽善尽美的解释。就我们自己的指导方向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而言，我们也许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目前所处的境地，但我们可以肯定今天的世界并非马克思设想的图式。关于这一点的证明——虽然是一些断片，但却是决定性的——已经在本章中提出。

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肯定并没有随着马克思的去世而停止发展。马克思只是一个开端。后来的思想家和行动家应用了、修正了、发挥了他的思想，并且提出了许多全新的学说、理论和战略。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发展确实是“以马克思为依据”的，虽然把它们同古典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的，只有那些为了僭夺正统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目的而感到有必要歪曲思想史和政治史的人。但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些后来的理论中，是否有任何一种有益于今天的社会研究、有助于我们认清政治方向的理论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它们当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一些流派。

第七章 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特色，就是不断发生着极其曲折和剧烈的争论。在许多局外人看来，这些争论往往显得带有宗派主义色彩。但对于实际参加争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说来，它们却一直是真正折磨人的，具有极重大思想意义的。不论是马克思或在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著述都不是学术界那种心平气和的辩论；它们同决定政策和历史事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包含着一系列连续不断的理论斗争，这些斗争深深关系到个人的利害得失和政治上的成败，涉及到人们的道德愿望，他们的再斗争和再失败。这种斗争关系到对人类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每一次的修正、发挥、反驳和背离，都配合着起先是在一国、然后是在另一国、现在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可以很方便地划分为好几个重要阶段，每一个阶段既是一个政治时期，又是一个思想轴心。当我们在本章中事先对它们作一番短暂的考察时，我们必须注意每一个阶段的直接政治背景以及每一个阶段所强调的历史变革的动因。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般抱有社会主义宗旨的西方思想家当中，有好些改革纲领既在彼此之间又同各种自由主义学说展开竞争。这些纲领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提供了精神和政治背景。许多小团体和空想家的移民区、公众和学派都打着“社会主义”的一般旗号。一种德国理论、英国观点和法国意识形态的混合物盛行于世。各种计划和“计划者”风靡一时。他们全都谴责一部分人由于垄断财产而统治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但他们彼此的纲领却有很大

分歧。有些人赞成大工业企业；另一些人则偏爱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小公社。有些人要求把财产分成小份；另一些人则要求把财产集中起来，实行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有些人要求一切人的收入完全平等；另一些人则主张按照需要或贡献规定收入，或是听任自由市场的作用去调节。有些人要求废除一切继承权，另一些人则认为继承权是维持家庭和经济的延续所不可或缺的。有些人希望由技术专家管理经济事务；另一些人则主张更纯粹的民主治理。^①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分一分类，就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存在着三种主要趋势：(1)一部分人可以说是“隐居”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公社里去了，他们在那里实践着——或者至少说是试验着——自己的反资本主义原则；(2)一部分人企图以正义这类理想向当权者的理性呼吁；(3)另一些人则考虑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革命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想到的是被剥削群众多少带有自发性的起义，或者也许是由工会发动的直接行动。另一部分人则考虑由一个组织严密、人数不多的政党通过密谋来进行革命。除此以外，几乎每一种能够想像到的观点都可以在不同时期的人们中间找到。

到十九世纪末叶，由于选举权更接近于普遍，工会变得更为有效和巩固，又出现了第四条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4)通过工会、压力集团、合作社和合法政党的活动，可能取得一系列选举的胜利，最终通过议会立法实现社会主义。

卡尔·马克思反对第一条(孤立的社会主义公社)和第二条(向当权者作空想的道德呼吁)道路；第四条(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① 参看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History of Socialism)第1卷，伦敦1953年版，第304页以下。

是他从没有真正考虑过的，虽然恩格斯在晚年曾面临过这一问题。

我们应该记住，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同许多政治集团和政党有密切联系；他们写了许多信件和宣言；他们多次向小群民众、不满现状的学者以及徬徨的（多半是移民）工人发表过演说。但他们又都不是直接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领袖。^①他们是知识分子——政治知识分子。在这种身分下，马克思毕生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虽然通过1848年的亲身经验以及他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细心研究，马克思懂得了不少实际发动革命的知识，他并没有能够——或者至少是并没有——阐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这样，以后就有别人出来作各种不同的说明，每一种都打着马克思的旗号，从而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引起了长期的严重分歧。

不用说，马克思的思想自然被卷进了政治行动的旋涡；事实上，他的著作整个说来已成为一切重要的左翼活动和理论的基础。它的影响几乎立即就分成了两个方面，^②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政治分化此后便一直具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最重要的意义：

社会民主党：一种鼓吹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群众性政党，主张

^① 1864年在伦敦，一群英国和法国的工会主义者——以及卡尔·马克思——建立了“国际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很快就包括有欧洲其他国家的代表。协会内部充满了剧烈的竞争，特别是马克思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之间的勾心斗角。它的组织成就的顶峰也许是七十年代初的海牙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六十五名代表，其中十八个是法国人，十五个是德国人，余下的属于许多国籍，其中有一个丹麦人、一个爱尔兰人和一个波兰人，他们当中有裁缝和印刷工人、教师和皮匠，还有一个“磁器工”。参看格斯那本编得极好并附有有关文件的著作《第一国际：1872年海牙会议记录》（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inutes of The Hague Conference of 1872），麦迪逊1958年版。

^② 第三方面是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如前所述，本书不准备讨论这方面的问题。读者可参看欧文·霍罗维茨：《激进主义和对理性的反抗》（Radicalism and the Revolt against Reason），伦敦和纽约1961年版。

教育工人阶级，使他们懂得何以应该通过选举获得政权的理由。一般说来，社会民主主义所涉及的，是如何在具有议会政治制度的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社会主义。

布尔什维克：一种由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这个党特别注意准备夺取国家政权，在有利时机迅速发动打击，利用各种眼前的问题争取广大阶层和群众的支持。一般说来，布尔什维主义所涉及的，是如何在一个经济落后和政治专制的国家发动革命。

现在，我们姑且不去从理论上判断这两种主义哪一种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和哪一种是最“正统”的，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历史事实和解释。如爱德华·伯恩斯坦那种合法的和进化的社会主义所表明的那样，社会民主主义认为：一个拥有很大一部分选民、同工会和合作社有联系的社会主义政党，能够通过宪法手段在民主政体范围内——也就是不通过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所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则在政治上基于这样一种迫切的需要，即必须建立和利用一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就是一个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由革命家组成的人数不多的政党。在别的地方，工人阶级如果得到适当的教育，也许能通过选举来完成革命，但是在俄国，列宁型的党却由于进行反对崩溃的沙皇政权残余、克伦斯基领导的自由主义者、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资本主义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干涉军与封锁的斗争而完成了革命。

(一)

十九世纪后半叶，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和强大的工会在西欧获得了发展。这些政党都松散地组织在第二国际以内，从1899到1914年，第二国际在世人眼中一直代表着“正统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党是在德国。在许多方面，德国党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派马克

思主义的典型：在意识形态上，它是革命的；在实践上，它是改良主义的。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个党变成了一种可以叫做“社会修正主义”的新趋势的中心。这种修正主义第一次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政治实践作了系统的规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爱德华·伯恩斯坦的学说最为著称。他分别受到了打着正统旗号的卡尔·考茨基^①和打着革命社会主义旗号的罗莎·卢森堡的批评。

从那以后，在中西欧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方向便在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占上风，尽管经过了不少波折和作了许多修改。我们在第八章中将看到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卢森堡本人的文章。在本章中，我们将简单地说明一下爱德华·伯恩斯坦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后来终于（事实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成为风行一时的“社会民主主义”。

随着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队伍的扩大和力量的增强，它们日益变成了改良的工具而不是革命的杠杆。革命可以等待，而在等待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社会必然会逐渐到来的信念便成为人们希望的寄托。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同工会和消费合作社一道，有时还联合非社会主义政党，争取一切可以争取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伯恩斯坦最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运动就是一切这一事实。维持运动和推进运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去打碎民主国家机器。通过利用这个国家机器，工人及其政党能够而且正在取得巨大的直接进展；他们也能逐步走向“革命的变革”。革命变成了动听的空话；暴力被认为是不必要的，甚至是无用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改良党”，社会主义将以“通过

^① 我敢肯定，甚至在考茨基于1918年改变立场以前，他也认为只有议会行动是行得通的。

经济组织获得解放”的形式在德意志帝国实现，虽然这当然也需要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恩格斯不是在他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说过，工人阶级必须学会如何利用民主政治吗？他不是说过，德国社会主义者正在向世界各地的同志们表明“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吗？^① 工会和消费合作社是“工业中的民主因素”。作为一点一滴进行改良的工具，它们可以发挥作用；而且，如果它们取得了强有力的联系，它们不就赢得“工业中一种真正的部分所有权”了吗？

伯恩施坦并不排除总罢工——除经济目的外并为政治目的而举行的群众性罢工。在争取社会主义的现实斗争中，这是一项技术武器，在特殊情况下无疑是有用的。归根到底，在现代武器出现以后，巷战和街垒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工人用这种办法是不可能获胜的。但是，群众性政治罢工可以被用来“对政府和舆论施加最强大的压力”。不用说，它的成功机会是不多的；它不能被轻易使用，只有在危急关头、只有在工人的合法行动途径被堵死的时候才能使用它，而且党和工会必须为之作周密的准备。它不一定是一种普遍的停止工作。事实上，伯恩施坦认为，“在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政治罢工将成为一种过时的武器。”它今天还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手段这一点，正证明了我们离开那种完全民主是多么遥远。

这就是那位主要的社会修正主义者指望的历史杠杆。对这些杠杆的选择，以及更一般地说来它们所导致的社会民主党的方针，是在修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情况下决定的，并且以历史动因本身

^① 关于爱德华·伯恩施坦及其有关问题的精闢阐述，可参看彼得·盖的学术性著作《民主社会主义的为难处境》(The Dilemma of Democratic Socialism)，纽约1952年版，本节中的大部分引文都录自该书。并可参看卡尔·朔尔斯克：《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Democracy)，马萨诸塞州剑桥1955年版。

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至于他自己的思想，伯恩斯坦曾对之作过下列最简单的总结：“农民的人数并没有缩减；中间阶级也没有消失；危机并没有愈来愈严重；贫困和奴役也没有进一步加深。现在所加深的只是不稳定、依赖性、社会距离、生产的社会性和有产者职能的过多。”^①

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了三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正统派”、“修正派”和“激进派”。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一切自命为“激进派”或革命者的人都遭到了严重的考验。面对着这一考验，德国的修正主义者和正统派为了一切实际的目的积极地或消极地合流了：他们都支持战争；到1919年，他们都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剩下的一部分革命者即激进派则确实表明了反战态度，并且支持（虽然不是毫无批评地）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取得的胜利。

德国党内的反布尔什维克派在理论上以正统的卡尔·考茨基为领导，同时，伯恩斯坦也加入到他这一边。考茨基在维护“纯洁的”马克思主义时，曾同伯恩斯坦进行过剧烈的论战，现在却和他携起手来。战争爆发时，考茨基正在试图说明，假如马克思还在世的话，他将有怎样的言论和行动。另一方面，伯恩斯坦由于已公开放弃了革命作为取得政权的手段，也许不那么伤透脑筋。他在西欧各国的志同道合者都采取了同样的立场。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便各自为本国而战，从而展开了一——就他们全是工人阶级成员而言——一场自相残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两大历史事件使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真正分了家。社会民主党人大嚷其国有化的唯一结

^① 彼得·盖：《民主社会主义的为难处境》，第244页。

果是使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成了国家的附庸。

从伯恩斯坦的观点来看，并不存在什么巨大的道德问题。通过支持战争，工人将得到比过去多得多的好处：如果德国战败了，德皇统治将被削弱；如果德国战胜了，德皇就会奖赏德国工人阶级的忠诚支持，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和社会保障。

考茨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德国的革命条件还没有成熟。因此，德国工人不能够有效地反对战争。如果说在工业先进的德国，条件尚且没有成熟，那么，当胆大包天的布尔什维克在落后的俄国不仅试着发动革命，而且取得了革命胜利的时候，考茨基会感到多么吃惊就可想而知了。

罗莎·卢森堡是德国党内革命派的领袖；我们将在第八、十一两章中读到她抨击伯恩斯坦和批评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章。^①

(二)

沙俄同西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在那里的发展具有迥然不同的性质。俄国是一个半封建的专制国家，没有重要的议会制度或其他任何民主形式。它的人口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民；它的资本主义发展既薄弱又奇特。虽然俄国的工人阶级是集中的，他们的人数却不多，而且任何组织工人的尝试都会受到严酷的镇压。在沙皇俄国，不可能有西欧那种庞大的群众性政党和工会或合作社。

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为消除农村的贫困而发展起来的，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早期的革命者——他们被称为“民粹派”——希望解放农民。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开始发

^① 对于罗莎·卢森堡的进一步讨论，见本章第四节。

展,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便逐渐向民粹派发出了挑战。1895年,在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他也许可以被称为俄国的考茨基——的领导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告成立。接着便开始了一段同民粹派作斗争的时期,后者在思想上远远敌不过才华横溢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到1903年,马克思主义者本身又开始内讧,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两派:列宁领导的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和少数派(孟什维克)。这种区别并不代表少数和多数的实际力量对比,但这两个称号却从此用开了。

孟什维克一般都赞同第二国际温和派的观点,主张等待资本主义在俄国取得发展,以便使工人阶级成长壮大,从而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党也将发展壮大,工人将受到教育,作好迎接未来的准备。

列宁认为这一切全是胡说八道。他指出,如果要在俄国发动革命,就必须培养出一批革命家,建立一个在时机到来时能立即行动的、组织严密的团体。在沙皇政权于战争时期倒台和1917年二月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的势力开始超过其余的社会主义政党。他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长期纲领。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结束战争!把土地给予农民!让一切人吃饱肚子!和平、土地、面包!**

他们在1917年10月的暴动中行动迅速而果断。到那时,他们要在各大城市夺取政权已不太困难。在1917年夏秋两季,以前意见相左的两个最杰出的俄国革命家逐渐言归于好,终于一道来巩固布尔什维主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揉合到一起,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战略和意识形态。而他们所领导的革命,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史的转折点。革命的事实、革命发生的方式、地点以及后来获得巩固的途径——这些问题便成了1917年以后一切马克思主义辩论的中心。

直到列宁在 1924 年去世为止，布尔什维主义——理论和实践同时包括在内——有些什么特点呢？在下文第九章中，我们将读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若干文章。这里只打算简略地指出我所认为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各项主要内容：

(1) 社会主义革命既能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也能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发生。

(2) 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必要时得处于地下状态的政党，“代表”（或者说代替）无产阶级作为这一革命的自发历史动因。

(3) 在这类国家中，工人的身旁还有农民。俄国农民是俄国工人的同盟军。布尔什维克党将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因为在俄国的特殊情况下，俄国农民是一个革命的阶级。

(4) 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首先对沙皇警察国家（它不知道“自由主义的自由”为何物）、然后对反革命分子（一切反对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人都逐渐被归入这一类）使用暴力和密谋是正当的。道德意味着做那些为进行革命所必需的事——假如你在道德上承认了它的重要历史意义的话。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目的——完成革命——决定了革命行动的手段，并且使任何手段都成为正当可用。

(5) 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一个由垄断资本家的巨大金融网统治的时代。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列强为瓜分世界而不断进行战争的时期。

(6) 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衰落；它已不再能支持下去。为了获得新市场，世界垄断资本主义需要输出资本，而不仅仅是输出制成的消费品。现在，资本家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获得新的市场。

(7) 这种帝国主义意味着世界已经被各大资本主义强国瓜分

完毕；因此，落后国家在经济上永远也不能取得像地位已经巩固的资本主义强国那样的发展。譬如说，在俄国、中国或印度这样的国家，决不会有强大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俄国的工业控制在英法两国资本家手上，他们不会容许它有进一步的发展。

(8) 为了这些原因，特别是由于帝国主义造成的这种不平衡发展，俄国的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多，却必须在它完全被帝国主义者并吞以前发动革命。俄国是最薄弱的一环；布尔什维克现在就要打碎这个环节。

(9) 而且，帝国主义者造成的形势，正好使落后国家的工人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帝国主义带来了战争，加深了对殖民地的剥削。正当资本主义大国忙于互相厮杀从而彼此削弱的时候，这些殖民地的工人将掀起反帝斗争。通过他们的行动，不发达地区的工人将使帝国主义本国绝大多数工人受到鼓舞，同样发动无产阶级革命。

(10) 作为坚定地领导——如果不说是包办——革命的动因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夺取到国家政权以后，必须保持它的革命组织的结构。它将是唯一的政党，因为只有它才是真正的“工农代表”。党内可以有很大分歧，然而，等到那个人数不多的控制集团一旦作出决定，一切党员都必须服从；在这样作出决定后，再公开表示任何分歧就等于背叛。^①

^① 这种政治垄断思想是一个引起颇多争论的历史性问题，但事实似乎是：一党制主要并不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一个基本原则，而是对于其他政党在年轻的苏联内战时期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甚至在 1917 年 10 月以后，布尔什维克还争取其他政党——从各派社会主义革命者直到孟什维克——的合作。只是在这些政党从事“反革命活动”以后，布尔什维克才宣布它们为非法，而且这只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军事措施，到内战结束就准备放弃。实行一党制的教条，禁止党内存在派别，最终甚至由一个人实行极权主义统治，这些都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后才出现的新大林主义的基本特点。

(11) 在俄国取得政权以后，布尔什维克便进而积极鼓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和前工业社会中的其他革命。既然布尔什维克能够搞成革命，这显然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所以，凡是希望成功的政党都必须在适当考虑历史和民族差别的情况下，在组织上和策略上步他们的后尘。

(12) 不论是在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之中，或是在取得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都认为有必要完全打碎旧国家和建立崭新的国家机器。

大致说来，以上就是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布尔什维主义。他们作了一系列杰出的努力，企图在一个同马克思谈到的那种社会正好相反的国家中，使马克思的思想适应于当时当地的革命目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面临着马克思从没有面临过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实践家以马克思可能同意也可能不同意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甚至从来也没有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处理过它们。尽管苏联人想方设法证明布尔什维主义是“正统马克思主义”，我们却不应该看不清这样一件事实，即整个说来，布尔什维主义是一套独特的理论，具有迥然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方针。

不言而喻，布尔什维克的确使用了马克思提出的范畴以及一般社会模型的各种原理；特别是，他们在考虑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社会时，仍然墨守着他的十九世纪观点。他那套丰富的、往往是很奏效的咒骂语汇，成了他们的革命八股；马克思勾画出了各种理想，布尔什维克则宣布这些理想为奋斗目标。一切事情都是以马克思的名义做的，但实际行动并不符合他的理论或政治方针。不管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可以适当地作出什么解释，反正它不会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不过，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

的名义进行革命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像看待维多利亚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把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具体地看做历史上特定的一种政治哲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大部分都是对下列现象的解释：何以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佣劳动者并没有普遍无产阶级化，更没有发动无产阶级革命。但是对布尔什维主义来说，这却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只是因为布尔什维主义在理论上一般并不涉及“先进资本主义社会”，在实践上并不发生在这种社会。它所涉及的是一个落后、专制、以农业为主的前工业社会。它所寻求的也只是如何去积极推动无产阶级化过程，从而在政治上推进社会主义。作为一次成功的革命，布尔什维主义变成了其他一切国家中马克思主义运动必然注目的中心。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从各方面研究它，不用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

(三)

列宁在 1924 年去世了。

西欧并没有出现成功的革命。

1929 年，托洛茨基被逐出了俄国。

这三件事意味着原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结束了，原来的“列宁主义”也丧失了它的大部分精神实质。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和第三国际所属各国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斯大林主义的更重要的意义是在实际政治方面，它在理论上并没有对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或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思想作出多少贡献。不过，纵然如此，它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独特变种，理论和实践在这种主义中既密切地结合着，又彼此严重脱离。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从那些在他看来是日常必需的权宜手段中发

展起来的，即使它的基础是以惊人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长远决策。它的每一个理论的产生都是为了维护某一项政策或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为决策提供指导的。作为理论来看，它是由各种合理化解方案拼凑起来的。但它却拼凑得很完整，从头至尾贯穿着同一条线索，即必须巩固苏维埃民族国家并使之工业化。如果说，只是由于要应付斯大林的敌手的高度理论能力、照顾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理论传统和对于“正统”的迫切需要，斯大林主义才发展了一些理论，它也的确是一部分布尔什维克理论在特殊情况下的巩固，它不是“唯一可能有的巩固途径”，但却是它们当中的一种。

简短地说，斯大林主义是以一事实和两项决定为基础的。事实是：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发生布尔什维克型或其他任何类型的革命。第一项决定是：我们必须单干；我们必须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第二项决定——它实际上是第一项决定的必然结果——是：我们必须利用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立经济基础。在沙皇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建成这一基础。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历史作用之一，就是帮助一个落后国家进行工业革命。它提出了所使用的手段，即暴政统治和警察镇压，用巴林顿·穆尔恰当的话来说，这是一种结合“进步和暴政”于一身的极权主义制度。

对斯大林主义者说来，建立重工业和迅速实现现代化这一目标不仅是必要的，而且需要立即见诸事实。斯大林成功地组织了——这也是斯大林主义的主要内容——一切社会活动，使它们都为这些目的服务。一个统治文化和思想的组织建立了起来，以便使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和经济学都适应于这一紧急目标。另一方面，凡是不认为这是必要的或是反对它的人，至少也要遭到严惩，搞得不好就要送命。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开始愈来愈把理想同理

想的宣布者等同起来的文学艺术。要求的是统一,是工作。所以,不论在艺术上、思想上或政治上,都不容许有任何分歧。那会分散所需要的精力。

统一的要求很快就为这样一种做法提供了基础,即把不同的制度和组织统一在一个人——暴君斯大林——的形象中。统一的程度愈大,对破坏统一的惩罚就愈严厉,对人们的猜疑心也就愈重。这就造成了一系列的清洗、处决、强迫劳动和出尔反尔;这样,就把一个人和他帮助推动并且仍在指导着的进程、一个可以说是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进程完全等同起来。人的生命和脑力的耗费是巨大的,但斯大林主义却取得了成效:在一个孤立无援、处于国内外敌人及潜在敌人的威胁之下的落后国家,它**曾经**是迅速实现了工业化的手段。

斯大林主义不能用“斯大林的权力欲”来解释,也不能认为它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俄国内战过程中必然会形成的后果。可以肯定地说,决不能像古典马克思主义那样以国家为了有产阶级的利益在职能上有必要镇压无产阶级这一说法来加以解释。在我看来,它必须被理解为对下列三种重要情况**唯一可能有的一系列反应**:

第一,需要稳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巩固革命。我所说的“需要稳定秩序”,意味着为了当权者心目中的人们的长远利益而需要在政治上压制人们的当前利益。具体地说,必须牺牲一部分农民的利益以满足工人的利益,而且不言而喻,统治集团的一切反抗者都必须被镇压。

第二,迫切需要在**外敌**面前保卫新国家。不管斯大林的辩护士作了多大夸张,这一威胁终究是真实的。在发动革命之初和革命刚胜利以后,这都是事实;自然,当希特勒控制了纳粹德国时,这

种威胁便更为严重。

第三,需要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实现下列目标:迅速建立重工业的基础,并且保证实现这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所需要的劳动纪律和消费牺牲。在斯大林主义的俄国,其他国家早期资本主义经营者的残酷工作由政府担当了起来。此外,还有一点虽然是可以争论的,也值得提一提,这就是:在苏联各族人民当中,由于没有遵守劳动纪律的习惯和不熟悉日常的工业工作,完成上述任务就变得更为困难。

只要稍微具有历史眼光就很容易看出,假如苏联事先没有紧张地实行工业化,假如它的大批农庄没有机械化,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多半会灭亡。它的广大农民已经受到了从事机械化战争的训练,工业当然也提供了机械化军事装备。在希特勒进攻前十年,斯大林曾说过:“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①

俄国为战胜纳粹付出的代价,几乎使这种胜利得不偿失:千百万人死亡了,无数城市变成了废墟,工业遭到了严重破坏,人民疲惫不堪,生活贫困。西欧各国人民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他们在复兴过程中,特别是在德国,得到了美国(它在战争期间没有遭到任何破坏或重大损失)的大量援助。斯大林的俄国则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援助;“援助”它复兴的是在被征服国家中实行**帝国主义掠夺**,同时继续实行斯大林主义的**强迫工业化**。

实行帝国主义掠夺的方法是:直接把工业设备运往俄国,榨取

^① 转引自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纽约1949年版,第549页以下,本节中的好几个论点都采自该书。这句话出自1931年斯大林在第一次工业经理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译文引自《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页。——译者]

赔款和直接剥削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强迫工业化的方法是有计划地发展经济,这就和战前一样,但现在除苏联本身而外,还包括东欧各国。不过,这种经济帝国主义的做法后来日渐减少了,虽然强迫工业化已经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

不言而喻,斯大林主义发展成为一个国际集团这一事实并没有证实原来的托洛茨基-列宁学说。首先,同这些早期布尔什维克希望相反,革命仍然没有在伦敦和柏林,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是发生于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发生于一般说来工业都不是先进的国家。其次,这些东欧国家的革命,除南斯拉夫以外,都不是由工人阶级自下而上掀起的,当然更不是由任何有国际主义观点的无产阶级进行的,与此相反,它们一般都是自上而下由外部发动的,主要的历史杠杆是实际参与其事或摆出威胁姿态的苏联红军。它们部分是革命,部分是征服;它们是由这一地区的霸主苏联一手制造出来的,并被置于它的卵翼之下。

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特色之一,即杜绝外部任何影响的闭关自守政策,主要是经济保护主义的一个俄国变种,这是一切刚实行工业化的国家为防止工业更强大的国家的竞争而使用的惯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种闭关自守是由“西方的”行动造成的,但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来说,这却有助于达到经济、社会和政治目的。由于工业化的强迫方式和痛苦的发展速度,苏联统治集团感到有必要蒙蔽苏联人民,使他们无从得知国外更高的生活水平。为了防止比较,他们谎报苏联国内外的状况,而且所说的谎话往往是想入非非的。他们还编造了外国间谍在国内外活动的可怕情景,就像美国麦卡锡分子的做法一样。但斯大林俄国在“麦卡锡主义”的道路上走的要远得多。那里出现了异想天开的虚构罪名的审判、清洗,集中营,屠杀和其他各种可怕的不法行为。

然而，尽管有其残酷和欺诈的一面，斯大林主义却起到了保证工业化和军事安全的作用。同时，它也用来保护所使用的专制手段，以及与这些手段不可分开的对苏联人民的欺骗。^①

1917年^②，俄国布尔什维克建立了第三国际以保卫自己的革命成果，支持国外的革命运动并且同第二国际分庭抗礼。第三国际直到1943年才在形式上宣告解散。从十月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境外一切共产党的历史都同它无法分开：它们不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就是同它有密切的联系或纠葛。二十多年以来，从二十年代末期到五十年代中期，斯大林主义——并且归根到底是斯大林本人——一直指导着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和理论。

当然，除去各国共产党，在苏联境外还存在着社会民主党人，并且有托洛茨基。社会民主党人在确实取得政权以后，例如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很快就扔掉了一切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任何社会主义的遗产；二十年代社会民主党统治下的德国和四十年代末的英国，仍然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的其余地区，不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以后，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取得过政权；一般说来，我想大家都会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他们攻击斯大林主义要比攻击本国的“阶级”敌人更加卖力。

因此，在二十世纪的第二个二十五年，必须结合斯大林主义——不论是对它作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

(四)

针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革命路线和第三国际所属各党的活

① 参看多伊彻：《斯大林》，第559页以下。

② 原文如此，应作1919年。——译者

动，托洛茨基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两个主要中心。但它们都只能站在外面窥视。（它们也很难置身于别的地方，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统一体是不容许内部存在反对派的。）

辗转流亡于土耳其、法国、挪威而最后抵达墨西哥的列夫·托洛茨基，在三十年代末期建立了一个他乐观地——非常乐观地——称之为“第四国际”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实际政治中从没有起过重要作用，但它却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论战的一个理论中心，对苏联社会的性质和其他世界历史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这三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一、第三和第四国际）展开了剧烈的理论和政治斗争。从他们的争论中发展出了不少思想。它们每一派都以马克思的嫡系自居；每一派都谴责另外两派背离了原来的主义。

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本人和列宁在内，曾经在革命中像列夫·托洛茨基那样出色地和多方面地起过作用。他一生的事业，正如列宁的事业一样，真可以说是理论永远密切地结合着实践的。托洛茨基对马克思主义的几次阐释和修正、批评和贡献，包括了它在二十世纪头四十年的全部发展过程。在革命和改良、正统和修正主义的冲突之外，他又另外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不断革命论”的革命修正主义。他参加了早期那些关于俄国、欧洲和美洲革命前景的不平凡的思想争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民粹派三者之间在革命策略问题上展开的争论。当革命本身要求作出痛苦的和当机立断的决定时，接着在危险而可怕的内战期间；最后，先是在俄国然后是在流亡中，托洛茨基的文章、攻击和批评始终活跃于斗争的舞台上。

托洛茨基在其活动初期便非常认真地努力把马克思的理论和

布尔什维克实践切实地结合起来，提出了这方面的若干基本论点——“不断革命论”。在他的晚年，他又对斯大林统治的社会进行了最透彻的分析。^①这中间，他还写了一部精辟的文学批评著作、一部三卷本的俄国革命史——这是二十世纪真正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以及难以计数的小册子和信件。

在政治上，从本世纪初到1929年被斯大林放逐为止，他一直站在决定性的行动岗位上。他是1905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者，1917年再度担任这一职务。内战期间，他缔造了和领导了红军，随着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建立，他在相当时期内又成为反对派的中心。

可是，即使他的多方面的活动真正令人惊叹，托洛茨基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来说，也仍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他生活在革命发生以前和革命的事变进程之中，对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前面已经指出的巨大贡献。但在他流亡以后，托洛茨基变成了一个没有革命背景的革命家、一个没有下属的官僚和一个没有政党的政治家。他具有发动革命的意志和热情，却缺乏必要的手段和机会（这二者时常是相互有关的）。

同托洛茨基和列宁一道，罗莎·卢森堡——我们在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左派时曾提过她——也许是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最复杂的。她不是斯大林主义的尖锐批评者，因为她在斯大林获得胜利以前就已经去世；但她曾经对布尔什维主义提出过善意的批评。在我看来，罗莎·卢森堡在政治上似乎处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之间一个特殊的和没有力量的地位。她反对第二国际的德国支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她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但

^① 我们将在第九、十一两章中看到这些著作的片断。

很早就作了重要保留。她首先是并且一直是一个革命家（第二国际的那些领导人和理论家却不是革命家），但她也热烈拥护民主和自由的一切最主要的本质。

这两种观点：即“为了革命”同时也“为了自由”，在她对无产阶级群众革命的自发性的信心中结合了起来。在这方面，她严格地遵循着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两可态度，也正是她的态度。她的思想体系中再明确不过的一点就是：民主程序必须和社会主义革命并行。她一只脚在第二国际，一只脚在第三国际，而她的头则恐怕钻进了古典马克思主义那些比较暧昧和偏于空想的牛角尖中。我在批评马克思主义时提出的所谓“形而上学的劳工作用论”，对罗莎·卢森堡说来既是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又是一种根本的信仰。

这个由于很早就对布尔什维主义提出批评因而在今天受到许多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在美国——大捧特捧的妇女，其实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家。她全面地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利弊，但她觉得革命的好处远远超过了流弊，在许多方面，罗莎·卢森堡对待 1917 年革命的态度同北美和拉丁美洲的很多菲德尔派对待 1961 年古巴革命的态度有相似之处：他们认为革命之利远多于革命之弊，但对于这些弊病也满怀忧虑。

我们很难断定，假如罗莎·卢森堡处在列宁的地位，她是否也会像列宁那样行事，但我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如马克斯·沙赫曼在 1938 年精辟地指出过的那样），即：列宁和卢森堡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德俄两国的不同情况造成的。“正如列宁的观点必须结合俄国形势的背景来考察一样，卢森堡对这些观点的责难也必须结合德国形势的背景来考察。……列宁强调极端集中制，卢森堡则强调民主和组织的灵活性。列宁强调职业革命家的决定性

作用，卢森堡则相反地强调群众运动及其自发起义……为什么？因为这些力量在德俄两国所起的作用显然不同。卢森堡在德国见到的‘职业革命家’和俄国的不同，他们并不是把零零散散的地方组织联合成一个全国性政党的激进工具……情形恰恰相反。在德国，‘职业工作人员’都是些个人名利的钻营者、保守的工会官僚、使党机器僵化的老爷、改良主义议会活动家，一句话，是一批最终取消了运动内容的人。”①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罗莎·卢森堡才反对“集中制”和严密的组织，而把希望寄托在运动的基层，指望从那里发展出积极的战斗精神。1919年，罗莎·卢森堡被德国军官杀害。

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从1917年10月就开始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并且至今还没有停止。在他们看来，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发起的革命则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的严重折磨，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我们现在还必须考察一下斯大林死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

（五）

目前流行于苏联集团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由脱离政治的哲学家提出的、自由地发展起来或是正在自由地发展着的一系列理论。它实际上是一种辩词，企图从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遗产中找出种种原理，为一个强大国家的政治和思想统治集团制订的政策作辩护。它主要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理想的表白、国内外的政治战略和决策，而不是关于社会、历史和人性的理论。

① 马克思·沙赫曼：《列宁和罗莎·卢森堡》(Lenin and Rosa Luxemburg)，载于《新国际》杂志，1938年5月，第143页。

不过，如果因此就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今天只是“单纯的意识形态”，那便大错而特错了。它确实是意识形态，但却有一个不同之处：它是基于马克思思想之上的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而这一点是颇有意义的。首先，这意味着它的实践者多半也是理论家——至少是不出色的理论家；其次，这些人多半要依靠和利用（在他们的国内政治斗争和国际交锋中）那些并不一定是不出色的理论工作者。第三，这意味着他们彼此之间展开竞争以及同外人进行论战时使用的术语，都取自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他们彼此都要求对方以这些理论来证实自己政策的正确。

关于今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需要提出的主要问题也许就是这样一点：它确实为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辩词，但它对于制订政策来说是否也是真正的理论指导路线呢？这个问题对于共产党人和反共人士都是重要的；在反共人士和非共产党人当中，这也是一个存在着很大分歧的问题。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政治上有影响的理论指导路线，虽然其影响大小难以测定。如果人们想了解今日苏联集团的性质、政治结构和世界历史意义，首先就需要懂得这一点。

在集团内部以及集团外部一切公认的正统共产党当中，斯大林的去世引起了极大的混乱，特别是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更加造成了这种状况。在第十二章中，我们将看到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例子：……【略】陶里亚蒂——中苏集团以外最大的共产党的领袖——对斯大林主义的讨论等。与此同时，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考虑的马克思主义“变种”——接替了伯恩斯坦学说的所谓“新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的第二届浪潮及其反响，同第一届浪潮相隔五十年以上，在这期间，人们业已经历了种种惨重的失败和巨大的胜利，

特别是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苏联已经获得斯大林主义式的巩固。在集团内部，五十年代的各种争执并不是那些在野集团和政党的知识分子进行的人人都可以随便参加的辩论。这些争执深深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而我们知道这个主义的代言人和当权者是不容许人们对它有丝毫背离的。争论的参加者对托洛茨基的著作和真实思想往往一无所知。不论在“春风解冻”或“冰霜严酷”的时期，辩论都在进行着。它们在文学形式的伪装下，作为巧妙的寓言和貌似荒唐的故事而出现。进行这些辩论的知识分子经常冒着丧失政治生命、甚至丢掉脑袋的危险。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这是一段奇特的时期——对于卡尔·马克思那种具有丰富创造性的思想来说，这也是一种奇特的命运。在英国博物馆中博览群籍而以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很少了解的狂热著书立说的马克思，决没有料到他的学说会有这样的遭遇。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时，苏联已经筋疲力尽。如前所述，它在战败纳粹过程中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它的许多城市化成了焦土，大部分农庄遭到破坏，数以百万计的男女青年牺牲了生命。可以肯定地说，战后时代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一就是苏联恢复工作的速度和气势。只经过了几年时间，它便以一种远远超过一切敌友意料之外的强大面目而出现。在军事上，并且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它几乎控制了全部东欧。几年之内，通过自己的真正革命，潜力巨大和人口众多的中国也参加了集团。于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就变成了“一个集团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调整各党之间的关系，共产国际改成了共产党情报局。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来说，它们同苏联的关系并没有改变。它们继续受它的统治。在它们的心目中，苏联是第一个出现的和唯一

的“真正工人国家”。因此，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它。

在各国共产党看来，只要是苏联实行的政策都绝对正确。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它们便能够解决问题，便是可以普遍应用的金科玉律，而不论各国的特殊国情如何。因此，遵循“莫斯科路线”不一定是和苏联有“勾结”。人们只要愿意留心，很多情报都是公开的。莫斯科通过共产党情报局讲话；别的党听到以后便相应办事。在我看来（虽然这一点并不十分肯定），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所谓“秘密勾结”的说法恐怕多半是那些过于庞大，甚至有些偏执狂的秘密警察部队捏造的。到1946年，冷战便显然在进行。1947年，美国采纳了破坏苏联威信和士气的马歇尔计划，表示愿意向苏联集团提供援助——当然是有条件的。斯大林以更强硬的政策作为回答。于是，冷战问题公开化了，共产党情报局明白要求各国党接受莫斯科的路线。

在此期间，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日益感到不满：归根到底，只有南斯拉夫的革命才是东欧的真正革命，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大多数南斯拉夫游击队都决心“走自己的路”。他们同意在不受重大束缚的情况下接受马歇尔计划。这便导致同苏联完全决裂。在苏联的宣传中，铁托这时不仅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和驯服的傀儡”，而且成了“工人阶级的死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发表了题为“铁托的反欧洲阴谋”之类的无聊小册子。总而言之，南斯拉夫在1948年变成了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理论实行统治但置身于苏联集团之外的国家。然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许多方面——或许在本质上——都代表着一种复活原来的布尔什维主义精神实质的努力。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竭力想在表面上缩小苏南分歧，但这种分歧很快又扩大了。可以肯定地说，在1961年的今天，苏联政府

——更不用说中国了——同南斯拉夫之间是没有多少意识形态上的友谊的。当八十一国共产党于1960年11月在莫斯科开会时，南斯拉夫党——或称“联盟”——没有接到邀请。而且，人们还以斯大林时代的语汇和咒骂字眼对它进行了猛烈攻击。这一情况所表明的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不和”；这体现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双方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着深刻分歧。这就是南斯拉夫和中国争论的内容。

铁托和斯大林的决裂是集团内部第一次出现的真正反抗；而到1956年，赫鲁晓夫则面临着一系列“走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主义反抗。总加在一起，这些反抗便构成了第二次修正主义运动。下面是这一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的事件。

1949年，毛泽东的运动在中国执政，虽然人们以意义不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词句对这条“道路”作了适当解释，它却显然是某种新的东西。一支农民军队解放了北京。虽然某些分析家可以巧辩说，俄国在1917年曾经有一个正在成长的工人阶级，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合理地说，1949年的中国革命是由工业无产阶级进行的。

同年^①，苏联针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联盟，成立了华沙条约集团。在此以前，路线已经变强硬了；内部镇压——苏联的麦卡锡主义——日益加强，这是对冷战的反应，也是为了在新近斯大林主义化的国家巩固政权。

但是到1953年，便相继发生了斯大林去世、朝鲜战争结束、工人和学生爆发反对东德政府的骚动等一系列事件。整个东欧的不满日益明显地表现了出来。1956年，波兰发生波兹南骚动；在俄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54年。——译者

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谴责了斯大林，如果不说是真正谴责了斯大林主义的话。全世界都听到了波兰知识分子的痛苦呼吁，也看到了他们的新开端；在匈牙利，既发生了思想反抗，也爆发了武装暴动。在随之而来的血腥镇压中，苏联坦克控制了布达佩斯的街头。

苏联集团内部的第二阵修正主义浪潮，迄今还没有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重大贡献，虽然它在苏联政权的中心已经毫无疑问地产生影响，引起了好几次重大的政策转变。譬如说，波兰的修正主义浪潮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纲领，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得到任何思想发展，甚至没有对它提出任何新的批评——至少就我个人在克拉科夫和华沙得到的印象以及我所读到的东西来说，情况似乎是如此。政府官员兼理论家亚当·沙夫的下列一段话（见《新闻》，1959年10月29日）也许是正确的：“我们并不害怕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但我们断然反对取消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者没有能在波兰达到目的，因为他们的哲学完全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的。他们在人民面前拿不出任何正面的纲领。”

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我们如果因此而去责备这些新修正主义者，那就未免太苛求于人了。很显然，不论过去和现在，该受责备的正是集团外部各先进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劳工领袖。他们绝大部分都接受了冷战——不肯给那些企图打破冷战局面的人以任何帮助。他们并没有真正支持在匈牙利战斗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没有给予波兰“修正主义者”以任何支持。这并不是说，如果他们提供了帮助，他们就能促使正统统治垮台，加速民主化的步伐。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权利讥笑苏联集团内部那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

到1956年，人们便可以看出，第二阵修正主义浪潮已经对苏

联集团各国——包括苏联本身——的统治阶层产生了深刻影响。不管人们对他们的思想贡献可能如何估价，无可怀疑的事实是，修正主义者确实表现了同斯大林主义的正统和压制的真正决裂。单是为了这一点，五十年代的“修正主义者”便应该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受到尊敬。而且，“修正主义者”——如正统斯大林主义者称呼他们的那样——当中的最优秀分子，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理想或经济制度。他们并没有像南斯拉夫的米洛文·德热拉斯那样，滑到了相当于自由主义或者至多是冲淡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尤其是波兰人，他们决没有放弃真正革命的“波兰人”或“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六)

在战后时期，发展和重新审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心一直在英国。其主要人物也许就是 G. D. H. 柯尔，一个最有意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在 1956 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所代表的立场，是一种“社会民主修正主义”。这里所说的“社会民主修正主义”一词，意味着非共产党左派社会主义者一种往往是狂热的但也经常是诚实的企图，即力图在道德上、思想上和政治上正脱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世界，设法使“社会民主主义”成为一种立即明显地给与人以自由的社会主义，成为一个生气蓬勃的运动，从而在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形成一个真正的新开端。

在题为《这是社会主义吗？》(Is This Socialism?) 的小册子中，G. D. H. 柯尔问道：“如果不是作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在一场选举中获胜有什么用处呢？赢得一次选举而没有一定的政策，只能导致下一次选举的失败，只能在自己的支持者当中散布沮丧和失望情绪。如果目的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别的东西——那

么是什么东西呢？如果目的仍然是社会主义，那就让我们坦率地告诉选民，我们打算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吧。”^①

柯尔教授在1956年又写了一本题为《再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World Socialism Restated)的小册子，本书第十三章摘录了它的若干片断。在这本小册子里，他大胆地提出了社会党人应该如何看待斯大林死后的苏联世界和本国共产党的问题。这已经引起一场争论，托洛茨基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纷纷提出指责，认为这又是在要求实行“人民阵线”和“同路人”的政策。

为了表明最近在英国进行的讨论的水平和内容，这里摘录一段彼得·肖尔对上述小册子的评论和柯尔的答复。

“那么，我们应该对共产主义抱何种态度呢？”肖尔总结性地问道。“首先必须承认，作为把原始社会改造成为现代社会的工具，共产主义证明是迄今以来最迅速和最有效的一种，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它之所以能迅速奏效，是因为在政治铁腕的控制下，它能够一面积累资金，一面把群众消费压低到仅足以维持生存的水平。它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特别是对于民族主义情绪来说），是因为它在积累资金过程中需要的外援最少。而且，即使把它那些令人嫌恶的缺点考虑在内，共产主义同它迄今所代替的（除去极少数例外）封建主义相比，仍不失为一种优越得多的社会组织制度。柯尔教授谈到他‘拥护’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越盟的时候，他表达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立场。结果，我们同意它们，仅仅是由于我们知道，生活在二十世纪总比生活在十三世纪好一些，而除去共产主义以外，又没有其他的工具可以用来实现这种变革。

“但最重要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必须把自信心重新树立起

^① 部分转载于《异议》杂志，1954年秋季号，第331页。

来。〔它〕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并不是一种怯懦的和三心二意的共产主义，而是另一种根本不同的政治信仰。它的任务不单是要摧毁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且——完成这一任务可能要困难得多——要摧毁正在发展着的造成不平等和阶级统治的新基础。在它致力于建立没有阶级的文明社会时，它将发现民主并不是一种累赘，而是绝对必需的东西。”^①

G. D. H. 柯尔作了如下答复：“最后，再回过头来谈谈我认为肖尔先生和我之间的主要争端。我同意资本主义不是唯一的敌人，但我认为它仍然是主要的敌人……我承认……生产资料社会化本身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我确实认为，大部分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无论如何总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当然，这种社会化必须包括多种多样的国家、区域、地方和合作社所有制；因为我已经看到，把大部分所有权集中到国家一个机构的手上，会引起多么严重的危险。据我看来，苏联通过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由于它在经济不平等方面的反社会主义措施，它现在还远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②

战后，在苏联集团以外的前工业世界中，已经发展起一种可以称之为“革命修正”的运动——例如在加纳、印度尼西亚、几内亚和古巴。这些革命是在形形色色的情况下和各国特殊历史的基础上发生的，的确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可是，过去的一切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它们仍然是重要的：即使说在革命发轫之初不是这样，到它们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以后也会如此。

^① 《柯尔的世界》(The World of G. D. H. Cole), 载于《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 1956年8月25日, 第205、206页。

^② 《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 1956年9月8日。

这些革命不同于 1917 年十月革命的地方很多,但有一点尤为重要: 这些新国家能指望得到并且将日益得到已经巩固的苏联集团的经济(必要时还有军事)援助。因此,它们同苏联集团各国的联系愈来愈密切。它们构成了冷战的最重要场所。在它们身上,再明显不过地反映了资本主义集团和苏联集团在道德上、经济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世界性对峙。

关于这些新革命,最后还必须提出一点: 人们有理由相信,像古巴领导人这样的革命家使用的政治策略、表现出来的革命气势和造成的社会动荡,不仅使美国的当权集团感到惶惑,也使苏联的统治集团非常吃惊。这不仅是因为苏联怀疑这些国家会利用和加剧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分歧,而且是因为俄国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它的统治集团业已养成了一种从长远着想的耐心等待和缓慢推进的传统。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以往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自动为我们提供答案。在以下六章中,一部分马克思的信徒将亲自“现身说法”。

第八章 社会民主党人

卡尔·考茨基：什么是社会革命？^①

像“革命”这个字眼那样易于引起争论的概念是不多的。因为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概念更违反现存的利益和偏见了，也因为像它这样含糊不清的概念确实并不多见。

一般说来，事件不比物品，是很难给它们明确下定义的。社会事件尤其如此，因为它们都极其复杂，而且社会愈是进步——人类的合作形式愈多——其内容就愈是错综纷繁。社会革命又是这些事件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因为它要完全改变人类协作活动的习惯形式。

因此，这个人人都在使用但人人对之有不同理解的字眼，时常会发生下列情况就不足为奇了：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说到革命时，这个词的含义前后会各不相同。有些人认为革命就是街垒、烈火中的城堡、断头台、九月大屠杀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另一些人则力图消除掉这个字眼的一切刺激色彩，把它理解为社会通过和平途径不知不觉地发生的巨大演变，例如美洲的发现和蒸汽机的发明引起的那种变化。此外还有介于这两种定义之间的许多种解释。

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给社会革命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即：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

^① 《社会革命》(The Social Revolution)，芝加哥1902年版，第5—20、26—37、80—84页。

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如果我们严格遵循这一定义，就立即会打消那种把社会革命理解为“经济基础的变更”——譬如说，由蒸汽机或美洲的发现引起的变更——的看法。这些变更是革命的原因，而不是革命本身。

但我不打算过分拘泥于社会革命的上述定义。还有一种更狭义的解释可供我们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或法律的社会上层建筑的变更，而只意味着某种特殊的变革形式或方法。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争取实现广义的社会革命，但也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拒绝革命，而只愿通过改良来实现社会变革。他们把社会革命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今天在我们的队伍中讨论着的，正是这种对立。在这里，我打算讨论一下作为社会变革特殊方法的狭义的社会革命。

改良和革命的区别并不在于一种使用暴力，另一种不使用暴力。一切政治的和法律的措施，都是通过国家力量实行的暴力措施。革命之有别于改良，主要也不在于使用特殊形式的暴力，如巷战或处决等。这些行动是由特殊的情况引起的，同革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也很容易伴随着改良运动发生。1789年6月17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在法国国民议会内的组成，尽管表面上没有使用暴力，却显然是一项革命行动。与此相反，在1774和1775年的法国，只是为了修改面包税以遏止面包涨价，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暴动，但它们却肯定不是革命。

不过，认为巷战和处决是革命特点的说法仍不失为一条线索，它能导致我们追本溯源，关于革命的本质取得重要的教训。1789年开始于法国的大变革，已经成为革命的古典范例。人们一提到革命，通常就想到它。从它身上，我们能够最有收获地考察出革命

的基本特点,以及革命和改良的区别。在这次革命以前,人们曾进行过一系列改良的努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屠尔果的改良。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同革命实现了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那么,屠尔果的改良同革命的相应措施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新的阶级夺得了政权,而这也就是革命和改良的区别。在采取措施调整社会的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使之适应于已经变更的经济条件时,如果它们是由统治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阶级采取的,那就是改良措施,而不论它们是统治阶级主动进行的,还是在下层阶级的压力下或形势所迫的情况下采取的。与此相反,如果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压迫的阶级夺取了政权,他们出于自己的利益要求,不得不或快或慢地变更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从而创造出新的社会合作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的措施就是革命的产物。

因此,由一个迄今受压迫的阶级夺得政权,换言之,一场政治革命,就是这种狭义的、相对于社会改良而言的社会革命的基本特点。任何人只要反对以政治革命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或是只局限于采取为统治阶级所赞同的措施,这些人就是社会改良派,而不论他们的社会思想可能如何敌视现存的社会形态。与此相反,凡是争取让一个迄今受压迫的阶级取得政权的人都是革命者;即使他们在准备和加速这一步骤的过程中,采取了强迫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改良的办法,他们也不失其革命者的身分。社会改良派和社会革命者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是否争取社会改良,而在于是否完全局限在这些改良的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也只有在一个迄今遭受社会压迫的阶级发动革命的情况下,政治革命才会变成社会革命。这样一个阶级必然要通过自己的社会解放来完成自己的政治解放,因为它先前的社会地位和它的政治统治地位是绝对不相

容的。统治阶级队伍中的内讧，即使采取了内战的暴力形式，仍旧不是社会革命。在下文中，我们要讨论的将只限于这里所说的狭义的社会革命。

社会改良能够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它可以暂时不触及他们的社会统治地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加强这种地位。与此相反，社会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同统治阶级的利益互不相容的，因为在一切情况下，它都意味着统治阶级权力的消灭。这就难怪目前的统治阶级不断地诬蔑革命，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他们拿社会改良的思想来抵制社会革命的思想，对前者颂扬备致，几乎把它捧上了天，虽然经常不使它成为地上的事实。反对革命的论点产生自各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形式。当基督教还在人们的心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革命思想往往被认为是罪恶的，是反抗神所建立的权威。这种观点很容易从《新约》中找到依据，因为圣经《新约》部分写于罗马帝国时代，而在那个时代，对统治权力的一切反抗似乎都是无望的，独立的政治生活已不复存在。不用说，革命的阶级则时常引用《旧约》里的话作为答复，因为《旧约》中还保留着很大一部分原始游牧时代的民主精神。到法律的思想方式代替了神学的思想方式以后，革命便被认为是对现存法律秩序的粗暴破坏，因为谁也没有侵犯权利的权利，所谓革命的权利根本是无稽之谈，革命在一切情况下都是犯罪。但是，新兴阶级的代表则提出了自己所争取的权利，把这种权利说成是一种自然和理性的永恒法则，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借以和历史遗留下的现存权利相对抗。他们声言，这种权利显然只有在被侵犯的情况下才会丧失掉，因此，也就不可能不在侵犯权利（即使它们是革命的结果）的情况下被恢复。

今天，神学的说教已经丧失束缚人的力量，特别是在人民的革

命阶级当中。所谓历史权利的说法也不足以服人。就目前的种种权利和目前的政府而言,它们的起源于革命还是不久以前的事,因此对它们的合法性可以提出怀疑。不仅法国政府是通过革命产生的,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英国和荷兰的统治王朝也是如此。再以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国王、巴登和黑森大公来说,不仅他们的称号依赖了革命暴发户拿破仑的保护,而且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国土也是拿破仑所赐;霍亨索伦王朝的现有地位是在许多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连哈布斯堡王朝也要在匈牙利革命面前低头。曾在1852年因叛国罪以雕像被处绞刑的安德拉西,一直没有放弃1848年匈牙利民族革命的思想,但人们仍不得不在1867年任命他为帝国大臣。

资产阶级本身也积极参加了所有这一切破坏历史权利的行动。因此,当它现在变成了统治阶级时,便很难有理由谴责以这种革命权利的名义进行的革命,虽然它的法律哲学千方百计地调和自然的和历史的权利。它必须寻求更有效的论据来中伤革命,事实上它也在新兴的自然科学以及伴随着它们的心理状态中找到了这种论据。当资产阶级还具有革命性的时候,激变论一直在自然科学(地质学和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这种理论是从自然界通过突然的飞跃而发展的前提中引伸出来的。资本主义革命一旦结束,激变论便让位于下列假说:发展是逐步的、不知不觉的,它是无数细小的进展和调整在一种竞争的斗争中长期积累的结果。对革命的资产阶级来说,自然界存在突变的思想是颇合口味的,但在保守的资产阶级看来,这些思想便显得不合理和不自然了。

当然,我不是说科学理论全是由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需要决定的。激变论的代表恰恰就是立场最反动、最没有革命观点的人。但是,每一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受到本阶级心理状态

的影响，把这种影响或多或少地带进自己的科学理论。以达尔文来说，我们肯定地知道，他的自然科学假设就曾受到过坚决反对革命的马尔萨斯的影响。进化论（达尔文的和莱厄尔^①的）来自英国并不全是偶然的，在这个国家最近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些革命的开端，统治阶级总能够在适当时机使它们半途而废。

一种思想是由某一个阶级提出的，或是符合这个阶级的利益的，这一事实当然并不足以证明这种思想的真伪。但它的历史影响所依赖的，却正是这些东西。新的进化理论很快地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尽管他们绝对没有检验这些理论的机会），便证明它们是符合于这些阶级的深切需要的。一方面，这些理论——它们对革命阶级的价值就在于此——以一种比旧的突变论激烈得多的方式打破了一切迷信，使人们毋需再承认有一种超自然力通过一系列行动创造了世界。另一方面——这是最合资产阶级心意的——它们又宣布一切革命和突变都是反常的、违反自然规律的和完全荒谬的。今天，凡是从科学上攻击革命的人都打着进化论的旗号，他们宣称：自然界不存在飞跃，因此社会关系也不可能有任何突变；发展过程只能是细微的变化和改善（它们称为社会改良）的积累。从这种观点来考虑，革命显然是一种反科学的概念，有科学素养的人只会对它嗤之以鼻。

对这种观点可以作如下答复：拿自然规律来比拟社会规律是完全不恰当的。当然，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一个领域中的概念会不自觉地影响另一个领域的概念。但这并不是什么有益的事，我们最好是遏制而不是助长这种把一个领域中的规律搬入另一个

① 查尔斯·莱厄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译者

领域的做法。当然，任何一个领域中的观察和理解方法上的进步，都能够而且将会影响其他领域中的方法和理解力，但同样真实的是，在每一个领域之内，也都存在着不适用于其他领域的特殊规律。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的根本区别。没有人能够只根据外表上的类似，就把适用于这两个领域之一的规律照搬进另一个领域。人们不会用化学上的亲和力规律来解决有性生殖和遗传问题。但是，当人们把自然界的规律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时，譬如说，由于自然界有生存竞争的规律，就认为人类的竞争是天生的和不可避免的，或是由于自然界有进化的规律，就认为不可能有社会革命，他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我们还有更多的反驳理由。如果说旧的激变论已经在自然科学中一去不复返了，那么，认为进化只是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变更的新理论，也在受到日益强烈的反对。一方面，这些理论已日益趋向于把进化本身减到最小限度的无为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事实正在迫使我们日益重视自然界发展中的突变。莱厄尔的地质理论和达尔文的有机进化论都是如此。

这已经引起了一种旧的激变论和新的进化论的综合，就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那种综合相似。正如马克思主义区别开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政治与法律上层建筑的突然变革一样，许多新的生物学和地质学理论也两者兼顾，既承认细微的、甚至极小的变更的缓慢积累，也承认由较慢的进化造成的突如其来的深刻变更——突变。

在最近一次举行于汉堡的自然科学会议上，戴·弗里斯^①的

^① 戴·弗里斯(1848—1935)，荷兰植物学家。——译者

报告为上述事实提供了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发现动植物的种往往在很长时期内不发生变化；其中有一部分因为过于古老，不再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生存环境而终于消失。另外一部分比较幸运；它们往往会突然“爆炸”（用弗里斯自己的话来说），从而产生出无数新种，这些新种有的由于不能适应生存环境而消失，有的则继续繁衍。

我并不打算从这类新看法中作出有利于革命的结论。如果这样做，就会重蹈那些以进化论来反对革命的人的复辙。但这些理论至少表明了一点，即科学家本身还没有对突变在有机界和地质发展中的作用取得完全一致的看法，因此，企图以这两类假设中的任何一类为依据，对革命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作出肯定的结论都是错误的。

如果有人不顾这些事实，仍然坚持自己的结论，我们便可以拿一个尽人皆知的事例来答复他。这一事例无可辩驳地表明自然界确实存在着突变：我指的是分娩。分娩是一种飞跃。胎儿原来一直是母体的一部分，和母体有着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由母体供给养料，本身也不进行呼吸，但是它一下子就变成一个独立的人，有它自己的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着和啼哭着，吸收着自己的养料和利用着自己的消化道。

然而，分娩和革命的相似之处并不只是动作突然这一点。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分娩带来的这种突变是完全局限于机能方面的。各部器官缓慢地发展着，在有可能发生那种突然使之获得新机能的飞跃以前，它们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如果突变发生在达到这一发展阶段以前，其结果就不是各部器官开始获得新机能，而是一切机能的停止——新个体的死亡。另一方面，各部器官在母体内的缓慢发展也只能进行到某一阶段，没有革命性

的分娩，它们就不能开始有新的机能。当器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突变便成为不可避免。

我们在社会中看到了同样的情况。在这里，革命也是由缓慢的和逐步的发展（进化）造成的。在这里，发展缓慢的也是社会器官，而可能突然地、飞跃式地和革命地发生变化的则是它们的机能。铁路是缓慢地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铁路的机能则能够突然改变，从一小撮资本家手上的牟利工具一下子变成替公众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企业。正如分娩时一切机能——血液循环、呼吸、消化——都同时革命化一样，铁路的各种机能也必须一下子同时革命化，因为它们全是密切联系着的。它们不可能一步一步地实行社会化，譬如说，我们决不能今天先改变司机和司炉的机能，过几年又改变售票员的机能，再过几年再改变会计的机能等等。用铁路来做譬喻，这一事实表现得十分清楚，但是，如果要使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政府分成若干步实行社会化，其荒谬程度也不下于此。这样一种政府是共各部器官必须彼此协作的一个完整的机体。在这些器官中，只要有一个器官的机能被改变，其余的所有器官也必须同样改变。社会主义者一步步夺取政府各部门的思想，其荒谬程度就等于是要把生孩子分做许多个月逐步地进行，每个月只有一个器官从胎儿状态变为独立的婴儿，与此同时，婴儿本身还联结在脐带上，直到它学会走路和说话为止。

由此可见，铁路或政府都不能逐步地改变，而只能一下子发生变化，使一切器官的资本主义机能都同时改变为社会主义机能，使它们从资本主义的器官一变而为工人阶级的器官，而且，只有那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器官才能有这种变革；但我们在这里也必须指出，就母体而言，是可以科学地测出其成熟时刻的，而对于社会则无法作出这样精确的预测。

另一方面，呱呱坠地并不标志着人体发展的结束，而是一个新发展时代的开始。这时，婴儿同周围的世界发生了新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新的器官形成了，已经存在的器官则在别的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口中长出牙齿，眼睛学习看东西，手学习抓东西，脚学习走路，嘴学习讲话等等。与此同理，社会革命也不是社会发展的终止，而是一种新发展的开端。社会主义革命能够一下子把资本家的工厂变为社会财产。但是，要把工厂从一个单调无味、令人厌恶的强迫劳动场所，变成一个人们兴高彩烈进行活动的愉快地点，却必须经过一段缓慢的逐步演变过程。社会主义革命能够一下子把资本主义大农场变为社会财产。但是在小生产仍然占统治地位的那部分农业中，就必须首先创造出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器官，而这些器官则只能是缓慢发展的结果。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用分娩来譬喻革命是非常贴切的。但是不言而喻，这只能表明了人们无权以自然界现象来证明社会革命是某种不必要的、不合理的和不自然的东西。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也无权从自然界现象中得出直接有关社会进程的结论。我们根据上述譬喻至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正如一切动物都必须经过一次突变（分娩或破壳）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一样，社会也只有经过突变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

在现代各大国中，英国是一个最像中世纪——不是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形式上——的国家。在那里，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最不发展。那里仍然有一个不仅名义上统治着而且实际管理着国家的贵族阶级。与此相应，英国也是这样一个现代大国，在那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主要只限于消除个别的弊政，而不是指向整个社会制度。同时，那里也最讲究用妥协的方法来防止革命。

如果说过去那种人民普遍武装的现象并没有助长社会大革

命，它却肯定大大增加了阶级之间动辄发生武装冲突的机会。在古代和中世纪，激烈的暴动和内战是屡见不鲜的。这些冲突时常是如此激烈，以致使被征服者遭到大规模的放逐、剥夺乃至完全消灭。那些认为暴力象征着社会革命的人，会在早期历史中找到许多这样的革命。但是，如果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先前的被统治阶级夺得政权，从而使政治的和法律的社会上层建筑——特别是财产关系——发生变更的话，就不会在那里找到社会革命。在这段历史时期，社会发展是一点一滴、一步一步进行的，没有什么翻天覆地的突然变化，只有无数细小的、时断时续的、表面上看来没有联系并且经常重演的、大都是不自觉的运动。这段时期的伟大社会变革，奴隶制在欧洲的消失，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同时代人对这个运动一点也没有注意，以致我们今天必须依靠假设才能重新塑造出它的面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发展以后，情况便完全改观。如果在这里细谈资本主义的作用过程及其后果，那就离题太远，而且也只是重复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只需要指出下列情况就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现代国家，结束了各个自治单位的政治与经济独立，使它们都丧失了原有的特权和特点，从而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一切地区都毫无例外地实行同样的法律、征收同样的赋税、设立同样的法庭、服从同一个政府。这样，现代国家就被迫变成民族国家，并且在其他平等之外又加上一种语言的平等。

这时，政府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了。一个现代大国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变动，都会对广阔的社会领域迅速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从这时起，一个早先被统治的阶级如果夺得政权，就必然要造成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国家掌握的权力有了巨大增长。资本主

义的技术革命同样波及到武器技术上。从宗教改革以来，武器便愈变愈精良，也愈变愈昂贵。于是，掌握武器成了政府独有的特权。单是这一事实就使得军队同人民分离了，即使是在实行普遍兵役制的地区也是如此，除非那里的人民同时还普遍拥有武装（这是任何一个大国中都沒有的事）。最重要的是，军队现在都由职业军人来领导，而他们已经形成一个同人民脱离和对立的特权阶级。

同早先的国家相比，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也有了巨大增长。国家在广泛领域内控制着大量财富，而这些领域中的生产技术手段是古代的高级文明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现代国家还拥有—个远比过去的任何国家更集中的官僚机构。现代国家需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以致沒有广泛的分工和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就不可能解决那些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统治阶级失去了原有的一切闲暇。即使说他们不是亲自生产，而是靠剝削生产阶级生活，他们也不是无所事事的剝削者。由于存在着竞争、即目前经济生活的原动力，失败者有完全被消灭的危险，剝削者不得不在彼此之间不断进行着紧张的角逐。

因此，资本家既沒有时间和闲暇，也沒有以前那种必要的修养来从事艺术和科学活动，他们甚至缺乏正规地参加政府活动的能—力。不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而且在管理国家事务方面，统治阶级都被迫不能参与。他们不得不把这些工作交给工资劳动者和机关雇员去做。资本家阶级居于统治地位，但并不管理国家事务。它只满足于统治着政府。

与此类似，在它以前的衰落的封建贵族也只满足于挂着皇室贵胄的虚名。但是，封建贵族的放弃社会职能是腐败的产物，而资本家的这种放弃则恰恰是由他们的社会职能造成的，是他们的一

个基本存在条件。

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帮助下，一个阶级能够长期维持自己的统治，即使它已经成为多余的乃至有害的。国家的力量愈大，统治阶级就愈加依赖这种力量，并且愈加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特权和拒绝作出让步。可是，它以这种方式维持统治的时间愈久，阶级矛盾就愈为尖锐，这样，它最终的政治崩溃必然会愈加彻底，由此引起的社会变动必然会愈加深刻，被压迫阶级的取得政权也就愈容易导向革命。

同时，斗争着的各阶级愈来愈意识到它们的政治斗争造成的社会后果。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大大加速了经济进展的步伐。一百年来的发明已为之铺平道路的经济变革，随着机器的使用于工业而继续扩大。使用了机器以后，经济关系便不断地发生变化，不仅旧的关系迅速瓦解了，而且新的关系在不断形成。“古老”这个字眼不再具有久经考验、可敬和不可侵犯等含义了。它已经成为有缺陷和陈腐过时的同义语。这种看法从经济生活中移植到了科学、艺术和政治领域之内。正如人们过去没有道理地死抱住旧事物不放一样，今天，人们只是出于喜新厌旧便毫不吝惜地抛弃一切旧东西。而一种机器、制度或理论正愈来愈容易过时。如果说，人们过去的工作是为了千秋万载的长远大计，并且由于意识到这一点而特别专心致志，那么，人们今天的工作就是为了昙花一现的效果，并且由于意识到这一点而特别草率从事。因此，今天的造物物不仅很快就会过时，而且不久便一无用处。

然而，新事物正是那种人们观察、批评和研究得最仔细的事物。平平常常的东西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人类很早就开始研究日蚀的原因而没有研究日出日落的问题。与此相似，只要社会现象看上去是普通的、理所当然的、“天生就是那样”的，就不会有什么

么力量刺激人们去研究这些现象的规律。而一旦在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形态,这种刺激力量就一定会加强。十七世纪初首先成为科学考察对象的,不是旧的世袭的封建经济状态,而是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状态。

经济学还受到了另一个原因的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是大规模的、社会性的生产。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巍巍可观的大国。现代经济学就像现代政治学一样,必须研究大量现象。人们看到的类似现象愈多,就愈倾向于注意普遍的——表明了社会规律的——事物,而个别的和偶然的事物愈被剔除,也就愈容易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阶段,才有可能利用数学来对社会现象进行大规模的观察,即有统计学的出现,以及产生自政治经济学并在唯物史观中得到最高度发展的社会科学。现在,各阶级第一次充分意识到了他们的斗争具有的社会意义,并且第一次为自己规定了各项伟大的社会目标——不是注定要为严酷的事实所粉碎的主观幻想和虔诚愿望,而是科学地考察了经济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后得出的结论。不用说,这种科学思想当然也会犯错误,它的许多结论会为事实所否定。但是,不论这些错误可能有多大,它都不会失去一切真正的科学具有的特点:力图以一种无可争辩的完整性统一地说明一切现象。在社会科学中,这意味着承认整个社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机体,人们不能任意地和单独地变更其中的任何一部分。社会上受压迫的阶级已不再把它的理论批评的锋芒指向个别的人和趋势,而是指向整个现存社会。而且正由于这一事实,凡是夺得政权的被压迫阶级都必然要改变整个社会基础。

从1789年大革命及其后果中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面貌早就被重农主义学派及其英国信徒预见到了。

古代和中世纪的组织同现代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这种区别，决定了它们的不同发展方式。前者大部分是不自觉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种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各地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争执层出不穷，无数个小自治单位不断掀起叛乱；后者则愈来愈自觉，并力求实现一个被认识了、通过科学的批判工作得到决定和传播的伟大社会目标。政治革命不是那样经常，但它们的内容比前者丰富，社会后果也更为广泛。

从古代和中世纪的內战过渡到前面解释过的那种社会革命，始自一半属于中世纪、一半属于现代的宗教改革运动。它的更高阶段是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最后，法国大革命变成了社会革命的古典范例，而 1830 年和 1848 年的起义不过是它的微弱反响而已。

这里所说的社会革命是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它不能出现于资本主义以前，因为那时的政治疆界还太狭小，社会意识还太不发达。它也将随着资本主义一同消失，因为资本主义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推翻，而处于一切社会阶级最下层的无产阶级，只能运用它的统治来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和阶级，从而也就消灭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

这样就引起了一个大问题，一个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当前的政治态度、从而在今天和我们有巨大关系的问题：社会革命的时期过去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已经具备了不用进行政治革命、不用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或者说，在我们的前面是不是还有一个要为夺取这种政权而进行决定性斗争的时代，即革命的时代？社会革命的思想是否已经过时？是不是只有那些盲目附和旧思想的人或者是蛊惑愚民、哗众取宠的投机家才主张社会革命，而每一个冷静地观察了当代社会现实

的正直的人都肯定不会考虑它呢？

问题就在于此。这肯定是一个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解决的重要问题。

我们已经发现，社会革命是各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们必须具备一系列先决条件：不仅要有高度发展的阶级矛盾，而且还要有一个巨大的、凌驾于一切地方和社区特殊性之上的，以一种消除一切地方特点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一个强大的军事和官僚国家，一种政治经济学和一种飞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在助成社会革命的这些因素中，沒有一种在最近十年内趋于削弱。与此相反，许多因素都已经大大加强。经济发展的步伐从沒有像现在这样迅速。由于报纸的存在，科学的经济学至少是有了广泛的、如果不说是深入的发展。经济学的知识从沒有像现在这样普及；人们，统治阶级及人民群众都包括在内，从来沒有能够像现在这样明确地了解自己的行动和斗争的深远影响。单是这一点就证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巨大转变不可能是不自觉的，我们不可能在剥削阶级毫无觉察的情况下慢慢地削弱它的统治，他们一定会意识到这一点，从而武装起来，利用他们的一切权力来压制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和影响。

然而，如果说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从沒有像今天这样普遍，那么同样正确的是，政府的权力也决沒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军事、经济和官僚的力量也决沒有像今天这样突飞猛进。因此，无产阶级一旦夺得政权，它就会立即运用这种权力去实现最广泛的社会变革。同时，在这些力量的帮助下，统治阶级仍然能继续存在和掠夺劳动阶级，即使它早已在经济上成为多余。可是，统治阶级愈是靠国家机器来维护自己，愈是为剥削和压迫的目的而滥用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对他们就愈为痛恨，阶级仇恨就愈为强烈，夺取国家

机器的努力也就会愈为加紧。

*

*

*

可是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决不是说民主是多余的，或是认为合作社、工会、社会民主党之参加市政机构和议会、纯粹的改良等等都是没有价值的。再没有比这种看法更不正确的了。与此相反，所有这一切对无产阶级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只是在作为避免革命的手段时，它们才是没有意义的。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一点所以有极大的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会带来一种更高级的革命斗争形式。在 1789 年，这种斗争只是由一群乌合之众进行的，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形式，不了解斗争各方的力量对比，对斗争的目的和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没有丝毫深刻的认识，每一种谣言或事变都能使他们受到欺骗或茫然不知所措。现在，进行革命斗争的已不再是这种乌合的暴民，而是有组织、有认识、胸有成竹、坚定稳重的群众，他们不会任性胡来，不会意气用事，也不会因为小受挫折便土崩瓦解。

另一方面，选举则是检验敌我力量的一种手段，能使我们明显地看到各阶级各政党之间的力量对比，看到它们的进攻和退却。这种检验能防止不成熟的举事，从而使许多失败得以避免。它们也可能造成这样的局面，即敌方自己会看到他们的许多阵地是守不住的，而如果维持这些阵地并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他们就会自动让步。这样，斗争中的流血牺牲就会少一些，碰运气的因素也会小一些。

通过民主制度以及利用它给予的自由和权利取得的政治成就，其价值也不应该被低估。诚然，如果要真正限制资本主义的统治，使之不知不觉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话，这些成就的作用的确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于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复活无产阶级来说，最

起码的一点改良和组织活动都可能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活动，无产阶级就要完全听任资本主义摆布，毫无出路地深陷在不断威胁着他们的贫困之中。无产阶级参加议会活动和成立各种组织所以是不可缺少的，不单单是因为它们能够使无产阶级摆脱贫困。它们还具有这样的价值，即能使无产阶级实际熟悉中央政府、市政机关及大工业中的各项问题和工作方法，并且在思想上成熟到有能力代替资产阶级作为统治者。

对于帮助无产阶级成熟，使之能早日发动社会革命来说，民主也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它并不能阻止这种革命。民主之对于无产阶级，就像是阳光和空气之对于有机体一样；没有民主，无产阶级的力量就无法发展。但我们不能只看到一个阶级的成长，而忘记了另一个敌对的阶级也在同时成长。民主并不妨碍资本的发展，它的组织、它的政治和经济力量都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增长而同时加强。合作社的确是在不断发展，但资本也正在积累，而且速度更快；工会的确是在不断加强，但资本也正在积聚和组织为大垄断机构，并且进展得更为迅速。不用说，社会主义报刊正在发展（这里只提出不能更深入讨论的一点），但无党无派的平庸报刊也在同时发展，毒害着和腐蚀着越来越多的群众。不用说，工资正在增长，但巨额利润的增长更为迅速。肯定地说，议会中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名额正在日益增多，但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和效能已越来越降低了，同时，议会多数也和政府一样，越来越仰承大财阀势力的鼻息。

因此，在无产阶级的斗争手段获得发展的同时，资本的斗争手段也随之加强，这样，最终只能是发生一场巨大的决定性冲突，直到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为止。

资本家阶级是多余的，而无产阶级则已变成了社会上不可缺

少的阶级。资本家阶级既不能提高无产阶级的地位，又不能把他们彻底消灭，在每一次失败后，无产阶级总能够东山再起，变得比以往更有威胁性。因此，当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战胜资本的巨大胜利，从而掌握了政权以后，它只能运用这种政权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这一点还没有实现，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社会和平是一种空想，它是从知识阶级的实际需要中产生的，但是并没有现实的发展基础。希望资本主义会不知不觉地长入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一种空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事情的结尾将不同于它们的开头。不论是经济的或政治的发展，都没有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革命时代业已结束。社会改良和无产阶级组织的加强都不能阻止革命的到来。它们充其量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使发展程度较高的那部分战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将从争取起码生存条件的斗争变为夺取统治权的斗争。

爱德华·伯恩斯坦：改良主义问题^①

……传统基本上是保守的，批判几乎总是破坏性的。所以，在采取重要行动时，即使事实上最正确的批判也可能是有害的，因而也可能是要受人非难的。

承认这话，当然不等于称传统为神圣而禁止批判。政党并不总是处于急流当中，只注意一项任务。对于一个必须不落后于真正的进化的政党来说，批判是必不可少的，而传统则可能变为沉重的负担，变为束缚手脚的桎梏。

^① 参阅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16—120、122、123—125、126、127—131、132—137页。——译者

但是人们只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主动地充分考虑他们的传统假设中所发生的变化意义。他们通常只在这种变化与不可否认的事实有关时才加以考虑，并且总想尽量使那种变化同传统的口号一致起来。这个方法叫做讲歪道理，而为此所作的辩解和解释通常叫做“空谈”。

“空谈”一词出自英语，据说最初是十六世纪时用来形容清教徒的单调乏味的赞美歌的。在较广的意义上，它指一种不管是盲目模仿或是明知其为虚假而加以使用的不实在的说法，以达到宗教或政治方面的目的，或与理论或现实有关的目的。这种从广义上来理解的“空谈”是由来已久的了——例如过去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就是最会卖弄“空谈”的——并且它现在以多种多样的形态侵入我们整个的文明生活。每一个民族、每一个阶级以及每一个由理论或利害系统统一起来的集团，各有各的“空谈”。“空谈”已经一半成为纯粹因袭的东西，成为单纯的形式，因此谁也不会再受它的空洞内容的欺骗，而对它进行斗争也就变成小题大做了。但是，对于装着好象有科学性的“空谈”，以及已经成为政治口号的“空谈”，就不能这样看待了。

我所说的“在我看来，人们一般称为社会主义终极目的的那个东西是微不足道的，运动才是一切”那句话，往往被人设想为否定社会主义运动的任何明确的目的，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先生甚至还发现我是从格哈德·冯·舒尔采-格弗尼茨所著《走向社会和平》一书中摘录了这个“名句”的。的确，那本书有一节说：以一切生产资料国有化为终极目的，对革命的社会主义来说肯定是不可缺少的，但对于宁愿把将来的目的暂搁在一边而首先要求达到当前目的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来说，就并非如此。因为在那本书里，某种终极目的被认为对实际目的说来是可有可无的，而我也

承认对终极目的不感兴趣，所以我就是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追随者”。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论证证明这里包含着一种异常丰富的思想。

八年前我在《新时代》上评论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时，虽然我的批评很受我现在不再支持的一些假设的影响，我却已经把终极目的和实际改革活动的这种对立视为无关重要而把它放在一边，并且承认——并未受到抗议——对英国来说，像舒尔采-格弗尼茨替它预测的那种进一步的和平发展并不是不可能的。我当时表示了这样的信念，即英国工人阶级在不断自由发展的情况下，肯定会增加他们的要求，但不会提出任何一种在当时看来并非必要的和断难如愿的要求。这同我今天的主张毫无差异之处。假使有人想举出英国从那时以来在社会民主运动方面所实现的进步情况来反对我，那么我就要这样回答：随着这种扩展，英国社会民主运动像恩格斯一再指出的那样，已经从空想的革命宗派发展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党派。任何一个明白道理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会梦想在今天的英国人们能够通过暴力革命立刻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谁也不会梦想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一举而夺取议会。但是他们越来越依靠在自治市和其他自治体中展开活动。早期的轻视工会运动的想法已经被放弃了；人们已为工会运动以及各处的合作社运动赢得了更亲切的同情。

而终极的目的呢？当然，那还仍旧是一个终极的目的。“工人阶级……并没有想靠人民的法令来实现现成的和完满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得到自己的解放，为了达到现代社会由于本身的经济的发展而总是要达到的那种更高的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使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

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自由发展。”马克思在他所著《法兰西内战》中曾这样说过。当我写下关于终极目的的这个句子时，我曾想到马克思的那段话，但并不是考虑其中的每一点，而是考虑它的基本思想。因为，归根到抵，那段话不过是说运动即过程的连续就是一切；而预先详细规定的每一个目的对运动来说是不重要的。我已经声明过，我愿意放弃关于终极目的这句话的形式，只要它承认这样的解释，即作为一项原则而表述出来的工人运动的每一个一般目的都被宣布为没有价值的。但是，关于运动趋势的预想的理论，如果超过这种大致已经明白地表示的目的，如果不经常留心事实和经验而试图决定运动的方向及其性质，就必然会成为空想，而且到了某一个时候会阻碍运动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取得真正的进步。

凡是稍稍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的人，也知道该党由于不断地反对这种理论并违背了根据这种理论所作的决议，才有今天这样的壮大。恩格斯在《内战》的新版序言内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的布朗基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所说的话，即说他们在实践中不得不违反他们自己的理论这种话，往往在另一种形式下说过多次。每一种理论或原则的宣告，如果不容人们在每一发展阶段上注意工人阶级实际的利益，总是会被人抛开的，正如一切发誓要改革琐细的工作并支持左近中产阶级政党的诺言曾经一再被人忘掉一样；并且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也会一再听到有人表示不满说：在各处竞选时，没有把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放在足够重要的地位。

在普列汉诺夫用以向我攻击的前述舒尔采-格弗尼茨的那段引文中这样说道：由于放弃了工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是绝望的这个断言，社会主义将失去革命的锋芒，而专心致志地去贯彻立法的要求了。根据这种对照，显然就可以看出：舒尔采-格弗尼茨所

用的“革命的”这个概念，含有用暴力进行革命斗争的意思。普列汉诺夫把事情倒转过来，并且因为我沒有提出过工人的地位是绝望的这一主张，因为我承认工人的地位能够得到改善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赞成的其他许多事实，他便把我当做“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

对于普列汉诺夫的科学社会主义说来有一件不幸的事，那就是前面所说工人地位是绝望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在题为《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著作中已被推翻了。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兰开夏纺织工人通过 1847 年的工厂法而实现的“生理方面道德方面的再生”，它“冲击着那些十分近视的眼睛”^①。为了实现大部分工人状况的某种改善，连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不必要的；在同一本书里我们读到：今天的社会并不是什么坚固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经常参加变化过程的有机体；在这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处理经济问题时，也“显然有了改进”。此外，著者还用许多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法的效果，以便刺激大陆方面也相率效尤，从而经过一番努力使改变社会的过程越来越带有人道的形式。所有这些都表明，工人的状况不是沒有希望而是能够改善的。从写作这本书的 1866 年以来，上面所说的立法沒有削弱，而是有所改善，变得更加普及，并且得到在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一些法律和制度的补充，所以工人状况的绝望之能够成为问题，在今天要比当时少得多。如果说明这样一些事实就意味着追随“不朽的巴斯夏”，那么站在这些追随者的最前列的就是——卡尔·马克思。

人们可能对我作如下的反驳：马克思确实承认了那些改进，可是《资本论》第一卷末尾关于资本主义的积累的历史倾向那一章表

^①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06 页。——译者

明，这些个别事实对他的根本见解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对于这种反驳，我只好答复说，上面的话即使是正确的，也只是对该章的反驳，而不是对我的反驳。

人们可以用种种迥然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一章。我相信我曾首先指出并确实再三指出：那一章所扼要地说明的，是资本主义积累中存在的发展趋势，但这个趋势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实现，因此不必促使它达到书中所叙述的对立的临界点。恩格斯对于我的这个解释从来没有明白表示反对，也从来没有在口头上或文字上说它是错误的。我在1891年评论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的那篇论文内对上面谈到的那些问题说了下面这番话时，他连一句反对的话也没有说过。我说：“显而易见，当立法即社会有组织的和有意识的行动适当地加以干涉时，经济发展趋势的作用就受到阻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被取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反而经常强调过。”假如有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去阅读前述的一章，他也就会在若干句子中不声不响地放进“趋势”一词，从而可以不必用歪曲解释方法的办法来使这一章同现实相一致。可是，这样一来，实际的发展愈有进步，这一章本身就会愈成为无意义的东西。因为这一章的理论上的意义，并不在于论证早在马克思以前已由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肯定了的资本主义的集中和积累的一般趋势，而在于用马克思独特的方法来说明它在较高发展阶段发生作用时所处的状态和采取的形式，以及它会产生的结果。可是在这方面，实际的发展却在事实上常常产生新的安排、势力和事实，而面临着这样一些新的东西，上述的说明似乎就不够了，并将相应地丧失其概述未来发展的能力。这就是我的理解。

但是，对于这一章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可能这样设想：那里所说的一切改善以及某些或许还会随之而来的改善，不过是

纠正资本主义咄咄逼人的趋势的暂时对策；它们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变更，归根到底并不能够在实质上影响马克思所断言的对抗的临界点；这种临界点终将——即使不是完全地也至少大体上——会以所描述的方式出现，并且会引起通过暴力的大变革。这种解释可以拿那一章最后几句明白的措辞为根据，并因最后又提起《共产党宣言》而得到某种程度的肯定，另一方面，在那以前不久黑格尔也提出他的否定的否定——在新的基础上恢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否定了的个人所有权。

据我看来，不可能简单地宣布一种看法是正确的而另一种看法是绝对错误的。我认为那一章说明了一种贯串在马克思的这部不朽著作中的并在别处也或多或少有所表现的二元论。这种二元论在于这样的事实，即上述著作希望成为科学的研究，同时又想证明早在该书起草以前就已提出的一个理论。作为那本著作的基础的，则是预先规定书中的解释应得到什么结果的公式。回到《共产党宣言》这件事，在这里表明马克思主义体系内实际存在着空想的残余。马克思曾在本质上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解决办法，但认为他们的手段和证据是片面的。因此他着手修正它们，但这是以一个科学天才的热心、锐利的批评眼光和热爱真理的精神来进行的。他毫不隐瞒重要的事实，并且，只要研究的对象不同需要加以证明的公式的终极目的发生直接关系，他也没有故意贬低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到这一点为止，他的著作是能够避免各种必然会同科学方法发生抵触的倾向的。因为，对解放工人阶级的努力一般表示同情，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并不会妨碍科学方法。但是，当马克思接近这样一点，即所讨论的问题真正涉及那个终极目的时，他就变得含糊其词和难以相信的了。于是便出现了例如那本书在关于近代社会中收入的转变一节内所表现出来的矛盾。由此

可见，这个伟大的科学精神终于变成了一种学说的奴隶。

能够证实我的这种想法的，莫过于有些人在力图坚持《资本论》中某些已被事实驳倒的论点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急切心情了。这样做的人正是一些向来不能同那本著作的辩证形式分开的比较忠实的马克思的信徒。至少我可以用这个论点来解释像考茨基那样在别的方面是非常尊重事实的人的言论，因为当我在斯图加特说有产者的人数多年来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时，他回答道：“假如那种话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胜利的日子就不仅会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或许会永远达不到目的。如果资本家的人数增加而无产者的人数并不增加，那么形势愈发展，我们就离目的愈远，并且资本主义会越来越强大，社会主义会越来越削弱了。”

有产者的人数增加而不减少，这并非资产阶级“协调经济学家”的捏造，而是由税务局调查得来的往往使当事人感到不快的事实，关于这个事实，今天已不再有争论的余地了。但是，这个事实对于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为什么社会主义的实现要取决于上述事实的否定呢？当然，仅仅是由于这个缘故：因为辩证法的系统似乎是这样规定的；又因为假如承认社会的剩余产品由人数逐渐增多而不是减少的有产者所占有，架子的一根支柱就有脱落的危险。但是，受这件事情影响的只不过是空洞的理论；它决不影响工人的实际运动。无论是工人们争取政治上的民主的斗争，还是他们争取工业中的民主的斗争，都和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这个斗争的前景并不取决于所谓资本集中在人数日益减少的大资本家手中的理论，也并不取决于这件事情只是其中一根支柱的整个辩证法架子，而是取决于与一般社会进步相辅而行的、特别是工人阶级本身的思想 and 道德发展相辅而行的社会财富和社会生产力的增长。

假使社会主义的胜利取决于大资本家人数的不断减少，社会民主党如果想要采取合理的行动，就得千方百计地助长资本在越来越少的的人的手里积累起来，或者至少不应当支持任何能够阻止这种减少的事情。可是，社会民主党事实上往往做着恰恰相反的事。例如，这些考虑就没有影响党在课税问题上的投票。从这极危险的理论的角度来看，工人阶级的这种实际行动，大部分可以说是取消了它应该完成的工作。但在这一点上，犯错误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只要那个教条认为进步取决于社会状况的恶化，错误就在教条本身了。

考茨基在其《农业问题》的序言中反驳那些主张必须克服马克思主义的人们。他说：他看到明白表现出来的疑惑和犹豫，但是单单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什么进步。就疑惑和犹豫并不是什么积极的否定这一点来说，考茨基的反驳是正确的。尽管如此，疑惑和犹豫却会成为这种否定的第一步。但是，问题究竟完全是克服马克思主义呢，还毋宁是摒弃某些附着于马克思主义、曾被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证明为理论与实际之间矛盾的根源的空想主义残余呢？这篇论文已经超过了应有的篇幅很多，因此我不能更深入地论述这个问题的一切细节。可是，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有义务来声明：我认为反对者们对于马克思学说的某些项目所提出的一系列不同意见没有被驳倒，并且有些是驳不倒的。这些不同意见和社会民主党的种种努力毫不相干，所以我更容易尽这种义务。

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不应当太敏感。曾经一再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即马克思的信徒所得出的并相信它们同马克思的学说相抵触的结论，曾被非常热心地辩论过，而结果却证明他们所认为是矛盾的东西大部分并不存在。我特别记得关于已故斯提布林博士的资本集中对剥削率的影响的研究所引起的辩论。斯提布林在他的

表达方式上和个别计算上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发现应归功于考茨基。但是另一方面，《资本论》第三卷已经表明，斯提布林的著作的根本思想即剥削率随着资本的不断集中而减少的论点，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当初认为的那样同马克思的学说相抵触，虽然他对现象所提出的证明是和马克思的证明不同的。可是，斯提布林在他那个时候却不得不听取（考茨基的）反驳意见：假如他的推论是正确的，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错误的了。实际上，发表这种议论的人也能指出马克思著作中的种种不同的章节。分析一下斯提布林的论文所引起的争论，对于说明马克思主义价值学说的一些矛盾是很有用处的。

关于历史上经济与暴力的关系的估价，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对于工人运动的实际任务和可能性的批判方面，也表现出相类的矛盾。这个问题必须在这里再提一下。但是在这里所应研究的，不是本来以及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暴力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问题，或者相反地经济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暴力的问题，而毋宁是在一定社会里暴力的创造力是什么的问题。

现在，如果追溯前几辈人关于政治权力的能力的偏见，那将是荒谬的，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我们还要往上追溯以解释那些偏见。例如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抱的偏见是有充足的理由为依据的；事实上很难说它们是偏见，因为它们所依据的是那个时期工人阶级的实际未成熟状态，由于工人阶级尚未成熟，群众政治权力的唯一可能的结果不是出现暂时的暴民统治，就是回到阶级的寡头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来谈论政治，就无异是避开更迫切的任务。今天，这些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排除了，因此凡是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想到要用那个时期的论据来批评政治行动了。

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首先把问题转过头来，按照产业无产阶级的潜在能力来宣传政治行动是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但是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就陷入了一些重大的矛盾。它承认工人阶级尚未达到为他们的解放所必需的成熟程度，也承认还没有为这种成熟所必需的经济的预备条件，从而把它本身和煽动民众的党派分开了。但是，尽管这样，马克思主义却一再求助于认为上述两个预备条件几乎已经具备的策略。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中看到有些段落用一种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空论差别很小的尖锐程度强调工人的未成熟状态，而不久以后我们又看到另一些段落，按照这些段落的说法，我们应当认为一切文化、一切知识、一切道德只有在工人阶级里面才能找到。并且这些段落使人难于理解，为什么最极端的社会革命家和暴力无政府主义者会是错误的。与此相应，政治行动常常是朝着最近的将来可能发生的革命动乱的，而在这种革命动乱的面前，立法的长期事业似乎不过是一种应急的办法，即纯粹是一种权宜之计。关于我们能从立法行动得到什么结果以及能从革命行动得到什么结果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想寻找任何系统的研究，那是徒劳的。

在最后这个问题上，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这是一望而知的。但那种差别通常被发现是这样：法律或立法改革的途径是比较缓慢的，而革命的暴力却是更迅速和更激进的。然而这仅仅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立法的方法和革命的方法究竟哪一种更有希望，完全要看所采用的手段的性质，以及那些手段对人民的不同阶级及其习惯的关系。

一般说来，只要革命的方法（常指暴力革命而言）所处理的事情是排除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放在社会进步道路上的障碍，这种方法就能比较迅速地完成它的事业：它的力量可以说是在它的消极

方面。

根据宪法进行的立法活动在这方面通常是比较缓慢的。它的途径常常是妥协的途径，即并不废除而是赎买既得权利。但是，当偏见和广大群众的狭隘眼界妨碍社会的进步时，它却比革命方法更为有力，又当问题涉及到建立那种能够持久的永久性经济安排时，它可提供更大的利益；换句话说，它最适合于积极的社会政治工作。

在立法方面，在承平时代理智胜过感情，在革命时代则感情胜过理智。但是，如果说感情往往是个有缺点的指导者，那么理智就是一种迟钝的原动力。如果说革命由于过分急躁而有过失，日常的立法者则由于拖延而有过失。立法起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作用，革命则起一种自然力的作用。

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达到这样的地位，即少数有产者的权利不再对社会进步构成重大的障碍，政治行动的消极任务不如积极任务那样迫切，那么，诉诸暴力革命就会是毫无意义的了。我们能够推翻一个政府或享有特权的少数，却不能推翻一个国家的人民。

当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组织时，当他们还没有通过自治团体的教育而达到高度的精神独立时，无产阶级的专政就意味着俱乐部的演说家和著作家的专政。有些人以为压迫和欺骗工人团体并把工人排除于立法和行政之外就是政治权术的顶点，我却不希望这些人将来在实践中体验他们的错误。同样地，我也不希望工人运动本身会这样做。

假如有人把将来可能有的事情移到现在来思考，或者强词夺理说它是现在的事实，那他就还没有克服空想主义。我们必须如实地来观察工人。工人既没有像《共产党宣言》中所申述的那样普

遍贫穷化，也没有像他们的谄媚者希望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已经摆脱了偏见和缺点。他们具有他们生活于其下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这些条件及其影响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除掉的。

我们有没有达到为废除阶级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呢？以前人们为了证明这一点而提出的数字是捕风捉影的，它们的根据是对特别幸运的工业部门的发展情况所作的概括，反之，近代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却力求通过详尽的计算，达到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的适当估计，而他们所得的结果常常同那些数字大相径庭。如果像过去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那样，想把一天的劳动时间一般地缩短为五小时、四小时、三小时甚或两小时，那么，除非大大降低一般的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希望在任何时候有这样的前景。因为，如果要保持同样的产量和工作量而又想大大地缩短一天八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么，即使在集体的劳动组织之下，劳动也要从极幼小的年龄开始，到极老的年龄才告结束。

那些关于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人数比例喜欢海阔天空地夸大其词的人，应当首先了解这个问题。可是，对于某一点想法不对头的人，对于另一点也常常是想得不对头的。

但是，凡是考察实际工人运动的人都会发现：工人并不怎样重视摆脱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认为庸俗的那些性质；工人根本不支持无产阶级政治的道德，相反地，他们倒有使无产者变成“俗物”的倾向。对于没有家庭和家国的流浪无产者说来，任何持久和坚决的工会运动都是不可能的。这决非资产阶级的偏见，而是经过几十年的劳工组织获得的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曾使英国许多劳工领袖——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变成这个有节制的运动的热心信奉者。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者了解本阶级的缺点。他们中间

最诚实的人决不是赞美这些缺点，而是企图竭尽全力加以克服。

如果一个阶级的绝大多数人住在狭小的房屋内过着拥挤的生活，受着劣等的教育，并且没有固定的充足的收入，我们就不能要求这个阶级具有高度的知识和道德水平，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创立和存在的前提。所以我们不愿编造一套假话说他们已经具有那种水平。让我们为现代工人运动部分地显露出来的、部分地产生出来的大量智力、自制力和精力而欢欣鼓舞吧；但是，我们不当把那适用于几十万人的标准毫无区别地搬过来用于大众即几百万人身上。

我乐意承认，我在这里是用两种尺度来衡量的。正因为我对工人阶级期望很大，遇有可能腐蚀他们的道德判断的事情就比对于上层阶级的同样习惯责备得远为严厉，并且我十分遗憾地看到，只能引起混乱和产生腐蚀影响的文学上的颓废气氛正在工人阶级的报刊上到处散播着。一个怀有大志的阶级需要健全的道德，不容有颓废现象。只要它努力追求它的当前目的，它是否规定一个理想的终极目的，那就是次要的问题了。重要的是，这些当前目的所依据的，应当是表现经济和社会生活较高水平的一个明确的原则，并且这些目的应当体现出作为文明发展过程中一种更高的道德和法权观的社会观。

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不能同意所谓“工人阶级没有什么理想要实现”的说法。假如它的作者不是做一种纯粹的文字游戏，我就只能认为那是自欺欺人之谈。按照这个意义，我当时曾求助于克尼格斯堡的大哲学家即纯粹理性的批判者的精神，反对那种企图支配工人运动并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安适的藏身之所的“空谈”。我这样做是抱有如下的信心的，即：社会民主党需要一个康德，他会判断所接受的见解并以深刻批判的态度对它进行考察，他会指

出在什么地方它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是最高的因而也是最容易使人误解的意识形态,并且对它提出警告:轻视理想并将物质因素夸大为推动发展的无限力量,就是自欺欺人,无论过去和将来都会随时由主张这种说法的人在行动上暴露出来。这样一个思想家既然能够非常正确地指出我们伟大战士们的著作中什么是优秀的和必然会存在下去的思想,以及什么是必然会或可能会消失的东西,也就使我们能够持一种比较公正的见解,来判断那些虽然不是从我们今天看来已属定论的前提出发但致力于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的著作。……并非任何时代都能产生像马克思那样的人物,今天工人运动的规模太大,不能允许同马克思一样的天才人物也占有他在工人运动史上所占的那种地位。除战斗精神而外,工人运动今日还需要这样一些能起协调作用的积极的思想家,他们的智力十分高超,足以识别小麦和糠皮,他们的思想方法十分伟大,足以认出生长在不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小小的植物,而且他们在社会主义的思想领域内虽然不是帝王,却是热情的共和论者。

罗莎·卢森堡:改良还是革命?^①

社会民主党可以反对社会改良么?或者说,它可以把那作为它的最终目的的社会革命,把推翻现存制度,同社会改良对立起来么?当然不可以。社会民主党认为,为了社会改良、为了在仍然是现存制度的基础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了各种民主制度而进行的日常的实际斗争,宁可说是引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力求达到最终目的——掌握政权和废除雇佣制度——的必经之路。

^① 参看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7、27、30—31、34、65—70页。

社会民主党认为，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在它看来，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而社会革命是目的。

我们在爱德华·伯恩斯坦的理论中第一次看到把工人运动的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这整个理论总结起来实际上不是别的，只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伯恩斯坦自己曾十分中肯地和精确地表述了这种见解，他是这样写的：“在我看来，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但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个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它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区别了开来，它把整个工人运动从适足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无谓的装饰品变成反对这个制度的、为废除这个制度而进行的阶级斗争，因此，伯恩斯坦所提出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个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等于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同伯恩斯坦及其门徒的论战中，党内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清楚地了解到，这不是这种斗争方式还是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策略还是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在粗略地考察一下伯恩斯坦的理论时，上面的这些话也许显得有些夸张。难道他没有不断地提到社会民主党和它的目的吗？难道他没有三番五次地明白表示，他也要争取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吗？难道他没有特别强调，他完全同意社会民主党的目前实践吗？

不用说，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每一种新的运动在最初提出自己的理论和政策时，总要从前一个运动中寻求支持，虽然它可能同前一个运动直接背道而驰。一开始，它总是要适应现成的形式，使用现成的语言。可是，经过相当时期，新的内核

便要突破旧的外壳，新的运动便要具有自己的形式，使用自己的语言。

指望一种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从一开始就会明确、彻底和全面地表明它的真正内容，公开而直率地否定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那就未免低估科学社会主义的威力了。今天，一个人如果既想冒充是社会主义者，又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近一百年来最伟大的人类思想成果，开始时都得言不由衷地恭维一通马克思。他必须先承认自己是马克思的信徒，然后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中找寻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根据，同时还把这种攻击叫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撇开伯恩施坦理论的外表，注意揭露它掩藏着的实质。对于我们党内工业无产阶级的广大阶层来说，这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

对于工人来说，再没有比“理论争执只是学者们的事”这句话更是粗鲁的侮辱和卑鄙的诽谤了。拉萨尔曾说过：“只有当科学和工人这两个对立的社会极端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以钢铁般的手臂扫除通向文化的一切障碍。”现代工人运动全部力量的基础就在于它的理论知识。

认识这一点，对于工人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正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在运动中影响的问题，因为这里正是拿他们的生命去冒险的。伯恩施坦从理论上表述了的党内机会主义思潮，这正是让那些靠拢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居于上风、依他们的精神来改造党的实际工作和党的目的的一种盲目的企图。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问题，最终目的和运动的问题，从另一方面看，就是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

因此，让党内的无产阶级群众积极地和详细地了解目前同机会主义进行的理论争执，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只要理论知识还是

伯恩施坦自己看不出他的议论中有什么新的东西，他倒以为这些议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说法、同社会民主党一贯采取的总方针意思是一样的。可是，在我们看来，很难否认伯恩施坦的见解实际上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途径有着根本的矛盾。

如果伯恩施坦的全部修正总起来说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比人们平常设想的要慢得多，那么，这种看法实际上只是意味着要把大家一贯主张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事业推迟一步。由此得出的结果实际上顶多是斗争的速度放慢罢了。但是，事情不是这样。伯恩施坦作为问题提出的，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速度，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的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过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社会主义理论总是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出发点将是一个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必须分别两个方面：其一是这里所包含的根本思想，其二是这些思想的表面形式。这里的根本思想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由于自己、由于本身的矛盾使时机成熟，那时它将崩溃，它将干脆不可能存在。人们把这个时机设想为一个普遍的、震动一切的商业危机的形式，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对那个根本思想来说，这个形式总还是非本质的、附带的东西。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是以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后果为依据的：第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着的无政府状态，这使它的崩溃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是生产过程的迈著大步走向社会化，这替未来的社会制度创造了确实的出发点；第三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和阶级觉悟，这是就要来到的变革的积极因素。

伯恩施坦所拔掉的，是上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石中的第一个。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普遍的经济危机。但是这样一

来，他就不仅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一定形式，而且也否定了资本主义崩溃本身。他明确地说过：“或许有人说，当人们说到现社会的崩溃时，心目中多半有一个比过去更加剧烈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矛盾引起的总崩溃。”关于这一点他答复说：“由于社会的前进的发展，现在的生产制度看来不是更有可能而是更不可能发生一个几乎同时的全面的崩溃，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适应性，另一方面——或者说，与之同时——工业分化的过程加强了。”

如果是这样，倒出了一个大问题：究竟我们为什么能够达到和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如果同伯恩施坦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走向自己的崩溃，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不再是客观上必然的事情了。于是，社会主义的科学依据的基石中就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另外两个后果，即社会化了的生产过程和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一点，伯恩施坦也是看到了的，他说：“社会主义的思想界（在废除了崩溃论后）毫不丧失信心。因为，仔细看来，我们前面指出过的废除或改变从前的危机的一切因素究竟是什么呢？它们同时也就是使生产和交换社会化的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它的萌芽。”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就可以证明这也是个错误的结论。伯恩施坦把卡特尔、信贷、完善的交通工具、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的适应工具，这些现象的意义何在呢？显然是在于这些现象消除了或者至少缓和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的矛盾，防止了这些矛盾的展开和激化。由此可见，消除危机就是指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消除生产和交换之间的矛盾，而工人阶级地位的提

高——一部分作为工人阶级来提高，一部分升到中间阶级——就是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和缓。可是，既然卡特尔、信贷、工会之类消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因而使资本主义免于崩溃，把资本主义保存了下来——因此伯恩斯坦才把它们称作“适应工具”——那么，它们对于社会主义又怎么会同时表现为“前提，一部分甚至还是萌芽”呢？显然，这是从它们更强烈地表现出生产的社会性这一点说的。但是，既然它们使生产的社会性保持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那么反过来说，它们也就使社会化了的生产毋需向社会主义过渡，而过渡就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这些现象的表现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萌芽和前提，就只是从概念上说是如此，而不是从历史上说是如此了，也就是说，根据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我们知道这些现象是同社会主义有连带关系的，但是事实上它们不但不会带来社会主义革命，反而把社会主义革命变成多余的事了。这样一来，社会主义的依据就只剩下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觉悟也不是资本主义日益尖锐的矛盾和行将到来的崩溃在精神上的简单反映——因为崩溃已经由适应工具防止了——而只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信服力是以它自己的想像社会主义的完美性为依据的。

总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得到的，是社会主义纲领的一个出于“纯粹理性”的根据、即唯心的根据，而客观必然性、即出于社会物质发展的根据，却消失了。修正主义理论面对着一个选择：“非此即彼”。或者，社会主义改造在将来也还是同过去一样，是出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那么，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它的矛盾也就发展了，在某种形式上，在某一时候，崩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如果是这样，“适应工具”也就无能为力了，而崩溃论是正确的）。或者，“适应工具”真正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因而

使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因而它的矛盾能够消除。如果是那样，社会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它就成为人们愿意它怎样它就怎样的东西，唯独不是社会物质发展的结果。这个两端论法导致另一个：或者，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想法是对的，那么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个乌托邦；或者，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乌托邦，那么“适应工具”论就必然站不住。问题就在这里。

* * *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筑起了越来越高的墙。这座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只会因之更加牢固。要推倒这座墙，只有靠革命的锤击，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社会主义决不是不论在任何环境之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只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又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社会革命手段来消除这些矛盾的结果。如果像修正主义那样，不承认前者，又拒绝后者，那么，工人运动最初是变成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最后并由于本身的重力而走到放弃阶级立场的地步。

如果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修正主义理论，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这种观点的一般性质究竟是什么？那么，刚才指出的那个结论也就明白了。修正主义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一起否认资本主义矛盾的，它在理论上倒也是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样，把这种矛盾的存在作为前提而从此出发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在理论上不认为这些矛盾的消灭要通过它们自己的彻底发展，不是以此为根据。——这一点，既是修正主义观点一般的核心，也是它同到现在为止的普通的社

会民主主义观点的根本分歧。

修正主义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它不愿意资本主义矛盾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消灭这些矛盾，它倒愿意减轻矛盾，缓和矛盾。于是它以为，危机的迟来和企业主的联合组织可以缓和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地位的提高和中间阶级的继续存在可以缓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控制的发展和民主制度的发展可以缓和阶级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当然，社会民主党现今的策略也不是要等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发展到极端，等待它们到那时候才发生的突变。相反，我们只是依靠已经认识的发展方向，在政治斗争中使矛盾的后果发展到极端，这是一般革命策略的本质。例如，社会民主党不等关税战争和军国主义的反动性质完全暴露，就对它们进行斗争。伯恩斯坦则不然，他在策略上根本不是依靠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尖锐化，而是依靠矛盾的缓和。当他谈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时，他把这一点说得最为露骨。

* * *

总之，伯恩斯坦的适应论不过是个别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但是，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论表现上究竟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精神和特点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上的一切错误，其根源正在于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看到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现象。例如，伯恩斯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经济学也把货币当作对市场需要的巧妙的“适应手段”，它也企图从资本主义现象本身去寻求资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药，它同伯恩斯坦一样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最后，归根到底，它还是同伯恩斯坦的理论一样，是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和粘合资本主义的创伤的，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

此是一个空想。

因此，整个说来，修正主义理论可以用这样的话来说明它的特征：这是以庸俗经济学的精神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 * *

伯恩施坦的书，对于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历史意义：它是替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思潮建立理论基础的第一个尝试。

我们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思潮，如果我们把一些零碎的表现——如大家知道的轮船补贴问题等——也计算进去，那是早就存在的了。可是，一个公开的统一的机会主义思潮却是九十年代之初开始的，是从取缔社会主义者的法律垮台后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时开始的。福耳马尔的国家社会主义、巴伐利亚的预算投票、南德的农业社会主义、海涅的补偿建议案、席佩尔的对于关税和军国主义的观点，就是机会主义实践的发展中的界标。

机会主义的外部标志首先是什么呢？是对“理论”的敌意。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实际活动，无论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无论在应用的斗争手段方面，最后，无论在斗争的方法方面，都设定了十分明确的界限。因此，只想追求实际成果的人们自然企图让自己的手脚不受束缚，让他们的实际工作脱离“理论”，不依据理论。

但是，这个理论迎头痛击了他们的每一个实际企图：国家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补贴政策、军队问题，都使机会主义遭到失败。显然，这种思潮如果想反对我们的基本原理，就势必要向理论本身、向基本原理挑战，而不是单单装聋作哑；势必要想法动摇这些基本原理，并且建立一种自己的理论。伯恩施坦的理论正是向

这方面努力的一种尝试，因此，我们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看到所有的机会主义分子立刻在伯恩施坦的旗帜周围集合了起来。如果说，一方面，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思潮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由我们的斗争条件产生的现象，它的增长是可以解释的现象，那么，另一方面，伯恩施坦的理论也是一个不难理解的企图，它是想把把这些思潮在一个普遍的理论表现中总结起来，找出自己的理论前提，同科学社会主义较量一番。因此，伯恩施坦的理论一开始就是机会主义在理论上的耐火试验，是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科学证书。

这次试验结果如何呢？我们已经看到了。机会主义树立不起一个能够顶得住批评的积极的理论。它所能够做的事情是先对马克思学说的各个个别的基本原理进攻，最后，正因为这个学说是各部分密切结合的一座大厦，就想把整个学说体系从最上层到基础一起毁掉。由此可以看出，机会主义的实践在它的本质上和基础上是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不能相容的。

但是，其次它也证明了，机会主义同社会主义也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它的内在的趋势是要把工人运动赶到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就是要完全麻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当然，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马克思的学说体系——从历史上说——不是一回事。在马克思以前，并且同马克思无关，就有了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主义的体系，每一个体系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论上表现出适应当时条件的工人阶级解放的意图。用道德上的公平观念为基础、即以不是反对生产方式而是反对分配方式的斗争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把阶级斗争理解为贫富对立，努力把“合作原则”同资本主义经济融合起来——我们在伯恩施坦思想体系中遇到的这一切，早已存在了。这些理论过去在它们的时代尽管有欠缺的地方，仍不失为无

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真正的理论。它们是孩子们一步跨七里的魔靴，无产阶级是穿了这种靴子学着走上历史舞台的。

但是，当阶级斗争本身的发展和它的历史条件已经导致放弃这些理论并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之后，除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外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社会主义，离开了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有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至少在德国是如此。从此以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和社会民主党，就是一回事了。因此，回到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上去，现在就不再意味着重新穿上无产阶级孩童时期的魔靴，而是穿上资产阶级的窄小的破鞋了。

伯恩施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打理论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我们说最后一次，是因为机会主义在伯恩施坦的理论中——无论消极方面的坚决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还是积极方面的集一切理论上的混乱之大成——已经走得很远，再没有什么事情要做的了。伯恩施坦的书一出版，机会主义就完成了它的理论上的发展，得出了它的最后的结论。

马克思的学说，不仅能在理论上驳斥机会主义的学说，而且是唯一能把机会主义当作党的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来加以说明的学说。无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最后胜利而发动的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军，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这个运动的全部特点恰恰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在这里，人民群众自己破天荒第一次在反对一切统治阶级的情况下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越出现社会的范围，在未来世界中求得实现。这个意志，群众又只有通过同现存制度不断进行的斗争，在现存制度的框子里培养起来。广大人民群众同一个超越现存制度的目的相结合，日常斗争同伟大的世界改造相结合，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任务，因

此这个运动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必然要在两块礁石之间摸索前进：一边是群众性的任务，一边是最终日的任务；一边是重犯宗派主义，一边是滚入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机会主义。

当然，马克思的学说在他的理论宝库中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提供了既反对这个极端又反对那个极端的锐利武器。可是，正因为我们的运动是一个群众运动，而威胁着运动的危险不是从人的头脑而是从社会条件中产生出来的，因此，那种跳到无政府主义一边去和跳到机会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防止得了的；只有当我们从理论的领域过渡到实践的领域，通过运动本身，当然只有靠马克思所提供的武器的帮助，才能加以克服。

马克思在半世纪以前写道：“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①

就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建立之后，这段话仍然是对的。就是有了科学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也还不是一下子变成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甚至在德国也是如此。但它不断地克服无政府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极端偏差，一天天更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这两种偏差不过是当作过程来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发展中的决定性阶段。

从这一点看来，值得奇怪的不是竟有机会主义思潮产生，倒不如说是这个思潮竟如此虚弱。当它仅仅表现在党的个别实际工作上的时候，人家还以为在它后面总有一个多少是认真的理论基础。可是现在它在伯恩施坦的书里已经完整地表达出来了，每一个人都不得会惊奇地喊道：怎么，你要说的就是这些吗？连一点一滴的新思想都没有！没有一点思想不是早已在几十年前给马克思主义驳倒、粉碎、嘲笑过的，并且一点也没有改变。

机会主义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适足以证明它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伯恩施坦的书在党的历史上所具有实在的意义就在于此。

因此，伯恩施坦在同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同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告别的时候，可以感谢它们缩小了它们对他的转变所提供的环境。因为，虽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豁达大度的，却只有它们才能使伯恩施坦显出是个注定的不自觉的工具，向前猛进的无产阶级通过这个工具已经表现了它的暂时的不坚定性，以便在仔细观察之后，轻视地和自豪地把这种不坚定性远远抛开。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5页。——译者

第九章 布尔什维克 ——革命的轴心

尼古莱·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①

本文标题所用的语句，似乎是不合情理的。谁不知道欧洲先进，亚洲落后呢？但是用作本文标题的语句，包含着一种辛辣的真理。

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的欧洲，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时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衰老的资产阶级与一切衰败了的和正在衰败的势力联合起来，以求保存陷于动摇状态的雇佣奴隶制。

在先进的欧洲，当权的是支持一切落后东西的资产阶级。欧洲在现时之所以先进，并不是由于存在资产阶级，而是由于不顾资产阶级，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使争取美好未来的百万大军日益增长起来，只有它才能保持和扩展对落后、野蛮、特权、奴隶制和人侮辱人现象的深恶痛绝的仇恨。

在“先进的”欧洲，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的阶级。而尚存的资产阶级甘愿干一切野蛮、残暴和罪恶的勾当，以维护垂死的资本主义奴隶制。

欧洲资产阶级为了一些财阀和资本家骗子的贪利目的而支持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2—83页。

亚洲反动势力的事实，要算是证明整个欧洲资产阶级已经腐朽的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了。

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百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懂得只有通过民主制度才能达到集体主义的觉悟工人多么欢欣鼓舞！一切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对年轻的亚洲是多么同情！

而“先进的”欧洲呢？它掠夺中国，帮助中国民主、自由的敌人！

请看一笔很简单但又值得注意的账目吧。借给中国的新的公债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为什么它要拥护袁世凯呢？因为这是个有利可图的机会。公债数目约为二亿五千万卢布，按一百卢布折合八十四卢布的行市计算。这就是说，“欧洲”资产者实付中国人二亿一千万卢布，而他们向大众要去二亿二千五百万卢布。你看，在几个星期内，一下子就赚得一千五百万卢布的纯利！这岂不是一笔绝妙的“纯”利吗？

若是中国人民不承认这笔公债呢？在中国不是有共和制度以及国会中的大多数反对这笔公债吗？

啊！那时“先进的”欧洲就会大喊什么“文明”、“秩序”、“文化”和“祖国”了！那时它就会出动大炮，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

整个欧洲的当权势力，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都是与中国所有一切中世纪反动势力实行联盟的。

但整个年轻的亚洲，即亚洲数亿劳动者，有各文明国家里的无产阶级做他们的可靠的同盟者。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无产阶级的胜利，他们一定能把欧洲各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一同解

放出来。

尼古莱·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 的特殊阶段^①

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的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已经变成了与自己相反的东西，而且由资本主义进入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在各个方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经济方面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同自由竞争正相反的东西，但是自由竞争分明已经变成垄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至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以及同这些垄断组织溶合起来的十来个支配着亿万资金的银行的银行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生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灭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进入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要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包括了最主要的内容，因为一方面，财政资本是与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溶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就是由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7—266页。

无阻碍地扩张到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区的殖民政
策，过渡到对已经分完了的世界领土进行独占的殖民政
策。

太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如
果你要从定义特别明显地看出它所说明的那个现象的各个极重要
的特点，那就显得这个定义很不够了。因此，一方面要记住，所有一
般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现象的
全部发展上各方面的联系，同时也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
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主要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
积聚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
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融为一体，在这个“财
政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财政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
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分割世界的资本家的国际垄断同盟
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帝
国主义是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上，垄断组
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
际托拉斯已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
分完毕。

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如果我们不仅注意到帝国主义的纯粹经
济上的主要现象（上述定义只包括了这些现象），而且注意到资本
主义的现阶段在整个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
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末我们就可以
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必须指出，照上面那
个意思理解起来，帝国主义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
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尽量确切的概念，我们故意
尽量多引用一些不得不承认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万分确凿的事
实的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

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来说明银行资本等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量转变成质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变成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线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还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是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的，那就太荒唐了。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进行争论，首先是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即 1889—1914 年这二十五年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考茨基进行争论，却是必要的。在 1915 年，甚至早在 1914 年 11 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那个定义中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时期”或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财政资本所“爱好”的一种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看作一个东西”；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关税制，财政资本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问题就成了“最平淡无味的同义语的反复”，因为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资本主义迫切需要的东西”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意见，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发挥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宣传这些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一部分人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愈来愈多地吞并或征服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武断地单单强调

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武断地、**錯誤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武断地、**錯誤地**强调了兼并农业区域这一点。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这是考茨基的定义在**政治**方面的含义。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充分，因为帝国主义在政治方面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經濟**方面的含义。在这一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錯誤**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财政资本。所以在法国恰好是**財政**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这时工业资本在衰退着）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引起了特别加紧地推行兼并政策（殖民政策），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它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地球已经瓜分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对**任何一块**土地都是想伸手要的；第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爭夺霸权**，即**爭夺领土**，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对德国来说，比利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来说，巴格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

考茨基特别着重地——并且屡次地——引用英国人的言论，认为英国人所确定的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的纯粹政治上的意义，同他考茨基的意思是相同的。我们现在举出英国人霍布森来，看看他在1902年出版的他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旧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它已经不是表明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企图称霸，而是表明几个帝国在扩大政治势力和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样的欲望驱使之下互相竞争的理論

和实践了；第二、财政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

由此可见，考茨基说他一般地引用英国人的言论，实际上是绝对错误的（除非说他引用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公开辩护人的言论）。由此可见，考茨基虽然妄自以为是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他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退后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特点了（而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历史具体性的嘲弄！）：（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财政资本家统治着商人。如果主要是说工业国兼并农业国，那就把商人抬上主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成了全面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那一套思想体系的基础；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所掀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该叫作帝国主义呢，还是叫作财政资本的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财政资本所“爱好”的政策，而拿另一个似乎可能的、也是以财政资本为立足点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起来。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非垄断的、非强力的、非掠夺的行动方式并存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恰巧在财政资本时代进行完毕而成了各个资本主义强国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这样一种情况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并存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现代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人库诺夫争论过。库诺夫又笨拙又无耻地说：帝国主义是现代的资本主义；资

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是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因此，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像民粹派在1894—1895年攻击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画的那幅讽刺画，画中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末他们就应该开起酒店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夫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的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所采取的各种政策中的一种政策，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反对这种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兼并等等。

这种反驳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妥协，因为“反对”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幼稚的愿望而已。不是暴露矛盾有多么深刻，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这种“理论”当然只能用来替那种主张同库诺夫保持统一的思想进行辩护。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财政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的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弃马克思主义究竟到了怎样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要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呢？

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抽象的东西，那末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像说：“发展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制造食物。在这一点上说来，超帝国主义“论”和“超农业论”是一样的荒唐话。

如果说财政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二十世纪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末对于“超帝国主义”这一死板抽象的概念（这个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的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来同它对立起来。而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也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人声势的思想，似乎财政资本的统治削弱了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财政资本的统治是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我们看到有三个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国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搏斗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太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最后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在正处于在殊死的斗争里逐渐形成的过程中。目前整个欧洲区的特征是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列颠区和美国区则刚好相反，有很高的政治集中，但是它们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夺取南美的斗争一天比一天尖锐。

有两个是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还刚刚开始，日美等国瓜分中国的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种胡说不是吓坏了的市侩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么？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像“可以”把实验室里的药片生产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由和平分割转为不和平分割，再由不和平分割转为和平分割的一个例子么？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船托拉斯里）和平地分割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财政资本，现在没有在改变了的新的势力对比的基础上，用**决不是**和平的手段来**重新分割**世界吗？

财政资本和托拉斯并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势力对比变更了，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武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尼古莱·列宁：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趋势^①

我们已经说过，帝国主义就其经济本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进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最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四种主要的垄断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这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297页。

就是资本家的各种垄断同盟，如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极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固然，最先走上卡特尔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但是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也表明了垄断是由生产集中产生的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引起了加紧对最主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垄断地占有主要的原料来源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尔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平常的中介企业变成了财政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是由三五个最大的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个人联合”，这几个银行把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总数大部分的几百亿资本集中在自己手里。财政寡头制给现在资产阶级社会所有一切经济和政治的机构罩上了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财政资本实行殖民政策，除了无数“旧的”动机以外，又加上了争夺原料产地、强先输出资本、争夺“势力范围”（即能够成立有利的契约、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例如，在欧洲列强还只占据非洲十分之一的面积作为自己的殖民地的時候（那是远在 1876 年的情形），殖民政策还能用非垄断的方式，即所谓“自由占领”领土的方式去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 1900 年的时候），全世界已经分割完毕的时候，就

必然会到来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分割世界和重分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

垄断资本主义把所有资本主义的矛盾弄到了如何尖锐的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这两件事实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就是世界财政资本取得完全胜利以来的这一过渡的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造成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不得不把帝国主义看成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向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或放债国的趋向愈来愈明显了，也就是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了。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向排除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可能，那就想错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各以或多或少的强度时而表现着这种趋向，时而又表现着那种趋向。整个说来，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迅速是从前远不能相比的，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不平衡也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研究德国大银行问题的作家里谢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期（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像拿旧时的邮车同现代的汽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汽车上的乘客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发展得异常迅速的财政资本，正因为发展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也不反对更“心安理得地”占领殖民地，把那些应当夺取的殖民地从更富足的国家手里夺过来，当然不单是使用和平手段。美国近几十年来

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寄生性也正因此而表现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就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来比较一下，也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的极大的政治上的差别也大大缩小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带有明显的寄生性的特征。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高额的垄断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个别的工人阶层，而且可能暂时收买工人中间相当大的一个少数，把他们拉到某一部门或某一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的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分割世界而紧张起来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情形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发展中的某些帝国主义特点在英国出现比在其他各国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方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议论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明显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会倾向于机会主义，那末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未免太无希望了。千万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抱乐观的态度，这是用来掩饰机会主义的乐观态度。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讨厌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也正像一个健康身体上的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溃裂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这方面最危险的，倒是那些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的人。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本质的叙述，可以说帝国主义是

过渡的资本主义，说得更确切些，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叙述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候常用的字眼，什么“互相错综”、“没有孤立性”等等；又说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都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讲了上面这句话的那个里谢尔，同时又非常郑重地说，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互相错综”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那个过程的最鲜明的一点。这说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这证明观察者是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纷乱的现象。这也暴露出观察者被一大堆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义。股票占有的关系，私有者的关系，是“偶然互相错综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错综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错综现象的基础的，是变动着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规模已经扩张得十分庞大，并且以精确估计大量资料为根据来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人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各个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甚至是彼此相距数千里的地点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从原料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是按照一个总的计划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的消费者的（美德两国的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末，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显然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什么简单的“互相错综”；同时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者关系显然已经变成一种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如果人为地拖延这个外壳的消灭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化起来，也许它还能在腐化状态中存留一个比较长久的时期（如果割治机会主义脓疮的手术不幸竟拖延下去的话），但是终究是必然会

被消灭的。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末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国民生计说来，就比政府大多数部长的活动更重要了”（在这里，把银行家、部长、工业家和食利者“互相错综”的情形忘掉，当然比较有利……）“……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倾向的发展情形彻底想一想，那末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统一在银行的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到那时候，指挥生产的不会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而是相当的社会机构。有可能从更高的观点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个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关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劳动的作用包括在自己的职务以内了，这种机关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言；但是我们已经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走着：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也只是形式上不同。”

不用说，这是对马克思的很不错的“反驳”，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想上去了，虽然这个猜想是天才的猜想，但终究是猜想。

尼古莱·列宁：国家及其发展^①

什么是国家，它是怎样产生的，为彻底推翻资本主义而奋斗的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基本上应当是怎样的……

要最科学地来看这个问题，至少应该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情况作一个概括的历史的考察。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致纠缠在许多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上面，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谈到国家问题的时候，首先就要知道，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有一个时候是没有国家的。国家是在社会分成阶级的时候、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出现的时候才出现的。

在第一个剥削人的形式、第一次阶级区分（奴隶主和奴隶）尚未出现以前，还存在着父权制的或有时所谓的克兰制的（克兰就是氏族，当时人们生活在氏族中）家庭，这种原始时代的遗迹在很多原始部落的风俗中还表现得十分明显，不管你拿哪一部论述原始文化的著作来看，都可以碰到比较确定的描写、记载和回忆，说有过一个多少与原始共产主义相似的时代，那时社会并没有分为奴隶主和奴隶。那时还没有国家，没有一贯使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关。这样的机关就叫做国家。

在原始社会里，在人们还生活在不大的氏族中，还处于最低发展阶段即处于近乎野蛮状态的时候，在与现代文明人类相距几千

^① 《论国家》。《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9、430、431—444页。

年的时代，还看不见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这种权力有时是属于妇女的，——那时妇女还不像现在这样处在无权的被压迫的地位，——但是在任何地方看不到什么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经常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关即暴力机关的特殊集团，大家知道，现在，这种暴力机关就是武装部队、监狱及其他强迫他人服从暴力的工具，即构成国家实质的东西。

如果把资产阶级学者制造出来的所谓宗教学说、诡辩、哲学体系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见抛开，而去探求问题的实质，那我们就会看到，国家就是从人类社会分化出来的管理机关。当专门从事管理并因此而需要一个迫使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强制机关（即监狱、特殊队伍及军队等等）的特殊集团出现时，国家也就出现了。

但是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国家并不存在，公共联系、社会本身、纪律以及劳动规则全靠习惯和传统的力量来维持，全靠族长或妇女享有的威信或尊敬（当时妇女不仅与男子处于平等地位，而且往往占有更高的地位）来维持，根本没有特殊的人，没有专门从事管理的人。历史告诉我们，国家这种强制人的特殊机关，只是在社会分为阶级，即分为两种集团，其中一种集团能够经常占有另一种集团的劳动的时候和地方，只是在人剥削人的地方才产生出来的。

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发展都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次序是这样的：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即氏族社会，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整个现代文明的欧洲都经过这个阶段，——奴隶制在两千年前占有完全统治的地位。世界上其余各洲的绝大多数民族也都经过这个阶段。在最落后的民族中，现在也还有奴隶制的

遗迹，例如在非洲现时还可以找到奴隶制的机构。奴隶主和奴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阶级区分。前一集团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即占有土地和当时还很原始的工具等等，并且还占有人。这个集团就叫做奴隶主。从事劳动并把劳动果实交给别人的人则叫做奴隶。

在历史上继这个社会形态而起的另一个形态是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奴隶制发展成了农奴制。这时社会基本上分为农奴主和农奴。人与人的关系的形式改变了。奴隶主把奴隶当做自己的财产，法律把这种观点固定下来，认为奴隶是一种完全被奴隶主占有的物品。农奴仍然遭受阶级压迫，处于依赖地位，但农奴主不能把农民看做自己私有的物品，而只能占有农民的劳动并强迫他担任某种劳役。其实，大家知道，农奴制，特别是在俄国维持得最久、表现得最粗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

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从商品、商品交换、货币权力中间产生了资本权力。在十八世纪，更正确些说，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界各地发生了革命。农奴制在西欧各国被消灭了。这一点在俄国发生得最晚。俄国在1861年也发生了变革，结果社会形态改变了，资本主义代替了农奴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区分仍然存在，同时保留着农奴制的各种遗迹和残余，但是阶级区分基本上具有另一种形式。

资本占有者、土地占有者、工厂占有者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始终只占人口的极少数，他们支配着全部国民劳动，就是说，使全体劳动群众受其支配、压迫和剥削；这些劳动群众大多数是无产者，是雇佣工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靠出卖双手、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在农奴制时代分散的和受压迫的农民，在过渡到

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一部分(大多数)变成无产者，一部分(少数)变成富裕农民，雇用工人，成为农村资产阶级。

你们应当时刻注意到社会从原始形态的奴隶制过渡到农奴制、然后又过渡到资本主义这一基本事实，因为只有记住这一基本事实，只有把一切政治学说纳入这个基本范围，才能正确评价这些学说，认清它们的实质，因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意见和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

你们根据这种基本区分来观察国家，就会看出，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社会分为阶级以前国家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社会阶级划分的发生和巩固，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国家也产生和巩固起来。在人类史上有几十个几百个国家经历过和经历着奴隶制、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在每一个国家内，虽然有过极大的历史变化，发生过各种与人类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到资本主义、到现在全世界的反资本主义斗争这一发展过程相联系的政治变迁和革命，但你们总可以看到国家出现的事实。国家一直是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机关，一直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的。人分为受治者和治者，后者高高在上，称为统治者，称为国家代表。这个机关，这批管理别人的人，总是把持着一定的强制机关，实力机关，不管这种加之于人的暴力表现为原始时代的棍棒，或是奴隶时代更加完善的武器，或是中世纪出现的

火器，或是完全根据现代最新技术造成的二十世纪的奇妙武器，反正都是一样。使用暴力的手段可以改变，但是只要国家存在，每个社会就总有一群人进行管理，发号施令，实行统治，并且为了维持政权而把实力强制机关、暴力机关、适合于每个时代的技术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我们详细地观察了这种共同现象，就要问为什么在沒有阶级、沒有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的时候就沒有国家，为什么国家产生于阶级出现的时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于国家的实质及其意义的问题找到一个确切的回答。

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当社会上还没有阶级的时候，当人们还在奴隶制时代以前，在较为平等的原始条件下，在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的条件下从事劳动的时候，当原始人很难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料来维持最简陋的原始生活的时候，沒有而且不可能有专门分化出来实行管理并统治社会上其余一切人的特殊集团。只有当社会第一次划分为阶级时，当奴隶制已经出现时，当某一阶级有可能专门从事最简单的农业劳动而生产出一些剩余物时，当这种剩余物对于维持最贫苦的奴隶生活并非绝对必需而由奴隶主攬为己有时，当奴隶主阶级的地位已经因此巩固起来时，为了使这种地位更加巩固，就需要国家。

于是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国家，出现了一个使奴隶主握有权力、能够管理一切奴隶的机关。当时的社会和国家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沒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范围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关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但是终究有一个机关迫使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使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受另一部分人压迫。要强迫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经常替另一部分人做工，就非有一种经常的强制机关不可。

当阶级没有的时候,这种机关也就没有。在阶级出现以后,随着阶级区分的加强和巩固,随时随地就有一种特殊的机关即国家产生出来。国家形式极其繁杂。在奴隶占有制时期,在当时最先进、最文明、最开化的国家内,例如在完全建立于奴隶制之上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已经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那时已经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别。君主制是一人独裁的政权,共和制是一切政权机关都由选举产生;贵族制是很少一部分人的政权,民主制是人民的政权(民主一词从希腊文“德谟克拉西”译出,意即人民的政权)。这些区别都是在奴隶制时代产生的。虽然有这些区别,但奴隶占有制时代的国家,不论是君主制、贵族共和制或民主共和制,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

任何古代史课程谈到这一问题时,都会指出当时君主国家和共和国家互相斗争的事实,但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罗马法典把奴隶看成一种物品。关于杀人的法律是把奴隶除外的,更不用说其他保护人身的法律了。法律只保护奴隶主,唯有他们才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不论当时所建立的是君主国还是共和国,都不过是奴隶占有制君主国或共和国。在这些国家中,奴隶主享有一切权利,而奴隶按法律规定却是一种物品,对他不仅可以随便使用暴力,就是把他杀死,也不算犯罪。奴隶占有制共和国按其内部结构来说分为两种:贵族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在贵族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在民主共和国中参加选举的是全体,但仍然是奴隶主的全体,奴隶是除外的。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基本情况,因为它最能说明国家问题,最能清楚地表明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个机器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奴

隶占有制国家内，有君主制，贵族共和制，甚至有民主共和制。其实，虽然政体极不相同，但本质只是一个：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农奴制国家内的情形也是如此。

由于剥削形式的改变，奴隶占有制国家变成了农奴制国家。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在奴隶占有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权利，根本不算是人；在农奴制社会中，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农奴制的基本特征，就是农民（当时农民占大多数，城市人口极少）被束缚在土地上，由此就有农奴制这一名称。农民可以在地主给他的那一块土地上为自己工作一定的天数，而在其余的许多天内则替地主工作。阶级社会的实质仍然存在：社会是靠阶级剥削来维持的。只有地主才有充分的权利，农民是没有权利的。其实，农民的地位与奴隶占有制国家内奴隶的地位没有多大区别。但是通向农民解放的道路毕竟是比较广阔了，因为农奴已不算是地主的直接私有物了。农奴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在自己那块土地上工作，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自己支配自己了，并且由于交换和贸易关系有更大的发展，农奴制日益解体，农民解放的机会也日益增多。农奴制社会总是比奴隶占有制社会更复杂。在农奴制社会中，工商业有很大发展，因此产生了资本主义关系。在中世纪，农奴制占居主要地位。当时的国家形式也不一样，也有君主制和共和制（虽然后者很不发达），但始终只有农奴主才算是统治者。农奴根本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无论在奴隶制或农奴制之下，不采取强制手段，极少数人是无法统治绝大多数人的。全部历史充满了被压迫阶级不断企图推翻压迫的事实。在奴隶制历史上有过长达几十年的奴隶解放战争。顺便说说，现在德国共产党人，即德国唯一真正反对资本主义桎梏的政党，取名为“斯巴达克”，就是因为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

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最后，这些奴隶有的惨遭屠杀，有的被俘虏，受到奴隶主的拷打。这种内战贯串着全部阶级社会史。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奴隶占有制时代发生的最大一次内战。在整个农奴制时代也经常发生农民起义。例如在中世纪的德国，地主和农奴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达到了很大的规模，变成了农民反对地主的内战。大家知道，在俄国也屡次发生过这种农民反对农奴主的起义。

地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关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的权力。这就是农奴制国家，这种国家，例如在俄国或者在至今还是农奴制占统治的十分落后的亚洲各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共和制，有的是君主制。国家实行君主制时，政权归一人掌握，实行共和制时，从地主当中选举出来的人多少可以参加政权。农奴制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农奴制社会中的阶级区分，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完全从属于占人口极少的地主。

由于贸易的发展，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结果分化出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资本产生于中世纪末期，当时世界贸易因发现美洲而得到极大的发展，贵金属的数量激增，金银成了交换工具，货币周转造成了巨量财富集中在一人手里的可能。全世界都认为金银是财富。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衰落下去，新阶级即资本家阶级的力量发展起来。结果社会被改造成这样：好像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以前那种分为奴隶主和奴隶的现象已经消灭；所有的人，不管是拥有多少资本或多少土地的人，或者是只有一双做工的

手的穷光蛋，都被认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法律对大家都同样保护，对人人的财产都加以保护，使其不受日益贫穷破产而变成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大众的侵犯。资本主义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

……这个社会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旧时的农奴制度。但这只是拥有财产的人的自由。当农奴制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被废除时(俄国晚于其他国家，在1861年才废除)，资本主义国家代替了农奴制国家，宣布它的口号是全体人民自由，说它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否认它是阶级的国家，于是为全体人民自由而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从此就展开了，现在这个斗争已经造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个斗争已经普及全世界了。

要了解已经开始的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要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质，必须记住，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自由的口号下反对农奴制国家的。农奴制的废除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获得自由，使他们得到好处，因为农奴制已受到破坏，农民已有可能占有土地了。至于农民究竟是占有他们赎买来的土地，还是占有他们按代役租制度取得的小块土地，国家是不管的：国家保护一切私有财产，不问其来历怎样，因为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民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内变成了私有者。在地主把一部分土地给予农民的时候，国家也保护私有财产，要农民用赎金购买这一部分土地，使地主得到补偿。国家宣称它保护全部私有权，并对私有权进行各种各样的帮助和袒护。国家承认每个商人、工业家和工厂主都有这种私有权。而这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以资本权力为基础的社会，以完全控制一切无产工人和劳动农民群众为基础的社会，却宣布自己是以自由为基础来实行统治的。它反对农奴制时，宣

布私有财产自由，深以国家不再是阶级的国家而自豪。

其实，国家仍然是帮助资本家控制贫苦农民和工人阶级的机器，但它在外表上是自由的。它宣布普选权，并且通过自己的拥护者、鼓吹者、学者和哲学家宣称它不是阶级的国家。甚至现在，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开始反对它的时候，这班人还责备我们破坏自由，说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一部分人强制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基础上的，而他们的国家却是全民的，民主的。所以现在，当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并且已在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时候，当反对全世界资本的斗争特别尖锐的时候，这个问题即国家问题就有了极大的意义，可以说，已经成为最迫切的问题，成为目前一切政治问题和一切政治争论的焦点了。

我们无论拿俄国或任何一个较为文明的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来看，都可以看到，几乎目前所有各种政治争论、分歧和意见，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一概念的。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在民主共和国特别是像瑞士或美国那样一些最自由最民主的共和国里，国家究竟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全民决定的总汇、民族意志的表现等等呢，还是使本国资本家能够维持其对工农的统治权力的机器呢？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政治争论所围绕着的根本问题……

我已经介绍你们阅读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这部著作里恰巧讲到，凡是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空头支票，丝毫也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

国家的统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这看资本用何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际上政权总是操在资本手里，不管有没有资格的限制或别种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

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本权力和一小撮百万富翁对全社会的统治表现得像美国那样横蛮，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贿赂风行（凡是在1905年以后到过那里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点）。资本既然存在，也就统治着全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

民主共和制和普选制同农奴制比较起来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为它们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有可能组成步伐整齐纪律严明的队伍去同资本进行有系统的斗争，农奴连稍微近似这点的东西也没有，奴隶就更不用说了。我们知道，奴隶举行过起义，进行过暴动，掀起过内战，但是他们始终未能造成自觉的多数，未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未能清楚地了解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甚至在历史上最革命的时机，还是往往成为统治阶级手下的小卒。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人类走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由于城市文化的发展，才使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可能认清自己的地位，掀起世界工人运动，在全世界上建立起包括千百万工人的政党，即自觉地领导群众斗争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议会制度，没有选举制度，工人阶级就不会有这样的进步。因此，这一切东西在广大群众的眼中具有很大的意义。因此，要来一个转变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不仅那些有意作伪的学者和神甫支持和维护资产阶级的谎言，说国家是自由的，说国家负有保护所有的人的利益的使命，就是许多诚心诚意重复陈腐偏见而不能了解从资本主义旧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也是如此。不仅直接依赖于资产阶级、受资本压迫或被资本收买的人（替资本服务的有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学者、艺术家和神甫等等），就是许多只是受资产

階級自由的偏見影響的人，也都在全世界攻擊布爾什維主義，因為蘇維埃共和國剛一成立就拋棄了這種資產階級謊言，公開聲明說：你們把你們的國家叫做自由國家，其實只要私有制存在，你們的國家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國家，也無非是資本家鎮壓工人的機器，而且國家愈自由，這種情形就愈明顯。歐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眾國就是如此。儘管這兩個國家是民主共和國，不管它們粉飾得怎樣漂亮，不管它們說什麼勞動民主和全體公民一律平等，但是，任何地方的資本統治都沒有像這兩個國家那樣無恥，那樣殘酷，那樣露骨。其實在瑞士和美國都是資本統治一切，只要工人企圖把自己的地位作稍微重大的改善，就立刻會引起內戰。在這兩個國家內，士兵較少，即常備軍較少（瑞士實行民警制，每個瑞士人的家裏都有槍；美國直到最近還沒有常備軍），因此，罷工發生時，資產階級就武裝起來，雇用士兵去鎮壓罷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對工人運動的鎮壓，都不如瑞士和美國那樣凶暴殘忍；在任何一國的議會里，資本的勢力都不如這兩個國家那樣強大。資本的勢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議會、選舉則不過是傀儡、木偶……但是愈往後，工人的眼睛就愈明亮，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就傳布得愈廣泛，尤其是在我們剛剛經歷過的這次流血的大戰以後。工人階級日益清楚地認識到必須同資本家作無情的鬥爭。

不管一個共和國用什麼形式掩飾起來，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國吧，如果它是資產階級共和國，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廠的私有制，私人資本把全社會置于僱傭奴隸的地位，換句話說，如果它不實現我們黨綱和蘇維埃憲法所宣布的那些東西，那末這個國家還是一部分人壓迫另一部分人的機器。我們要把這個機器拿到應該推翻資本權力的那個階級手里。我們要拋棄一切關於國家是普遍平等的陳腐偏見，因為這是一種騙局，因為只要剝削存在，

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人们迷信般地崇拜国家，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腐童话；无产阶级要把叫做国家的这个机器摒弃，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过来。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只有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一部分人挨饿的现象，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任何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观点。

尼古莱·列宁：工人管理国家和经济^①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制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一个阶段。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制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58—461页。

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对人们使用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制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摧毁、粉碎、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警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达到这样高度的民主,就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所有的人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所有的人”真正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而且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关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内立刻推翻资本家和官僚,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统计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统计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正

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做同等的工作，正确完成工作量，领取同等的报酬。资本主义使这种统计和监督变得非常简单，成为一种非常容易、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察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统计，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一小撮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安排好”监督的时候，任何管理都开始不需要了。民主制愈完备，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即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愈民主，则一切的国家开始消亡也愈快。

当大家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统计并对寄生虫、老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少数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

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这样,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尼古莱·列宁:论 1917 年革命的策略^①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对每个历史关头的阶级对比关系和具体特点,做出经得起客观检验的最确切的分析。我们布尔什维克总是努力执行这个要求,因为要对政策作科学的论证,这个要求是绝对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说,“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们公正地讥笑了只会背诵和简单重复“公式”的人们,说明公式至多只能指出**一般的**任务,而这些任务是必须随着历史过程中每个特殊阶段的**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改变的。

现在,革命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根据哪些确切肯定的客观事实来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呢?……

我指出“俄国目前时局的特点”就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因为我认为,这一时期的基本口号或“当前任务”就是:“工人们,你们在反对沙皇制度的国内战争中,显示了无产阶级的英雄主义奇迹,现在你们应该显示出无产阶级的和全民的组织的奇迹,准备在革命的第二阶段上取得胜利。”

^① 《论策略书》。《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3—35 页。

第一阶段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国家政权转入资产阶级手中。

在1917年2—3月革命以前，俄国的政权是在一个旧阶级即以尼古拉·罗曼诺夫为首的农奴主、贵族、地主的阶级手里。

这次革命后，政权转到了另一个新阶级即**资产阶级**手里。

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首要的基本的标志。

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经常会听到那些喜欢把自己称为“老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的喧嚷：难道我们不也是向来都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才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吗？难道土地革命这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吗？难道事实不正相反，土地革命不是还没有开始吗？

我回答说：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思想，**一般说来**，是由历史充分证实了的；但是事情的具体演变与任何人所能想像的不同，它要新奇得多，特殊得多，复杂得多。

忽略或忘记这一事实，就会同那些屡次在我党历史上起可悲作用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只是无谓地背诵记得**烂熟**的公式，而不去研究新的生动的现实的特点。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在俄国革命中已经实现了，因为这个“公式”所预见到的只是**阶级的对比关系**，而不是实现这种对比关系、这种合作的**具体政治机构**。“工兵代表苏维埃”，——这就是已由实际生活实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

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实际生活已经把它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

现在提到日程上的已是另一个新任务：使这个专政内部的无产阶级分子（反护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主张过渡到公社的分子）同小业主或小资产阶级分子（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社会革命党人等等革命护国派，他们反对走向公社，他们主张“支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实行分裂。

现在谁只是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他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因此，就应当把他送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古董保管库去（可以叫做“老布尔什维克”保管库）。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已经实现了，但是实现的方式非常奇特，有许多十分重大的改变。关于这些改变，我将在以后的一封信中专门谈到。现在必须弄清一个不容置辩的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和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

“我的朋友，理论是黯淡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

谁按旧方式提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问题，谁就是使活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死教条的牺牲品。

按照旧方式，结论是：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后，才可能是和应当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统治，他们的专政。

但是生动的实际生活中已经产生了另外一种情况，产生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有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现在同时并存的既有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李沃夫和占契柯夫的政

府)，又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后者自願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自願做资产阶级的附属品。

不要忘记，彼得堡的政权实际上是在工人和士兵的手里，新的政府沒有而且也无法对他们施加暴力，因为无论警察、脱离人民的军队或是威风凛凛地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吏，都不存在。这是事实。这种事实表现出巴黎公社型国家的特征。这种事实是旧公式包括不了的。应当善于使公式适应生活，而不是背诵一些早已失去意义的关于一般“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词句。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以便更清楚地说明它。

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离开分析阶级关系的正确立场。现在掌握政权的是资产阶级。而农民群众难道不也是另一阶层、另一类型、另一性质的资产者吗？为什么这一阶层不能取得政权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呢？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呢？

老布尔什维克往往是这样议论的。

我的回答是：这完全可能。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时局时，不应当从可能出发，而应当从现实出发。

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自由地选举出来的士兵和农民的代表，自由地加入了第二政府即附属政府，自由地补充、发展和改善了这个政府。但是，他们又同样自由地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这种现象丝毫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我们向来知道，并且屡次指出，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支持，不仅依靠暴力，而且依靠群众的不觉悟、守旧、闭塞和无组织。

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不顾事实，只谈“可能性”，简直是可笑的。

农民夺取全部土地和全部政权，这是可能的。我不仅沒有忘记这种可能，沒有把自己的眼界局限于今天，而且我在直接地确切

地表述土地纲领时还估计到一种新现象，即贫雇农和富裕农民之间发生了更深刻的分裂。

但是也有另一种可能：也许农民会听从社会革命党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的劝告；这种小资产阶级政党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转向护国主义，劝告人民等待召开立宪会议，虽然直到现在连召开的日期都还没有确定！

可能，农民会继续保持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协议，保持他们目前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同资产阶级成立的协议。

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忘记了土地运动和土地纲领，是极大的错误。但是忘记了**现实**，同样是极大的错误，因为现实向我们表明了资产阶级同农民**成立协议的事实**，用更确切的、少带法律性而多带经济和阶级意义的话来说，就是资产阶级同农民实行**阶级合作的事实**。

只有这一事实不再成为事实，只有农民脱离了资产阶级，夺取土地、夺取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只有那时，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阶段，这一点以后会专门谈到。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根据这个未来阶段的可能性，而忘记自己在农民同资产阶级**成立协议的现在**所负的责任，他是会变成小资产者的。因为他在实际上是鼓动无产阶级去**信任小资产阶级**（“它，这个小资产阶级，这些农民，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内，就会同资产阶级分开**”）……

我们上面所假设的这种**人**，很像甜蜜蜜的路易·勃朗和软绵绵的考茨基派，决不像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

我在提纲中非常肯定地说，必须在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为了避免发生任何怀疑，我在提纲中**两次**

着重指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持不懈的、“**适合群众实际需要**”的“解释”工作。

愚昧无知的人或普列汉诺夫先生这类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可以高喊什么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但是，谁只要愿意思索和学习，谁就不能不知道，布朗基主义是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却明明是**大多数人民的公开的直接的**组织。在这些苏维埃**内部**扩大影响，不会而且绝对不会滚到布朗基主义的泥潭中去。这样做，也不会滚到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中去，因为无政府主义否认在从资产阶级统治到无产阶级统治的**过渡时期有国家和国家政权的必要**。而我则用丝毫不会引起误会的明确态度，**坚决主张**在这个时期要有国家，不过根据马克思的意见和巴黎公社的经验，这种国家不是寻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而是**没有常备军、没有同人民对立的警察、没有站在人民头上的官僚**的国家。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尤·加米涅夫同志在《真理报》第27号上的一篇短评中，是怎样表述他同我的提纲和上述意见的“分歧”的。这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地了解这些提纲和观点。

加米涅夫同志写道：“至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我们是不能采纳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承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里有两个很大的错误：

第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问题提得不正确。这样提问是抽象地、简单地、单色地（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提问题，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谁这样提问题，谁现在只是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否已经完成”，谁就无法了解极其复杂的至少是“两色”的现实。这是从理论上说。而在实践上，他就是束手无策地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投降。

实际上，现实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政权转到了资产阶级手中（普通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另一方面，除了这一政府外，还存在着一个附属政府，它就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后一个“也是政府”，自己把政权让给资产阶级，自己使自己依附于资产阶级政府。

加米涅夫同志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一老布尔什维克的公式，有没有包括这种现实呢？

没有。这个公式已经过时了，已经完全不适用了，已经僵死了。要努力使它复活是徒劳无益的。

第二、这是一个实际问题。我们不知道，现在在俄国是否还能建立一个特别的、脱离资产阶级政府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是不能建筑在不可知的基础上的。

如果这样的专政还可能实现，那末，走向这种专政的路只有一条，就是立刻坚决地彻底地使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开。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小资产阶级已不是偶然地而是不可避免地转向了沙文主义（=护国主义），“支持”资产阶级，依赖资产阶级，害怕离开资产阶级等等。

如果这个小资产阶级现在已经能够夺取政权，但它不愿意夺取，那末应当怎样“推动”它去夺取政权呢？

只有使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分离出来，摆脱这些小资产者的畏缩心理，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者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并团结起来，才能使小资产阶级觉得脚下发“烫”，不得不在一定条件下去夺取政权……

谁现在就能迅速而彻底地使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即无

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开,谁在下述两种可能情况下都是正确地反映了运动的利益,一种情况是俄国还会出现一个特别的、独立的、不依赖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一种情况是小资产阶级不能摆脱资产阶级,永远(直至社会主义到来)摇摆于我们和资产阶级之间。

谁只是根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没有完成”这个简单公式来行动,谁就似乎是担保小资产阶级一定能够脱离资产阶级而独立,谁就是在目前束手无策地向小资产阶级投降。

附带谈一下,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的“公式”,不妨回忆一下我在《两种策略》(1905年7月)中特别强调的一段话: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过去和未来。它的过去就是专制制度、农奴制度、君主制度、特权制度……它的未来就是反对私有制的斗争,雇佣工人反对业主的斗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加米涅夫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到了1917年,还只看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过去。而实际上,这个专政的未来已经到来,因为雇佣工人和小业主的利益与政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分裂,并且是在“护国主义”、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

现在我来谈谈加米涅夫同志上述议论中的第二个错误。他责备我,说我的公式“指望这个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这是不对的。我非但没有“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公开警告过别人,反对过这种意见,我在提纲的第八条中公开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

谁指望我们的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谁就不会起来反对实行社会主义的直接任务，这不是很明显吗？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俄国建立“公社国家”（按照巴黎公社类型建立起来的国家），也不能“立刻”办到，因为这需要所有（或大多数）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代表，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党人、齐赫泽、策烈铁里、斯切克洛夫等人的策略和政策的全部错误与害处。而我十分明确地声明过，我在这方面只“指望”“耐心的”解释（如果要实行“立刻”就能实行的转变，还用得着耐心吗？）！

加米涅夫同志有点“不耐烦”地挥舞着拳头，重复资产阶级对巴黎公社的偏见，似乎巴黎公社想“立刻”实行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这样。可惜的是公社把实行社会主义过于推迟了。公社的真实本质并不是资产者通常所寻求的那种东西，而是它创立了特殊类型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俄国已经产生，这就是工兵代表苏维埃！

加米涅夫同志不去仔细考虑事实，考虑现存的苏维埃的意义，考虑苏维埃在类型上、社会政治性质上同巴黎公社国家的一致，他不去研究事实，却说我似乎在“指望”“立刻”就会实现的东西。很遗憾，他只是重复许多资产者的伎俩：对于迫切的、现实的、实际生活提出来的问题，如**什么是工兵代表苏维埃**，它是否**高过**议会制共和国，它是否**更有益于**人民，是否**更民主**，是否**更有利于斗争**（例如同歉收作斗争）等等抛开不谈，只是注意“指望立刻转变”这种空洞的、好像科学的而实际上毫无内容的、大学教授式的死问题。

这是一个空洞的虚构的问题。我所“指望”的**只是、纯粹是**：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处理增加粮食生产、改善分配、改善士兵给养等等**实际**困难问题上，要比官僚和警察高明得多。

我深信，工兵代表苏维埃比议会制共和国会更快地更好地发

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关于这两种类型国家的比较,在另一封信里还要详细谈到)。它们会更好地、更实际地、更正确地决定应当实行哪些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步骤,应当怎样实行这些步骤。对银行实行监督,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但这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今天,德国的地主和资产者正在采取这种步骤来对付人民。明天,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获得全部政权,它就会更好地采取这种步骤来为人民谋福利。

什么东西迫使我们采取这种步骤呢?

是饥荒,经济破坏,即将临头的破产,战争的惨祸,以及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惨痛的创伤。

加米涅夫同志在他的短评的末尾声明:“在广泛的争论中,他希望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只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希望和一定要始终是革命无产阶级群众的党,而不变成共产主义宣传员的小团体,就只有采取他这种观点。”

我认为,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他对时局的估计是非常错误的。加米涅夫同志把“群众的党”和“宣传员的小团体”对立起来。但是要知道,“群众”现在正好卷入“革命”护国主义的狂热里了。在这种时候,一个国际主义者能够抵抗“群众的”狂热,不是比“希望”同群众“在一起”,比共同卷入狂热,要更体面些吗?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在欧洲各交战国里,沙文主义者不也是借口要“同群众在一起”来为自己辩护吗?难道不应该在一定时期内站在少数地位来反对“群众的”狂热吗?为了把无产阶级的路线从“群众的”护国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中解脱出来,宣传员的工作不正好是目前的中心工作吗?把无产阶级群众和非无产阶级群众混在一起,不分析群众内部的阶级差别,这正是造成护国主义狂热的条件之一。轻蔑地谈论无产阶级路线的“宣传员的小团体”,恐怕不太

妥当吧。

尼古莱·列宁：俄国和欧洲的革命前景^①

我们应当简单地谈一下我们对俄国革命的任务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尤其是因为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通过瑞士工人向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工人讲几句话，这些国家的工人同瑞士人民讲一样的语言，同时瑞士人民直到现在一直享受着和平和相当多的政治自由……

俄国无产阶级十分荣幸地**开始了**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引起的一系列的革命。但是那种认为俄国无产阶级是各国工人中间最优秀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想法，同我们是毫不相干的。我们清楚地知道，俄国无产阶级的组织性、修养和觉悟程度都**不及**其他国家的工人。并不是特殊的品质而是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俄国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可能是很短暂的时期内**成为全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

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由于贵族地主还保持着大量土地，由于有了1905年的经验，俄国这个国家的农民性质**能够**使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巨大的规模，而把我国革命变成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变成进到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级**阶梯**。

这些思想已经被1905年的经验和1917年春季的事变证实了。我们党就是在争取实现这种思想、不调和地反对其他一切政

^① 《给瑞士工人的告别信》。《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7、380—381、382、383页。

党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后还要为实现这种思想而奋斗。

社会主义在俄国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农民群众能够彻底实行不可避免的、条件已经具备了的土地改革，直到没收地主的数量极大的全部地产。我们过去曾多次提出这个口号，现在我们党的中央和我们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也在彼得堡提出了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将为实现这个口号而斗争，同时它决不忽视农业雇佣工人以及赞助他们的贫苦农民同斯托雷平（1907—1914年）土地“改革”后力量更加强大的富裕农民发生激烈的阶级冲突的必然性。决不能忘记，一百零四个农民代表既在第一届杜马（1906年）也在第二届杜马（1907年）提出了革命的土地法草案，要求把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并且把这些土地交给按彻底的民主制原则选出的地方委员会掌握。

这种变革按其本质来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它会极其有力地推动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它会大大巩固俄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阵地及其对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影响。它会使城市无产阶级能够依靠这种影响发展“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样的革命组织，用它们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旧的压迫工具——军队、警察、官僚，并实施（在帝国主义战争和战争后果这个无比沉重的担子的压力下不得不实施）一系列革命措施来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监督。

俄国无产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不能胜利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但它能使俄国革命具有很大的规模，为社会主义革命造成极好的条件，并在某种意义上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它能使自己主要的、最忠实的、最可靠的同伴——欧洲和美洲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易于进入决战……

帝国主义战争的客观条件，保证了革命不会局限于俄国革命

的第一阶段，不会局限于俄国这一个国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正在成为事实。

正在开始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万岁！

尼古莱·列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合作社^①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制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实行没有，其实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制在我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含有很多幻想。他们的幻想常常是可笑的。究竟他们的幻想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不懂得工人阶级为推翻剥削者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根本意义。现在，我国已经推翻了剥削者的统治，因此，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理想中许多曾经是幻想的、甚至是浪漫的或庸俗的东西，已经成为毫无粉饰的现实了。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有居民的合作化了。那些确信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进行斗争等等的人曾合理地嘲笑、讥讽和蔑视过社会主义，而这个社会主义，现在，在使居民尽量合作化的情况下，自然就能达到目的了。但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明了，使俄国居民合作化现在对我们有多么巨大的、不可限量的意义。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实际上，在新经济政策时

^① 《论合作制》。《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2—430页。

期,使俄国居民充分广泛而深入地合作化,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私人利益、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尺度,找到了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尺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解决不了的难题。的确,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权力,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最小农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等等,难道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难道这不是我们通过合作社,而且仅仅通过合作社,通过我们从前鄙视为买卖机关,并且现时在新经济政策下我们从某一方面也有理由加以鄙视的合作社来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一切吗?这还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这已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而且足够的一切。

我们许多作实际工作的人所估计不足的正是这一情况。在我国,人们还轻视合作社,还不了解:第一、在原则方面(生产资料所有权操在国家手中),第二、在采用尽可能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方面,这种合作社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要知道这一点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种种工人联合来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回事;学会实际建设社会主义而使所有小农都能参加这项建设,又是一回事。我们现在达到的就是这段阶梯。毫无疑问,我们虽然达到了这段阶梯,却绝少利用它。

我们转入新经济政策时作得过火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过分重视自由工商业的原则,而在于我们完全忘记了合作制,在于我们现在对合作制仍然估计不足,在于我们已经开始忘记合作制在上述两方面的巨大意义。

我现在想跟读者谈一谈,从这“合作制”原则出发,此刻在实践

上可以而且应当作到的是些什么事情。为使每个人都明白“合作制”原则的社会主义意义，此刻可以而且应当用些什么手段来着手推广这一原则。

在政策上要这样对待合作社，就是使它不仅能一般地、经常地享受一定的优待，而且要使这种优待成为纯粹资财上的优待（如银行利息的高低等等）。贷给合作社的国家资金，应该比贷给私人企业的多些（即使稍微多一点也好），甚至和拨给重工业等等的一样。

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不待说，“自由”资本主义的诞生曾花了许多万万卢布。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社会制度就是合作制度，这一点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并使它实现。但是支持合作社就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支持，就是说，把这种支持仅仅了解为支持任何一种合作社的周转是不够的，而应该了解为支持**确实有真正民众参加**的合作社的周转。奖励参加合作社周转的农民，这种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同时应当检查农民参加的情形，检查他们参加的自觉性和诚意，——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合作社工作者到村子里来开设合作商店的时候，严格地说，居民是并不参加合作社买卖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尝试一下。

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面。为了使全体居民个个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须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是很少的一些工作。实在说，我们需要作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了解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把参加合作社的工作作好。“**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仅有的这一件事，就必须实行全盘的改革，必须让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方面经历整个

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的准则应该是：尽量少卖聪明，尽量少耍花样。在这一方面，新经济政策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恰恰适合于最普通的农民的水平，它并没有向他们提出丝毫更高的要求。但是，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作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理解能力，没有充分教会居民利用书报，没有这一切物质基础，没有相当的保障，如防荒、防饥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善于把我们已经充分表现出来而且获得了完满结果的革命胆略和革命热忱与（这里我几乎敢于说）作一个干练而又有知识的商人的本领（有了这种本领就足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合作社工作者）结合起来。所谓作商人的本领是指作文明商人的本领。这一点是俄国人，或者直截了当说是农民应该牢牢记住的，他们以为一个人既然作买卖，就有本领作商人。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对的。他虽然在作买卖，但作买卖距离有文明商人的本领还远得很。他现在是按亚洲方式作买卖，但是为了善于作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作买卖。他要作到这一点，还需要一整个时代。

现在结束我的话：在经济、财政、银行方面给合作社以种种优先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对组织居民的新原则采取这样的支持。但这里提出的还只是一般性的任务，因为在实践上这一任务的全部内容还没有确定，还没有详细规划出来，也就是说，应该善于找出我们对合作化的“奖励”方式（和奖励条件），找出我们能用来充分帮助合作社的奖励方式，找出我们能用来培养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奖励方式。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

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每当我写到新经济政策问题时，我总要引我1918年那篇论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这曾不止一次地引起某些青年同志的怀疑。但他们的怀疑主要是在抽象的政治方面。

他们觉得，生产资料属于工人阶级，国家政权也属于这工人阶级，这样的制度就不能叫作国家资本主义。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所以用“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第一**、是为了确定我们现在的立场同我在与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的立场之间的历史上的联系，并且那时我就屡次证明，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时的经济制度；我很重视确定普通的国家资本主义同我在帮助读者认识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那种特别的、甚至非常特别的国家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性的联系。**第二**、我一向很重视实际目的。而我国新经济政策的实际目的就是要采用租让制；在我国条件下，租让制无疑就是纯粹的国家资本主义。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看法就是这样。

不过还有事情的另一方面，在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国家资本主义或至少能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拟的东西。这就是合作制问题。

毫无疑问，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具体经济情况下，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社会主义式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产生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

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既是私人企业，又是集体企业。在我国现存制度下，合作企业与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是集体企业，但它与社会主义企业没有区别，因为它占用的土地和使用的生产资料是属于国家即属于工人阶级的。

我们有人谈论合作社时，对于这一情况估计不足。他们常常忘记，由于我们国家制度的特殊，我国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如果把租让制（顺便说一句，租让制在我国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单独划开，那末在我国的条件下合作制是同社会主义完全一致的。

现在来说明我的看法。为什么说自罗伯特·欧文以来所有的旧日合作社提倡者的计划都是幻想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估计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的阶级统治这样的根本问题，而幻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这种“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当作彻头彻尾的幻想，把以为只要实行居民合作化就能使阶级敌人转变为阶级朋友、使阶级战争转变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幻想，当作浪漫主义的，甚至庸俗的东西。

从当前的基本任务看来，我们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

但是你们看，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除工人国家暂时有条件地自愿租给剥削者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外）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现在情况就大变了。

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在我国，单是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只有上述一点“小小的”例外）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

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已经转到和平组织“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假如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在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斗争，我可以说，我们是应当把重心转移到文化建设方面的。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末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是转向文化建设了。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受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其经济目的就是合作化。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站稳了。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说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竟在文化变革，即文化革命之前先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可是，现在我们还是要进行文化革命。

现在，只要实现了这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此项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非常困难的。

尼古莱·列宁：工人委员会和民警^①

……二三月革命只不过是革命的第一阶段。俄国目前正处在过渡到革命的下一阶段，或者如斯柯别列夫所说的“第二次革命”的特殊的历史时期。

如果我们要作马克思主义者，要学习世界各国革命的经验，我们就应当竭力了解，这个过渡时期的特点究竟何在，从这些客观特点中要得出什么样的策略。

时局的特点在于，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异常容易地取得了第一次胜利，最主要的原因有三：（1）英法财政资本及其走狗的帮助；（2）一部分高级军官的帮助；（3）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在城乡机关中，在国家杜马及军事工业委员会等机构中都有现成的组织。

古契柯夫政府处于前后夹攻之中：受到资本的利益的约束，它不能不倾向于继续进行掠夺性的强盗战争，保护资本和地主的巨额利润和恢复君主制度。受到自己的革命的起源和从沙皇制度急剧过渡到民主制的必然性的约束，受到忍饥挨饿的、渴望和平的群众的压力，它不能不进行欺骗，支吾搪塞，拖延时间，“宣布”和保证（保证在物价高涨时期也是唯一便宜的东西）尽量多些，兑现则尽最少些，它一只手拿出了让步，另一只手又收回让步。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对新政府最理想的情况下，它依靠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界的组织才能，能够使崩溃的日子迟一点到来。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它仍旧没有力量摆脱崩溃的命运，因为不抛弃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不转到革命的措施上去，不

^① 《远方来信》。《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30—340页。

依靠俄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宏伟的有历史意义的英雄气概，那是不能从全世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战争和饥荒这个可怕的妖怪的魔爪中挣脱出来的。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用一次打击是推翻不了新政府的，或者即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在革命时期可能性的限度扩大了千百倍），但是我们如果不能使领导全体城乡广大贫苦群众、半无产阶级和小业主的无产阶级具有象整个俄国资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界那样出色的組織的话，那我们也是不能够保持住政权的。

不管在彼得堡是否已经爆发“第二次革命”（我已经说过，认为在国外能够估计出革命成熟的具体速度的想法是荒谬的），或者这次革命推迟了一段时间，或者它在俄国某些地区已经爆发（这一点已经可以看到某些迹象），不管在何种情况下，在新的革命的前夜也好，在它爆发的当天也好，在爆发后的第二天也好，口号都是无产阶级組織起来。

工人同志们！你们昨天在推翻沙皇君主制度时，曾经表现了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的奇迹。在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在推翻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地主资本家的政权时，也一定会再次表现出这种英雄气概来。但是你们如果不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組織性的奇迹，你们就不可能在这个下一次“真正的”革命中取得巩固的胜利！

目前的口号就是组织起来。但是局限于这一点，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方面，组织起来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也就是说，光是指出必须“组织群众”，还是不能说明问题；另一方面，谁局限于这一点，谁就只是自由派的应声虫，因为自由派正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所以希望工人不超过一般的“合法的”（从“正常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观点来看）组织，也就是希望工人仅仅报名

加入自己的党、自己的工会、自己的合作社等等。

工人根据自己的阶级本能懂得，在革命时期，他们不仅需要一般的组织，而且需要与此完全不同的组织，他们正确地走上了1905年我国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建立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并且吸引士兵代表、农村雇佣工人代表以至（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全体贫苦农民代表参加苏维埃，从而发展、扩大和加强苏维埃。

在全俄各地为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或者用经济上不大确切但却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为全体劳动者和被剥削者建立这一类组织，这是我们当前首要的、不可延缓的任务。我在这里先提一下，对于全体农民群众，我们党（关于它在新型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特殊作用，我希望在以后的信中谈一谈）应当特别建议成立同富裕农民分立的单独的雇佣工人以至于不出售粮食的小农的苏维埃，因为离开这个条件，就根本谈不上执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政策^①，同时也不可能正确地解决关系到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极重要问题，即正确地分配粮食和扩大粮食生产等问题。

那末请问，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于1915年10月13日在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7号上曾经写道，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看成是起义的机关，是革命政权机关”。

这个从1871年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引伸出来的理论原理，应当在正是对俄国这一次革命的这一阶段给以具体指示的基础上加以阐明和具体发展。

^① 在农村中现在已经展开争夺小农和一部分中农的斗争。地主在富裕农民的帮助下，引导他们跟资产阶级走。我们应当在农村雇佣工人和贫农的帮助下，引导他们同城市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我们需要革命的政权，我们需要（在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国家。这是我们区别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地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我们主张集中的、共产主义的大生产，他们主张分散的小生产。不，这种区别恰恰表现在政权和国家的问题上，我们主张革命地运用革命的国家形式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无政府主义者却加以反对。

我们需要国家。但我们需要的不是资产阶级到处建立起来的那种国家，从君主立宪起直到最民主的共和国为止。这也是我们同陈旧的、开始腐烂的社会党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分子之间的区别，他们歪曲了或者忘记了巴黎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教训的分析。

我们需要国家，但不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那种国家，因为它的权力机关如警察、军队、官僚是同人民分离并且同人民相对立的。一切资产阶级革命只不过改善了这架国家机器，只不过把它从这个党的手中交给另一个党的手中。

而无产阶级如果想要保卫这次革命的成果和继续前进，取得和平、面包和自由，那就应当“打碎”（马克思的用语）这架“现成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使警察、军队和官吏同全民武装融为一体。沿着 1871 年巴黎公社和 1905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无产阶级，应当把一切最贫苦的、被剥削的人民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使他们自己能够把政权机关直接控制起来，自己组织起这种政权机关。

俄国工人在第一次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在 1917 年 2 月—3 月，就已经走上这条道路了。目前的全部任务就是清楚地了解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就是勇敢地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

英法和俄国的资本家要做的“仅仅”是撤换，甚至是“吓唬一下”尼古拉二世，而根本不触犯旧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和官僚。

但是工人往前走得更远了，他们打碎了这架机器。现在，不仅英法资本家，而且连德国资本家，例如在看到俄国士兵是怎样地枪杀自己的长官，并且连拥护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涅彼宁海军上将也不放过时，都因为又恨又怕而**暴跳如雷**。

我上面说，工人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确切一些说：**开始打碎**这架机器。

我们拿一个具体例子来看。

在彼得堡和其他许多地方，警察一部分遭到了歼灭，另一部分则被解散。警察是一种同人民分离的、同人民对立的特种组织，它由听命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分子组成。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如果不**恢复警察**，它不仅不能恢复君主制度，而且会连政权也保持不住。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情。

另一方面，新政府必须重视革命的人民，用小让步和许诺来蒙骗他们，拖延时间。所以它采取了不彻底的办法：它在建立“人民的民警”和由选举产生的权力机关（这说起来真是太好听了！真是太民主、太革命、太漂亮了！）——**但是……但是**，第一、把人民的民警置于城乡自治机关即根据暴君尼古拉和刽子手斯托雷平的法律选举出来的地主资本家的监督和指挥之下；第二、在民警之前冠以“人民”的字眼，其目的无非是在“人民”眼中撒灰，它**实际上并没有号召人民个个参加这种民警，也不责成业主和资本家给那些参加社会服务即参加民警的职工照发工资。**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的地主资本家政府就是采取这种办法，使“人民的民警”始终是纸上谈兵，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的反人民的民警却在鬼鬼祟祟地逐渐复活**，首先是

由“八千个大学生和教授”组成(外国报纸这样描写目前彼得堡的民警)——这显然是玩具!——然后逐步地由旧的和新的警察组成。

不要让警察复活! 不要把地方政权交出去! 建立一支真正全民的、人人普遍参加的、受无产阶级领导的民警! 这就是当前的任务和当前的口号, 这个任务和口号既符合正确反映了的未来阶级斗争及未来革命运动的利益, 又符合任何工人、农民、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爱好民主的本能, 他们对于警察、乡警、巡官以及地主资本家对这些武装分子的指挥权, 是不能不切齿痛恨的, 因为地主资本家指挥下的这些武装分子一贯对人民作威作福。

他们, 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之流, 地主和资本家, 需要什么样的警察呢? 他们需要的正是沙皇君主制度时代的那种警察。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非常短暂的革命时期过去以后建立或者恢复起来的, 正是这样一种警察, 它是同人民分离的、同人民对立的、这样或那样地服从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分子的特种组织。

我们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者需要什么样的民警呢? 我们需要真正人民的民警, 也就是说, 第一、它是由全体人民、由两性全体成年公民组成的, 第二、它把人民军队的职能同警察的职能、同国家秩序和国家管理的主要的和基本的机关的职能结合起来。

为了把这些道理讲得更明白些, 我举一个非常简略的例子。自然, 如果有人以为能够拟订一个建立无产阶级民警的“计划”, 那是很荒唐的, 因为当工人和全体人民真正群众性地行动起来的时候, 他们所拟订的计划和所作的安排, 一定比任何理论家高明百倍。我并不是提出一个“计划”, 而只是举这一例子说明我的想法。

彼得堡约有二百万居民。其中一半以上是从十五岁到六十五岁的人。我们如果以一半计算，就有一百万人。从这里即使减去四分之一的病人或者有其他原因目前没有参加社会服务的人，剩下的还有七十五万人，假定每天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在民警队服务（同时仍从业主那里领取工资），那就可以组成一支五万人的军队。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国家”！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民警，只有它才是实际上的而不是仅仅口头上的“人民的民警”。

这就是我们应当走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才能制止任何特种警察、任何同人民分离的特种军队的死灰复燃。

这种民警既然百分之九十五是工人和农民，它就能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理智和意志、力量和权力。这种民警将把全体人民武装起来，教他们学习军事技术，保证（非古契柯夫式地、非米留可夫式地）能够击破恢复反动统治的任何企图和沙皇走狗们的任何阴谋诡计。这种民警将成为“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执行机关，它将获得人民绝对的尊敬和信任，因为它本身就是全体人民的组织。这种民警将使民主不再是掩盖资本家奴役和嘲弄人民的漂亮招牌，而成为真正地培养群众参加一切国家事务的措施。这种民警把少年男女吸引来参加政治生活，使他们不仅受到教育，而且受到工作的锻炼。这种民警将发挥学者们所说的“福利警察”的作用，如进行卫生监督等等，可以吸收一切成年妇女参加此类工作。不吸收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参加民警、参加政治生活，不使妇女从使她们愈来愈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中走出来，那就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不能建成民主，更不必说建成社会主义了。

这种民警将成为无产阶级的民警，因为工业工人和城市工人

将自然而然地在这种民警中对贫苦群众起决定性的影响，正象他们自然而然地在 1905—1907 年和 1917 年整个人民革命斗争中处于领导地位一样。

这种民警将保证绝对的秩序和严格遵守的同志纪律。同时，在一切交战国都遭遇到的严重的危机中，它使我们有可能用真正民主的方式同这种危机进行斗争，正确地迅速地实行粮食及其他物资的分配制度和贯彻“普遍劳动义务制”，这种制度现在法国人把它叫作“公民动员制”，德国人把它叫作“公民义务服务制”，不这样做，就不可能——事实表明确实不可能——医治万恶的掠夺性战争所已经造成和正在造成的创伤。

难道俄国无产阶级流下自己的鲜血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些关于实行政治民主改良的好听诺言吗？难道他们不是在要求和争取使每个劳动者立刻看到和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所改善吗？不是使每个家庭都有面包可吃吗？不是使每个小孩都能得到一瓶好牛奶吗？不是使任何有钱人家的大人在小孩的需要得不到保证时，都不敢多拿牛奶吗？不是使沙皇和贵族遗留下来的宫廷和富丽堂皇的住宅不要闲置不用而要开设济贫院吗？而这许多措施，除了有妇女与男子平等参加的全民警以外，又有谁能实行呢？

这些措施还不是社会主义。它们涉及消费品的分配，而不涉及生产的改组。它们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目前的任务不在于理论上把它们划归哪一类。假使我们削足适履地拿狭隘了解的“理论”来硬套复杂的、迫切的、迅速发展着的实际革命任务，而不把理论看作首先是、最主要是行动的指南，那就大错特错了。

俄国工人在直接的革命斗争中曾经表现出了勇敢、主动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奇迹，而现在他们是否有足够的觉悟、坚忍性和英雄

气概能表现出“无产阶级组织性的奇迹”来呢？这一点我们是不知道的，对这一点加以猜测也是一件没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只有实际生活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所确实知道并且作为一个政党我们应当告诉群众的是，现在世界上有一架力量非常巨大的历史发动机，它产生了空前未闻的危机、饥荒和无数的灾难。这架发动机就是战争，进行这场战争的，从交战双方的资本家来说，都是为了达到强盗的掠夺目的。这架“发动机”把许多最富裕、最自由和最文明的国家推到了毁灭的边缘。它迫使各国人民把最后一点力量都拿出来，使他们陷入了不可忍受的境况，它使当前的任务不是实现某种“理论”（这是谈不上的，马克思就曾经经常要社会主义者提防这种幻想），而是实施最极端的、实际可行的措施，因为不采取极端的措施，千百万人就会立即活活地饿死。

当客观形势要求全体人民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先进阶级的革命热情能够做很多很多事情，这一点是用不着加以论证的。在俄国，大家对事情的这个方面都是亲眼看到和亲身感触到的。

重要的是懂得，在革命时期，生活象激流一般，客观形势迅速地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在每一个时期，我们应当善于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策略和当前的任务。在1917年2月以前，任务是勇敢地进行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宣传，号召群众起来斗争，唤起群众。在二三月的日子里，形势要求我们英勇地忘我地进行斗争，立刻打倒最近的敌人——沙皇制度。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过渡时期，我们正在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从同沙皇制度“搏斗”过渡到同古契柯夫—米留可夫的、地主资本家的帝国主义“搏斗”。摆在当前日程上的是一项组织的任务，但是，也不能把这项任务刻板地了解成仅仅建立千篇一律的各种组织，而应当理解

为吸引空前广泛的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到组织中来，并且由这个组织执行军事的、行政的、国民经济的任务。

无产阶级通过不同的道路来完成这个特殊任务。在俄国的一些地方，二三月革命已经几乎把全部政权交到无产阶级手中，在另一些地方，他们可能要通过“强力的”手段建立和扩大无产阶级民警，而在第三类地方，他们大概会争取立刻根据普遍的……选举法举行城市杜马和地方自治局的选举，以便当无产阶级组织性还不够强，士兵和工人的关系还不够密切，农民运动还不够开展，大多数人对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的军事帝国主义政府还没有完全失望，因而以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政府”代替这个政府的时机尚未到来的时候，在那里建立起革命中心等。

我们也不会忘记，在彼得堡附近有一个实际上很先进的共和政体的国家，这就是芬兰，从1905年到1917年，芬兰在俄国革命战斗掩护下，比较和平地发展了民主制度，在那里，多数人民已经转到社会主义这一边。俄国无产阶级保证芬兰共和国有充分的自由，直到分立的自由（现在未必还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对这一点有所怀疑了，而立宪民主党人罗迪切夫却在赫尔辛福斯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他为大俄罗斯人争取某些特权的交易），正因为这样，俄国无产阶级赢得了芬兰工人的完全信任及其对全俄无产阶级事业的同志式的帮助。在困难的巨大的事业中，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芬兰工人是优秀的组织家，他们将在这方面帮助我们，他们将按自己的方式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作。

俄国国内革命的胜利，——芬兰在这种胜利的掩护下在和平的组织工作上取得成就，——俄国工人在新的规模上转入革命的组织任务，——无产阶级和贫苦居民阶层夺取政权，——鼓励和发

展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我们走向和平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尼古莱·列宁：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①

社会变革不能是各国无产者的一致行动，理由很简单，就是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开始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不是各国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才会用联合的行动实现社会主义。正因为皮·基也夫斯基不懂这个道理，他才犯了错误。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性早已消失不见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性，确立阶级共同性。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我们提纲第6节）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这些民族在客观上还具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

恩格斯曾拿印度作为这些民族的范例，他指出，印度可能完全反对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因为恩格斯同可笑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大不相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认为，在先进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不必采取一定的民主措施，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除各个地方的民族压迫。无产阶级在哪些国家取得了胜利，就会

^① 《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53—54页。

改造那些国家。但是,这种改造不能一下子实现,并且“战胜”资产阶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

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击退资产阶级反革命企图的时候,不发达的和被压迫的民族决不会袖手等待,决不会停止生活和消逝不见。既然它们连 1915—1916 年战争,连这同社会革命比较起来不过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一次很小很小的危机也利用来发动起义(各殖民地、爱尔兰),那末毫无疑问,它们就更会利用各先进国家的国内战争这种大危机来发动起义。

社会革命只能在各先进国无产阶级为反对资产阶级而进行的国内战争已经同不发达的、落后的和被压迫的民族所掀起的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的时代中进行。

为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平衡,而客观现实又告诉我们,除了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民族之外,还有许多很弱小和经济十分不发达的民族……

列夫·托洛茨基:俄国历史的不平衡发展和混合发展规律^①

一个落后国家往往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思想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一定要盲目地仿效先进国家,重复它们经历过的一切阶段。维科^②及其现代信徒所持的历史循环论,只是在观察前资本主义旧文明轨迹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另一部分

^① 《俄国革命史》(The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 1 卷,纽约 1932 年版,第 4—9 页。

^② 乔·巴·维科(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译者

依据也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情况。事实上，某些文明阶段所以会在新的地区重复出现，这是同当时整个发展过程所具有的地方性及偶然性分不开的。但资本主义却意味着这些局限性的被消除。资本主义为人类的普遍和持久发展准备了条件，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实现了这一点。这样，不同的国家就决不可能再重复相同的发展方式。落后国家虽然不得不效法先进国家，却不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前进的。历史落后性的特权——这样一种特权确实存在着——往往允许，或者不如说是强迫人们跳过一系列中间阶段，不待发展成熟就提前把一切现成的东西都接受下来。野蛮人扔掉了弓箭直接改用步枪，并不需要再去经历从前者演进到后者的那段漫长过程。美洲大陆的欧洲殖民者也没有把历史从头再演一遍。德国和美国今天所以能在经济上赶上英国，正是由于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比英国来得晚。另一方面，英国煤炭工业中的保守和无政府状态——麦克唐纳及其伙伴的头脑也是如此——则是为英国资本主义披荆斩棘的长期历史所付的代价。历史地位落后的国家在向前发展时，必然要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奇特地结合起来。它们的发展整个说来具有一种无计划的、复杂的和混合的性质。

跳过中间阶段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绝对的。其程度大小从长远来说要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和文化能力。而且，落后国家在借用外来成就的过程中，为了使它们适应于本国较原始的文化，往往败坏了这些成就。在这方面，吸收过程本身就具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性质。譬如说，西方的某些技术和训练因素，特别是军事和工业因素，在彼得大帝时代反而导致了农奴制这一基本劳动组织形式的加强。欧洲的军备和欧洲的贷款——它们是一种更高级文化的确凿无疑的产物——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加强，而沙皇制度反过来又

妨碍了俄国的发展。

历史规律学家们臆造的图式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发展的最普遍的规律即不平衡规律，在落后国家的命运中最尖锐、最复杂地表现了出来。在外部需要的推动下，它们的落后文化不得不跳跃前进。这样，从发展不平衡的普遍规律中又产生出另一条规律，我们姑且称之为**混合发展规律**——它意味着把历史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合并了起来，它是若干步骤的结合，是古老形态和现代形态的混合物。没有这条规律（当然要结合它的整个物质背景来考虑），就不可能理解俄国的历史，事实上也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二等、三等或十等文明国家的历史。

在富裕欧洲的压力下，俄罗斯国家以远大于西方的比例吞噬了人民的财富，从而不仅使人民加倍地贫困，而且削弱了有产阶级的基础。同时，由于需要有后者的支持，它又不得不以强迫性的组织手段来推动它们的发展。因此，官僚化的特权阶级始终没有能够充分地成长起来，这也就使得俄罗斯国家愈加接近于亚细亚专制主义。莫斯科公国的沙皇十六世纪初正式建立的拜占庭式专制政权，在一般贵族的帮助下压服了封建大王公，接着，它便通过使农民成为贵族农奴的办法换得了他们的拥护，从而在这个基础上树立起圣彼得堡的帝国专制统治。整个进程的落后性充分表现在下列事实上：十六世纪末叶产生的农奴制，在十七世纪粗具规模，在十八世纪繁荣昌盛，直到 1861 年才被明文废除。

追随着贵族的教士阶层，在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中起了不小的作用，但也只是一个奴仆而已。教会在俄国从没有上升到像它在天主教西方那样高的位置；它心甘情愿地替专制政权充当精神奴仆，并且把这看成是它的卑躬屈膝换来的报酬。大主教和主教完全是由世俗权力机关指派的。主教们随着沙皇的变更而变更。

到彼得堡时期，教会对国家变得更加奴颜婢膝了。二十万教士和僧侣实质上是官僚机构的一部分，是一种福音警察。作为这种效劳的报酬，东正教会在土地、收入和信仰的垄断方面，则受到一种更正规的警察的保护……

不仅俄国的封建主义发育不全，俄国古代的全部历史也都是苍白贫血的；俄国缺乏作为商业和手工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城市，便是反映了这一点的一种凄惨现象。手工业在俄国没有能够脱离农业，而是保持着家庭工业的性质。俄国的古代城市是商业、行政、军事和采邑中心——因此是消费的而不是生产的中心。就连那个同汉萨相似、没有被鞑靼人征服的诺夫哥罗德，也只是一座商业的而非工业的城市。诚然，农民工业的广泛分布造成了一种对大规模贸易中介活动的需求。但是，流动商人在俄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决抵不上西方那些同周围农民不可分割的手工业基尔特和工商业中小资产阶级。而且，俄国的主要商路都是跨越国境线的，因而从很早的时候起便让外国的商业资本起主导作用，使得整个进程都具有了一种半殖民地的性质，俄国商人成了西方城市和俄国农村之间的中介人。这种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时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得到极端的表现。

由于城市——最能够促进一个亚细亚国家发展的东西——在俄国居于无足重轻的地位，也就不可能进行宗教改革，即以某种适应资产阶级社会需要的现代化基督教来代替封建官僚的东正教。反对国教的斗争仅限于建立一些农民教派（它们当中最强大的是“旧信仰派”）。

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十五年，俄国出现了一种名为“普加乔夫暴动”的哥萨克、农民和乌拉尔工奴的运动。这次声势浩大的暴动所以没有变成一场革命，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的是一个第三等级。

沒有城市的工业民主制，农民战争就不可能变成革命，正如农民教派不可能上升到宗教改革的高度一样。普加乔夫暴动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反而加强了保卫贵族利益的、在危险时刻再一次证明它本身有存在理由的官僚专制主义。

正式开始于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的欧化，在此后一百年中愈来愈成为统治阶级（贵族）本身的要求。1825年，在政治上归纳了这一要求的贵族知识分子，竟然打算用军事密谋来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这样，在欧洲资产阶级发展的刺激下，进步的贵族便打算代替不存在的第三等级。但是，他们在渴望建立自由主义政权的同时，仍旧希望保障本阶级的统治，因此特别怕唤起农民。所以，密谋始终只是一群杰出而孤立的军官的纸上谈兵，他们几乎没有进行斗争便承认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意义。

在地主阶级中，拥有工厂的那些人首先赞成以雇佣劳动制代替农奴制。俄国谷物出口量的不断增加，也起了同样的推动作用。1861年，贵族官僚依靠自由主义地主实行了农村改革。在这个运动中，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扮演了帮腔的角色。不言而喻，沙皇政权在解决土地问题这一俄国的根本问题时，是远不如普鲁士君主此后十年中解决民族统一这一德国根本问题时那样大刀阔斧和干净彻底的。一个阶级的问题由另一个阶级来解决，是落后国家惯常采用的混合方式之一。

不过，最明确地显示了混合发展规律的，还是俄国工业的历史和性质。很晚才兴起的俄国工业并没有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程序，而是硬挤进了这个发展行列，使它们的最新成就适应于自己的落后性。正如俄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跳过了手工业基尔特和制造业时代一样，工业的各个部门也跳过了曾经花费西方几十年时间的

一系列技术生产阶段。由于这一点，俄国工业在某几个时期获得了惊人迅速的发展。在第一次革命和大战之间，俄国的工业生产几乎增加一倍。这在俄国的某些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已足能证明“所谓落后性和发展缓慢云云完全是无稽之谈”。但事实上，这种迅速发展的可能性正是由非常落后的处境决定的，而这种落后状态不仅持续到旧俄国被消灭的时刻，并且——可叹的是——一直遗留到了今天。

列夫·托洛茨基：怎样发动起义^①

人们并不热心于发动革命，就像他们并不热心于发动战争一样。不过，二者之间有这样一点区别：在战争中，强迫起决定性作用，而在革命中，除去环境的压力以外并没有任何强迫。革命只有在人们完全走投无路时才会发生。同整个革命相似，起义——一系列革命事变中的高潮——也不能召之即来。在下定最后冲击的决心以前，群众要经过若干次进攻和退却的周折。

密谋通常总是和起义相对立的，前者是少数人有意识的策划，后者是大多数人的自发运动。而且，一场胜利的起义只能是一个动员起来走在全国前面的阶级的行动，不论是在方法上或历史意义上，它都同少数密谋者背着群众推翻政府的行动有很大差别。

在一切阶级社会中，都存在着足够多的矛盾，使得密谋活动能够在社会裂缝中生根。可是历史经验证明，要不断地为一种密谋的社会组织提供营养，还必须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社会病态——例如像西班牙、葡萄牙或南美那样。单纯的密谋即使获得成功，也只

^① 《起义的艺术》。《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167—174页。

能是以同一个统治阶级中的一个集团代替另一个集团——或者更差的是，只是改换一些当政要人。只有群众起义才能实现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胜利。经常发生密谋往往是社会停滞和腐朽的表现，而群众性的起义则与此相反，它们一般都是打破了旧平衡的某种迅速发展带来的后果。发生于南美各国的长期的“革命”，同“不断革命”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不断革命”的反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群众起义和密谋在任何情况下都互不相容。几乎一切起义都在某种程度上包含着密谋因素。群众起义受革命发展某一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制约，它永远也不会是纯粹自发的。即使一次起义对大部分参加者来说都是突如其来的，它事先也还是会受到某些思想的鼓舞，起义者从这些思想中看到了一条摆脱生活困境的出路。另外，群众起义也可以是预见到的和有准备的。人们可以事先组织起义。在这种情况下，密谋就从属于起义，为它服务，替它铺平道路，加速它的胜利。一个革命运动的政治水平愈高，它的领导愈认真，密谋在群众起义中的作用就愈大。

我们务必要了解暴动和起义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关系。由于密谋有时意味着少数人的独立发动，有时又意味着少数人为大多数人的起义作准备，所以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一种表面上的矛盾（即使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起义和密谋之间的上述关系尤为必要。

不用说，我们当然会在历史上看到：即使不存在密谋，群众起义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胜利。由普遍的愤怒、零散的抗议、示威、罢工和巷战中“自发地”爆发的起义，有可能把一部分军队吸引过来，从而瘫痪敌人的力量，把旧政权推翻。在一定程度上，俄国

1917年2月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况。1918年秋季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也呈现了大致类似的图景。在这些事件中，由于没有一个深切了解起义利益和目标的政党来领导群众，胜利的果实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别人手里，也就是说，让那些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反对起义的政党取得了政权。

推翻旧政权是一回事，把政权拿到自己手里又是另一回事。资产阶级可能在革命中获得政权，并不是由于它的革命性，而是由于它的资产阶级地位。它掌握财富、教育和报刊，广泛控制着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拥有一整套等级统治的组织机构。无产阶级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必然不会具备任何有利社会条件的情况下，起义的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人数、自己的团结、自己的干部和自己的领导机构。

正如一个铁匠不能赤手去抓烧红的铁块一样，无产阶级也不能直接夺取政权；它必须有一个执行这项任务的组织。把群众起义和密谋协调起来，使密谋从属于起义，又通过密谋进行起义的组织工作，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起义艺术”的内容复杂而责任重大的那部分革命政治学。它的先决条件是：对群众进行正确的一般领导，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有灵活的方针，周密地制订进攻计划，谨慎地从事技术性的准备，勇敢地发动打击。

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一般都把这样一种运动称为**自发起义**，在这种运动中，群众由于普遍痛恨旧政权而联合起来，但是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斗争方法，也没有一个有意识地指出如何争取胜利的领导。官方历史学家——至少是那些有民主倾向的人——勉强承认这种自发起义是一种要归咎于旧制度的难以避免的灾祸。他们所以能有这种容忍态度的真正原因是，“自发的”起义不会越出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

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类似的立场。他们一般地并不否认革命是一场社会大灾变，就像他们并不否认地震、火山爆发、日月蚀和瘟疫是大灾变一样。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有意识地为推翻旧政权作准备，是事先的计划，是密谋（这些行动被他们称为“布朗基主义”，或者更坏的是，“布尔什维主义”）。换句话说，社会民主党人愿意批准——只是在既成事实之后——把政权交给资产阶级的起义，但毫不留情地谴责那些唯有它们才可能使无产阶级当权的方法。在这种客观主义的假面具之下，隐藏着一种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政策。

奥古斯特·布朗基曾对他目睹的或亲自参与的许多次失败的起义作了研究，从这些研究中，他总结出了一套策略原则，如果违背这些原则，任何起义都很难——如果不说是不可能的话——取得胜利。布朗基提出了下列各项要求：及时地建立真正的革命突击队，使他们得到集中的指挥和充足的装备，周密地作好街垒布置，保证这些街垒万无一失地筑成，并且准备有步骤地而不只是偶然地守卫它们。所有这些根据起义的军事问题得出的原则，当然要随着社会状况和军事技术的变更而发生变化，但它们本身决不是“布朗基主义”——就这个名词的意义相当于德文中的“暴动主义”或革命冒险主义而言。

起义是一种艺术，并且和一切艺术一样有它自己的规律。布朗基提出的原则是一种革命军事现实主义的要求。布朗基的错误不在于他的正面原理，而在于他的反面推论。从策略上的缺点会导致革命失败这一事实，布朗基进而得出了下列推论：只要遵循起义的各项策略原则办事，就一定能取得胜利。只是从这一点开始，把布朗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才是正当的。密谋不能代替起义。无产阶级的少数积极分子，不论他们组织得多么严密，都不

能无视本国的一般状况而夺取政权。在这一点上，历史已经对布朗基主义作出谴责。但也只是在这一点上。他的正面理论迄今仍然有效。为了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不仅是自发的起义。它还需要一个合适的组织和一项计划；它还需要密谋。这就是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恩格斯对盲目崇拜街垒的批评，是以军事技术和一般技术的进步为依据的。布朗基主义的起义策略，是符合于旧日的巴黎、半手工业无产阶级、狭窄的街道和路易·腓力普的军事制度的性质的。布朗基的原则错误在于把革命和起义等同起来。他的技术错误在于把起义和街垒战等同起来。这两种错误都遭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虽然在把起义看做是一种艺术的问题上，恩格斯赞同布朗基主义，但他不仅指出了起义在革命中占据次要地位，而且发现街垒在起义中已日益不起作用。恩格斯的批评同放弃革命方法走纯议会道路毫无共同之处，决不像那些和霍亨索伦王朝书报检查官勾结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庸人当年所歪曲的那样。对恩格斯来说，关于街垒的问题始终只是一个关于起义技术的问题。改良主义者企图根据他否定街垒能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引申出他也反对一般的革命暴力。这样做是荒唐的，这就等于是根据战壕的重要性在未来的战争中将要减少这一点，作出军国主义将要消灭的推论一样。

无产阶级借以推翻和代替旧政权的组织是苏维埃。这一点后来已成为历史经验问题，但在十月革命以前，它却一直是纯理论的预测——当然是根据以前的1905年经验作出的。苏维埃是组织群众准备起义的机关，是起义的机关，也是胜利以后的政府机关。

可是，单靠苏维埃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它们可能在不同的纲领和领导下为不同的目标服务。苏维埃从党的手上接受纲领。

处于革命状态中的苏维埃——离开革命，它们也就不可能存在——包含了整个阶级（那些最为落后、迟钝或丧失斗志的阶层除外），而革命的党则是阶级的头脑。只有把党同苏维埃——或是同大致相当于苏维埃的其他群众组织——明确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夺取政权的问题。

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苏维埃自觉地和切合时宜地展开夺取政权的活动。它适应着政治形势和群众情绪的变化，准备好暴动的军事基地，按照统一的行动计划组织起突击队，拟订出发动进攻和最后冲击的计划。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便把有组织的密谋和群众暴动结合起来。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曾不止一次地被迫驳斥过敌人说他们是密谋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謠言。而且，再没有谁像列宁那样不可调和地反对纯密谋主义了。布尔什维克无情地批判了过去社会革命党人以个人恐怖手段对付沙皇政府要人的策略，坚持同知识分子的个人冒险主义相对立的群众起义，与此同时，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却一再替这种策略辩护。但是，在驳斥形形色色的布朗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列宁也从没有对任何“神圣的”群众自发性表示过崇拜。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和更深刻地看出了革命的主观和客观因素、自发运动和党的政策、广大群众和进步阶级、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苏维埃和党、起义和密谋之间的关系。

但是，如果说起义一方面不能召之即来，另一方面又必须事先加以组织才能取得胜利，那就需要革命领袖正确地估计形势。他们必须及时地觉察出正在成熟的起义，然后补充以密谋。要说明这种对自然进程的有意识干涉，用分娩阵痛时助产士的干预做譬喻仍然是再清楚不过了，尽管这个譬喻已经被人滥用。赫尔岑有

一次责备自己的朋友巴枯宁，说他在其一切革命活动中总是把妊娠的第二月当做第九月。然而赫尔岑本人却倾向于甚至到第九个月还否认怀了孕。在 1917 年 2 月，几乎可以说完全不存在决定分娩日期的问题，因为起义是在没有集中领导的情况下突如其来地爆发的。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政权并没有为起义者所掌握，而是被那些遏制群众的人窃夺去了。第二次起义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一次起义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有意识地准备的。因此，正确地掌握时机来及时发出进攻信号的问题，就落到了布尔什维克指挥部的肩上。

在这里，我们不能过于拘泥字面，把**时机**理解为确定不移的某日某时。真正的分娩也要经历一段相当长的难以肯定的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不仅和助产术颇有关系，而且对遗嘱法庭的判案也很有意义。如果时机尚未成熟，发动起义就必然要导致革命流产；如果行动过迟，就会坐失良机，把大好的形势无可挽回地放过。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一个有时是几星期、有时是几个月的成熟阶段，在这段时间内举行起义总有几分成功的机会。先辨识出这段比较短的时期，然后再选定发动最后打击的时机（这时便意味着比较准确的某日某时了），这就是革命领袖责任最重大的任务。它完全称得上是关键性问题，因为它把革命政策和起义技术结合了起来——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起义就同战争一样，也是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政治的继续。

本能和经验是革命领导所必需的，正像其他一切创造性活动都需要它们一样。但是所需要的还不仅乎此。魔术师的¹艺术也能依靠本能和经验获得成功。但是，只有在墨守成规的时代，政治魔术才足以应付局面。一个发生巨大历史动荡的时代是用不着魔术师的。在这里，即使是受到本能启发的经验，也不足以解决问题。

在这里，必须有一个理解各种主要历史力量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的综合理论。在这里，必须有一种唯物主义方法，能够使人透过表面上的各种纲领和口号，看到各个社会集团的真正动向。

革命的基本前提是，现存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能够解决本国的发展提出的迫切问题。然而，只有在社会内部已经包含一个新阶级，能带头解决历史提出的问题的情况下，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准备革命的过程就是：设法使产业矛盾和阶级矛盾引起的客观问题，反映于广大群众的主观意识之中，从而改变这种意识，在各个社会集团之间造成新的相互关系。

列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①

马克思所理解的不断革命意味着这样一种革命，它不同任何形式的阶级统治妥协，它不会停留在民主阶段，它要进一步采取社会主义措施，并且和来自外部的反动派进行斗争，一句话，这是一个阶段紧接着一个阶段、只能以完全消灭一切阶级社会告终的一种革命。

为了消除围绕着不断革命论产生的各种混乱看法，我们有必要弄清楚统一于这个理论中的三方面思想。

第一，不断革命论包含着从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个理论的真正历史根源就在于此。

不断革命的概念是由十九世纪中叶的伟大共产主义者、由马克思及其信徒提出的，和它相对立的是那种众所周知的民主思想，即认为一切问题都应该和平地、以改良主义的和逐渐演变的方式、

^① 《不断革命论》(The Permanent Revolution)，纽约1931年版，第22—27页。

通过建立“理性的”或民主的国家来解决。马克思曾认为，184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将直接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错”了。然而，他的错误只是在事实方面而不是在方法论上。1848年的革命没有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正由于这一点，它也没有能争取到民主制度。至于1918年的德国革命，它根本不是取得民主成就的资产阶级革命，事实上，它是被社会民主党扼杀了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乃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它在战胜无产阶级以后，被迫保留了虚伪的民主形式。

庸俗“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图式，按照这种图式，一切资产阶级社会早晚都要建立民主制度，在这以后，无产阶级就能在民主条件下逐步组织起来和获得提高，最终进入社会主义。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本身，看法便各有不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认为，这种过渡将是一个把社会主义内容填入民主制度的改良主义过程（如饶勒斯）；表面上主张革命的人则承认，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运用革命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如盖得）。但他们都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不仅是两个完全分离的社会发展阶段，而且彼此距离很远，这对于一切国家和一切民族来说全不例外。这种看法也流行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在1905年前后属于第二国际左翼——当中。杰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前辈普列汉诺夫，就曾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在现代俄国是一种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不仅孟什维克持同一立场，绝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目前党的领袖全都无一例外地包括在内——也抱有相同的看法，这些布尔什维克领袖当时都是坚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但在1905年，甚至到1917年前夕，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对他们来说也还是遥远未来的幻景。

这些思想和情绪向1905年新产生的不断革命论展开了斗争。

不断革命论指出：在当代落后的资产阶级国家中，民主革命的任务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又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这就是不断革命论的中心思想。如果说传统的看法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要经历很长一段民主过程，那么，不断革命论便证实了这样的事实：对落后国家来说，人们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民主的。单从这一点看，民主制度本身便不会占据几十年时间，而只能直接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它们一环紧套一环，彼此无法分开。这样，在民主革命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便存在着一种不间断的革命发展。

“不断”论的第二个方面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本身的特点。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和不断进行内部斗争的情况下，一切社会关系都在被改变。这个过程必然要具有一种政治的性质，也就是说，它是通过正在改变的各个社会集团不断进行冲突而发展的。内战和对外战争的爆发，同“和平的”改革时期相互交错。经济、技术、科学、家庭、道德和风俗习惯方面的革命，在相互影响的复杂情况下不断展开，始终不允许社会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质。

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性质构成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方面，它产生自目前的经济状态和人类的社会结构。国际主义不是抽象的原则，而是世界经济的性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规模的阶级斗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反映。社会主义首先在各国范围内发生，但它不能在这种范围内完成。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暂时性的，即使是一种时间较长的——像苏联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暂时状态。在一个孤立无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内外部矛盾必然要随着取得的成就同时发展。在长期孤立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国家最后必定会成为这些矛盾的牺牲品。只有

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胜利才是它的出路。从这个观点来看，单独一国的革命决不是一个能够自己站住脚的整体，而只是国际链条上的一环。不论暂时有什么起伏，国际革命的进程是永不间断的。

不断革命论的所有这三方面，都遭到假革命分子的攻击，即使攻击的明确程度并不经常一样。事实上，由于它们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部分，情况也只能是这样。那些假革命分子把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专政机械地割裂开来，把一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的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他们认为，在一国范围内取得政权实质上并不是革命的开始，而是革命的结束，此后便进入改革阶段，从而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1905年，他们甚至不承认俄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先于西欧取得政权。1917年，他们只主张在俄国实行民主革命，拒绝无产阶级专政。1925—1927年，他们在中国实行了一种由资产阶级领导进行民族革命的方针。后来，他们又为中国提出了一个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对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他们宣称，在苏联可以建成一个孤立的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他们来说，世界革命已经不再是取得胜利的必要前提，而只是一种有利环境。他们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彻底背离，就在他们同不断革命论进行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完成了。

以算旧账和伪造历史的方式开始的这种斗争，完全改变了革命统治阶层的世界观。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阐明，这种价值观点的改变是在苏联官僚阶层社会需要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个阶层愈来愈保守，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国家秩序，要求人们满足于保证了官僚阶层特权地位的革命，宣扬革命的成就已足可保证和平地建设社会主义。关于这些问题，这里不打算细谈。我们只想指出一点：官僚阶层是深深意识到它的物质和思想统治地位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之间的关系的。这一点目前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或

者说正因为——斯大林主义统治机器迫于没有料到的各种矛盾，正在拼命向左转，给予它昨日的右派鼓舞者以十分严酷的打击。虽然他们匆匆忙忙地借用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派”的口号和论点，如所周知，官僚们对这个反对派的仇恨却一点也没有减少。在反对派分子当中，如果有人为了支持工业化方针等目的申请恢复党籍，首先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谴责不断革命论和承认——哪怕只是间接地——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这样一来，斯大林主义官僚阶层就暴露出它的向左转纯粹是一种**战术**，它仍然全盘保留着民族改良主义的**战略**基础。这种做法的意义不说自明；在政治上就像在军事上一样，战术从长远说来是服从战略的。

问题早就超出了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特定范围。争论逐步扩大，今天几乎已经把革命世界观的一切问题包罗无遗。是不断革命**还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抉择同时也就决定了苏联的各种内部问题、东方的革命远景，直至整个共产国际的命运。

列夫·托洛茨基：关于不断革命论的 十四个命题^①

如果我把最重要的结论简短地逐条列出……读者想必是不会反对的。

一、不断革命论目前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最大注意，因为思想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进程所作出的最终结论，已经把这个问题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旧日论战陈迹中重新提出，使它变成了一个关系到一般国际革命的性质、内在统一和方法的现实问题。

^① 《不断革命论》，第166—171页。

二、对于资产阶级发展较晚的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说，不断革命论意味着：只有通过领导被压迫的本民族、特别是领导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才有指望彻底地和真正地解决这类国家的问题，即取得**民主解放和民族解放**。

三、在民主革命中，不仅由于土地问题，而且由于民族问题，占落后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具有重要地位。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民主革命的任务就不能解决，甚至不可能被认真地提出。但是，只有通过毫不妥协地和本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作斗争，才能够实现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联盟。

四、不论个别国家革命初期会出现什么样的插曲，只有在组织成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指导下，才有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革命联盟。这又意味着，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在这个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首先解决民主革命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

五、布尔什维主义的旧口号——“工农民主专政”——正好表示了无产阶级、农民和自由资产阶级之间的上述关系。这已经为十月革命的经验所证实。但是，列宁的旧公式并没有事先解决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阵营内部将具有什么关系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公式里包含着代数的未知数，它们只有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变成精确的算术数值。历史经验表明而且是在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表明，不管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多么重要，它仍然不能独立地起作用，更谈不上起领导作用了。农民不是追随工人就是追随资产阶级。这意味着，只有作为一种**领导着农民群众的无产阶级的专政**，“工农民主专政”才有可能实现。

六、工农民主专政，作为一种在阶级内容上和无产阶级专政有所不同的制度，只有在建立起这样一个独立的革命政党的情况下

才可能实现，这个政党必须表达农民和一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能够依靠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帮助来夺取政权，并且决定它的革命纲领。但是，正如现代史——特别是最近二十五年的俄国历史——所表明的那样，在建立农民党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依赖性以及他们内部的深刻分化。由于这种分化，小资产阶级（农民）的上层在一切重大问题、尤其是战争和革命问题上都追随大资产阶级，下层追随无产阶级，而中间阶层则必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作出选择。在克伦斯基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政权之间，在国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之间，不可能存在、事实上也不存在任何中间阶段，也就是说，不存在工农民主专政。

七、共产国际力图把早就失去了历史内容的工农民主专政这一口号强加给东方国家，只能产生反动的效果。就这个口号是针对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提出的而言，它有助于瓦解无产阶级，使他们消失在小资产阶级群众之中，这样，它就为民族资产阶级取得领导权创造了良好条件，从而导致民主革命的失败。把这个口号列入共产国际纲领，是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十月传统的直接背叛。

八、无产阶级作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掌握政权和实行专政以后，用不了多久，那些深刻地侵犯到资产阶级权利的任务便要不可避免地落到他们的肩上。这样，民主革命便立即变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形成一个不间断的革命过程。

九、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不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意味着革命的开始。只有在国内的和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才成为可能。处于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斗争必然要导致爆炸，也就是说，在内部导致内战，在

外部导致革命战争。社会主义革命的不间断性就在于此，而不论涉及的是一个昨天刚完成民主革命的落后国家，还是一个早就存在着民主和议会制度的老资本主义国家。

十、在一国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像的。资产阶级社会发生危机的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同民族国家的范围发生了矛盾。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另一方面则引起了成立资产阶级欧洲联邦的幻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一国开始，然后在国与国之间进一步发展，最后遍及整个世界。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就变成一种意义更新更广的不断革命；只有在全世界都建立新社会的最终胜利到来时，这场革命才宣告完成。

十一、从上述世界革命发展的简要图式看来，各国根本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成熟”或“不成熟”的问题，目前共产国际纲领中的那种分类是迂腐的。就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世界市场、世界性的生产力和分工而言，它也为世界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准备了条件。

不同的国家经历这一过程的速度将各不相同。在某些情况下，落后国家可能比先进国家更早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们实现社会主义的时间则要晚于后者。

因此，在无产阶级还没有成长到能够团结农民和夺取政权的时候，一个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便不可能完成民主革命。与此相反，在一个无产阶级已经通过民主革命取得政权的国家，专政和社会主义的以后命运，归根到底并不单是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同时，它主要也不是取决于该国的生产力，而是取决于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十二、在狂热反对十月传统的反动潮流中产生的一国建成社

会主义论，是自始至终反对不断革命论的唯一理论。

在我们的抨击下，那些假革命分子企图巧言强辩，说什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只适用于俄国，因为它具有别的国家所没有的特点（地大物博）等等，但这并不能为他们开脱，而只能使他们的处境更糟。抛弃国际立场的结果，总是要导致民族救世主义，即认为自己的国家具有种种特权和特点，因此能够起一种别的国家所不能起的作用。

世界性的分工、苏联工业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欧洲先进国家的生产力依靠亚洲的原料等等，使得社会主义在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独建成。

十三、斯大林-布哈林的理论不仅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十分机械地对立起来，而且硬使民族革命脱离了国际道路。

这种理论给落后国家的革命规定了一种无法实现的建立民主专政制度的任务，它把这种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从而把幻想和虚构带进了政治，瘫痪了东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妨碍了殖民地革命的胜利。

按照这些假革命分子的理论看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本身就意味着革命已经完成（用斯大林的公式来说，已经完成了“十分之九”），此后便进入民族改良时代。因此，富农长入社会主义论和“中立”世界资产阶级论，便成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是存亡相共的。

在民族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已沦为一种仅仅有助于反对军事干涉的工具。共产国际的现行政策、它的组织制度以及领导人选，同共产国际已沦为注定不能解决独立任务的辅助机构的状况完全一致。

十四、布哈林拟订的共产国际纲领是彻底的折衷主义。它枉

费心地企图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调和起来。但后者却是和世界革命的不间断性密不可分。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力图使共产国际有一个正确的政策和健康的组织制度的斗争，同争取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斗争是不可分割地结合着的。而纲领问题又同两种互不相容的理论、即不断革命论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问题不可分开。不断革命的问题早就超出了已经完全成为历史陈迹的插曲性的列宁-托洛茨基意见分歧的范围。现在，它已经成为以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为一方，以中派的折衷主义为另一方的一场斗争。

列夫·托洛茨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活^①

毫无疑问，到将来（时间愈往后就愈是这样），对于设计城市花园、模范大厦、铁路或港口这类百年大计的事业，不仅参加竞争的土木工程师们深为关心，广大群众也会感到强烈的兴趣。过去那种像蚂蚁般在许多世代内一砖一石、不知不觉地堆起一些住宅区和街道的做法，将要让位于一种手持地图和罗盘、以改造山河的气概建设都市化农村的过程。围绕着这些罗盘，将组成若干真正的人民政党，这些拥护不同的技术和建设方案的未来政党，也将进行热烈的鼓动，开会和竞选。在进行这种斗争时，建筑艺术中将再一次充满群众的情感和精神，只是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人类将以创造的精神教育自身，它将习惯于把世界看做是可以塑造成各种最完美的生活形式的柔软的粘土。艺术和工业之间的藩篱将被推倒。未来的主要风格将是造型的，而不是装饰性的。在这个问题

^① 《文学与革命》(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纽约1957年版，第249—256页。

上,未来派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把这当成是艺术的消灭、艺术的自愿让位于技术,那就错了。

以小刀为例,艺术和技术的结合可以沿着两条基本的路线发展:或是用艺术来装饰小刀,在刀柄上绘画大象、美女或巴黎铁塔;或是由艺术帮助技术,为小刀设计一种“理想的”形式,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将最适合制造小刀的材料和小刀的用途。认为这一任务能够用纯技术手段来解决是不正确的,因为用途和原材料有着千变万化。要制出一种“理想的”小刀,除去需要了解原材料的性质及其使用方法以外,还必须同时具有想像力和审美力。根据工业文化的整个趋势看来,我们认为,在未来的人们对原材料进行创造性加工的时候,艺术想像将致力于探索物品本身的理想形式,而不再是以外加的美去装饰一件物品。如果小刀的情况是这样,服饰、家具、剧院和城市的情况就更是这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机制”艺术的消灭,即使在最遥远的将来也是如此。但是,艺术和一切技术部门的直接合作,看来却将要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这是否等于说工业将合并艺术,或是艺术将把工业提升到同它本身一样高贵的地位呢?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使用哪种说法取决于是从工业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问题。但是从表达的内容来看,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这两种说法都意味着工业的规模和艺术素质的巨大扩展,而这里所说的“工业”则指的是人类毫无例外的全部产业活动;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农业也将成为工业的一部分。

不仅艺术和工业之间的界壁将要倒坍,艺术和自然之间的隔阂也将同时消除。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让·雅克·卢梭所说的艺术将更加接近于自然状态,而是指自然将变得更加“人工化”,目前的山河、田野、牧场、草原、森林、海岸的分布并不是不可变更的。

人们已经对自然的面貌作了不算太少也不算太小的改造。但它们同将来的活动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學生的练习。据说信仰可以移山，但是同“信仰”没有任何干系的技术工艺却真的能够削平大山，把它们搬走。迄今为止，人们一直是为工业目的（采矿）和建筑铁路（开隧道）而这样做的；在未来，这种活动则将要按照一个通盘的工业和艺术计划，以更为巨大千百倍的规模来展开。人类将重新安排山河，认真地和不断地改造自然。最后，人类至少将按照自己的趣味——如果不说是按照自己的形象的话——把地球整个重建一遍。我们丝毫也不用担心这种趣味会是低劣的……

只是到这时才开始计划和认识自己的新人，将不会像克柳也夫和追随他的拉祖姆尼克那样，仅仅拿起重机和汽锤同捕捉松鸡的翻板和打捞鱈鱼的拖网相对比。通过利用机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将控制整个自然界，连同它的松鸡和鱈鱼在内。他们将为高山和峡谷指出新位置，他们将改变河流的航道，他们将为海洋定下不许它违反的规则。愚蠢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会说，这样一来，自然界岂不是单调乏味了吗？但他们的愚蠢也正表现在这里。不用说，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整个地球将被划分为许多小方块，所有的森林都将变成花园和公园。情况多半会是这样：树丛和森林、松鸡和老虎都将继续存在，只是要存在于人们指定的地方。人们将如此巧妙地做到这一点，以致老虎甚至都不会注意到机器或是感觉到有任何变化，而将像原始时代那样安详地生活着。机器并不和大地对立。机器是现代人类一切生活领域中的工具。目前的城市是一种暂时现象。但它不会倒退为过去的乡村。与此相反，乡村基本上将上升到城市的水平。这就是人们的主要任务。城市是暂时现象，但它指出了通向未来的道路。而目前的乡村则完全是属于过去的东西。从审美的观点来看，乡村所以显得那么古色古

香，好像使人走进了民间艺术博物馆一样，其原因正在于此。

即使没有像日本发生的那种地震，人类经历了内战的可怕破坏以后，也将会面临极为严重的贫困状态。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克服各式各样的贫困、饥饿和匮乏，即征服自然的努力，将成为最主要的趋势。每一个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初期，都将出现像美国那种改进机械的狂热。消极享受自然的现象将从艺术中消失。技术将成为艺术活动的更有力的鼓舞因素，到后来，技术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本身也会以更高级的综合方式获得解决。

今天，有少数热心家梦想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有戏剧性，并且对人类本身实行有节奏的教育。这些虽然是梦想，但它们在这对未来的展望中却真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使得自己的经济制度合理化、即充满自觉性和计划精神以后，人类将完全抛弃目前这种停滞不前、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目前一般家庭所操心的食物和儿女教育问题将不再成为人们的沉重负担，而会变成表现社会主义精神和无穷尽的集体创造性的主题。妇女将最终摆脱她们的半奴隶地位。在技术不断进步的同时，教育、即最广泛意义下的年青一代身心的陶冶将成为社会思想最高成就的表现领域。人们将围绕着不同的教育学说组成强大的“政党”。社会教育方面的实验和不同方法的竞赛，将达到前人从未梦想过的程度。共产主义时代的生活将不会像珊瑚岛那样盲目地形成，人们将自觉地建设生活，使它受到思想的检验，得到指导和纠正。生活将不再是听天由命的，因而也不再会停滞不前。知道如何改造山河、如何在勃朗峰上和大西洋深处建筑人民宫的人类，将不仅能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丰富、灿烂和紧张的内容，而且能使生活中充满最强烈的变动。在新的技术发明和文化成就的压力下，生活的外壳还没有来得及形成就会被再次打破。未来的生活将不会是单调的。

未来生活的美好还有甚于此。人最终将认真地着手调和他自己的身体。在劳动、行走和游戏时，他将竭力使自己肢体的动作尽可能做到准确、有目的和节约，从而获得人体美。他将尝试着首先控制自己机体中的半意识过程，然后再控制潜意识过程，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生殖等，他将在必要的限度以内，设法使这些过程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控制。连纯粹的生理生活都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生物学上的人，已经固定化了的 *homo sapiens*（人类），将再次进入一种激烈改变的状态，并在自己的手上成为最复杂的人工选择方法和身心训练的对象。这是完全符合进化法则的。人类先是以科学技术代替笨重的劳动，以科学代替宗教，从而扫除了产业活动和意识形态中的愚昧因素。以后，他们又通过民主和理性主义的议会制度、接着是通过公开的苏维埃专政推翻了专制和阶级统治，从而驱除了政治领域中的不自觉状态。经济关系中的盲目性因素最大，但人们通过以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经济生活，也正在把它们从这个领域中消除。这便使人们有可能彻底地改变传统的家庭生活。最后，人的本质是隐藏在无意识的王国和造化的底层之下最秘密、最黑暗的角落中的。因此，探索性的思考和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将在这方面作出最大努力，难道还不是不言而喻的吗？难道人类还会匍伏在上帝、国王和资本脚下，以便后来在黑暗的遗传规律和盲目的性选择之前满足一点可怜的欲望吗？解放了的人类将努力使自己的器官活动获得更大的平衡，使自己的机体组织更有比例地发展和损耗，以便把那对死亡的恐惧变成机体对危险的合理反应。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人体组织和生理方面的极端不协调，即人的各种器官和组织的发展与损耗极端不成比例，才使得生命本能体现为对死亡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病态的和歇斯底里的恐惧，这种恐惧蒙蔽了理性，造成了种种关于死后生活的愚

蠢幻想。

人类将争取控制自己的感觉,把自己的本能提到意识的高度,使它们明朗化,并且把自己的意志触鬚伸展到各个隐蔽的角落,从而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创造出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生物学典型,或者也可以说是超人。

现在很难预言未来人类的自治将达到什么程度,他们的技术将发展到什么高度。社会性的建设和自我的身心教育将成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切艺术——文学、戏剧、绘画、音乐和建筑都将赋与这一过程以美丽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共产主义人类的文化建设和自我教育的范围,将把现代艺术的一切主要成分都发展到最高水平。人类将比现在强壮、聪明和灵巧得无可比拟;人的身体将变得更加协调,动作将更有节奏,声音将更为悦耳。生活形式将具有强烈的戏剧性色彩。普普通通的人都将上升到亚里士多德、哥德或马克思的高度。而在这样的一般水平之上,还将出现新的高峰。

第十章 斯大林主义的巩固

约瑟夫·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①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间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间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间断（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2—96、100—103、104—105、158—159页。

换句话说：

(甲) 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乙) 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烧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独创的”、“卓越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那个卓越的理论”。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这样。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

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跃进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请看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些条件是怎样说的：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和照旧统治下去。只有当‘下面’不愿照旧生活而‘上面’也不能照旧统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牵动被剥削者又牵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①。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大多数工人（至少是大多数有觉悟、有思想、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有进行革命的必要，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可以把最落后的群众吸引到政治运动中来……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能够很快地把政府推翻。”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革命获得胜利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既然已经巩固自己的政权并领导着农民，就能够而且应当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是不是说，它这样就能获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即最后胜利呢？换言之，这是不是说，它单靠一个国家

^① 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的力量就能够最终巩固社会主义并完全保障国家免除外国武装干涉，也就是免除复辟呢？不，不是这个意思。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至少必须有几个国家内革命的胜利。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无产阶级专政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基本问题：

(一)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问题首先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内容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规模和成绩，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具体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是这个革命的机关，是这个革命的最重要的据点，它的使命是：第一、镇压已被推翻的剝削者的反抗，巩固自己的成绩；第二、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使革命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也能战胜资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可是，如果革命不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特设机关作为自己的基本支柱，那末它就不能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不能保持胜利并向前进展到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

(二)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

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对^①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②资产阶级是专政的)”。考茨基及其同伙关于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废话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 的掩饰。“纯粹的”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这至少是因为

①② 黑体是我加的。——斯大林

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剝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剝削群众是沒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之流和司丁尼斯之流、洛克菲勒之流和摩尔根之流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資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剝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剝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剝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剝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結論：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关、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当然，在遙远的将来，如果无产阶级在那些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如果现在的资本主义包围被社会主义包围所代替，那末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完全可能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由于国际环境的“不利”，会认为最好是“自愿地”向无产阶级做重大的让步。可是，这个假定所涉及的只是遙远的和可能的将来。对于最近的将来，这个假定是沒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沒有任何根据的。

因此，列宁说得对：

“不用暴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用新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三) 苏維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

政的胜利就是镇压资产阶级，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这是很明显的。但是要依靠什么组织才能完成这个巨大的工作呢？无产阶级的在资产阶级议会制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旧的组织形式不足以完成这个工作，这是不容置疑的。那末，无产阶级的什么新的组织形式能够起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掘墓人的作用，不仅能够摧毁这个机器，不仅能够以无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且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基础呢？

无产阶级的这个新的组织形式就是苏维埃。

苏维埃优越于旧的组织形式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是无产阶级的最能包括一切的群众组织，因为苏维埃，而且只有苏维埃，才能包括所有一切工人……

党的作用

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随着阶级的消灭，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消灭，党也一定会消亡。

如果没有一个因为本身具有团结性和铁的纪律而强有力的党，要争得和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没有意志的统一，如果没有全体党员行动上的完全的和绝对的统一，党内铁的纪律是不可思议的。这当然不是说，因此就排斥了党内争论的可能。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党内的批评和争论，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更不是说，纪律应当是“盲目的”。恰恰相反，铁的纪律不是排斥自觉自愿的服从，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因为只有自觉的纪律才能成为真正铁的纪律。可是，当争论已经结束，批评已经完

结,决议已经通过后,全体党员意志的统一和行动的统一就是保证党内统一和党内铁的纪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

列宁说:“在目前紧张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最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只有有近乎军事纪律的铁的纪律,只有使党的中央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机关,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争得专政以前的斗争条件下党内纪律的问题就是这样。

关于争得专政以后的党内纪律也应该这样说,而且更应该这样说。

列宁说:“谁只要稍微削弱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由此应该得出结论:派别组织的存在,无论和党内统一或党内铁的纪律都不能相容。几乎用不着证明,有派别组织就会产生几个中央;有几个中央就是表明党内没有共同的中央,就是分散统一的意志,就是削弱和破坏纪律,就是削弱和破坏专政。第二国际各党既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不愿意引导无产者去夺取政权,当然是可以容许派别组织自由这种自由主义的,因为它们根本就不需要铁的纪律。可是,共产国际各党既然把争得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基础,就不能容许“自由主义”,也不能容许派别组织自由。

党是意志的统一,是排斥任何派别活动和党内权力分散现象的。

约瑟夫·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 共产党人的策略^①

从前人们通常认为革命将经过社会主义成分首先在那些最发达的“先进”国家内平衡“成熟”的道路发展起来。现在这个见解要大加改变了。

列宁说：“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其次，西欧的一些国家，而且是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终究能把这些国家里的革命运动推延下去，造成某种‘社会和平’的局面。”

“同时东方许多国家，如印度、中国等等，正是由于最近这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而完全被抛出了自己的常轨。这些国家的发展已完全按照一般欧洲式资本主义的标准进行。在这些国家里开始了一般欧洲式的波动。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清楚，这些国家已经卷入了不能不引起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漩涡。”

因此，“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的。它们这一种发展的过程，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5—348页。

除此以外，不仅战败国和殖民地受战胜国的剥削，而且一部分战胜国也落入美国和英国这两个最强大的战胜国的财政剥削的罗网中；所有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世界帝国主义解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除这些矛盾以外，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内部还有一些极深刻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正在发展；所有这些矛盾又由于伟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同这些国家并存而日益加深和尖锐化，——如果注意到这一切，那就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国际形势的特点了。

最可能的是，世界革命将经过许多新国家的无产者在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援助下用革命手段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国家体系的道路发展起来。我们看见，第一个脱离出来的国家，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已经取得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援助。没有这种援助，它就不能支持住。毫无疑问，这种援助将会增强和发展起来。同样毫无疑问，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巩固得愈彻底，这个国家变成进一步扩展世界革命的基地，变成进一步瓦解帝国主义的杠杆愈迅速，世界革命的发展，许多新国家脱离帝国主义体系的过程就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

没有几国无产者的共同努力，第一个获得解放的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不可能，这个论点是对的；同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其余各国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帮助愈切实，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愈迅速愈彻底，这个论点也是对的。

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获得胜利的国家“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

第二、这种帮助应当表现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起

来反对其余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掀起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获得胜利的国家所给予的这种帮助的特点不仅在于它加速其他国家无产者的胜利，而且还在于它以促进这个胜利来保证社会主义在第一个获得胜利的国家内的**最后胜利**。

最可能的是，在世界革命的发展进程中，与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策源地和这些国家的全世界体系并列，会出现个别苏维埃国家的社会主义策源地和这些策源地的全世界体系，而这两个体系间的斗争将充满世界革命发展的历史。

列宁说：因为“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相当长期的顽强斗争，便不能实现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中的自由联合”。

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个国家在冲破帝国主义体系这一事业中的伟大创始，它是帝国主义国家汪洋大海中的第一个社会主义策源地，而且还在于它是世界革命的第一阶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

因此，不仅那些忘掉了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说革命在一国内胜利纯粹是一国的而且仅仅是一国的现象的人是错误的，而且那些虽然记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但是竟把这个革命看做一种只应接受外援的被动现象的人也是错误的。实际上，不仅十月革命需要其他国家革命的援助，而且其他国家革命也需要十月革命的援助，以便加速和推进推翻世界帝国主义的事业。

约瑟夫·斯大林：基础和上层建筑^①

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产生的，但这决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只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后，就要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帮助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来摧毁和消灭旧基础与旧阶级。

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基础之所以创立上层建筑，也就是为了要使上层建筑替它服务，要使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起来和巩固起来，要使上层建筑积极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履行它替基础服务的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走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走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并终止其为上层建筑。

* * *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从旧的质到新的质的转变不是经过爆发，不是经过消灭现存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而是经过新质的要素的逐渐积累，也就是经过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来实现的。

一般说来，要告诉那些醉心于爆发论的同志们，从旧质过渡到新质经过爆发的法则，不仅不适用于语言发展的历史，而且也不常常适用于属于基础之类的或属于上层建筑之类的其他社会现象。对于分成两个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没有敌对阶级的社会，爆发就决不是必需的了。我们曾在八年到十年的

^①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26—27页。

时间中实现了我国农业从资产阶级个体农民的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制度，这是一个消灭在乡村中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可是这个改革的实现，不是经过爆发，就是说，不是经过推翻现存政权和建立新的政权来实现的，而是经过从乡村中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到新的制度的逐渐过渡来实现的。这件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这是从上而下的革命，这种改革是由现存政权主动进行，并获得农民基本群众的拥护而实现的。

约瑟夫·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 不可避免性的问题^①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损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体会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他们只看见显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27页。

从外表上看来，一切都好像是“平安无事”；美国已使西欧、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仰其配给；德国（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都陷入了美国的铁爪中，顺从地执行着美国的意旨。但是如果以为，这种“平安无事”会“永世地”保存下去，以为这些国家将无止境地忍受美国的统治和压迫，以为它们不会设法挣脱美国的镣铐，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那就错了。

我们首先看一看英国和法国吧。无疑地，这两个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地，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于它们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可不可以设想，当美国人在按照“马歇尔计划”进行“援助”的掩盖下，打入英国和法国的经济，竭力把它变成美国经济的附属品的时候，当美国资本在英、法殖民地夺取原料和销售市场，从而为英、法资本家的高额利润制造奇灾大祸的时候，英法两国竟会无止境地忍受现在的这种情况呢？如果这样说：资本主义的英国，接着还有资本主义的法国，归根到底将不得不从美国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便保证自己的独立地位，当然也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这岂不是更正确吗？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主要的战败国德国（西德）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现在在美国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可怜的生活。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它们的商业，它们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它们的整个生活，都被美国的占领“制度”加上了镣铐。要知道，这些国家昨天还是震撼了英国、美国、法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统治基础的强大帝国主义国家。如果认为这些国家不会设法重新站起来，打破美国的“制度”，奔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就等于相信神怪。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

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对于资本主义说来，对苏联作战、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是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加危险，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所提出的问题，只是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优势的问题，而对苏联作战所一定要提出的问题，却是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第二，因为资本家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叫嚷什么苏联的侵略，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相信有苏联的侵略，因为他们估计到苏联的和平政策，并且知道苏联自己是不会进攻资本主义国家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曾经有人认为德国是被彻底击溃了，正如现在某些同志认为日本和德国是被彻底击溃了一样。当时也有人谈论和在报刊上叫嚷美国已使欧洲仰其配给，说德国再也不能站起来，说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再也不会发生了。虽然如此，但是，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十五年到二十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当然，英国和美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是打算指使已经站立起来的德国来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然而，德国却首先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集团。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试问，有什么保证能使德国和日本不重新站立起来，不设法从美国的奴役下挣脱出来，从而过自己的独立生活呢？我认为这样的保证是没有的。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是仍然存在的。

有人说，既然现今已经有强大的人民力量成长起来，它们正在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战争的论点，应该认为是已经过了时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现今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唤起人民群众去为维护和平、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而斗争。因而，它所抱的目的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它只限于为维护和平而斗争的民主目的。在这一点上，现今维护和平的运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运动是不同的，因为后一运动曾经走得远些，它抱有社会主义的目的。

可能，在各种情况的一定凑合下，争取和平的斗争会在某个地方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但这将不再是现今的和平运动，而是推翻资本主义的运动了。

最可能的是，现今的和平运动即维护和平的运动，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会使上述这个战争得以防止，使它暂时推迟，使当前的和平暂时维持，使好战政府辞职而代之以别的愿意暂时维持和平的政府。这当然是好的。甚至是很好的。但是，这仍然不足以根本消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其所以不足，是因为纵然有保卫和平运动的这一切胜利，但帝国主义仍然保持，仍然存在，因而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也仍然是存在的。

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

第十一章 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

罗莎·卢森堡：民主和专政^①

列宁-托洛茨基理论的基本错误就在于，他们正像考茨基一样，把专政和民主对立了起来。“非专政，即民主”，布尔什维克和考茨基都是这种提法。考茨基自然打定主意赞成“民主”，也就是说赞成资产阶级民主，这正是由于他认为民主同社会主义革命互不相容。另一方面，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决定赞成同民主有区别的专政，因而赞成一小撮人的专政，也就是说赞成一种资产阶级方式的专政。他们是对立的两极，两者都远远背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以后，决不能听信考茨基以“条件尚未成熟”为借口提出的所谓忠告，真地放弃社会主义革命而专门致力于促进民主。如果听从了这种劝告，无产阶级就必然要背叛它自身，背叛国际和革命。它应该而且必须以最有力、最坚定和最果断的方式立即采取各种社会主义措施，换句话说，它应该而且必须立即实行专政，但这是一种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政党或集团的专政——这是一种以人民群众最积极地和不受限制地参加政权、以无限民主为基础的最广泛最公开的阶级专政。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从来不对形式民主的偶像顶礼膜拜。”当然，我们从来不是形式民主的偶像崇拜者。我们对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也并不盲目崇拜。可是，难道从这

^① 《论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纽约 1940 年版, 第 52—56 页。

里就能得出结论说，如果社会主义变得不称我们心意，我们也可以像库诺夫、伦施和帕尔富斯那样把它扔进垃圾堆吗？托洛茨基和列宁本人的例子便提供了否定的答案。

“我们从来不对形式民主的偶像顶礼膜拜。”这句话里真正有内容的內容只在于：我们总是区别开**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式和社会内核；我们总是要挑开表面平等和自由的美丽外衣，揭示出社会不平等和缺乏自由的痛苦实质；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反对民主，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推动工人阶级，使他们不致为美丽的外衣所蒙蔽，从而通过夺取政权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民主以代替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完全消灭民主。

但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某种遥远的东西，非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成以后的天国中才能够实现；它也不是某种圣诞节的礼物，非要在一般老百姓长期地和忠心耿耿地支持了一小撮社会主义独裁者以后才赏赐给他们。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同摧毁阶级统治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是同时开始的。它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取得政权的那个时候开始的。它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回事。

不错，是专政，但构成这种专政的是**运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的消灭；它的主要内容在于向资产阶级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利和经济关系展开强有力的、坚决的进攻，没有这种进攻就不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然而，这种专政必须是整个阶级的任务，而不能由少数领导者以阶级的名义来把持——也就是说，它必须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一步一步地进行；它必须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之下，为完全公开的活动所控制；它必须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训练机会日益增多的产物。

毋庸置疑，如果不是处于世界大战、德国占领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种种巨大困难的可怕压力之下，布尔什维克本来是会按照上述

方式行事的，但这些困难却注定要歪曲任何社会主义政策，而不论它可能充满多么善良的意图和多么美好的原则。

这一点的一个明显证据就是，苏维埃政府使用恐怖手段的范围已经广泛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特别是在德帝国主义即将倒台前和暗杀德国大使以后的最近这段时期。所谓革命不是时髦茶会这一老生常谈，并不足以这种情况辩解。

俄国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是可以理解的，它们代表着一个不可避免的因果序列，其起点和终点是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和德帝国主义的占领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指望列宁及共同志能够凭空搞出一套最完美的民主制度、最有典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繁荣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就是提出了不合情理的要求。通过他们坚定的革命立场、值得效法的果敢行动以及对国际社会主义始终不渝的忠诚，他们已经作出了在那种艰难环境下可能作出的一切贡献。但是，当他们开始把非做不可的事装做是自愿做的，当他们把自己迫不得已采取的策略编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为社会主义策略的典范拿来向国际无产阶级推荐时，他们便造成了危险。当他们这样自欺欺人，从而掩盖了他们在不得不采取的虚伪步骤中真正作出的不容置疑的历史贡献时，他们便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他们为之而奋斗和受苦的运动——起了一种不良的作用；因为他们硬要把俄国的紧急形势造成的种种歪曲当做新发现，搬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武库中来，而它们其实只是这次世界大战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总崩溃的副产品。

让德国政府里的社会主义者去大嚷大叫，说什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歪曲表现吧！如果过去或现在的情况真是这样，那也只因为它是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发展情况——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一种歪曲表现——的产物。

我们大家都要受历史规律的限制，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布尔什维克已经表明，他们有能力完成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在历史条件限制下所能完成的一切任务。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做出奇迹。这是因为，在一个被世界大战弄得疲惫不堪、遭到帝国主义入侵并且被国际无产阶级出卖了的孤立无援的国家，居然会出现一种典范性的没有任何缺点的无产阶级革命，那只能是一种奇迹。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要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中分辨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真正的精华和偶然性的糟粕。在现时代，当我们在全世界都面临着决定性的最后斗争时，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问题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它所涉及的并不是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策略问题，而是无产阶级行动的能力、果断程度和实现社会主义政权的意志。就这一点来说，列宁、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朋友是**走在最前面的**，他们给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迄今为止，他们仍然是**唯一**进行了实际斗争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够同胡滕一道高呼“我已经大胆地做了！”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政策中基本的和**具有持久意义**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作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也就是说，在夺取政权和实际解决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方面，他们为国际无产阶级率先树立了榜样，从而大大推动了全世界资本和劳动的总结算。在俄国，这个问题只能被提出而不能获得解决。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全世界的未来都属于“布尔什维主义”。

列夫·托洛茨基：苏联官僚阶层的兴起^①

研究苏联历史的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各项重大问题上，官僚统治阶层实行的是一系列相互矛盾的政策，走的是一条左右摇摆的曲折路线。企图用“环境改变了”来为他们解释或辩护，是立不住脚的。要做个领导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先见之明。可是，斯大林集团丝毫也不能预见到不可避免的发展后果；他们每一次总是在事实面前显得措手不及。他们的反应只是一些行政性的措施。为每一次转折辩解的理论都是在事后作出的，而且在提出新的理论时，很少考虑到他们昨天所讲过的话。根据同一批无可反驳的事实和文献，历史学家也将不得不作出下列结论：所谓“左派反对派”对俄国事变进程的分析要比斯大林集团正确得多，他们对未来发展情况的预测也远比后者符合事实。

乍一看来，这种说法似乎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矛盾的。人们会问，为什么没有远见的集团偏偏取得了节节胜利，而洞察未来的集团反倒步步败北呢？可是，这种往往会自动出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反对意见，只是对那些以唯理主义方式思考问题、把政治看作弈棋或以理取胜的人才具有说服力。政治斗争本质上是各种利益集团和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是非曲直之争。不言而喻，对于斗争的成败来说，领导集团的质量决不是毫无关系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因素，归根到底也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且，斗争中的每一方所要求的都是能代表自己的领导者。

二月革命把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捧上了台，并不是因为他们

^① 《被出卖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纽约1945年版，第86—114, 248—256页。

比沙皇统治集团“更聪明”或“更狡猾”，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至少是暂时地——反抗旧政权的革命人民群众。克伦斯基所以能够把列宁驱入地下和囚禁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才能高于这些人，而是因为大多数工人和士兵当时还追随着护国的小资产阶级。克伦斯基的个人“优越性”——如果可以在这里使用这样一个字眼的话——只在于他不比绝大多数人的目光更远大。布尔什维克打垮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是依靠其领袖的个人优越性，而是因为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无产阶级终于能够领导不满的农民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法国大革命的波澜起伏同样令人信服地表明：一个接一个登台的“领袖”和“英雄”的力量，主要在于他们代表了支持他们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个人特点所以能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发挥影响，只是由于这种代表性，而不是由于什么个人的优越才能……

众所周知，迄今以来的每一次革命过去以后，都要有一次反动甚或反革命继之而来。不用说，这决不会把国家完全推回原来的起点，但却时常夺去了人民的大部分胜利果实。一般说来，第一阵反动浪潮的牺牲品总是那些在革命进攻时期曾经站在群众前面的先驱者、首倡者和鼓舞者。原来处在第二线的人会走到前面，同以前的革命敌人联合起来取代他们的位置。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主角”们就这样进行着戏剧性的斗争，而在这种斗争的背后，各阶级之间则在形成着新的关系，同样重要的是，原来的革命群众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心理变化。

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人阶级的活动怎么会造成这种局面的呢？它的革命主动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无产阶级自豪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代之而起的是这样一幅卑鄙、怯懦和个人钻营的景象呢？许多同志曾经惶惑不解地提出过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

时，拉科夫斯基提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他举出巴贝夫的例子，巴贝夫走出亚培监狱以后，也弄不明白巴黎郊区的英雄人民怎么会变成了那种模样。革命要消耗人的大量精力，对个人和集体来说都是如此。人的神经会逐渐支持不住。坚定的信念会受到震动，坚强的性格会受到销磨。一个接一个的事变展开得过于迅速，会使新的力量来不及补充损失。饥饿、失业、革命干部的死亡、群众被排除出政府管理机关——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巴黎郊区人民身心的疲惫，以致需要再过三十年，他们才能够发动一次新的起义。

苏联文献中那种想当然的说法，即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无产阶级革命，是没有任何科学内容的。世界形势和各种内部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十月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但各个阶级本身却是在沙皇统治和落后资本主义的野蛮环境中形成的，决不是天生就适合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情况恰恰相反。正因为一个许多方面还很落后的无产阶级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史无前例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专政，它的队伍中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反动和倒退。这种反动是在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事变中发展起来的。外部的条件和事变一个又一个地促成这种发展。干涉接着干涉。革命从西方得不到直接帮助。国家并没有出现指望的繁荣，而是长期陷进了不祥的贫困。此外，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不是在内战中牺牲了，就是变得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于是，在经过一段激昂奋战、充满希望和幻想的史无前例的紧张时期过去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个对于革命的结果完全失望、疲惫和颓唐的漫长阶段。“无产阶级的自豪感”不再时兴了，代之而起的是怯懦和钻营名利的狂潮。新的统治阶层随着这一浪潮乘时而起。

五百万红军的复员对于官僚阶层的形成起了不小的作用。凯旋归来的指挥官们在地方苏维埃、经济和教育部门纷纷担当起领导职务，他们顽固地把保证了内战胜利的那种制度带到了每一处地方。这样，群众就从各方面被逐渐排除，不再能真正参与国家事务。

无产阶级内部的反动使城乡小资产阶级受到莫大鼓舞，在此以前，他们已经由于新经济政策而活跃起来，一天比一天胆大。最初是作为无产阶级代理人上台的新兴官僚阶层，这时开始感到自己成了各阶级之间的一个仲裁法庭。它的独立性一个月比一个月增强。

国际形势也起了同样一种强大的推动作用。世界工人阶级受到的打击越沉重，苏联官僚阶层就越有自信。这两个事实之间不仅有一种时间上的联系，而且互为因果。官僚阶层的领袖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失败；无产阶级的失败又助长了官僚阶层的兴起。保加利亚起义的失败，德国工人政党1923年的不光荣退却，爱沙尼亚1924年起义尝试的破产，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被出卖和波兰工人政党扶助皮尔苏茨基的不光彩行径，1927年中国革命的遭到可怕的屠杀，最后还有更加不祥的德国和奥地利的最近失败——这些历史灾变粉碎了苏联群众对世界革命的信心，使官僚阶层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群众希望的唯一寄托。

至于最近十三年来世界无产阶级何以遭到失败的问题，读者必须参看我的其他著作，在那些作品中，我揭露了脱离群众、极为保守的克里姆林宫领导对各国革命运动所起的危害作用。在这里，我们主要只关心一件无可反駁的和富有教益的事实，即革命在欧洲和亚洲的不断失败虽然削弱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却大大加强了苏联的官僚阶层。

在这个历史序列中，有两个日期特别重要。1923年下半年，苏联工人热烈注视着德国，在那里，无产阶级似乎已开始夺取政权。德国共产党的仓皇退却，是苏联工人群众可能感到的最大失望。在这以后，苏联官僚阶层立即展开了一个讨伐“不断革命”论的运动，给予左派反对派以第一次残酷的打击。在1926和1927年，苏联人民心中产生了一阵新的希望浪潮。所有的眼睛这时都转向东方，注视着中国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左派反对派已经从受到的打击中复元，正在结集一支新的强大队伍。但在1927年底，中国革命又被刽子手蒋介石扼杀，共产国际几乎可以说是直接向他出卖了中国工农。苏联群众再一次大失所望。经过一段时期在报刊上和群众集会上对他们大肆攻击以后，官僚阶层终于在1928年对左派反对派进行了大规模逮捕。

不用说，有数以万计的革命战士是聚集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旗帜周围的。先进工人无疑是同情反对派的，但始终只是消极的同情。群众不相信通过新的斗争真能改变局势。与此同时，官僚们则进行了这样的宣传：“为了国际革命，反对派打算把我们拖进一场革命战争。动乱遭受得够多的了！我们已经争得了休息的权利。我们要在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信赖我们——你们的领袖吧！”这种休息的福音大大稳定了党的干部和军政人员，并且无疑地在疲乏的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农民——中引起了反响。他们不禁考虑，反对派难道真的打算为“不断革命”思想而牺牲苏联的利益吗？事实上，斗争正是围绕着苏维埃国家的切身安危问题而进行的。共产国际在德国的错误路线导致了十年以后希特勒的胜利——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来自西方的战争威胁。在中国实行的同样错误的政策加强了日本帝国主义，从而也大大加剧了东方的危险。但是，反动时期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们不敢大胆

地思想。

反对派受到了孤立。官僚阶层趁热打铁，利用工人的惶惑和消极情绪，挑拨他们当中比较落后的部分反对先进部分，并且越来越大胆地依靠富农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同盟军。在几年的时间里，官僚阶层就这样粉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

如果认为从前默默无闻的斯大林出马之初，便已经全副武装着一整套战略计划，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并非如此。在他找到自己的道路以前，他本人便被官僚阶层摸清楚了。他有着官僚阶层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坚强的性格、短浅的目光、同政治机器——他的影响的唯一来源——的紧密联系等等。对于他所获得的成功，斯大林本人最初也感到意外。这是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对他的欢迎，这个集团竭力要摆脱旧的原则和群众的控制，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充当它内部事务的仲裁者。作为革命事变中和群众心目中的次要人物，斯大林表现出他是热月政变派式的官僚阶层无可置疑的领袖，是他们当中的第一把交椅。

新的统治阶层很快便显示了它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这一点更为重要——利益。在十月革命期间，目前官僚阶层中的老一辈人绝大多数是站在街垒的另一边的……或者充其量也只是站在斗争之外。目前官僚中那些在十月革命时期曾经置身于布尔什维克阵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起什么作用。至于年轻一代的官僚，他们都是由老一辈人提拔——经常是从他们自己的子女中——和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不可能是十月革命的实现者，但他们却完全适合于利用革命的成就。

这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个人事件当然也不无影响。譬如说，列宁的患病和去世就无疑地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假如列宁再多活

几年，官僚势力的压力就会发展得缓慢一些，至少在头几年会这样。但早在1926年，克鲁斯卡娅就在一批左派反对派当中说过：“假如伊里奇现在还活着，他恐怕已经被关进监狱了。”列宁本人的忧虑和预言性的警告，当时在她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她对于列宁能否独挽狂澜是不抱任何幻想的。

官僚阶层所征服的，不只是左派反对派。它还征服了布尔什维克党。它也击败了列宁的计划，虽然列宁看出了主要危险是国家机关可能“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①。它击败了所有这些敌人——反对派、党和列宁。在斗争中，它所依赖的并不是思想和逻辑，而是它自己的社会势力。尾大不掉的官僚阶层压倒了革命的首领。这就是苏联的热月政变派的秘密。

布尔什维克党准备和保证了十月的胜利。它并且缔造了苏维埃国家，为它提供了一支坚强的干部队伍。党的蜕化既是国家官僚化的原因，也是国家官僚化的后果。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至少简短地说明一下这一过程。

布尔什维克党内制度的特点是**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是一点不矛盾的。党极其注意经常严格规定它的界限，但也注意让所有进入这种界限的人真正享受到参与决定党的政策方向的权利。批评自由和思想斗争是党内民主的不可取消的内容。目前那种说布尔什维主义不能容忍派别的理论，是没落时代的一个神话。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派别斗争史。的确，一个要把最大胆的偶像破坏者、战上和起义者联合在自己的旗帜之下以推翻全世界为己任的真正革命的组织，怎么能在内部没有思想斗争、没有暂时的派别和集团的情况下生活和

^① 见《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8页。
——译者

发展呢？布尔什维克领导机构的远见往往能缓和这种冲突和缩短派别斗争的时间，但也仅此而已。中央委员会所依靠的，就是这种活泼的民主支持。从这里，它获得了敢于决定政策和发布命令的勇气。领导机构在一切紧急关头表现出来的正确性使它具有高度的威信，而这也就是实行集中制的宝贵的精神资本。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制度，特别是执政以前的党内制度，同目前共产国际所属各支部的制度是完全相反的。目前各国共产党的情况是：“领导人”全由上面指定，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能依靠不受监督的党机器彻底改变政策，他们对下层党员是态度骄横的，对克里姆林宫则奴颜婢膝。但是，在夺得政权以后的头几年，即使党已经显示出受到官僚侵蚀的迹象，如果当时有人描绘一下十年或十五年后党的形象，每一个布尔什维克——包括斯大林在内——也都会认为这是恶毒的诬蔑。

列宁及其同事一直非常关心布尔什维克党的纯洁性，他们很注意防止党员们染上当权者的恶习。可是，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特别密切以及有时完全合而为一的事实，在这头几年中无疑地已经对党内制度的自由和弹性产生了不利影响。随着困难的增加，民主一天天相应缩小。最初，党是希望保持苏维埃范围内的政治斗争的自由。内战使党不得不改变这种考虑而采取严酷措施。反对党一个接一个地被宣布为非法。这一显然违背苏维埃民主精神的措施，并没有被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是一项原则，而只认为是一种临时性的自卫行动。

执政党的迅速发展以及它的任务的艰巨和史无前例的性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内部分歧。地下的反对派潮流通过各种途径对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施加压力，加剧了派别斗争的尖锐性。在内战结束时，这种斗争采取了如此尖锐的形式，以致眼看有动摇国家

政权的危险。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参加暴动的布尔什维克不在少数）期间，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有必要禁止派别斗争，也就是说，把国家政治制度搬进执政党的内部生活。当时，这种禁止党内派别的做法再次被认为是一项非常措施，一待形势好转就将予以放弃。同时，中央委员会应用这条新规定时也极其慎重，唯恐它会扼杀党内生活。

可是，本来只是对困难形势作必要让步的这项措施，却非常投合当时已经开始单纯从行政便利的角度来干预党内生活的官僚阶层的口味。早在1922年，在列宁的健康有所恢复的一段短暂时期，他目睹官僚主义的日益发展，心中十分惊恐，已着手准备对斯大林集团进行斗争——作为夺取国家机器的第一步，这个集团已经把持了党机器。但是，第二次发病和随之而来的死亡使他不能同这支内部的反动队伍一决胜负。

此后，斯大林以及当时和他合作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全部努力，都放到使党机器摆脱下层党员的监督这一点上。在这场“稳定”中央委员会的斗争中，斯大林表现出是所有中央委员中立场最始终如一和最可靠的人。他不需要想办法扔掉国际问题的包袱，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关心过这些问题。新统治阶层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就是他自己的观点。他深信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民族性的和行政性的。他把共产国际当成是不得不背的包袱，应该尽可能利用它服务于外交目的。在他的眼里，党的价值只在于驯服地支持统治机器。

在宣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同时，官僚阶层还鼓吹这样一种理论，即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观点看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切，党是无足轻重的。第二种理论比第一种获得了更大程度的实现。利用列宁逝世的机会，统治集团宣布“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

于是，严格的要求被放弃了，党的大门敞开了。工人、职员、小官吏像潮水一般涌进党来。这一手有着政治目的，它要把革命先锋队消溶在沒有经验、沒有独立性但却习惯于服从权威的群氓之中。这个计划果然达到了目的。“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党员”的运动让列宁的党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因为它使得官僚阶层从此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党机器取得了必要的独立地位。民主集中制从此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在党机器内部，从上至下发生了大规模的人事更动。唯命是从成了一个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幌子下，革命者的位置普遍为政府官僚所代替。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变成了党迅速蜕化的历史。

由于左、中、右三派的领导人都属于克里姆林宫的同一个机构即政治局，许多人都不能认清正在展开的这场斗争的政治意义。在思想肤浅的人看来，这似乎只是一个人倾轧的问题，是一种争夺列宁“继承人”位置的斗争。但是，在严酷的专政条件下，社会矛盾只能首先通过执政党的机构表现出来……

在列宁时代的政治局组成人员中，现在只剩下斯大林一人。原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列宁流亡国外时的多年合作者，已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判处十年徒刑，目前正关在监狱里。另外三名委员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也完全失去了领导地位，只是由于他们尚能俯首贴耳，目前还担任着次要职务。最后，本文作者现在正流亡于国外。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也受到了排斥，因为她不论怎样努力，都无法使自己完全适应于热月政变派。

目前政治局的组成人员在布尔什维克的历史上一向只占据次要地位。如果有人革命的前几年预言他们未来的飞黄腾达，他们自己就首先会感到惊讶，而且这并不是一种假谦虚。正由于这个原因，目前才格外严厉地强调政治局的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

反对政治局都是错误的。然而，斯大林又比政治局还要正确，斯大林是不会犯错误的，因此也不可能自己批评自己。

要求党内民主是整个这一时期一切反对派集团的口号，一个始终被提出和始终没有实现希望的口号。左派反对派的上述纲领在1927年提出要求，希望在刑法中特别加进一条法律，“禁止直接或间接迫害提出批评意见之工人，违者予以严惩。”但刑法中非但没有加入这一条，反而加进了一项镇压左派反对派本身的条款。

党内民主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老一辈人脑海中对它的回忆。苏维埃、工会、合作社、文化和体育组织中的民主也随着它一同消失。每一种和每一级这样的组织，都由党的书记实行着绝对的等级统治。早在“极权主义”这个名词从德国传出来好几年前以前，苏联就已经变成了“极权主义”国家。“通过使用各种涣散斗志的方法把有思想的共产党人变成机器，通过摧毁他们的意志、性格和人的尊严，”拉科夫斯基在1928年写道，“统治集团终于把自己变成了代替阶级和党的、无法排除的和不可侵犯的政治寡头。”从他写出这些愤怒的言辞到现在，苏联政权的蜕化又加重了好多倍。国家政治保卫局已经成为党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如果说莫洛托夫能够在1936年3月向一个法国记者吹嘘，宣布执政党内已不再有任何派别斗争，那也只是因为政治警察的自动干涉现在变成了解决争论的方法。往日的布尔什维克党已经死亡了，没有任何力量再能使它复活。

随着党在政治上的蜕化，不受监督的统治机器在道德上也开始堕落……

政权的取得不仅改变了无产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而且改变了它自己的内部结构。发号施令成了一个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权，这个集团愈是吹嘘自己的种种高尚使命，就愈是忙于解决它

是偶然性的现象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有机变化过程。雅各宾党人所依赖的，是被革命巨浪激起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可是，和生产力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十八世纪的革命，从长远说来只能使大资产阶级当政。热月政变不过是这一必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表现为苏联热月政变的，又是什么类似的社会必要性呢？……让我们再把理论上的预言和现实比较一下吧。“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有必要的，”列宁在1917年谈到刚夺得政权以后的那段时期时写道：“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同过去……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①这种消亡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主要表现为“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军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②镇压工作。接着，列宁提出了一个精湛的和无可非议的论点：“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③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消除了历史上的国家的主要任务——保卫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财产特权。

因此，按照列宁的说法，从剥夺者被剥夺的那一天起，也就是说，在新政权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经济和文化问题以前，国家的消亡过程就已经开始。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获得的每一个成功，都意味着国家的进一步消灭和消溶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这种消溶的程度是社会主义结构的深度和效率的最好标志。我们可以大致提出这样一条社会学定理：工人国家中群众运用强迫手段的程度，同剥削倾向的力量或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成正比，同社会团结和普遍忠于新政权的程度成反比。因此，官僚阶层——也就是“享有特权的官吏和常备军军官”——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强迫力量，它是群众

①②③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6—407页。——译者

不能够或不愿意运用的，并且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针对着群众本身。

假如民主的苏维埃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原来的力量和独立性，但不得不以早年的规模采取种种镇压和强制手段，这一现象本身就会引起我们的严重忧虑。因此，当我们看到群众性的苏维埃已经完全从舞台上消失，而把强制职能交给了斯大林和雅果达这一伙人的时候，我们该是多么震惊便可想而知了。而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强迫啊！首先，我们必须问一问自己：国家的这种顽强生命力，特别是它的警察化，是由什么社会原因造成的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是根本修改我们对一般社会主义社会的传统看法，或是根本否定苏联官方的估计。

现在让我们从最新一期莫斯科报纸上举个例子，这是一段对苏联现政权的千篇一律的说明，是苏联全国天天重复着的和小学生们背诵着的口头禅：“在苏联，寄生的资本家、地主和富农阶级已经被完全消灭，从而永远结束了人对人的剥削。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着的斯塔哈诺夫运动正在为我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真理报》，1936年4月4日）不用说，共产国际的世界性报刊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是鹦鹉学舌。可是，假如剥削已真的“永远结束”，假如国家已真的处在从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最低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更高阶段的道路上，那么，社会要做的事就只有最后摆脱国家的束缚了。然而，苏维埃国家非但没有消亡（这样一种对比甚至是人们很难体会到的），反而具有了一种极权官僚主义的性质。

同样的致命矛盾也反映在党的命运上。在这里，可以大致提出如下的问题：为什么从1917到1921年，当旧的统治阶级还手持武器正在进行战斗的时候，当他们获得全世界帝国主义的积

极支持的时候，当武装的富农正在破坏军队和粮食供应的时候，仍然有可能在党内就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公开地和毫无顾忌地进行争论呢？为什么在今天，当外国干涉已经停止、剥削阶级已被粉碎、工业化已无疑成功、绝大多数农民也已经集体化之后，反倒不准人们对永远把持着权柄的领导者提出一点点批评呢？为什么一个布尔什维克按照党章规定要求召开党代表大会就会被立即开除，一个公民对斯大林的永不会犯错误略表怀疑，就会遭到审判和处刑，几乎像是参加了恐怖活动一样呢？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种可怕的、规模巨大和不可容忍的镇压制度与警察机器呢？

理论不是一张可以随时兑现的支票。如果事实证明一种理论是错误的，我们就必须修改它或弥补它的缺陷。我们必须找出那些使苏联的现实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迥然异样的真实的社会力量。我们决不能在黑暗中徬徨，只是重复一些有助于维护领导的威望但被活生生的现实打了耳光的陈词滥调。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举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

1936年1月，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宣称：“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鼓掌）。就这个意义来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消灭阶级的问题（鼓掌）。”可是，今天还存在着过去遗留下来的“生来就敌视我们的分子”，即以以前的统治阶级的残余。而且，在集体农民、国家雇员以及有时在工人当中，还发现有“小投机者”，“盗窃集体财富和国家财富的人、反苏维埃的窃窃私语等等。”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专政。同恩格斯所说的相反，工人国家决不能“睡觉”，而必须愈来愈警惕。

这位苏联政府首脑所描绘的图画，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得厉害，本是十分令人安心的。社会主义已取得完全胜利：“就这个意义来

说”，阶级已经被消灭。（如果说它们在这个意义上被消灭了，它们也就是真正被消灭了。）当然，过去遗留下来的残余分子会在这里或那里破坏社会和谐，但我们很难想像，零零落落几个已经丧失权力和财产的梦想资本主义复辟的人，加上“小投机者”（甚至还不是**投机者**！）和“窃窃私语”，就能够推翻无阶级的社会。照他说的话看来，一切似乎都极其顺利。可是，情况如果真是这样，铁的专政和官僚阶层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呢？

我们必须认为，那些反动的梦想家是会一天天少下去的。对于那些“小投机者”和“窃窃私语”，特别民主的苏维埃可以一笑置之。“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列宁在 1917 年这样回答了那些大谈官僚国家问题的资产阶级和改良主义理论家，“我们丝毫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然性。但是……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①这些话听起来就好像列宁预见到了后来的一个政府领导人所说的东西，特地写出来反驳他一样。全苏联的公立学校里都讲授列宁的学说，但人民委员会里的人却似乎没有学过列宁的理论。要不然，我们便不可能解释莫洛托夫何以那样大胆，竟敢不假思索地求助于已经被列宁的犀利论锋完全粉碎的理由。革命的奠基人和他的不肖后辈之间就是这样大相径庭！列宁认为，即使是消灭剥削阶级的任务，也可以在沒有官僚机器的情况下完成，而莫洛托夫在解释官僚机器何以于阶级消灭以后还要扼杀人民的独立性时，却找不出比大谈其被消灭的阶级的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50 页。——译者

“残余”更好的借口。

可是，由于官僚阶层本身的权威代表也承认，过去的阶级敌人正在被苏联社会成功地同化，依靠这些“残余”过日子便相当困难了。譬如说，在1936年4月举行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之一波斯特雪夫就曾说过：“许多破坏分子……都已真诚忏悔，加入了苏联人民的行列。”鉴于集体化已经成功实现，“富农的子女今后不用再为他们的父母负责了”。而且，“富农本身现在也很难相信他们还有可能恢复以前在农村中的剥削地位”。政府取消了同社会出身有关的限制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如果说波斯特雪夫所作的并得到莫洛托夫完全同意的这份报告有什么意义的话，它的意义只能是：不仅官僚阶层的存在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时代错误，一般的国家强制在苏联也失去了任何作用。然而，不论是莫洛托夫或波斯特雪夫都不同意这个必然的推论。他们宁愿自打嘴巴，也要保持国家权力。

事实上，他们也无法摒弃国家权力。或者用客观的语言来说：目前的苏联社会不可能在没有国家乃至——在一定范围内——官僚阶层的情况下存在。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决不是一点点过去的残余，而是目前存在着的强大力量和趋势。所以要有一个作为强迫机器的苏维埃国家存在，乃是由于目前的过渡结构仍然充满着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消费领域——所有的人最密切和最敏感地注意到的一个领域——中表现得特别紧张，而且时刻有可能要扩大到生产领域中去。社会主义的胜利既不能说是已成定局，也不能说是已经不可变更。

官僚统治的基础是社会在消费品方面的匮乏，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当商店里货物充盈的时候，顾客可以随时来买东西。当货物不多的时候，顾客就不得不排队。当队

伍很长的时候，就有必要派一个警察来维持秩序。这就是苏联官僚权力的起点。它“明白”什么人该得点好处，什么人必须等待。

乍一看来，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理当会减少特权的必要，缩小“资产阶级法权”的应用范围，从而削弱这种法权的保卫者——官僚阶层的立足基础。然而，事实上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况：直到目前为止，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同时加强了各式各样的不平等、特权和优待，从而加强了官僚主义。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

在最初一段时期，苏联政权无疑要比现在平等得多，官僚主义性质也远没有现在这样严重。但那是一种普遍贫困的平等。当时，国家是如此贫困，因而没有机会从人民群众中分离出一个广泛的特权阶层。与此同时，使人们丧失个人积极性的工资的“平等化”性质，也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阻碍。在享受优渥的特权待遇成为可能以前，苏联的经济必须先摆脱贫困和有所提高。目前的生产状况还远不能保证每个人的一切需要，但已足够使少数人得到可观的特权，并且把不平等化为刺激大多数人的动力。迄今以来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并没有加强国家的社会主义特点，而是增进了它的资产阶级性质，第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除去目前阶段决定资本主义报酬方式的经济因素以外，还有一个体现为官僚阶层本身的政治因素平行地起着作用。它实质上正是不平等的培植者和保护人。它最初作为工人国家的资产阶级机关而兴起。在树立和保卫少数人特权的进程中，它当然把最肥美的肉夹进了自己的碗里。没有一个负责分配财富的人会亏待他自己。因此，原来是出于社会需要而产生的一个器官，现在已大大越出了社会需要它履行的职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因素，从而使整个社会机体受到巨大的威胁。

这样，我们便开始看出苏联的热月政变的社会意义。群众的

贫困和文化落后，再次从一个手持大棒、穷凶极恶的统治者的形象中体现了出来。已被废除和遭到谴责的官僚阶层，又一次从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它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同人民群众的社会距离和精神距离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它现在已不能允许自己的活动或收入受到任何控制。

因此，官僚阶层那样害怕“小投机者、盗窃国家财富者和窃窃私语”，看上去便不再神秘，而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了。由于还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苏联经济时刻在造成和复活盗窃与投机的趋势。另一方面，新贵族的特权使人民群众产生了爱听反苏“窃窃私语”的倾向，也就是说，只要是批评——虽然是小声地——贪得无厌的头子们，总可以找到听众。所以，造成问题的并不是过去的幽灵，并不是业已不复存在的旧事物的残余，一句话，并不是去冬的残雪，而是新的、强有力的、不断复活着的个人积累倾向。以其规模而言还是很可怜的第一阵繁荣的浪潮，正由于取得的进展还很可怜，并没有削弱而是加强了这种离心倾向。另一方面，在无特权的群众当中则同时滋长了一种反抗新贵族控制的情绪。社会斗争再次尖锐化。这就是官僚权力的来源。但是，这种情况也给官僚政权带来了威胁。

阶级是由它们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主要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的。在文明社会中，财产关系得到法律的确认。土地、工业生产资料、交通运输事业和商业的国有化，加上对外贸易垄断，构成了苏联社会结构的基础。通过这些由无产阶级革命树立起来的关系，苏联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性质在我们看来基本上是确定不移的。

从它的居间和管理职能、它的致力于维持社会等级以及利用国家机器达到个人目的等方面看来，苏联的官僚同其他一切国家

的官僚(特别是法西斯分子)都是类似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巨大差别。在其他一切政权之下,官僚阶层对统治阶级的独立性还从来没有达到过这样高的程度。在资产阶级社会,官僚阶层代表着一个有教养的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拥有无数种手段对行政事务进行日常监督。在苏联,官僚阶层则爬到了无产阶级的头上,这个阶级还刚刚从贫困和愚昧中抬起头来,没有任何统治或领导的传统。法西斯分子上台以后,通过共同利益、友谊、婚姻等纽带同大资产阶级联结起来,而苏联官僚阶层则是在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染上了资产阶级的习气。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承认它不只是官僚阶层而已。它是苏联社会中不折不扣的唯一的特权统治阶层。

另一个区别也同样重要。苏联官僚阶层已经剥夺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以使用它自己的方法来保卫所取得的社会利益。但是,由于主要生产资料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把持政权的事实本身便在官僚阶层和国家财富之间造成了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关系。生产资料属于国家。但国家又可以说是“属于”官僚阶层。假如这些目前还是刚刚出现的新关系竟然得到巩固,变成了正常的和合法化的东西(不管是否遭到了工人的抗拒),它们从长远说来就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成果全部丧失。不过,目前就这样谈论至少还为时过早。因为无产阶级还没有最后表明态度。官僚阶层也还没有造成那种赞成它以特殊类型的所有制形式来进行统治的社会力量。它还不得不保卫作为它的权力和收入来源的国有制。就它这方面的活动来看,它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

如果把苏联官僚阶层说成是一个“国家资本家”阶级,那显然是经不住批评的。官僚阶层既没有股票也没有证券。它是按照行政性等级统治的方式招募、补充和更新的,独立于任何特殊的财产

关系之外。官僚个人不能把他利用国家机器的权利传给后代。官僚阶层是在滥用权力的形式下享受种种特权的。它掩盖着自己的收入；它装作自己甚至根本不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它把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据为己有，这意味着它具有社会寄生的性质。所有这一切都使苏联统治阶层陷进了一种极其矛盾、暧昧和不光彩的地位，尽管它独揽大权，并且有人们的歌功颂德作为烟幕。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变换了许多政权和官僚阶层，但它的社会基础却始终原封未动。它凭借着自己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使封建的和行会的关系不可能复辟。国家权力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它不是同资本主义发展相合作，就是对它进行遏制。但一般说来，以私有制和竞争为基础的生产力是自动起作用的。与此相反，从社会主义革命中产生的财产关系，则总是同新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体现在新国家的身上。社会主义倾向对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胜利，不是由经济自动产生的作用——我们离这种阶段还远得很——来保证，而是由专政采取的政治措施来保证的。因此，整个经济的性质以国家政权的性质为转移。

苏联政权的崩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计划经济的崩溃，从而导致国有制的废除。托辣斯和工厂之间的强迫纽带将被斩断。比较成功的企业将终于走上独立的道路。它们可能改变为股份公司，或是找出另一种过渡的所有制形式——例如工人参加分红。集体农庄将同时瓦解，而且这要容易得多。因此，如果目前的官僚专政垮台，而又没有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权来代替它的话，那就将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恢复并同时造成工业和文化的严重衰退。

但是，如果说为了保存和发展计划经济，一个社会主义政府仍然是绝对必要的话，那么，目前的苏联政府以什么人为支柱以及通过什么措施保证它的政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就更为重要。

在1922年3月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列宁向领导集团说了这样几句实际上是给党的临别赠言：“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质；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的精神品质，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关紧要的东西。”^①存在决定意识。在最近十五年中，政府社会成分的改变甚至比它的思想的改变还要深刻。由于在苏联社会的一切阶层中，官僚阶层已经最好地解决了它自己的社会问题，从而完全满足于现状，因此，这个阶层已不能为它的政策的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任何主观保证。它只是在害怕招致无产阶级反对的范围内继续保持着国有制。这种使国有制得以保存的恐惧心理的产生，要归功于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地下党的存在，这个党是社会主义倾向反对资产阶级反动——热月政变派官僚阶层已完全成为这一反动趋势的代表——的最自觉的表现。作为一支自觉的政治力量，官僚阶层已经出卖了革命。但所幸的是，一次胜利的革命不仅代表着一个纲领、一面旗帜和一系列政治制度，而且代表着一整套社会关系。要想完全取消革命的成果，单是出卖它还不够，你必须把它推翻。十月革命已经为统治阶层所出卖，但是还没有被推翻。它具有巨大的抗拒力量，因为已经树立的财产关系、无产阶级的现实力量、它的最优秀分子的觉悟、世界资本主义的困境以及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等等，都给予它以支持。

为了更好地理解目前苏联社会的性质，让我们对它的未来作两种假设。第一种假设是，苏联官僚阶层被一个革命党推翻，这个党具有旧布尔什维主义的一切属性，并且武装着最近历史时期的世界经验。这样的党第一步将恢复工会和苏维埃中的民主。它将能够而且必须恢复各苏维埃政党的活动自由。它将同群众一道并

^①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53页。——译者

领导着群众，对国家机器实行无情的清洗。它将取消官阶和勋章，废除一切形式的特权，并且把劳动报酬的不平等限制到维持经济和国家机器所必需的程度。它将让青年获得独立思考、学习、批评和成长的自由机会。它将按照工农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大大地改变国民收入的分配方式。但是，就财产关系而言，新政权毋需采取革命措施。它将保存和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的实验。在政治革命即废黜了官僚阶层以后，无产阶级将有必要在经济领域中实行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但毋需进行另一次社会革命。

假如——现在来谈第二种假设——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将来推翻了苏联统治阶层，在目前的官僚、行政人员、技术人员、经理人员、书记和一般的特权上层集团中，它将找到为数不少的现成奴仆。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有必要清洗国家机器。但是，一次资产阶级复辟所要清洗出去的人，多半要比一个革命的党所要清洗的少得多。新政权的主要任务将是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首先，它必须设法创造条件，使软弱的集体农庄中发展出坚实的农户，并把强大的集体农庄变为资产阶级类型的生产合作社——农业股份公司。在工业领域中，取消国有化将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开始。在过渡时期，计划经济原则将变成国家政权和个人“公司”（也就是苏联工业巨头、流亡国外的前厂主和外国资本家当中的潜在业主）之间的一系列妥协。虽然苏联官僚阶层已经在准备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上走得很远，新政权在财产形式和产业活动方式的问题上还得进行一次社会革命而不单是进行改革。

再假定——这是第三种变化情况——既没有一个革命的也没有一个反革命的政党取得政权。官僚阶层继续统治着国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关系也不会令人满意。我们不能指望官僚阶层为了社会主义平等，会和平地和自愿地放弃特权。如果说官僚

阶层认为它现在就能恢复官阶和勋章制度，尽管这样做显然很不方便，那它将来也必然能够在财产关系问题上寻求支持。有人也许会说，大官僚们是不太关心存在着什么财产形式的，只要他们的必要收入能够得到保证。这种说法不仅忽略了大官僚本身权利的不稳定性，而且忽略了他们的子孙的问题。新的家庭崇拜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特权如果不能够传给儿女，就只有一半价值。但遗嘱权和财产权不可分割。仅仅做一个托辣斯的经理是不够的，还必须做一个股东。官僚阶层在这个决定性领域中的胜利，将意味着它变成一个新的占有阶级。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官僚阶层的胜利则将保证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活。因此，第三种情况最后总要把我们带回头两种局面，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叙述了前两种。

把苏联现政权说成是过渡性或中介性的，就等于放弃了**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类明确的社会范畴。但是，这样一种定义除去本身完全不足以说明问题以外，还会使人发生误解，以为从目前的苏联政权只能向社会主义过渡。事实上，倒退到资本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要提出一个更完整的定义，内容必然要复杂一些，谈起来也比较噜苏。

苏联是一个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性质矛盾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a)生产力还不足以使国有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b)为需要所形成的原始积累倾向，通过计划经济的无数细孔流露出来；(c)保存着资产阶级性质的分配方式是新的社会分化的基础；(d)经济的发展虽然没有很快地改善劳动者的处境，却有助于迅速造成一个特权阶层；(e)由于利用各种社会矛盾，官僚阶层已使自己成为一个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不受控制的特殊等级；(f)社会革命虽然已经为执政党所出卖，仍旧存在于财产关系和劳

动群众的意识中；(g)正在积累的各种矛盾的进一步发展，既能够导致社会主义，也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h)在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反革命必须击败工人的反抗；(i)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工人们必须推翻官僚阶层。总之，今后的前途将要取决于国内的和世界舞台上的各种现实社会力量的斗争。

教条主义者无疑地将不会满意这种假设的定义。他们喜欢的是绝对化的公式：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假如社会现象永远具有一定不移的性质，社会学问题肯定就要简单得多。可是，如果为了保持逻辑的完整性，就把那些今天不符合你的图式、明天还可能完全推翻你的图式的因素硬从现实中排除出去，那便是一种再危险不过的做法。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特别注意了这一点，尽量不使那些史无前例的和富于变化的社会形态受到歪曲。科学的以及政治的任务不是把斩钉截铁的定義强加给尚未得出结论的过程，而是探究它的每一个阶段，分别开它的进步和反动倾向，揭示出这些倾向的相互关系，预见到可能有的发展前景，并在这种预见中找寻出行动的依据。

鲁道夫·希法亭：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 极权主义的国家经济？^①

“国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很难经得起认真的经济分析。国家一旦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唯一所有者，资本主义经济便无法再运行下去，因为维持这种制度存在的机构已经被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由资本主义所有人之间的竞争（“最终”形成价

^① 《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在1940年对斯大林俄国的看法》，载《现代评论》月刊，1917年6月号，第266—271页。

值规律的正是这种竞争)产生的价格,决定着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用于积累的利润比例和哪些部门进行这种积累。在一种必须一再克服危机的经济制度中,如何重新协调各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不论是在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方面,也都要由价格来决定。

资本主义经济受到各种市场规律(马克思对它们作了分析)的制约,这些规律的自发作用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决定性特征。可是,国家经济恰恰消灭了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它所代表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消费者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已不再是价格,而是一个国家计划委员会。价格和工资形式上仍然保存着,但作用已经不同,现在,决定生产过程的已不再是它们,而是规定它们的中央政权了。工资和价格变成了分配手段,决定着个人从中央政权交给社会支配的产品总额中得到的份额。它们构成了一种比个人直接摊派产品——此时已谈不上是商品——更简单的分配技术方式。价格已成为分配符号,对经济不再有任何调节作用。因此,虽然形式没有变,它们的作用已完全更改了。

“竞争的强烈刺激”和对于利润的疯狂追求,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动力,但它们在苏联已经消失。利润意味着个人占有剩余产品,因此只有在私有制的基础上才有存在的可能。可是,瓦勒尔先生反对说,马克思不是说过积累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而积累在俄国经济中不是又起着决定性作用吗?难道这还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瓦勒尔先生忽略了一点很小的地方,也就是说,他忘记了马克思指的是资本积累,是不断增长着的生产资料的积累,它们能带来利润,对它们的占有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推动力。换句话说,马

克思指的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的积累，也就是—种属于**资本主义**范畴的扩大经济活动的过程。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积累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独有特点，它在一切经济制度中——也许最原始的采集经济时代是例外——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一种消费经济、一种由国家组织的经济中，所积累的并不是价值而是消费品——中央政权为满足消费需要而需要的产品。单是俄国国家经济有积累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它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因为积累的东西不是资本。瓦勒尔先生的论点完全混淆了价值和使用价值。他居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能够在没有积累的情况下存在：

但这样一来，统治着俄国经济的中央政权——这里接触到了基本问题——又是什么东西呢？托洛茨基和瓦勒尔的答复是：“官僚阶层。”可是，虽然托洛茨基不认为官僚阶层是一个阶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阶级是由它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决定的），瓦勒尔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据他说，苏联官僚阶层的结构（不幸的是，他并没有对之进行分析）“基本上”不同于其他任何资产阶级，但它却仍然具有相同的职能——积累资本。不用说，结构上有巨大差别而职能仍然不变的事实当然是一种奇迹，是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但似乎（瓦勒尔说）在人类社会却能出现。

总之，瓦勒尔认为这就是证据，证明俄国由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着，从而也就是由国家资本主义统治着的。他死抱住那种混淆了资本和生产资料的概念不放，似乎不能理解资本主义积累以外的任何积累方式。他不懂得，积累（即扩大生产）在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中都是生产管理者的任务；即使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积累也只能产生自剩余产品（它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表现为剩余价值），而积累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

主义性质。

但是，“官僚阶层”是否真的“统治着”经济、从而也统治着人民呢？每一个国家、特别是苏联的官僚阶层都是由各式各样的分子组成的。它不仅包括狭义的政府官员（也就是从小职员起直到将军们甚至斯大林本人为止），而且包括一切工业部门的经理以及像邮政和铁路这一类部门的雇员。这样一支成分复杂的队伍如何能实行步调一致的统治呢？谁是它的代表？它如何作出决定？它掌握着什么机关？

事实上，“官僚阶层”并不是独立的秉政者，按照它的结构和职能来看，它不过是真正统治者手上的工具。它是按照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并服从领导的权力。它只接受而不发出命令。正如托洛茨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任何工作人员“在等级体系中都可能被上级当作替罪羊而牺牲掉”。能够说这些人是代替资本家控制生产的新主人吗？斯大林充分利用了这种神话，在最近几次清洗时，被他下令枪决的那些人当中就有数以千计的工业经理。

占据统治地位的不是官僚阶层，而是向官僚阶层发号施令的人。向俄国官僚发号施令的是斯大林。当初，在旧的国家机器崩溃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率领着一群干练的信徒夺取了政权。这些信徒从来也没有能够站在党的地位作出过独立的决定，他们始终是领导人手上的工具（后来的法西斯和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也是这样）。列宁和托洛茨基改变了国家机器，使之符合于他们作为统治者的利益，他们消灭了民主，建立起自己的专政，这种专政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在实践中却决非如此。这样，他们就建立了最初的**极权国家**——即使这个名称当时还没有出现。斯大林继续进行这项工作，利用国家机器消灭了竞争者，终于树立起掌握无限大权的个人独裁。

我们不应该抹杀这一现实，而在所谓“官僚阶层”统治的问题上做文章，事实上，官僚们和人民一样，也得唯命是从地服从政府。即使说他们能够分得主人的一点残羹剩饭，这种地位也是改变不了的，更何况他们的饭碗随时都可能打破，而且经常有丢掉脑袋的危险。他们分得的一点残羹在社会产品中并不占多大比例。不过，这种分化的心理影响却可能是十分巨大的。

上述事实造成了重大的经济后果。迫使经济服务于自己的目的，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的本质。经济失去了自己的规律，成为一种被控制的经济。这种控制一旦建立起来，便把市场经济变成消费者的经济。在此以后，需要的性质和范围便由国家来决定。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证明，这种控制一旦在极权主义国家实行以后，便立即迅速扩展，导致无所不包，就像俄国从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情况一样。尽管它们的出发点很不相同，这几个极权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现在已愈来愈接近。在德国，生产和积累的性质也由千方百计地保持和加强自己力量的国家来决定。价格失去了原有的调节作用，已变成单纯的分配手段。经济以及经济活动的代表者，都或多或少地听命于国家的指挥，正在变成国家的附庸。经济失去了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主要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界对德国以及俄国的当权者就没有巨大影响。但是，他们的影响却是有条件的、受限制的，并不能对政策实质起决定性作用。政策实际上是由一小撮当权者决定的。决定政策时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利益，他们关于维持、运用和加强自己权力的考虑，而政策制订以后，便以法律的形式强加于被控制的经济之上。主观的因素、政治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合理性”，所以在这些国家的政治中具有这样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此。

宗教信徒只相信天堂和地狱是决定性力量，宗派马克思主义

者只相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相信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宗派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理解，目前这种已取得独立地位的国家政权，正在按照它自己的规律展示出它的巨大威力，它已经把各种社会力量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并强迫它们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因此，不论是俄国的或一般极权主义的制度，都不是由经济性质决定的。与此相反，经济是为国家政权的政策所决定的，它必须为这个政权的目的服务。极权主义政权要依靠经济过活，但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经济，甚至也不是为了统治着经济的那个阶级——而资产阶级国家则不然，虽则它有时也可能追求自己的目的，像任何一个研究外交的人都能证明的那样。极权主义国家在历史上的例子，可以在后期罗马帝国时代、在依靠禁卫军统治的罗马皇帝的政权中找到。

不言而喻，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看来，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很难谈得上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对我们说来，社会主义总是和民主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按照我们的看法，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意味着把经济从一个阶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交给整个社会——一个实行民主自治的社会——去掌握。我们知道，在自由市场条件下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将要为一种“管理经济”所代替，但我们从没有想到，这种经济的政治形式竟会是无限专制。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是非常明确的，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将实行最大程度的民主：就连我们中间那些认为最严格地实行中央集权在过渡时期是必要的或不可避免的人，也同意这段时期只是暂时的，有产阶级被镇压下去以后便要宣告结束。随着阶级的消失，阶级统治即我们一般认为是唯一可能有的政治统治形式也将消失。这样，“国家便开始消亡……”

但是，历史这个“最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给了我们另一种教训。它教导我们，和恩格斯的指望相反，“对物的管理”有可能变成无限制的“对人的管理”，从而不仅导致国家脱离经济的制约，而且导致经济受制于国家。

一旦受制于国家，经济便保证了这种政府形式的长期存在。这样一种结果要归因于主要由战争造成的独特形势。诚然，这一事实并不排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但却多少改变了我们那种在完全不同的时期发展起来的、相当简单化的和图式化的关于经济与国家、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国家作为一支独立力量而出现的事实，使问题大大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政治（即国家）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便不容易从经济上说明它的特点。

因此，争论苏联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社会主义”性质，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它两者都不是。它所代表的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国家经济，也就是德国和意大利的经济日益与之接近的那种制度。

弗朗茨·博克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①

共产国际从1919年到今天的历史，实在是一段头绪纷繁的历史。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把整个时期串连起来的中心线索。这里没有任何高潮，事件似乎是一个接一个排列着的，在它们之间很难找到密切的联系。总起来看，共产国际的历史可以说是由一系列希望和失望构成的。俄国和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时常以为，革命

^① 《对俄国以外各斯大林主义政党的一篇重要批评》。 录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纽约1939年版，第413—429页。

即将在这个或那个国家爆发，胜利已经在望。资产阶级的阵线将被突破，而通过打开的缺口，世界革命即将到来。但事实往往是，他们所盼来的并不是成功而是失败。许多共产党在困难的斗争年代里通过巨大牺牲取得的进展，往往在几天之内就化为乌有，例如在 1923 年的德国、1926 年的英国和 1927 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追逐着一个不断欺骗他们的幻影，马克思所描绘的社会革命的幻影。〔共产国际的历史中包含着一系列波澜起伏，但却看不到任何稳定的进展和长时期的成功。〕

可是，现实虽然这样令人失望，共产党人的信念却十分坚定。他们每采取一种新政策、每对一个新国家发动进攻的时候，总相信这一次将和以往不同，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这一次的进攻将不会再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信念是，只要有一个懂得运用适当策略的真正“布尔什维主义”的党，就能够取得胜利。因此，每一次失败——而共产国际的历史也是一部失败史——都导致更换领导和政策。情况时常是这样：共产国际实行了一种“右”的政策，于是，它开始强调民主，同工人运动中的其他部分谋求合作，注意参加工人和一般下层阶级的日常斗争，结果，共产党在党员人数和影响上都有所发展。一切似乎都非常顺利，直到党企图从预备阶段跃入革命行动的决定性时刻。到那时，党才突然感到，不知道怎么回事，它已无力投入革命。这样，失败也就随之而来。共产党人相信，这种失败完全是由错误的思想造成的。在照顾群众的和平主义与合法主义“偏见”的过程中，共产党人本身也受到影响，变成了“机会主义者”——这就是正统的看法。

在这以后，党往往就要向左转。当初在党的群众影响最大的时候，他们并不去发动武装暴动，而现在，当大局已定、党已经失去

一切影响或者至少是一切胜利的机会时，他们却要冒险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举 1923 年的保加利亚和 1927 年的中国这两个突出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即使说没有举行突然的暴动，向左转也意味着政策的全部转变。共产党人突然否认民主国家同专制国家或法西斯主义之间有任何区别。他们同群众性的民主政党割断了一切联系。他们着手分裂工会。真诚地参加群众的日常斗争被斥为“机会主义”。号召革命的宣传代替了其他一切种类的宣传。从党内严格清洗了一切“机会主义”分子。但是，如果说“右”翼的政策导致了决定性时刻的失败，那么，“左”翼的政策便把党变成了一个微不足道、几乎毫无影响的小宗派，直到党的衰落有目共睹，再一次实行“右”的政策为止。情况就这样自左而右、自右而左地反复下去。

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愈来愈趋向极端。最初，政策上的“左”“右”之分还是不很明显的。只是在革命时期结束以后，这种区别才显现出来。以后，每一次向左或向右的转折在剧烈的程度上都超过以前。看来，共产党是想采取更极端的办法以避免重蹈覆辙。在共产国际政策的六个不同阶段，可以分辨出三个“左”的时期和三个“右”的时期。它首先采取“左”的路线，在 1920 和 1921 年这段时期，我们很有兴味地看到，社会民主党人还只被称为“社会爱国者”或“社会叛徒”等等。到 1924—1925 年的左倾时期，它们已经被看成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的第三党”了。最后，到 1929—1934 年的极左时期，他们便被扣上更厉害的帽子，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者”，而且，德法两国的共产党人还在实践中和本国的真正法西斯分子联合起来，共同打击“社会法西斯主义”。

第一次向右转是在 1922—1923 年，这时还只限于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策略，并且倾向于使用和工人阶级民主政党相同的语言。

可是，1925—1926年的第二次向右转，便已经意味着部分地取消了共产党任务的基本思想。季诺维也夫本人就宣称，革命在英国可以不通过共产党而通过工会来进行。此外，对美国的农场工人运动和克罗地亚的农民也抱有类似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接到命令，不许在任何方面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目前正处于第三次向右转的时期，当前的倾向意味着企图和社会党合流，否定一切革命意图，反对西班牙工人运动中的一切派别，认为它们过于冒进等等，关于这些我们就毋需赘述了。

在他们的政策屡屡变换的这些年代中，只有一件东西似乎是共产党人还没有想到的，这就是对手段和目的必须适应于形势的认识。诚然，在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迅速改变政策的过程中，通常总有一段共产党人实行中间路线的短暂时期，例如不久以前（1934年）共产党人就改变了态度，同其他一切民主力量共同保卫民主。可是，这些只是两个极端之间的过渡阶段。

根据对共产国际这一基本发展规律的描绘，我们立即可以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如果过分估计俄国的作用，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把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特点简单地看作“莫斯科命令”的产物，那就大错特错了。不错，莫斯科依靠它的威信和财力——最近甚至依靠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起的影响是巨大的。可是，莫斯科对共产国际的这种统治毋宁说是俄国以外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只要俄国以外还存在着比较有力量、的革命运动，这些运动就不会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尽管俄国革命的威信极高。在1919年的匈牙利专政时期，贝拉·库恩便断然拒绝过列宁的劝告，不愿和社会民主党人割断组织联系。罗莎·卢森堡和列维在领导斯巴达克团期间，也注意做到把俄国人当做盟友而不当做主人。中国苏维埃的

独立性更是超过共产国际的其他一切支部，只是在它们的力量被蒋介石的“围剿”粉碎以后，它们才完全变成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去年已决定全部解散。当共产国际在 1919 年即战后革命危机的高潮时期建立时，按理说它应该具有巨大的权威性。然而，事实上正是在 1919 年，它的力量显得十分微弱，因为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当时还不愿听命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作为莫斯科统治下的一个组织，其本身就是失败的产物。1920 年，当情况表明战后革命形势正在转入低潮的时候，莫斯科却时来运转了。直到这时，布尔什维主义的思想，那种认为工人运动不事先清洗掉内部的一切非正统分子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教条，才为欧洲大陆各社会主义政党遭到失败的左翼所接受，而共产国际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实行的分裂也是从这一假定出发的。只是这种分裂导致了群众性共产党的成立。新的共产党以为，共产党建立以后，成功的主要条件便已经具备，于是迫不及待地投入了战斗，结果只是在 1921 年 3 月的德国大灾难中体会到自己完全想错了，群众性共产党的存在并不能弥补群众革命情绪的低落。在共产国际诞生的时候，西方的革命已经结束。

这两个事件的同时发生并不是偶然的。在世界大战以前，没有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能够在分裂的状态下取得胜利。可是，战争的爆发恰恰造成了这样一种状态。恰恰是在阶级斗争的理想几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实际革命意义的时刻，全世界的大多数工人政党却埋葬了这些理想。信念坚定的少数革命派指责它们这样做是背叛。可是，所谓背叛云云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人们是否接受它要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一个正直的人有义务做一个革命者。而大多数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当时则都认为，他们的义务是保家卫国。事实证明，对本民族的忠诚要比对社会的忠诚强有力

得多。那些革命家很久以后才接受了这一历史判决。甚至到 1919 年，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还以为，只要举起一面新的、革命的国际旗帜，各国工人就会迅速地团结到它的周围。可是事与愿违，这样，由二十一项加入条件造成的分裂，就从一个偶然事件发展成为持久的现实。规定各支部要不断清洗内部的二十一条，是以这样一个明显的假定为出发点的，即：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工人运动的大部分——更不用说下层阶级的其他部分了——常常都是改良主义的。可是，假如情况果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又如何能获得成功呢？通过它作为一个群众性组织而成立的事实本身，通过它所意味着的分裂的长期存在，共产国际就对它自己致力争取的、从没有过许多成功机会的无产阶级革命宣布了死刑判决。

随之而来的情况又是很自然的。在组织和经费问题上，只有很少信徒的各国共产党不得不依靠莫斯科的援助，从而沦为莫斯科的附庸。但更重要的仍然是意识形态上对俄国的依赖。对俄国已经完成的革命愈崇拜，真正的革命机会就愈为渺茫。东西方每一次革命的失败，都增加了人们对俄国的崇拜。在共产国际成立以后的头几年，人们还非常关心国外可能有的革命机会，时刻注意把这些利益同俄国的国家利益调和起来，但这种努力后来便逐渐改变了性质。另一方面，俄国把它自己的革命愈来愈抛到了后面。正因为革命在俄国已经是陈旧的事实，俄国对国外革命的推动力也就逐渐消失了。同时，世界各地的革命、至少是俄国欢迎的那种革命都转入了低潮。

中国革命的失败是这方面的转折点。在 1925 年，俄国的内部争论已开始大大影响共产国际。现在看来，中国革命左翼的机会确实被莫斯科断送了。在其他所有国家，革命机会只存在于共产党人的头脑中。在 1921 和 1923 年的德国，在 1926 年的英国，本

来是不可能发生革命的。但是，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被莫斯科的干预断送了，它企图使革命者的利益同自己的利益相一致，而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中国革命的失败摧毁了共产国际在全世界最后一个真正的机会。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就不再有自己的严肃任务，变成了莫斯科统治集团手上的玩物。1929—1934年的极左路线主要是斯大林在派别斗争中玩弄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动摇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俄国的地位。

希特勒上台以后，形势又为之一变。莫斯科从1921年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受到了严重威胁，感到它的革命历史成了自卫的阻碍。共产国际必须收起它那套极端主义的言论了，因为这些言论可能妨碍俄国找寻适当盟友的努力。这样一来，共产国际就自动变成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而在此以前，它主要的作用并不在这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显地分辨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共产国际主要是进行革命的工具。在第二阶段，它主要是俄国派别斗争的工具。在第三阶段，它主要是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这三个阶段之间的界限当然不那么严格。但有一件事是始终清楚的，这就是：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所有这一切发展只能是巨大背叛的结果。列夫·托洛茨基正在向全世界宣传，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国的革命本来是有可能成功的，只是由于斯大林的出卖才流于失败。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共产国际的发展——甚至俄国的部分发展情况——其实是由下列事实造成的：布尔什维克原来追求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根本就是一个幻影。经过许多次挫折以后，他们也不不得不在行动上间接承认了这一点，采取了一种现实的态度。共产国际职能的这种变化，才是它的真正发展趋势，那些或左或右的摇摆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已。

这种变化不可能不对各国共产党本身的结构发生影响。这种结构从一开始就完全不符合于共产党人对自己的党所抱的看法。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符合列宁的理想：它曾经是一批干练的队伍，一种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宗教集团，一支信奉唯物主义的十字军，是革命知识分子中最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最果断和最活跃的一批干部。但后来东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却决不是这个样子。它们基本上是由不断更换的党员组成的。党员们的这种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政策何以会时时变更。各国共产党奉行的政策是如此前后矛盾，以致不可能由同一批人来执行。

各国党的完全缺乏传统，出于同一原因。在斯大林命令人们阅读完全由他自己捏造的党史以前，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运动是以一世纪前革命者的继承人自居的，党员们对党的历史也都有清楚的记忆。可是，后来东西方各国共产党的党员几乎每五年一换，这些新党员愿意相信官方共产主义关于党史的最新解说。另一方面，对党史的认真研究则得不到鼓励。

这种缺乏一贯立场和传统的特点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后果：随着党员的更换，共产党的社会性质也有了改变。在1921年举行过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一段时期，比较重要的共产党都还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可是，这种情况早就改变了。在变更党员的过程中，共产党日益倾向于吸收“落魄”分子——落拓不羁和失去职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1929—1934年的极左时期，大多数共产党主要都是由这些分子组成的。今天，情况有了更可观的改变。在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农民和红军的党；在西班牙，它是一个由一切阶级组成而唯独没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党；在英美，它主要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党；在许多国家的国外流亡者当中，共产主义受到极大欢迎，但这些流亡者却大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有在法

国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群众中有真正影响的真正工人阶级政党。

共产国际社会结构的这种缓慢改变，使我们看到了造成它的历史的另一个原因。马克思和列宁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看来同真正的工人运动是互不相容的。不错，马克思和列宁的某些革命预言已完全应验。维护私有制和私人主动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无力应付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它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以后，确实如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便进入了不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周期，而且，正如大多数专家一致赞同的那样，对这种危机别无他法可想，只能通过国家控制、国家干预和计划经济来克服。此外，经济危机也确实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政治风暴。然而，他们有一点却肯定没有说中：他们本来以为，在这种危机的最严重时刻，无产阶级一定会发动革命，打倒一切有产阶级，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但事实并非如此。无产阶级在当代动荡局势中的这种领导作用，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想成分。在俄国，领导革命的并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一个由知识分子中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半宗教性集团，这个集团在农民、农民出身的士兵和工人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在西方，由于既没有这样的集团，也没有愿意追随它的群众，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证明完全是一个幻想。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许多，它们都同背叛问题很少有或者没有关系。即使所有的社会党领导人都曾经站在革命派一边，大多数无产阶级也会干脆脱离他们，另行依附某个比较温和的政党。因为设想无产阶级能够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胜利地反对其他一切阶级，这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念头。在西方，并不存在俄国那样的革命农民。而且，存在于俄国的那种人民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绝

对分裂，在西方也是完全看不到的。从西方的古老文明中得到好处的不仅是所谓工人贵族，工人阶级的一切阶层都不例外，他们全都有某些利益害怕失去，他们的一些主要信仰全都和上层阶级相同。如果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最发达的现代国家，所有的阶级和集团都变得过于“资产阶级化”了，以致使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了实际意义。

所以，现存社会制度的危机在西方只有两种解决方法：在某些国家中，一个由各阶级共同组成并且凌驾于各阶级之上的革命党，用铁腕把阶级斗争压制下去，使国内的一切集团矛盾都服从于本国为统治别的国家而进行的剧烈斗争。这就是法西斯主义。第二种可能是，在另外一些国家，各阶级之间存在着合作和妥协的传统，它们迄今以来一直能够把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并且为逐步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而合作。这就是进步的、和进化的民主国家的一般状况。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国中，此外再没有第三种解决途径。至于俄国、西班牙、南美、中国这类工业落后的国家，情形又当别论。

而且，根据本能和信仰，西方的工人运动也非常明白它为什么要维护民主。专政的成就可能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是，不论是德国危机的结束、意大利的殖民地扩张，还是俄国的五年计划，都没有使群众得到多大好处。工人阶级组织、特别是工会的活动自由，是保证工人分享本国经济和政治成果的主要条件。而工会的活动自由又取决于把自由作为整个政治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西方工人运动的这种自由主义和合法主义精神，共产党人只能抱两种态度：或是向这种精神低头，从而解散共产国际本身；或是向大部分工人运动宣战，他们实际上已这样做了。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便逐渐割断了同真正无产阶级的联系。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

克党的时候，提出过一条基本理论，认为革命的党决不是无产阶级的代理人，它必须是一个独立的集团，只是通过革命信念和无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种理论就包含了同无产阶级割断联系的可能性。西方的工党就是工人运动本身，党和运动不可分割。共产党只是和工人运动有联系，而联系则是可以割断的。

共产党人希望在自己的前进道路上充当无产阶级的领导者。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从一开始起就不是别的，而是建立自己的统治即共产党专政。因此，当西方无产阶级不响应他们的号召时，共产党人转向别处寻求支持便是很自然的了。为党和国际的权力而斗争，过去和现在都是他们的中心课题。所以，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共产党竟变成了一种无阶级的、依靠对它们的极权主义国家（俄国）和超人的领袖、斯大林“元首”的崇拜联合起来的党，也就不是任何背叛的产物，而是它们的基本理论最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了。共产党的这种转变并不新鲜，在那些深受革命折磨的国家中，早就有别的群众运动走上了这条道路。在1919年的东欧和中欧，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冲锋陷阵失败以后，革命的任务往往都由一种无阶级的和崇拜元首的党、即法西斯政党以不同的方式承当了起来。在这种不可避免的——除非是在顺利实行民主妥协的国家——发展中，共产国际只是参加者之一。

但它的这种发展又是自相矛盾的。共产国际今天所做的事，大部分都是在有意识地模仿法西斯主义：对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元首崇拜、民族主义、争取青年、军事气氛等等。可是，俗话说得好，“即使两个人做同样的事，结果也不会相同”。德国人崇拜的希特勒毕竟是一个德国人。法国工人却不能崇拜一个俄国人斯大林。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真正要为本民族扬眉吐气，建功立业。而代表外国打天下的法西斯主义则是荒诞不经的……一个摇摆于本国和

外国之间的运动，决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在它们本国具有的那种说服力。俄国不可能把它的革命移植到外国。它要想传播自己的极权主义制度，也将是同样不可能的……

在西方，共产主义运动一般说来顶多不过是给警察带来不少麻烦的一种现象。至于仍然坚持1917年原则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甚至连这种规模都达不到，而且今后也很难达到。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实在可怜得很，远不是它的狂热反对者所夸张的那样，那么，同样的话却不一定能应用到目前那些不革命的、目标比较狭隘的共产党的身上……

目前那种不革命的共产主义的号召力，是一种奇特的心理现象。这种号召力并不是来自革命纲领，因为共产党人已不再是革命者了；它也不是来自温和的纲领，因为守旧的温和政党比比皆是。造成这种号召力的是两个因素的奇特混合：一方面实行完全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政策，另一方面又相信“在地球的六分之一土地上”已经建立起天堂的神话。在国内，那些投票拥护共产党的群众，是决不会为了革命而反对民主的。因此，崇拜俄国的专政，通过为它服务来耽迷于自己在国内无法实现的、诽谤和消灭敌手的暴力冲动，便更加显得令人快意了。目前的共产主义运动实质上是一种信仰外国教主的运动；正因为如此，它是自由主义和民主趋于衰落的一个严重象征。自由主义和民主的本质就在于不相信什么教主，它们认为通过政治上获得解放的人民本身的力量完全可以搞好政治。共产党人也可能大谈其保卫民主和自由，而事实上，它们的号召力所依赖的基本冲动，却是同自由民主正好完全相反的。可是，这种在国内实行温和政策但又崇拜国外的暴力和恐怖的奇特结合，是不会长期持续下去的。目前，在大多数国家中，共产党的宣传都还没有触及真正的“劳动者”。假如这些真正的劳动

者在非常困苦的情况下一旦失去了对自由民主的信仰，真的要寻找一个救主的话，斯大林像片上的快乐微笑也并不会使他们得到安慰。到那时，他们将会皈依一个本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救主，就像他们在德国所做的那样。到那时，也和德国的情形一样，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变成法西斯党员。在那些法西斯主义还没有得到发展机会的国家中，目前这类形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代替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一种救主信仰；但它所崇拜的救主远在异国，而在一种比较缓和的形势下，对于远没有实际行动可能的社会集团来说，这种救主也比较适合他们的口味。然而，这方面的恶果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看到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已逐渐受到了破坏。正如共产党的经常干预每每对本国的外交活动构成了严重障碍一样，共产党的斗争宗旨对欧洲政体的基本力量也经常是一种威胁。问题并不在于共产党打算推翻现今的政体；与此相反，对于民主国家的实力和战斗能力，很少有人像斯大林那样强烈地感到兴趣，虽然说只要俄国认为有必要改变外交政策，这种兴趣便会立即转向反面。不过，斯大林究竟想不想和民主国家结成联盟的问题并不重要。实际问题是，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对民主和自由构成了威胁，这样，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最后就多半会加强法西斯主义。

从民主国家的观点看来，自然产生了究竟有没有方法遏制住共产党活动影响的问题……民主国家不能利用意大利、德国和俄国习以为常的镇压手段，同时，实行一种给共产党“小鞋”穿的政策也是不智的，这只能激怒他们，而不能取得多大成效。但是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来，则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国际的价值究竟是否像乍看起来那样大？

事实上，我们可以肯定，国外共产党的存在虽然表面上带来了好处，但也使俄国在外交上承当了很沉重的责任。尽管它力求成

为一个军事强国，尽管它费尽心机把革命的过去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俄国迄今还没有争取到一个可靠的盟友……各大强国所以不愿和俄国联合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共产国际的存在。同时，共产国际为法西斯国家提供了振振有词的侵略口实，而民主国家中那些主张同德国而不是俄国合作的右翼政党，也正是以这一点为理由的。通过共产国际所属各党的活动，俄国在民主国家的政治斗争中所起的影响是很可疑和很有限的，肯定抵不上为它付出的代价。一旦发生大规模的国际冲突，共产国际十之八九将表现出毫无用处，只会加深俄国的孤立，并促使许多本来可能守中立的力量联合起来反俄。要消除这些后果，单是把老共产党员全部砍头还不够。共产国际的存在本身，就在一般舆论中引起了不安，这种不安是由它原先追求的目标造成的。谁也不敢肯定，到最后的紧急关头，共产国际难保不恢复它原来使用的方法。只要共产国际存在着，西方的一般公民甚至一般政治家，就仍然会以1917年革命后的情形来衡量俄国，而不会根据处决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以后的状况来看问题。因此，为它自己的利益着想，俄国也应该解散共产国际，并且以不干涉国外事务的审慎行动表明，它所说的赞同民主国家的宗旨不是空话，人们能够像对待民主国家那样对待它。这样一来，各个民主大国和俄国的密切合作就变得切实可行了，而单是这种密切合作的可能性便会大大有助于维护和平和防止侵略。

事情能否这样解决，主要将取决于莫斯科领导人的心理。不幸的是，斯大林及其部属的态度恰恰是国际政治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之一。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一向就不甚了解西方，不了解它的观点、情绪和动力，这已经不止一次地使它遭到惨重的失败。而且，俄国人还经常以形而上学的绝对化态度，玩弄一种天真的政治

权术。列宁和一般老布尔什维克早就认为：资本家的一切诺言都是谎话，一切理想都是欺骗。在斯大林统治下，这种看法变得更趋于极端，竟发展到把一切人都看做是坏蛋。在俄国的国内政治和共产国际的活动中，两面手法时常玩弄得如此过火，以致往往破坏了它自己的目的。斯大林这样一个容不得一个老伙伴活下来的人，当然决不会相信国际领域中有真诚合作的可能。像斯大林这样一个人是不可理喻的。不过，现在还存在着一线这样的希望：事实将使他受到教训，因此，到他最后面临着完全孤立和真正解散共产国际的抉择时，他将会选择后者。从他本人以及他的共产国际口口声声表示尊重的那些理想的角度看来，这样做将是十分可取的：这将大大有助于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事业，有助于表现俄国人民的诚实与伟大。

艾萨克·多伊彻：前共产党人的良心^①

伊格纳齐奥·西洛内^②谈到，他有一次曾向意大利共产党领袖陶里亚蒂开玩笑地说过这样一句话：“最后的斗争将是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之间的斗争。”这句玩笑话里包含着辛辣的真理。因为在反苏反共的宣传战中，最活跃的狙击兵就是以前的共产党员或同路人。以一种不同于西洛内的抱怨口吻，奥尔托·凯斯特勒^③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你们这些称心如意的、偏狭的盎格鲁-萨克逊反共人士，总是对我们抱这样一种态度：憎恶我们的醒世危

① 对《破产的上帝》(The God That Failed)一书的评论，录自《俄国在转变中》(Russia in Transition)，1957年版，第223—236页。

② 伊格纳齐奥·西洛内(1900—)，意大利作家。——译者

③ 奥尔托·凯斯特勒(1905—)，美国籍匈牙利作家。——译者

言，不愿把我们当做盟友——可是，归根到底，在你们这一边，只有我们前共产党人才真正了解情况。”……现在，有六个作者——凯斯特勒、西洛内、安德列·纪德^①、路易·费歇尔^②、里查德·赖特^③和斯蒂芬·斯宾德^④——联合了起来，共同揭露和摧毁“破了的上帝”。

前共产党人的“军团”并不是以密集队形前进的，而是零零落落，分散得很厉害。他们彼此很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同时各有个人的特色。他们全都脱离了一支军队和一个阵营——有的是在良心的驱策下实行倒戈的人，有的则是逃兵和趁火打劫者。少数人不声不响地坚持着根据他们的良心而采取的反对立场，其余的人却大嚷大叫，要求在他们原先剧烈反对的军队中得到安插。所有的人都仍然穿着褴褛不堪的旧制服，但又都套上了一些新拣来的破烂衣衫。所有的人都怀着一腔怨恨和个人的往事回忆。

他们的入党时期有早有晚；这个日期对他们以后的经验是有关系的。譬如说，那些在二十年代入党的人，参加的还是一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前景的运动。党的结构当时仍然是流动的，它还没有被铸成极权主义的死板格式。一个共产党人思想上的诚实还是被看重的，它还没有降格到永远服从莫斯科的国家需要。而那些在三十年代入党的人，他们的水平从一开始就要低得多。从一开始，他们就像新兵一样，在党内军营的操场上，被党的军曹呼来喝去。

① 安德列·纪德(1869—1951)，法国作家。——译者

② 路易·费歇尔(1896—)，美国新闻记者。——译者

③ 里查德·赖特(1908—)，美国小说家。——译者

④ 斯蒂芬·斯宾德(1909—)，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译者

这种区别使前共产党人的回忆各有不同内容。1921年入党的西洛内，怀着真正的热情回忆了他同党的最初接触；他生动地描绘了早年共产党人的队伍中是如何慷慨激昂，意气风发。而三十年代入党的凯斯特勒和斯宾德的回忆，则表现出党对他们的最初影响在思想上和精神上都是多么贫乏。西洛内及其同志在投入繁琐的日常任务以前和以后，都热烈地关心着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但在凯斯特勒的回忆中，党分派给他的“任务”从一开始就使他的一切个人理想和信念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早年加入共产党的人，在变成或者被训练成傀儡以前总还是一个革命者。而后来加入共产党的人，则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呼吸到真正的革命空气。

不过，纵然如此，几乎每一个人最初的入党动机都是相似的，如果不说是完全一样的话。这些动机是：遭到社会的不公平待遇或社会地位下降；由于经济衰退或社会危机而感到自身没有保障；迫切希望在摇摇欲坠的现代社会迷宮中找到一个可靠的精神指针，找到一个伟大的理想或目标使自己有所寄托。这些新来者感到，资本主义旧秩序造成的苦难再也无法忍受了；同时，俄国革命的灿烂光辉又把这些苦难衬托得分外明显。

社会主义、没有阶级的社会、国家的消亡——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指日可待的事。很少有人预先知道，将有多少鲜血、汗水和眼泪等待着他们。对这些新入党的人说来，思想上皈依共产主义以后，自己就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普罗米修斯——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将不会由于宙斯的愤怒而被锁在高加索的岩石上。“从此以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凯斯特勒回忆他当时的情绪说]能破坏皈依者内心的平静了——除去偶然担心自己万一再失去信仰……”

现在，我们的前共产党人咬牙切齿地说，他们的希望被出卖了。这在他们看来几乎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当他们滔滔不绝地

谈论自己早年的期望和幻想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却并不生疏。幻想破灭的华滋华斯^①和他的同时代人，正是这样回顾他们青年时代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崇拜的：

“活在那个黎明是极大的欢乐，
但青春的岁月才是真正的天堂！”

这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一怒而脱党的做法，可以在历史上找到若干高贵的先例。贝多芬曾在《第三交响乐》乐谱的里封面上题辞，表示把这部作品献给拿破仑，但他在听到第一执政快要当皇帝以后，便立即把这页纸扯下来撕成了碎片。华滋华斯曾把拿破仑的戴上王冠称为“全人类的厄运”。当他们发现这位科西嘉的人民解放者和暴君之死敌原来也是一个暴君和压迫者的时候，全欧洲热情拥护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曾为之目瞪口呆。

当代的华滋华斯们看到斯大林同希特勒、里宾特洛甫之流握手言欢的时候，也感到了同样的震惊。如果说现代并没有创作出新的《第三交响乐》，至少那些没有写下来的交响乐的题辞页，已不知被愤怒地撕碎过多少张了。

在《破了产的上帝》一书中，路易·费歇尔带着几分悔恨的情绪，不太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他何以会长期崇拜斯大林。他分析了决定人们到什么时候不再被斯大林主义迷惑的各式各样的动机，这些动机有的起作用很慢，有的则很快。使得欧洲人对拿破仑幻想破灭的原因几乎是同样各不一致和变化无常的。曾经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写过《解放者波拿巴颂歌》的意大利大诗人乌果·福斯科洛，早在签订了坎波·佛米奥和约^②的那一年便转而反对他

^① 威廉·华滋华斯(1770—1850)，英国反动浪漫主义诗人，早年拥护法国大革命，以后转入了反动阵营。——译者

^② 1797年，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从意大利进入奥国，奥军连连失败，被迫签订了这一和约，承认法国占领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译者

素所崇拜的偶像，因为这项和约一定已使一个来自威尼斯的“雅各宾党人”目瞪口呆，就像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的条约使一个波兰共产党人目瞪口呆一样。可是，像贝多芬这样的人却还要被波拿巴继续迷惑七年，直到目睹他撕下了共和的面具。拿破仑的这一行动，和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清党审判一样，叫人们“睁开了眼睛”。

一次伟大的革命竟被原来用以保卫它的铁拳所粉碎，这是世界的最大悲剧。一个革命后的暴政竟以自由的旗帜美化自己，这是世间最令人憎恶的景象。因此，前共产党人和前雅各宾派一样，在道德上是有理由揭露和反抗这种景象的。

然而，事情是否真像凯斯特勒所宣称的那样，“只有前共产党人……才真正了解情况”呢？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地说，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一切人当中，最不了解情况的正好是前共产党人。

不管怎么说，前共产党文人这类书呆子气的结论，看来是过于夸张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西洛内是一个显著的例外）都从来没有进入过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核心，从来没有参与过它的公开或秘密组织的机要。一般说来，他们只是在党的大门边上从事文学或新闻活动。他们对共产主义学说或思想的认识，通常都产生自他们自己的文学直觉，而这种直觉有时候虽然敏锐，却常常使人受到蒙骗。

更糟的是，前共产党人还有一个他们所特有的缺点：他们做不到超然物外、心地无偏。他们在感情上永远摆脱不了对以前环境的憎恶，从而不能够真正理解他们曾被卷入或与之有过瓜葛的那些戏剧性事件。他们所描绘的共产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世界，是一间充满了思想和道德恐怖的巨大黑房。这种图画把无知识的人纯粹从政治领域带进了魔鬼研究学的天地。有时候，艺术效果可能是强烈的——恐怖和魔鬼的确时常在杰出的诗篇中出现；但这种

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乃至于是危险的。当然，斯大林主义的历史中确实有很多恐怖的东西。然而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而且，就连这个带有魔鬼色彩的方面，也必须从人的动机和利益的角度上予以解释。可是，前共产党人连进行这种解释的打算都没有。

在难得看到的一个真正进行自我批评的片断中，凯斯特勒作了以下的自白：

“一般说来，我们的回忆总是把过去浪漫化了。但是，当一个人抛弃了一种信仰或是被一个朋友出卖了的时候，就会产生相反的心理。在后一种心理的影响下，原来的经验往往失去了它的纯洁色彩，在回忆中变得肮脏而令人嫌恶。在这篇文章里，我本想重新描绘出我经历这段[在共产党内的]生活时的原有心情，可是我知道，我的企图未能实现。嘲讽、愤怒和羞愧的感情时时袭来；往日的热情似乎变成了精神倒错，过去那种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事业，现在看起来活像是一个吸毒者，只沉溺于一点可怜的嗜好之中；受到责难的回忆的广场上，横亘着铁丝网的阴影。那些深受过当代伟大幻想的影响并且经历了它的道德和思想堕落的人，不是染上了一种相反类型的新嗜好，就是要终生忍受心灵创伤的折磨。”

当然，不一定所有的前共产党人都是这样。有些人也许仍然觉得，他们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并没有凯斯特勒描绘的那种病态色彩。但尽管如此，凯斯特勒的话依旧有很大的代表性，在这里，他坦率而真实地说出了他本人也是其中的一员的那一类前共产党人的特点。成问题的只是，我们很难把这种自我画像同他的另一种吹嘘调和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很难相信他所说的这样一些人物是“唯一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一个外伤休克患者也就有权利说，只有他才真正懂得创伤和外科了。前共产党知识分子最了解的或者说最有体会的，是他们自己的创伤，但他们并

不知道造成这种创伤的外部暴力的性质，更不用说治疗方法了。

不正常的感情用事决定了许多前共产党人的发展。“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对活动的这种逻辑，”西洛内说，“已经使许多前共产党人远离了他们的出发点，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使他们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们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几乎每一个前共产党人都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和自己的党决裂的。一开始，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要保卫社会主义理想，使之不受听命于莫斯科的官僚阶层的蹂躏。一开始，几乎每一个人都是要把俄国革命的污水泼出去，以保护澡盆里的孩子。

可是，或早或晚，这些动机便被忘却或抛弃了。在以共产主义的名义和党的官僚决裂以后，这些异端分子也就逐渐和共产主义本身决裂了。他们声称，他们已发现祸害的根源比最初想像的要深得多，虽然他们在挖掘“根源”的工作上也许是非常懒惰和非常肤浅的。他们不再保卫社会主义不受无耻的诽谤了；他们现在要保卫人类免遭社会主义谬误的危害。他们不再要泼出俄国革命的污水以保护孩子了；他们发现，这个孩子原来是一个必须勒死的怪物。这样，异端分子就变成了叛徒。

他们会离开出发点有多远，他们是否会像西洛内所说的那样变成法西斯分子，这要视每个人的倾向和气质而定。而斯大林主义对异端分子的愚蠢迫害，往往把前共产党人逼得走上了极端。但是，不论个人的态度之间可能有什么差别，前共产党知识分子一般都不再反对资本主义了。他们往往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卫士，而且在进行这一活动时不择手段、心胸狭隘、无视真理，满怀着斯大林主义在他们心中造成的深仇大恨。他们仍然是宗派主义者。他们变成了颠倒过来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仍然把世界绝对化地分成黑白两半，但是把原来的黑白双方掉换了位置。过去，作为共产党

人，他们看不出法西斯分子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现在，站在反共的立场上，他们又看不出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不同。过去，他们曾听信党的吹嘘，以为它永不会犯错误；现在，他们相信自己是永远正确的。他们曾一度沉溺于当代的“最大幻想”，现在，他们又深深陷入了当代最巨大的幻灭。

他们早先的幻想至少还体现了一个正面的理想，而他们目前的幻灭则完全是否定性的。因此，他们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便不会有什么积极建树。在这一点上，他们也和拿破仑时代忿懑的前雅各宾党人一样。华滋华斯和柯勒律治^①永远不能摆脱对“雅各宾危险”的莫大恐惧；这种恐惧甚至使他们的诗才都失去了光辉。正是柯勒律治在下院里谴责了禁止虐待牲畜的议案，说它是“立法雅各宾主义的最鲜明例子”。前雅各宾主义者变成了英国反雅各宾反动政策的推动人。“禁止煽动性著述与叛乱性通讯法”、“反叛乱法”和“禁止煽动性集会法”（1792—1794）的通过，议会改革的失败，“人身保护法”的停止生效，英国少数教派的解放被推迟了整整一代时间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前雅各宾主义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发生的。由于正在同革命的法国交战，“不宜于此时胡乱进行实验”，奴隶贸易的寿命也得到了延长——而且是以自由的名义。

我们的前共产党人也与此类似，他们出于最良好的动机，干着最恶劣的行为。他们勇敢地奔跑在一切政治迫害的最前列。他们对自己以前的理想所怀的盲目憎恨，是促成现代保守主义的发酵剂。把最温和的“福利国家”说成是“立法布尔什维主义”，在他们当中也并不少见。他们大大帮助形成了这样一种气氛，在这种气

^① 萨缪尔·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反动浪漫主义诗人，政治立场和华滋华斯相似。——译者

氛中，产生了英国反雅各宾反动派的现代化身。他们的反常行为反映了他们所处的困境。这种困境并不只是为他们所独有——这是一整代人在其中朝秦暮楚混日子的一条死胡同。

这里所举的历史类比，可以扩大到两个时代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今天的世界分裂为斯大林主义和反斯大林主义联盟两大阵营，同当年的世界分裂成拿破仑法国和神圣同盟非常相似。这是一种被暴君利用的“蜕化”了的革命和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保守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分裂。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不论是今天或那时，人们只能作非此即彼的选择。然而，这场争执的是非曲直已经成了这样一大本糊涂账，以致人们不论选择哪一方，并且不论实际的动机如何，从长远的和最广泛的历史意义说来，都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

一个正直的和具有批判眼光的人不可能顺从拿破仑，就像他现在不可能顺从斯大林一样。但是，尽管拿破仑使用了种种欺诈和暴力，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却存在了下去，在整个十九世纪都引起了强烈的回响。神圣同盟把欧洲从拿破仑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在很短一段时期内，大多数欧洲人都为它的胜利欢呼。可是，卡瑟尔累、梅特涅和亚历山大一世能够给“解放了的”欧洲作出的贡献，只是保存一种腐朽的旧秩序。这样，由革命产生的一个帝国的虐政和侵略性，便延长了欧洲封建主义的寿命。这是出乎前雅各宾主义者意外的胜利。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久以后，他们本身和他们的反雅各宾事业也都变成了邪恶而又可笑的时代错误。在拿破仑战败的那一年，雪莱向华兹华斯写了这样的诗句：

“在可敬的贫困中，你构制了
献与自由、献与真理的歌唱——
但你竟舍弃了它，我不禁哀悼

过去你如彼，而今天竟是这样。”^①

假如我们的前共产党人稍有一点历史感的话，他们将会考虑这一教训……

“你的敌人比这还要坏上千万倍”，这也许就是《破了产的上帝》一书的题旨，以及该书所鼓吹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哲学。书中作者用以保卫西方反俄反共的高亢热情，有时会因为思想上的摇摆或残余意识形态的束缚而冷却。这种摇摆往往从他们自述胸怀的字里行间或是奇特的旁白中流露出来。

譬如说，西洛内依旧把墨索里尼上台前的意大利——作为共产党人，他曾反对过当时的制度——说成是“假民主”。他并不觉得墨索里尼垮台后的意大利要好一些，但他却认为反对这个政权的斯大林主义者“更要坏上千万倍”。西洛内肯定比这本书的其他作者更懂得，他那一代的欧洲人已经为实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哲学付出了多大代价。路易·费歇尔鼓吹“两条战线作战”，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资本主义，但后一种反对听起来非常软弱无力，不过是聊以遮羞而已；而他新近对甘地主义发生的崇拜，则使我们觉得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笨拙方法。更有甚于此的是凯斯特勒，在他的矫揉造作和反共狂热当中，他有时会暴露出内心中一些奇特的隐讳：“……如果我们观察一下历史，比较一下革命开始时提出的庄严目标和它们后来的可悲结局，我们便会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一个被玷污的文明如何玷污了它自己的革命产儿”（黑体是我加的）……如果说“革命的产儿”共产主义真的被它所反对的文明“玷污”了，那么，不论这个产儿是多么可厌，罪恶的根源便不在于它本身，而是在于那个文明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凯斯特勒本人却

^① 见《雪莱抒情诗选》。《外国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432页。——译者

又像[惠塔克·]钱伯斯那样狂热地“保卫”着那个文明。

凯斯特勒在结束他的自白时，还流露出了另一种甚至令人更为惊讶的思想：

“我为共产党服务了七年——正好是雅各为了娶拉班的女儿拉结而替他放羊的时间。七年期满以后，新娘子在晚上被送进了雅各的帐篷；只是到第二天早晨，他才发现自己热情等待了那么多年的并不是美丽的拉结，而是丑陋的利亚。我不知道他以后是否从那由于受骗而感到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不知道他以后是否还认为他真的相信过自己的幻想。我也不知道这个神话的幸福结局是否还有重演的可能，因为雅各通过再一次放羊七年的代价，终于得到拉结，使幻想变成了现实。由于他深爱拉结，七年的时间在他看来只是几天。”^①

人们或许会认为，雅各-凯斯特勒是否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过早地停止了替拉班-斯大林放羊，而应该耐心地等待下去，直到“幻想变成了现实”。

以上这些话并没有非难——更谈不上申斥——谁的意思。我要重新声明，它们的目的在于突出一种思想混乱的情况，而具有这种情况的不仅仅是前共产党知识分子而已。

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凯斯特勒愤愤不平地指责了那些自由主义者老好人，因为他们对前共产党人过于狂热的反共表现感到震惊，就像普通人厌恶“脱下僧服的教士带一个姑娘去跳舞”一样地厌恶这些人。

可是，那些自由主义者老好人也许倒是的，而且，他们对于这一类特殊反共人物的看法也许还要糟糕：在他们看来，这些脱下

^① 这个故事出自《圣经·创世记》第29章。——译者

僧服的教士“带着”的并不是姑娘而是婊子。前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完全混乱，使得他们不适宜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们总是怀着一块心病，模糊地感到他们不是背叛了自己以前的理想，就是背叛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或者和凯斯特勒一样，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背叛了两者，左右都难以做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要想方设法消除自己的犯罪感和不宁静的心绪，或是以特别坚定的姿态和狂热的反共活动作为掩饰。他们坚持要全世界相信，他们那不安的良心在一切人的良心中最为纯洁。他们可能已不再关心任何事业了——除去为自己辩护。而对于从事政治活动说来，这却是最危险的动机。

看来，前共产党知识分子只有一种不失尊严的态度可以采取，那就是超然于纷争之外。他们不论是参加斯大林主义阵营或是反斯大林主义的神圣同盟，都难免要违背自己的良心。所以就让他们站在任何阵营之外吧。让他们努力恢复批判的眼光和思想上的毫无偏颇吧。让他们打消染指政治的廉价野心吧。他们至少不妨做到使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如果说他们不能以自我谴责和自我否定为代价，换取到同世界保持虚假的和平的话。这并不是说，前共产党文人或一般知识分子就应该退隐进象牙之塔。（他们的心里还残留着过去对象牙之塔的轻视。）不过，他们却可以撤退到一座望楼里去。超然而又警惕地注视着这个乱得不可收拾的世界，敏锐地观察着它的风云变幻，并且平心静气地和踏踏实实地对它们作出解释——这就是前共产党知识分子唯一能对特别缺乏缜密观察和诚实解释的一代人作出的光荣贡献。（因此，当我们看到，在那些有才能的前共产党作家的著作中，观察和解释是那样少，而哲学空谈和说教又是那样多的时候，我们能够不感到惊讶吗？）

有人也许会提出：难道知识分子现在真的能冷眼旁观这个世界吗？即使说参加斗争会使他们同事实上并不是自己的事业联系起来，难道说他们真的能不参加任何一方吗？好吧，我们就来回答这种问题。我们可以举出历史上的几个人“知识分子”，他们在类似的情况下就曾拒绝同当时的任何阵营站在一边。他们的态度在他们的许多同时代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但历史却证明了他们的见识高于当时的各种爱憎之上。关于他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三个名字：杰斐逊、哥德和雪莱。这三个人都面临着拿破仑思想和神圣联盟的选择，虽然方式各有不同。但这三个人也以不同的方式拒绝了选择。

杰斐逊是英勇的早期法国革命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他甚至愿意原谅“恐怖”，但是却无法容忍拿破仑的“军事专制主义”。然而，他和波拿巴的敌人、即他所说的欧洲的“虚伪解放者”也没有交道可打。他的不偏不倚的立场不仅符合于中立的年轻共和国的外交利益，而且是从他的共和主义信仰和民主热情中自然而然产生的。

同杰斐逊不同，哥德正好生活在风暴的中心。拿破仑的军队和亚历山大一世的士兵轮番在他的魏玛扎营。作为公国的大臣，哥德看风转舵地向每一个入侵者低头。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人，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物外和遗世独立的态度。他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可歌可泣之处，同时对它带来的恐怖深感震惊。他欢呼法国大炮在瓦尔密发出的轰鸣，^①开辟了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纪，但他也看穿了拿破仑的愚蠢。他欢呼德国从拿破仑手上获得了解放，但他也痛切地意识到这种“解放”的可悲。他在这些以及其他问题上所抱的超然态度，使他博得了“神仙中人”的美名，而且这种

① 1792年9月，法国革命军队在瓦尔密打败了普鲁士侵略军。——译者

说法往往并不是阿谀之辞。但他所以有这种超凡入圣的气度，绝非由于他对同时代人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说法遮掩了他的立场的戏剧性特色：面对着是非功罪无法分清的斗争各方，他不能够也不愿意置身于任何一个阵营。

最后，雪莱则是以他那年轻而伟大的灵魂所怀有的全部激情、愤怒和希望，注视着两个世界的冲突：他肯定不是什么“神仙中人”。然而，他从来也没有听信过斗争各方的自我宣传。和那些比他岁数大的前雅各宾主义者不同，他始终忠实于雅各宾派的共和思想。因此，他是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而不是作为乔治三世英国的爱国者来欢呼拿破仑倒台的。他欢呼那个“在自由的坟墓上狂欢纵饮”的、“最没有抱负的奴隶”终于倒台。但是，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他也知道“威胁着正义的，还有一个”比波拿巴主义的暴力和欺骗“更永恒的敌人”，这就是体现为神圣同盟的“古老的习俗、合法的犯罪和血腥的信仰”。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三个人——杰斐逊、哥德和雪莱——都是置身于他们当时的巨大斗争之外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比那些满怀着恐惧和憎恨的参加者更忠实、更深刻地解释了那个时代。

大多数前共产党知识分子都倾向于步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的后尘，而不愿学习哥德和雪莱的榜样，这是一件多么可惜和多么可耻的事！

第十二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和 新修正主义者

[略]

帕米罗·陶里亚蒂：关于斯大林主义的九个问题
答记者问(1956年6月16日)^①

(1) 在你看来，苏联对个人迷信的谴责意味着什么？内政上的动机是什么？外交、政治、社会、经济、心理、历史方面的动机是什么？

苏联共产党人对个人迷信的谴责和对斯大林工作的批评，在我看来，恰恰意味着苏联共产党领袖们说过的以及正在重述的一切：不多也不少……

因此，应该习惯于这种想法：对苏联同志们来说，对斯大林和对迷信他个人提出的批评的意义，正是他们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说的。那么，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由于斯大林的错误和他个人迷信的结果，已经积累了一些消极因素，在苏联社会生活各部门、在党和国家活动的各部门形成了不利的、甚至是极端恶劣的局面。但是，要用一个总的概念把所有这些消极的方面概括起来，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这样做有产生过分的、武断的和虚假的概括的危险，也就是有认为苏联的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现实不

^① 见《反斯大林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第98、102—126、129—130、132—136、139页。

好而加以否定、批判的危险，这就会同历来的反动无稽之谈不谋而合。

比较不武断的概括是：从斯大林的错误中看出，由于个人权力逐渐侵害在根源上和性质上都是民主的集体机构，官僚主义、法制的破坏、停滞状态和社会有机体各种岗位上的部分退化等现象就积累起来了。但是，应该马上补充说一句：这种侵害只是部分的，它的最严重的表现大概是在国家和党的最高领导机构方面。随着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倾向：限制民主生活，在许多方面（技术和经济发展、文化活动、文学、艺术等）抑制思想和行动的主动和活跃。但是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就摧毁了民主和社会主义性质所由产生的、使苏联社会在本质上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优越的苏联社会的基本特点。苏联社会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政权则恰恰相反，它们常常犯一些远为严重的错误和处于一种远为严重的局势。那些错误不可能成为当时公民生活、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普遍的持久的部分。它们如果长久继续下去，也许就已造成了决裂，尽管这种假设是应该慎重地提出的，因为决裂对于人民群众和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必定是利少害多的。不仅那些本来也许想造成决裂的人，而且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都认识到这个危险。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所犯错误的后果不是十分严重的。这些错误是极为严重的，它们扩及很多领域，并且我认为纠正它们是不容易的，也不是很快就能做到的。实质上，可以说苏联社会的领导干部有一大部分（党、国家机关、经济、文化等领导干部）在对斯大林的迷信之下变得麻木了，丧失了或者减少了他们在思想和行动方面的批评和创造能力。因此，当时绝对有必要揭发斯大林的错误，并用这样的方式来揭发，以便震撼它们的

基础，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各种机构重新充满活力。这样才可能使这个社会获得新的民主进展，而这对于各国人民之间更好的了解、对于国际局势的缓和、对于社会主义与和平的进展将是有力的贡献。

(2) 你认为在苏联所进行的对个人迷信的批评会引起一些制度上的变化么？

(3) 政权的合法性是公法的重大问题，现代政治思想倾向于把人民意志看作合法性的泉源。西方式的议会民主主张：人们必须要有几个政党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在一党制的情况下，人们在选举时无从就政府和反对派加以选择，你认为这种政权是正当的吗？

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但我认为：今天不能预料苏联会有制度上的改变，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的批评也并不意味着有这种改变的必要。这并不是说，相当重要的改变就不能实现，何况，某些改变已经开始了。

首先，制度上的改变是指什么说的呢？我认为：采取这种说法的人指的是政治机构的改变，就是说，使苏联社会退回去接受所谓西方制度所特有的政治组织形式中的至少某几种，再不然就是强调这些制度所特有的某些组织机构的新的意义。假如是这样提出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假如有这个必要的话，那就让我们来考查一下政权及其根源的合法性吧，不过让我们努力摆脱西方文明的辩护士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采用的虚伪的形式主义。我们读过《国家与革命》，我们幸而没有忘记它所教导的对我们极其有益的内容。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不会使我们忘记它。实际上，在所谓西方文明中，合法政权的根源根本不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意志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部

分因素，它通过定期选举的媒介来对决定一部分政府方针发生作用。但是，在选举中（意大利的例子就证明这一点）人们采取了层出不穷的压力、恫吓、煽动、作弊、合法与非法的干预，结果形成相当严重的限制和对人民意志的歪曲。这种手段不仅为当时掌握着政权的人的利益服务，而且为社会中由于财富、占有生产手段和交换手段以及由此而来的其他等等而掌握着实权的人的利益服务，他们的实权开始于对政治生活的事实上的领导，接着就必然会受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宗教当局和权力的其他一切神经中枢的保护。我们认为：今天由于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运动的现有力量，有可能把这种阻碍人民自由表达意志的制度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有可能为表达这种意志开辟日益宽阔的道路。因此，我们的行动以民主为基础，并且我们认为如果不离开这种基础，新的发展总是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现实，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西方世界的民主发展的方式当作偶像，当作绝对和普遍的范例（只要在这个西方世界里深入地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到西班牙、土耳其、拉丁美洲和葡萄牙的情况，更不用说美国通行的歧视性选举制度等等事情了）。事实上，我们仍然认为西方方式的民主是有限的、不完善的、在很多方面是虚假的民主，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才能得到发展和改善。因此，即使我们承认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辟了苏联民主发展的新过程，我们也决不能想像，这种发展可以或必须用恢复“西方”形式的制度这一办法来求得实现，并且我们坚决认为这样设想是错误的……

苏维埃制度的运行是否可能发生停滞和受到阻碍呢？苏维埃民主制是否会因而受到限制呢？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已经公开承认的事实。由于专断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和对政权法制的破坏，苏联的民主生活受到了限制，部分地受到了

窒息。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必然就能避免错误和危险。硬说能够避免的人只是证明其幼稚而已。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由人组成的，而且它还是一个正在发展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内部存在着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并且这个社会也随着历史的演变而演变。事实上，应该研究一下苏联民主生活的这种限制为什么和怎样会出现的，但是，不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何，我们毫不怀疑这样一点：不可能得出必须恢复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的结论。

多党制或者一党制本身不能被认为是区分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同样，它也不构成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之间的分界线……在苏联，甚至党这个概念本身也同我们的概念不同。党为实现并发展社会主义而工作和斗争，但它的工作主要是积极的和建设的性质，而不是以假定的内部政治反对派为目标的纷争的性质。党对之进行斗争的“反对派”，是应该加以克服的客观障碍，是应该在工作中加以解决的矛盾，是应该加以控制的现实，是为了使新东西向前发展而应该予以消灭的旧东西的残余，等等。对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意义的对立物的辩证发展，已经不再体现为不同的政府党派或反对党派之间的竞争，因为，那个国家里没有进行这种竞争的客观的（即在事物中的）根据和主观的（即在人们思想中的）根据。这种辩证发展体现在包括一系列彼此配合的组织（党、苏维埃、工会等等）的单一体制的内部。斯大林受到批评，因为他阻碍了体制内部的这种表现。纠正的办法在于恢复正常的性质，而不是否定制度或推翻制度……

法官应当享有独立地位，苏联宪法像其他许多宪法一样，已经保证了这一点。但是，对这种准则的违犯总是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发生的。何况，法官不是、也不可能是生活在社会、社会矛

盾、社会上主导和优势潮流之外的公民。十年以前，如果一个英勇的游击队领袖在战争环境下杀了一个被指控为间谍的人，任何法官是不会想到要把他判处无期徒刑的——我说的是无期徒刑；而今天，人们就这样做了。法官是“独立的”么？他们也许在形式上不受政府命令的直接约束，但是，法官们并不是不受加斯贝利之流十年来为了诋毁游击运动、控告游击队和对游击队的领袖们判刑而进行的宣传的影响的。法官们是统治阶级的构成部分，这个阶级内部产生的无论正当与否的思想潮流，他们是逃避不开的。现在，据说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有过一些审讯，宣布过不合法的、不公正的判决。宣布这些判决的法官们十分可能并不是出卖了良心的公民。他们是这样的公民：他们相信，斯大林所主张的当时在全国人民中间传播的关于必须予以消灭的“人民公敌”到处存在这一错误学说是根据的。因此，即使在理论上是“独立”的，他们仍然以那种方式进行了审判。党和政府的政治领导路线的正确，才是真正的保证，而要使路线正确只有在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永久密切地联系人民群众，从而加强党和国家内部的应有的民主生活。法官同人民的接触越密切，他也就越公正。

(4) 已经有人说：东西方之间没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在西方，人们把个人迷信称为暴政，把引起清洗、审讯和判刑的种种错误称为罪行。而东方却把反对称为叛国，把争论称为偏差，等等。不同的语言从来就表示本质上的分歧。这种语言上用词的不同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谈到东西方之间政治语言不同的这种说法，我要说的是：在我看来，它纯粹是一种反动的谬论。……实际的情况并不证明，在目前世界的两个部分，人们各说各的语言，而是证明，不仅无力赞同、而且无力了解他们所敌视的社会和政治上深刻变化的那些社会集

团，希望在世界的不同部分之间制造互不了解的深渊，从而不利于那个向前迈进的部分。但是他们并没有做到。

东方和西方的政治用语对双方来说是绝对一样的。暴政在这里和那里具有同样的涵义。在斯大林政权下的某些特定的时期，人们注意到有暴政的因素，人们看出政府做了一些道德上不能容忍的违法行为。谁也没有否认这一点。民主这个字眼，无论在这一方或者那一方，都意味着政府是属于人民的，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以及全体人民都享有平等权利，等等。俄国共产党人在他们最初的宪法里规定工人和农民选举代表所需票数两者有所不同，当时他们完全知道这种规定是不民主的。俄国共产党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要在法律上保证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所取得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把国家从外国侵略和灾难中拯救出来，从而为社会主义的来临创造了最基本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巨大成就之后，这种规定就撤消了。事实就是这样很清楚地昭示我们：歧视办法取消以后，民主就恢复了它的完整性。在这里，在我们这个所谓了不起的西方，我倒希望有人给我解释一下，天主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意大利对公民所采取的政治歧视和民主之间能有什么相同之处呢？我们这个政府是以政治歧视作为它一切活动的基础的，而且这种做法永远是大多数国家执政集团、地主资本家、救济机构、劳动机关等等的普遍的行动准则。

说什么在东方，反对就等于叛国，争论就等于偏差，这是绝对荒谬的说法。在争论中，往往可能出现同现有的政治路线不相调和的相反的意见，它可能被认为是偏差，因为它是一个偏差。而在我们这里〔在意大利〕，表达同执政党见解不同的政治见解则被指为“思想上的恐怖行动”。至于反对立场，我已经说过，不是也不能同叛国并论。毫无疑问，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反对立场所采取

的形式可能被认为是叛国或是煽动叛国……斯大林所犯的重大错误，就是在新的环境中，在已经没有必要的时候，还非法地发展了这种制度，甚至使这种制度更为严峻。列宁一开始就不断指出必须尊重革命法制，虽然这种法制曾经不得不受到相当大的限制。斯大林当时那种作法，只能便利于建立一种个人权力。而他的同事们的错误则在于没有及时了解到这一点，而且听其发展，以至于再也不可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不给大家造成严重的损害。

(5) 你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同俄国历史政治传统相反而且同俄国历史政治传统无关，还是相反地认为它是这种传统的发展呢？

(6) 斯大林为了加强和维持自己的个人独裁而采取了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在西方被称为“恐怖”的一套强迫性的措施。你认为这种“恐怖”是必要的吗？

……当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已经显得严重的时候剥夺斯大林的权力，这在“法律上”是可能的，但是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假如提出这个问题，就会造成冲突而断送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前途，而在当时，全世界各地的武力都指向着苏联。只需稍稍——哪怕是肤浅地——知道在斯大林领导国家的年代里苏联的舆论，只需密切注意当时国际局势的演变，就能够认为上述说法是极为正确的。今天，苏联领导人揭发了一些具体错误，例如，斯大林在战争初期一度丧失信心。然而，当时在苏联，不用说是剥夺斯大林的权力，哪怕只是限制他的权力，又有谁会理解和接受呢？当时要是发生这样的事情，甚或只是出现一些迹象，一切就会瓦解。在其他的时候结果也会是一样的。固然，赫鲁晓夫的看法说明那些本来想纠正这种局面的人所处的不得已的情况；但同时这种看法也使整个情况复杂化，并增加了它的严重性。我们不能不承认：或者斯大

林所犯的错误是全国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因而是人民群众所不知道的——而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或者就是大部分干部、因而是受干部指导和领导的舆论认为它们并不是错误。大家可以看出，我排除这样的解释，即：仅仅由于存在着用自己的手段控制着当时局势的军事、警察恐怖机器，改变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领导党的机构的人们就决不可能对于像纳粹进犯那样的危机引起如此勇敢的反应。我觉得正确得多的办法是承认斯大林尽管犯了错误，他还是享有全国很大一部分人——首先是领导干部，还有群众——的支持。其所以这样，是不是因为斯大林不但犯了错误，而且也做了好事，“他为苏联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不懈地信任人民”？……

谈到这里，应该毫不犹豫地公开承认：如果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分析和解决民主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重要的新问题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说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我们却不能认为今天由苏联报刊重申和发挥的代表大会对于斯大林的错误以及使这种错误能够发生的原因和条件所采取的态度是令人满意的……

固然，今天他们批评自己，这是他们的很大的功绩，但是这种批评对他们的威望也有一些影响。但是，除此以外，只要我们在实质上一味把斯大林的个人缺点当作一切弊病的根源，我们就仍然处在“个人迷信”的范围之内。起初，一切优点归功于一个人的超人的积极品质；而现在，又把所有的坏处都归诸于他的异乎寻常的骇人听闻的缺点。不管是两种做法中的哪一种，我们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判断准则。真正的问题，即苏联社会为什么和怎样会走上而且竟然走上了脱离它自己当作目标的民主生活和法制的道路，甚至发生某种蜕化现象的问题，却避而不谈。要作这方面

的研究,就应当密切考察这个社会发展的连续阶段,而首先应当这样作的就是苏联同志们,因为他们了解情况比我们清楚,我们可能因为对事实了解片面和脱离实际而犯错误。

我们首先记起列宁在他最后的一些演说和著作中曾经强调从新社会产生官僚主义的危险。看来很明显,斯大林的错误同苏联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也许首先是整个党的生活中各个官僚机构的分量过分增长有关。要在这里说明哪些是原因、哪些是结果,那是十分困难的。因果逐渐转化而互相成为对方的表现形式。能不能把官僚主义的这种分量过重也归因于从古老俄罗斯的政治组织形式和风俗继承下来的一种传统呢?……我们关心的倒不是估计旧人剩下多少,而是了解当新的领导阶级担负起全新任务的时候在它的内部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官僚主义领导这一事实……

这样肯定也许不是不正确的:对民主制度的有害限制和官僚主义组织形式的逐渐出现,都是在党本身内部产生的。

但是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仔细研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和着手农业集体化以后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这里触及一些真正的原则问题。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甚至是伟大的。在沒有外国援助和贷款的情况下,依靠新社会内部力量的飞跃发展,建立了巨大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

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初步巨大胜利之后,就能毫无困难地前进,就能不要求群众和领导群众的党在新社会范围内以行动来解决各种新型矛盾而前进,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我认为这种错误有两个重要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群众在各个地方和组织中(党、工会、工厂、苏维埃)活动的停滞,而他们本来是应当处理那些地方的真正的新困难的。可是恰恰相反,开始广泛散播的都是充满了堂皇的言论和现成的漂亮词句的文章和演

说。实际上,这些言论和演说既同生活脱节,是冷淡而无用的。创造性的辩论逐渐消失了,同样,群众活动也越来越少,而且这种活动与其说是由于自身的要求,还不如说是由于上面的推动。但是第二个后果是更加有害的。当现实占了上风,当困难作为仍然到处存在的不平衡和对立情况的后果而出现的时候,就逐渐产生一种倾向,认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实施计划的缺点和障碍、供应上的困难和原料的困难、发展工业或农业各部门的困难,都是阶级敌人或暗中活动的反革命集团等等进行破坏和干预的结果,并且这种倾向终于成了主流。并不是说这些事情没有存在过;它们在当时确实是存在的。苏联曾经受到敌人的包围,他们毫不留情地准备采取一切手段使苏联的发展遭受损害和阻碍。但是,在判断客观形势时所产生的这种错误的倾向使人们失去了节制,失去了在善恶之间、敌友之间、无能和软弱同有意识的仇视和叛变之间、反对立场和从事物本身所出现的困难同阴谋破坏的敌对行动之间的界限观念。斯大林以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越发展、敌人就必然越多、阶级斗争就越尖锐的错误理论,对这种可怕的紊乱给予了一种假科学的解释。这就使得这种紊乱经常化和严重化,并成为今天被公开揭露的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加以闻所未闻的违反的根源。但是要了解这些主张怎么能为人民所同意和接受,那就必须进一步深入探求。……斯大林在某一时期曾经是当时情况的体现者和创造者,他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在官僚主义式的机构压倒民主生活方式的时候,表现出他自己是这种类型机构的最内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因为他为实际上错误的方向作了理论上的辩解,而他的个人权力就是以此为根据,甚至一直达到蜕化的地步的。这一切就说明了他的在他的亲信中所享受的支持,而且这种支持一直继续到他逝世为止,也许现在还保持着若干效力……

(7) 怎么解释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曾经相信斯大林关于审讯和阴谋案的正式说明呢？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曾经一直无限信任苏联共产党和它的领导人。这种信任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上的一些决定性时刻，在工人运动和国际政策的一些决定性问题上，苏联共产党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苏联共产党夺得政权的1917年革命使大家感到振奋。事实证明在革命之后他们提出、维护和奉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大家知道他们所曾遭遇的并最后加以克服的种种非凡的困难。当时全世界都反对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攻击他们，辱骂他们。所有国家的统治阶级都纠合起来反对他们。在反对派各党，甚至在工人运动中，简直没有几个人了解（更不必说赞许了）正在苏联实现的巨大事业。今天除了最顽固的反动派以外，谁都承认苏联的建立是当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而过去，却只有共产党人或者几乎只有他们才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这种建树，解释、卫护这种建树并卫护从事这种建树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全世界工人阶级先锋队对这个真正站在整个政治和社会运动最前列的共产党给予信任，表示深刻而完全的团结，是自然和正确的。还必须考虑到这个事实：几乎所有开始批评苏联共产党政策某一方面的那些人不久就终于投入了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官方诽谤者的行列，终于成为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的公开的或者隐蔽的代理人。各国共产党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它们自己的行列里体验过这种经验。因此，除了上述的同苏联共产党人保持信任和完全团结的关系之外，还建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团结是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特有的性质。这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当中没有人对这种信任和团结关系感到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就是这种关系使得每一个在它本国具体条件下工作和斗争的党，能为十月革命在工人阶级中所引起的这

种革命的新高涨，表现和提供明确的政治形式和组织形式，而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进步又使这种革命的新高涨得以滋长和壮大……

我相信问题所涉及的审讯就是在这个时期（下面我要谈到这种限制的意义）发生的，当时法国人正在为争取人民阵线而斗争，西班牙内战烽火连天，苏联的国际政策在保卫民主与和平方面正非常有效地展开。当时没有任何因素可使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怀疑判决是否合法的，特别是因为他们知道：原来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的领导人既然已经在政治上失败而且在群众中又陷于孤立，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恐怖手段来继续进行斗争。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苏联。（1934年在巴黎，我们的最优秀的活动家之一、勒佐尼尔艾米利亚的卡米洛·蒙塔纳里被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刺杀了。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所有的被告都供出他们的罪行，这一事实无疑地引起了我们的惊讶，我们中间还进行了讨论，但是仅此而已。此外，我们还不清楚，今天透露出来的对法制的破坏行为和采用道德上不能容忍的非法讯问办法，究竟是整个审判时期的情况，抑或仅仅是我上面所谈到的时期以后的某个时期的情况……

我再说一遍，就最初的一些审讯——我们当时只能谈论这些，因为后来的审讯大都不公开进行了——而言，我今天认为同时存在着两个因素：一方面是反对派试图阴谋反对政权并进行恐怖行动；另一方面是采取了道义上应受谴责的非法讯问办法。当然，前者并不能减轻后者的严重性。

（8）对于个人迷信的批评来自上层有权势方面，事先没有征求民意。你是不是认为这可以证明斯大林主义并不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消灭呢？

我所作出的和实质上已经说明了的判断，使我认为对于斯大林的错误的纠正和批评不可避免地要来自上面。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中的限制，所犯错误的内容和后果，以及斯大林用以围绕自己的歌颂，使得来自下面的批评只能够紊乱地、缓慢地开展，而且可能造成危险的决裂。这一点也许令人感到不快，但这是以前所发生的事情的结果。……按照列宁在革命初年所提供的榜样恢复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思想和实践领域内恢复首创精神，振兴研究工作，鼓励生气勃勃的争论，提倡宽容那种为了达到判断和性格的独立而为发现真理所必不可少的错误：用这些办法来重新教育党的几十万名男女干部，通过他们来重新教育全党，又通过全党来重新教育一个领土极为辽阔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公民的生活条件在各个地区仍然大相悬殊），是一件在三年之内或者在一次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所不能完成的巨大任务。……我认为，应当通过这种广泛的发展，用绝对不同于斯大林在世时所采取的办法（那时他抛弃了国家和党的活动中的法律准则）来纠正斯大林的错误……

（9）你认为对个人迷信的批评将引起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俄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之间关系的改变么？一般说来，苏联和国际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将发生变化吗？

说各共产党随时都从莫斯科接受训令、指令和命令的这种愚蠢的无稽之谈，我希望至少在意大利已经不再有人相信了。假如还有这种人的话，写给他看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的头脑显然太不管用了，以至于即使仅仅接近于理解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他也绝对没有能力做到。因此，我的答复是为了别人写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紧跟着的年代里，共产国际刚刚建立，没有疑问，各国工人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方针上的主要问题那时是在莫斯科，在中央机构、在提出具体方针的代表大会和

其他国际会议上进行充分讨论的。可以说，当时存在着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中领导，其主要的领导责任由俄国同志们承担，而从各国去的同志们则予以协助。然而，不久以后运动开始迅速地自动向前发展，特别是在有坚强领导人的国家。……假如说共产党人遵循苏联国际政策的伟大道路前进，那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个政策是正确的，而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

1947年成立的情报局所担负的任务与“国际”大不相同：它主要做了两桩事情：第一桩是好事，第二桩是坏事。第一桩就是正确指导整个工人运动抵抗和打击帝国主义的战争计划。第二桩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失策的下涉……

对斯大林的批评暴露出一个对整个运动说来是共同的普遍问题，这就是官僚主义蜕化的危险所呈现的问题：民主生活遭到窒息，建设性的革命力量与革命法治的破坏之间产生混乱，政治和经济的领导机构脱离群众的生活、批评和创造性活动。我们欢迎取得政权的各国共产党之间展开一种竞赛，谋求最好的办法来永远防止这种危险的发生。至于我们，我们有责任规划工作方式和我们的道路，使我们也不至遭受停滞不前和官僚主义的危害，使我们善于共同解决劳动群众的自由问题和社会正义问题，这样来使我们在群众中赢得日益增长的威信和支持。

[略]

八十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告世界人民书^①

我们，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的时候，来到莫

^① 见1961年《世界知识年鉴》，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29—33页。

斯科的世界五大洲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们，满怀着对人类命运的责任感，号召你们：

参加保卫和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威胁的普遍斗争。

三年前，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向全世界人民发出了和平宣言。

从那时起，和平力量在反对战争挑拨者的斗争中取得了卓越的胜利。

今天，我们对和平事业的胜利怀着更加坚定的信心，起来反对威胁千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的战争危险。在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现实可能性，使各国人民世代代的愿望，即生活在和平和自由条件下的愿望，得以实现。

面临着会引起巨大牺牲和亿万人死亡、会使世界文明的主要中心变为废墟的战争灾难的威胁，维护和平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激动着全人类。

我们共产党人，为和平、为普遍安全、为创造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能享受和平和自由生活的条件而斗争。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目的，就是为各国人民确保持久的和平。

社会主义不需要战争。新旧制度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性斗争，不需要通过世界战争的途径，而要通过和平竞赛来解决。这就是：究竟哪一个社会制度在竞赛中能达到经济、技术和文化的较高水平，能保证人民群众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

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尽自己一切力量拯救人类免于现代战争的灾害，是自己的神圣义务。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遵循伟大列宁的学说，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基础。

在我们的时代，对于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说来，或者是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和竞赛，或者是屠杀人类的核战争，没有别的道路……

现在同过去一样，侵略战争的组织和策动者，是帝国主义国家反动的垄断的军事集团。帝国主义大国政府的政策威胁着和平，它们违反本国人民的意志，把招致灾害的军备竞赛强加于各国，煽起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冷战，压制人民爱好自由的愿望……

各国人民欢迎苏联提出的并且受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热烈支持的有关全面彻底和有监督的裁军建议。谁在反对这些建议的实现呢？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它们不要有监督的裁军，而只谈对军备的监督，企图把裁军谈判变成空谈。

各国人民对两年来三个大国没有进行核武器试验感到高兴。是谁反对采取新的措施和通过决定来完全禁止这种杀人的试验呢？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它们不断宣称想要恢复原子武器的试验，并且经常威胁要破坏关于禁止原子武器试验的谈判。它们只是在人民的压力下才被迫参加这种谈判的。

各国人民不愿意在他们享有主权的领土上保留外国军事基地；他们反对侵略性的军事条约，因为这些条约限制他们国家的独立，并且使他们的国家处于危险的境地。

是谁反对人民的意志呢？

是大西洋集团国家的政府，它们给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在国外领土上提供军事基地，给他们提供大规模杀伤的武器，并且用原子武器加速武装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军队。

是美国的统治集团把侵略性的军事条约强加于日本、巴基斯坦和远东的其他国家，唆使它们反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占领南朝鲜并把它变成自己的军事跳板，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干涉

老挝和南越的内政，支持在西伊里安的荷兰帝国主义者、在刚果的比利时帝国主义者、在果阿的葡萄牙帝国主义者以及其他殖民主义者，准备对古巴革命进行武装干涉，把拉丁美洲各国拖进军事同盟。

是美国侵占中国的台湾，经常派军用飞机侵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同时，还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享有代表席位的合法权利。

随时准备发射的火箭装置，装满核子武器的仓库，在空中飞行的携有氢弹的飞机，在海洋中行驶的随时准备进攻的军舰和潜水艇，设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网，这就是帝国主义现在的实际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的任何国家，不论它是大国还是小国，都可能突然被核战争的火焰所笼罩。

帝国主义为了一小撮大垄断组织和殖民主义者的私利，把世界推向战争的边缘。

和平的敌人散布虚构的“共产主义侵略”的骗人谎言。他们需要这种谎言，是为了掩饰自己真正的目的，麻痹人民的意志，在人民面前为军备竞赛进行辩解……

在我们的日子里，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反对火箭-核战争的威胁、争取普遍彻底裁军、维护和平的斗争更迫切的任务了。在我们的日子里，没有比参加这个斗争更为崇高的义务了……

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

我们的这一信念，不只是出于我们争取和平的意志和对战争挑拨者的憎恨。防止战争的可能性是从世界新形势的事实中引伸出来的。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现代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包括三分之一以上人类的社会主义体系及其主要力量——苏联，正在利用自己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和科学技术力量，来限制帝国主义的行动，束缚军事冒险分子的手脚。

高举为和平而斗争的旗帜的国际工人运动，提高着人民的警惕性，鼓舞着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政策。

已经获得自由和政治独立的千百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民以及正在争取民族自由的人民，正成为越来越积极的和平战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和平政策的当然同盟军。

主张和平与和平共处的还有不同意帝国主义者们的侵略政策的中立国家……

所有这些团结起来进行坚决斗争的爱好和平的力量，能够粉碎罪恶的战争计划，保卫住和平，并且巩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和平是不会自行到来的。只有通过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共同斗争，才能维护和巩固和平。

我们共产党人向一切劳动者，向各大洲的人民呼吁：

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和平共处，为反对“冷战”，为反对军备竞赛而斗争！如果能把消耗在军备上的大量资金用于和平日的，就有可能改善人民群众的状况，减少失业，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增加住宅建筑，更广泛地实行社会保险。

不许扩大原子军备，不许用大规模杀伤武器武装德国军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

要求同两个德国缔结和约，并使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

为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企图把更多的国家拖入冷战，拖上备战的轨道而斗争！

要求撤消设立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撤退驻扎在外国领土上的军队，并禁止设立新的军事基地。为使那些被迫接受侵略性军事条约的国家摆脱这些条约而斗争！争取达成关于无核武器区的协议！

不许美国垄断组织用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扼杀英雄的古巴人民的自由！

我们，为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事业而斗争的共产党人，向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和平的其他党派和团体的成员们、全体工会会员们、一切爱国者们伸出手来：同我们一起为保卫和平、争取裁军而行动起来！让我们求得一致的行动吧！

让我们建立起反对帝国主义者准备新战争的共同战线吧！

让我们为保卫民主权利和自由，为反对反动派和法西斯黑暗势力，反对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反对垄断组织的专横，反对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军国主义化而共同斗争。

各国人民为争取自身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削弱着好战势力，增强着和平力量。

非洲已经觉醒，正在走向新的生活。非洲人民遭受殖民主义奴役和野蛮剥削的灾难最为深重。非洲人民正在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他们作为一个年青的越来越独立自主的爱好和平的力量走上历史舞台。

但是，被历史注定要灭亡的殖民主义还没有彻底消灭。

野蛮的暴力和恐怖阻碍着东非人民——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的人民走向自由的道路。种族主义制度在南非联邦逞凶肆虐。英勇的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权利，在战争中流血牺牲已经六年了，这个战争是受到大西洋同谋者所支持的法国殖民主义者强加于他们的。在刚果，帝国主义者不择手段，以阴谋诡计

和收买方法推翻合法政府，把政权交给他们的驯服傀儡……

从殖民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各国兄弟們：正为自身解放而斗争的各国兄弟們：

殖民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我们共产党人同你们在一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同你们在一起！

我们同你们一起，要求立即无条件地承认一切民族有独立生存的权利。

让你们国家的财富和劳动者的努力只用于谋取你们人民的福利吧！

你们争取主权完整和经济独立、争取自身自由的斗争，是服务于神圣的和平事业的！

我們，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們号召

男人們、妇女們和青年們，

一切职业和一切社会阶层的人們，

一切人們，不論他們的政治信念和宗教信仰，不論他們是哪个民族和什么肤色，

一切热爱自己祖国和憎恨战争的人們，

要求立即禁止試驗、生产和使用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

要求立即締結全面彻底和有監督的裁軍条約。

让现代科学和技术不再帮助制造带来死亡和毁灭的武器，让他们服务于人们的福利和人类的进步！

让一切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广泛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来代替军事集团吧！

在我们的时代，

和平的力量超过战争的力量！

如果各国人民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而联合起来，进行顽强的积极的斗争，就一定会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崇高目的——捍卫住和平。

共产党人将为这一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和平必将战胜战争！

[原编者按]

在这份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正规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发表后不久，南斯拉夫人就有了非常强烈的反应。^①在他们看来，告人民书并不是“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之一”；不论是对于苏联集团内部或以外的各国共产党来说，它都不是有意义的“行动指针”。南斯拉夫人自然十分关心这个文件，这首先是由于它对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宣言强烈谴责了这种道路），其次的和更一般的原因是，莫斯科会议“所考虑的当前各项问题影响到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一切政党和运动的行动，而会议考虑这些问题的方式”又不能令人满意。

弗拉霍维奇先生在这本八十来页的小册子里指出：“声明中对许多问题的一些积极的论点和结论的意义，由于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攻击而大大降低了……很显然，这些攻击鼓舞了各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对那些人来说，攻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已经成为他们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以便使劳动人民不去注意自己的问题。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报刊和电台几乎每天都在对我国

^① 参看维利科·弗拉霍维奇：《倒退的一步》(A Step Backward)，贝尔格莱德1961年版。弗拉霍维奇先生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和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以下引文见该书第16、79—80页。

进行攻击，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莫斯科声明使他们目前对我们的攻击合法化了。”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南斯拉夫和苏联集团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突出了以下两点：第一，“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决不是苏联集团的“专利品”；第二，就是在集团内部，正如举行莫斯科会议这一事实和会议举行了很长时间所表明的那样，在理论上和政策上也存在着尖锐分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集团内部、集团以外以及苏联集团和集团以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经常存在着直接影响行动的剧烈的和重大的意见分歧。

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发言记录摘要^①

阿尔托尔·斯塔列维茨同志：……如所周知，七中全会清楚地显示了党的病根：在我们的队伍中和党的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开倒车的趋势，打算在党和国家内恢复斯大林主义的方法，扼杀民主，利用民族主义偏见，压制群众积极性，破坏法制等等。有些同志竭力否认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集团。难道他们真以为大家是一群傻瓜吗？我们不会忘记那一系列配合得很好的，其中的攻击、批评和建议是那么密切相关和互为补充的演说。当苏联共产党主席团的一个代表团突然来访、因而使局势达到最紧张程度的时候，当这个集团的成员相继散布华沙党组织在准备示威的流言和天知道一些别的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全都看到了这个集团是怎样行动的。鲁明斯基同志就是我们这方面的证人。正是他在讨论开始的第一

① 见《波兰的道路》(The Polish Road)，利兹1957年版，第34—41页。

天在休息室里宣布——当时他以为那个所谓“不存在”的集团准可以稳操胜算——历史事件的演变总是从小集团身上开始的，纳托林集团现在将会获得更多的支持云云。

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所以愈来愈陷于混乱和瘫痪，主要是因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这个集团威胁着要分裂党，发动反民主的进攻和人身攻击……

我们再不能容忍党内和领导机构内部的这种疾病了：它眼看就要给波兰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无法估计的损害。

七中全会没有做到的地方，八中全会一定要做到。党必须粉碎自己的队伍中那些想把党重新推进死胡同的趋势：它们想使党重新阻挠民主化的进程，扼杀党内的思想自由，施加行政压力和实行官僚主义统治，压制批评并以腐朽的沙文主义理论涣散党员的斗志。党必须有一个新的领导，一个统一的、能够行动的领导，这个领导将把真实情况——而且只是真实情况——告诉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将果断而有力地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并且有能力把全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1948年，我们党改变了政治路线，当时它已经变成个人迷信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斯大林主义政策的压力下，党抛弃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据说它是不符合和违背苏联的道路的），走上了一条在一切生活领域中全都生搬硬套苏联做法的道路……

我们不应该忽视过去的成就；抛开一切错误不谈，它们终究是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自我牺牲和艰巨努力的成果。但是，我们决不能同意贝尔曼同志在他的发言中所作的估价。贝尔曼同志声称，“在过去，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基本上正确的、探求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恰当形式的政策。”请问，导致了如此可悲的结果，导

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危机、导致了无数经济困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正确政策呢？那些经不起重大需要的考验、因而在今天必须加以修正的东西，是一些什么样子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恰当形式呢？难道这些形式的实质不正是“那种造成了中央集权和官僚主义歪曲、从而带来巨大损害的领导制度”吗？可是，贝尔曼同志提到这种制度的时候，却把它说得好像和党的政策毫无关系似的。

过去这些年来，党的路线没有能使社会主义原则得到实现，因此，它不能被说成是正确的路线，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也不认为它是正确的。

虽然党的国家工业化政策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成就），我们照搬斯大林主义五年计划的办法却在许多方面是错误的。它的最大失败并不单纯是某些失调现象以及由过分集中的计划和监督制度造成的若干严重错误，而首先在于对工人阶级采取了非社会主义的态度。

工人阶级并没有成为自己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代表——一个往往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阶层——以它的名义控制着一切。我们的经济安排并不以群众的需要和他们的生活水平为转移，与此相反，决定它们的是一些往往牺牲了群众利益的、建筑在错误估计之上的计划。因此，尽管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工人阶级仍然是如此愤慨和失望。虽然在改造农村过程中树立的一般社会主义远景是正确的，抄袭苏联做法的党的政策却充满了严重错误。这不止是一个建立生产合作社时使用压力的问题。它实际上要严重得多：我们重复了甚至在今天的苏联农民态度中还有所反映的那些错误。在这里，我指的是国家和农村之间的不正常关系，数量过大的强迫征购以及强迫征购这一政策本身（这种政策大大减少了商品的交换量，使农民经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耗竭了农村信

贫的那种政策，以及多样化的农民自治被摧毁的事实。我国农业政策中的错误不仅引起了生产率的降低，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政治恶果；目前的形势是，主要的战线不是存在于贫农和富农之间，而是以统一的农民为一方、以官僚阶层为另一方的斗争。所有这一切的必然后果，就是大量生产合作社的瓦解和国家遭到巨量的物质损失。

党在我国的人民民主政治结构中也犯了严重错误。通过机械地模仿苏联，建立起了这样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形式上虽然是民主的，事实上却是一个没有真正民主内容的空壳。反映在我国宪法中的这种制度，完全以苏联的所谓斯大林宪法为蓝本，它不符合我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它不能反映工人阶级在真正的工农民主政权中的领导作用……

大规模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保安机关、军事情报局和司法机关的可怕偏差与罪行，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造成了极坏的损害。这些偏差和罪行不是偶然的错误，也不能归咎于个别坏人，它们主要是由一种错误的政策造成的，而这种政策所依据的则是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把任何形式的反对都当做帝国主义破坏活动，把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目为破坏分子等等极端夸大的、不符合事实的和有害的观点。它们的产生要归因于贝利亚制度的影响，归因于外部压力及其必然后果：按照当时流行于苏联的观点，把保安机关置于党和国家之上。对无辜人民的迫害、反人道的审讯方法、捏造的审判，最后是在这些犯罪措施下丧失了生命的许多牺牲者——整个这一悲剧……损害了我们党的道德威望和人们对于党的许多领袖的信任。

面对着所有这些事实……怎么能够说党过去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呢？

同所有这些情况紧密联系着的，是我们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些关系的不正常，对主权、平等和互相尊重党的独立地位的原则的严重破坏，是造成过去的许多错误、偏差和损失的根源。我们所以没有能找到我们自己的、符合我国人民的利益和需要的办法来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十分坦率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如果不消除个人迷信的残余，不在各党之间的关系上恢复列宁主义原则，不让每一个党享有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充分自由，特别是如果不让我们党通过自己的波兰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加强和苏联的友谊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不可缺少的团结。

不言而喻，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同走向社会主义的苏联道路是并不抵触的。与此相反，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点和独立，倒是为一切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在走向共同目标时的合作创造了最坚实的基础……

罗曼·魏菲尔同志：我只想谈一谈不多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关于我国工人阶级、青年和知识分子目前思想的性质和方向问题。有些同志对这个运动深感不安。我认为他们的态度是错误的。这个运动的基本倾向是健康的——这是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运动。

在最近几周中，激动着工人阶级、特别是大企业中的工人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是工人委员会问题，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单纯提高生活水平，而真正是参加管理工厂和全国经济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走向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发展，而不是脱离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

激动着我国青年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青年中最先进的分子要求改变他们的组织，他们要求自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即使他们错了，这难道意味着脱离社会主义、怀疑共产主义和企图

恢复资本主义吗？当然不是！这是一种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动倒退的运动。

无可否认，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要复杂一些，他们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但即使在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核心，而且，即使在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当中，也有许多人公开要求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一些十年前不关心甚至敌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著名知识分子，今天已经接受社会主义并且为保卫社会主义而斗争。他们对外国同事说：要想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这些人也说了许多使我们感到震惊的完全错误的话。但是，这一发展中的主要趋势是什么呢？我认为它的方向仍然是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称之为“个人迷信”的过去的那些东西，已经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感到厌恶。我们全都看到了漠不关心甚至憎恶的迹象。我们全都看到了波兹南事件。我认为，当广大群众采取了主动，而我们作为一个党却没有能够领导这个暴风雨般的运动时，他们的主动性却毫不含糊地走向左的方面，走向社会主义和发展民主，走向发展工人阶级的民主，这表现了广大群众的明白事理和健康的阶级本能，表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可征服的力量……

现在我来谈第二点：这样一来，是不是我们就同其他国家的同志、国际工人运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割断联系了呢？在我看来，我们这里还没有人充分理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近发生的变化。

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最感到恼火的同志）对于斯大林主义的错误怎么可能把我们的运动歪曲到这种地步的问题，采取了一种过分简单化的看法。他们谈到了所谓贝利亚制度的影响，甚或谈到对它的某种直接屈服。这些话也有几分道理。但问题在于，就党员群众而言（归根到底，他们才是决定整个运动发展的人），大

家是真地相信斯大林比自己高明的，即使有些事情时常显得不能理解。我们总是认为事情就应该那样……

当然，我们的这种态度也有某些事实根据。苏联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国家。我们不能够辨认清楚（斯大林的暴政也不容许我们看清楚）：哪些是十月革命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表现，哪些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包围的经济落后和疮痍满目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极其巨大的困难条件所引起的歪曲，最后，哪些又是无法开脱和解释的政治蜕化的征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势有了改变。苏联不再孤立了。在它的身旁屹立着欧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几年以后人民中国又取得了胜利。把苏联的经验拿来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相比较，研究每个国家有哪些不同的和独有的特点……的时机在当时已经成熟。在此以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通过了反南斯拉夫的决议，并且接受了随着这类决议而来的一切东西。我们是由于什么原因屈服的？我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当时还相信，不同意斯大林的看法甚或保持我们自己的观点的任何企图，都意味着投向反革命阵营。就波兰而言，哥穆尔卡同志显示了我们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所缺乏的政治远见。斯大林死后，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当陶里亚蒂同志谈到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多中心问题时，他第一个说明了新时代的特点。苏联仍然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定要保卫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保卫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团结。但是，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今天将根据本国的状况，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的方法——同时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它的科学成就和辩证法，向其他国家的同志学习……

如果我们在波兰寻求的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许多方面都和苏联、南斯拉夫或中国的道路不同，并不等于我们就置身于世界革命运动之外。因为所有这些道路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通过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通过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废除人对人的剥削。我们所走的是一条大多数先进的共产党人已经采取、一切共产党人明天都将采取的道路。

第十三章 苏联集团以外的 馬克思主义

爱德华·卡德尔：社会主义民主在 南斯拉夫的实践^①

在西欧，人们对南斯拉夫和它的政治立场有这样一种看法：1948年以前，南斯拉夫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形式方面都是追随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制度的，到了1948年和以后，为了对付苏联的压力，南斯拉夫才被迫反对官僚主义和保卫民主。这种意见认为，南斯拉夫不可能以其他方式为自己创造出一个抵抗苏联压力的思想和政治基地。在被迫踏上这条道路以后，它现在已别无选择，迟早总要走向西欧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形式。

这种解释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完全把事情弄颠倒了。

事实是，同苏联的冲突并不是苏南两国内部制度发展倾向不同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正是这种内部倾向的不同，导致了两国对外政策的相应不同和影响了两国之间的关系。任何别的解释都是违背事实的。当然，1948年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也加强了新南斯拉夫所特有的内部倾向。

其结果是，新南斯拉夫的内部发展造成了两国外交政策的相应不同。这些内政和外交的发展是同一个问题的两方面。因此，说南斯拉夫独特的内部发展完全是由外部的政治冲突引起的，是

^① 苏联集团以外主要马克思主义国家的主要理论家于1954年在奥斯陆发表的演说。

一种远不符合事实的看法。这种看法会使人无法理解南斯拉夫1948年以后发生的一切。

革命刚一胜利，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者就面临着如何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实质上，这就是对已经国有化或社会化——不管实现它的途径是通过进化还是通过革命——的生产资料采取什么管理形式的问题。因此，怎样刺激劳动者有意识地促进社会化生产资料发展的问题，也立即被提了出来。这样，附带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期间，为了给劳动者自觉活动的发展提供最有利的条件，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至于这些问题涉及的理论 and 原则，卡尔·马克思早就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可是，这并不足以解决实际问题，不能使我们决定为真正实现本来的原则所必需的实际政治形式。卡尔·马克思本人似乎就不打算去事先解决后代必然会遇到的问题。他不能够也没有为我们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他最初的想法是，国家机器将成为无产阶级履行自己的社会主义历史使命的主要工具。马克思预见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将以一个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后来……由于意识到官僚主义可能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威胁，他对待一个独立于人民之外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的态度越来越有所保留。他最后相信，这种机器应该被“组织成为国家的无产阶级”所代替。

革命爆发时的俄国是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正因为这样，尽管列宁竭力使事态朝相反的方向发展，斯大林主义的原则仍然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原则的内容可以最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为了使一个国家有力量走向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是必需的组织形式。通过把国家机器和工人阶级的意志与觉悟等同起

来，斯大林大大缩小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官僚主义危险的警告，使它们变成了仅仅是关于行政机关的对人冷酷、文牍主义和无所事事的训诫。这样，斯大林也就掩盖了官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实质。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反对这种看法。它坚决反对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把持本民族的一切经济和生产资源，代替经济力量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独立和客观作用。

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国家是民族意识的化身，国家是全能的。因此，斯大林主义认为，国家甚至能极详细地确定和指导经济力量的运动。国家的经济计划以及对经济实行集中行政管理的制度，几乎是人类意识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唯一表现。经济领域中的其他一切因素都必须服从这种集中管理制度。

执行这一制度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几种：(1)国家机器的最高机关向下级机关发布指示；(2)下级机关向个人传达命令；(3)上级最严格地控制下级；(4)具体分配任务；(5)处分没有完成任务的人。

由此可见，这种制度并不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解放劳动力，发挥那些用公有生产资料从事工作的人们的创造性能力，提高个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不言而喻，斯大林主义制度要完全依靠国家机关的工作好坏。有鉴于此，斯大林实行了一种从经济上鼓励管理干部的特别制度。一个机关的成绩愈大，管理机构成员的报酬就愈高。这种鼓励制度的目的并不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者的创造潜能，而是首先在于刺激控制劳动者的机构。这样一来，国家机关就开始在社会关系中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地位**。

但是，指令和控制除了是自由的劳动人民共同利益的表现外，本身并不是创造力量。在生产资料社会化的条件下，只有每个人

自觉的劳动意志才能成为这种创造力量，而每个人自觉的劳动意志是从他本人的物质和精神利益中产生的。当每一个劳动者越是认识到他个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认识到经过适当的自治机构他可以以平等地位参加解决有关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问题时，这种意志就会越发明显地表现出来。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的质量，不管是精神的或是体力的，都只能由他的创造性意志的质量和强度来决定，而不能通过控制、检查和外部压力来提高或加强。在生产资料已经社会化以后，情况更是如此。

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是：(1)解放各个成员的创造性意志；(2)保证人们经常受到社会教育和专门训练；(3)使这种意志建立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上，建立在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上，并鼓励它们的实现。因此，高级社会机关的指导和控制，只有当它们旨在为实现上述三项目标提供有利条件时，才能是积极的和创造性的。

因此，以工业国有化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只能在特定情况下和短暂时期内起进步作用并获得群众的支持。这段时期只局限于消灭旧的剥削关系。新的社会主义关系一旦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具备了基本的发展条件，这种国家制度便不再能够起进步作用。只要它一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说，只要它的停滞过程一开始，就必然会引起行政机构和每一个个人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个人将开始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进行反抗。他不再愿意去生产比要求于他的最低限额更多的东西了。这样，劳动者便日益沦为国家机器的无法可想的工具，而国家机器由于独占着经济管理，也将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这样的制度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引起了不良后果。在经济上，这种后果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缓慢了，经济基础的缺乏推动力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和其他任何垄断制度一样，必然走向停滞，走向生产力的衰落。因此，在这

种情况下就要求有一个相应的组织，一个以政治专横和普遍猜疑为基础的进行控制和施加压力的组织。

在西欧，社会主义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的努力方向是：通过目前的古典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加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并通过进化逐步巩固它们。不用说，通过这种媒介表现出的某种具体政策，究竟是不是代表走向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往往是有待争论的问题。但一般讲来，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说，通过古典的欧洲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逐步走向社会主义，在许多国家中不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正在实现。

不过，有两个事实需要我们注意。第一，这些国家正好是历史上资本主义出现最早的国家。它们取得了一种特殊的经济地位和相应程度的经济实力。因此，它们的生活水平便有可能高于较落后地区，从而使国内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正因为如此，通过在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度的范围内逐渐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主要只限于这些高度发达的国家。这类国家的民主传统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同时又能够在它的范围内逐步加强社会主义因素。

另一方面，在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它们几乎全都缺乏深刻的民主传统，内部矛盾同时又尖锐得多，所以不大有可能以类似的方式向前发展。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且，考虑到作为现时代特色的国际资本的极端集中，以及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没有一个不发达国家能够指望走古典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想解决如何解放本国工人阶级的问题，它们首先要解决如何使本国摆脱经济落后和政治附庸地位的问题。对它们说来，完成后一种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

即使说我们暂时抛开某个国家发达或不发达的问题不谈，我们仍然会看到：在某些国家，由于政治制度不能够妥协或是向工人运动作出让步，结果造成了一种政治和经济僵局。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极端尖锐。单是这一事实就使得以和平与民主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成为不可能了。最后，革命冲突便成为这种局势的产物。事实上，过去的南斯拉夫正是这种状况。考虑到这些情况，如果我们还坚持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不可能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起点，或是一口咬定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是唯一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政治体制，那就等于创造了一种新的教条，其害处不下于硬要把十月革命的道路强加给一切国家的相反公式。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好些国家发生的事实，表明了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这是不可否认的。……与此类似，通过古典的民主形式逐步向社会主义进化，在许多国家，也已经成为历史事实。否认这两种事实中的任何一种都显然是可笑的。在今天，不论把它们当中的哪一种教条主义化，都会妨碍实现目前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绝对的命令。这个绝对的命令就是要寻求一条道路，保证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团结。这里所说的团结，并不是共产国际类型的思想和行动的完全一致，而是意味着展开建设性的和民主的合作，协调国际社会主义的各种趋势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带有建设性的和批判的经验交流的团结，能大大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运动，使它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灵活性足以适应现存的和不断变化的条件，并能动员和加速一切导致人类社会进步的因素的发展……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过渡时代。世界的政治结构也正在相应地变化。因此，如果我们只热衷于发明一些一切国家都必须遵循的经济或政治图式，那就错误了。尽管我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或是官僚行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抱批评态度，我们仍然感到，对于处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许多落后国家说来，连这类制度也可能表现为向前迈进了一步。情况可能是：如果不实行这种制度，唯一的选择就只会是停滞不前、窒息于内部矛盾之中或听任国家继续陷入落后和仰承他人鼻息的泥潭。很明显，如果人们能找到一种加速不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援助方式，伴随着这一切进展的痛苦就会减少一些。然而，这种想法看来在最近还不会实现。

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便能看出：把任何特殊的或单一的运动形式作为金科玉律强加给各国人民或全人类的企图，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反动的后果。因此我认为，争取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容忍的共存和合作关系，不仅对于维护和平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为人类的今后进步创造最有利的条件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只有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最进步的社会主义倾向才能充分地表示自己的意见。

可是，世界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看到，虽然在走向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不论是长是短——以内，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能够充当有效的工具，但是，通过它的作用获得的社会主义成果，这些时候也就要开始起反作用，使整个旧民主制度有所变更。要不然，这种一度适合于社会主义不断进步的政治形式，就必然要成为社会主义进步的障碍。

我个人经过仔细考虑，得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正在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每一种民主制度，早晚都要具有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已经变化了的生产关系将相应地要求一种民主的经济管理形式，而且，不论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通过进化的还是通过革命的途径实现的，情况都是如此。第二，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包含着扩大个人

在一般社会管理机构中的地位。

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因此，在经济管理中实行新的民主形式，也就会赋予民主的政治结构以一种适应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方向和形式。经济民主是一个有久远历史的概念。然而，过去主要只是把经济民主看作古典的政治民主的补充或是平行于政治民主。我以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该记住，古典的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是经济民主的一种特殊形式。资产阶级民主植根于由资本私有制产生的经济关系。它符合于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构，以及在这一基础上发展的社会的经济需要。因此，当代提出的对经济民主的需要，实际上也就是对旨在帮助一个其出发点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社会自由发展的、新的民主政治形式的需要。

我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经验，使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经济民主”是生产资料社会化所形成的新政治制度的确定形式。同时，对于那些因为落后于时代而日益停滞、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民主制度来说，这也是解决日益增多的困难的唯一方法。

至于扩大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问题，在我看来，国家机器的地位和权力无疑将要由它来决定。在这一过程中，它将扩大现在被视为最低级的、最接近群众的社会自治机构的影响和活动范围。同样，独立自主和垂直地联系着的社会自治机构的地位，也将一天比一天更为重要。

不言而喻，这种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目前的政党和政党代表机关的制度。事实上，甚至最民主的政党也要限制个人的主动性。它会引起政治上的停滞，并且必然要大大减少人们在有关个人和社会利益的问题上直接进行创造性活动的机会。……政党制度把

社会从盲目的自发势力的压力下解放了出来，并且给社会关系带来了很大的稳定性。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通过缓和基本矛盾——有时是转移开人们的视线——完成了这一必要任务的。……但是，如果假定存在着已经有所发展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更不用过远地瞻望将来，谈论什么无阶级社会了），那末我们就已经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公开的社会矛盾将要减少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旧的制度或政党不仅会成为不必要的，而且将阻碍现有社会力量的充分发挥。

因此，在社会主义关系获得发展以后，我们必须认为，众所周知的那种古典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一定会逐步变成一种从生活出发的更直接的民主制度。……到那时，决定人们如何行动的就不再会是对于这个或那个政党的隶属关系，而是他们作为自觉的社会劳动者对自己面临的具体社会问题所持的独立态度。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这种制度的出发点是革命，它们如果回到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上去，那就等于取消革命，使社会沦于反民主的统治之下。

固然，甚至在这样一种直接民主的制度内部，人们仍然会由于志同道合而结合起来。但这种结合并不一定具有严格的政党组织的性质。而且，间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直接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之间的基本区别就在于：资产阶级民主，连它的古典形式也不例外，肯定了国家的权力集中，但是，以日益发展的社会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民主，却体现了作为阶级政治工具的国家消亡。不论出发点是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还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国家体制，我认为民主的发展必然要导致这一结局。

鉴于上述事实，我们不能同意那样一种说法，即社会主义民主在南斯拉夫的发展必然要导致机械地恢复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形

式。我们迄今取得的成就，不过是发展的第一步。但这是走向新的民主形式的第一步，这种民主形式有机地反映着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我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我们如何对待这一问题是一个原则问题。即使不是这样，实际的政治考虑也会强迫我们去重视它。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已经在管理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且足足占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但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还是小私有生产者。此外，我们又是在特别困难的国际关系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的结合事实上意味着，机械地恢复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就等于放弃革命和革命已经取得的一切，就等于宣布我们愿意放弃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

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派别中，有些人对我们的看法颇不赞同，他们的批评可以总括为以下几句话：“我们并不否认你们的革命是有道理的和必要的。它消灭了反民主的和反动的制度。可是，革命现在已经成功，你们为什么还不建立古典的欧洲民主制度呢？”

对待我们的问题采取这样的态度，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即民主这种东西在旧南斯拉夫是不存在的。这并不是因为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有意識地反对建立民主制度，而是因为它完全没有能力这样做。在旧南斯拉夫，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化排除了民主的可能。南斯拉夫资产阶级的反民主，是这个国家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

战前的南斯拉夫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制造业、采矿业和建筑业雇佣的工人，不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在很少使用现代化工具或技术的情况下耕种土地。……我们应该记住，南斯拉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地

区的经济发展相差悬殊。因此，战前南斯拉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使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不可能……

我国的这些经济和政治特点中的每一种，在革命前和革命后都对我国的发展起了不同的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要继续起作用。诚然，革命改变了国家政权的性质，解放了社会进步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但是，这并不能使经济关系自动发生变化，因而还没有消灭由它们引起的矛盾。

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我们在原则上赞成建立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样一种努力也很难有指望取得成功。这将把我们投入内战，也可能使我们受到已被我们推翻了的反动的阶级专横的统治。更可能的是，它将直接导致国家资本主义的官僚政治。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只有革命才能够作为我们走向新的民主形式的出发点。而且，如果它不能把我们导向直接民主，导向政治垄断的消亡，它就会抛弃自己的内容。革命一旦变成了既成事实，就不能再有另一个出发点。在革命以后，如果要恢复某种革命以前的形式，在政治上就必然要使革命不再成其为社会主义革命……

在革命以后，我们决定甚至不顾我国的国际地位而担当起使我国工业化的不同任务，自然是出于上述考虑。某些批评我们的西方人士习惯于认为，工业化是我们的某种教条主义表现。可是，我们从一开始便认识到，要想使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力量始终保持住它们对反革命和官僚主义的胜利，它们必须强大到足以在经济上真正领导起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并且建立起愈来愈自由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不发达的城乡小生产者分子当中始终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我们就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社会主义力量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能主要通过经

济行动而不是国家强制，把陈旧的社会关系消灭掉的时候，这一任务才能完成。到那时，我们就必须进而使社会力量的物质比例变得有利于社会主义……

由于我们努力的结果，战后的南斯拉夫已经大大接近于世界上经济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我们实现这一目的的努力，曾要求我们在政治形式上作相应的改变。经济上的落后使我们既容易遭到过去资本主义残余力量的侵袭，又容易引起反对这些力量的官僚主义的发展。虽然资本主义分子已经被革命剥夺了权力，他们仍旧拥有一定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把社会主义的政治稳定性削弱到相当可观的程度。由于我们要同这支潜在的反对力量进行斗争，同时又特别致力于加速经济的发展，最初便需要在国内维持严格的纪律，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行政治集权主义和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这必然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因而也造成了官僚主义发展的危险……

同斯大林主义的理论相反，我们的看法是：革命不仅应该以一种国家机器来代替另一种国家机器，而且同时也应该开始作为一般政权工具的国家的消亡过程。当然，这不能是法律条例的机械改变过程。它只能是新的物质力量和新的社会关系发展的有机结果。只有当回到资本主义关系成为不可能和荒谬可笑的时候（正像今天不能回到封建主义去一样），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才会成为如此强大和不可动摇，以致阶级矛盾再不会表现出来。

简言之，只有在社会主义不再需要依靠国家的时候，国家才会消亡。因此，社会主义关系的物质力量越是加强，它们在社会生活行为中越是变得无法更换，国家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必要性就越减少，或者更恰当地说，国家将更多地转变为这样一种社会组织机构，这个机构所依靠的将不再是强力，而是共同的社

会利益以及对于符合共同利益的社会纪律的自愿服从。

所有这些都说明，“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不能是建立社会主义关系中的主要动力，也不能必然是社会主义觉悟的化身。这种社会主义关系只能是劳动人民的自觉的和自发的、经济的、社会的和和其他的活动与实践的结果，而劳动人民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劳动、创造、思考和建设未来的。人们的这种积极性导致新的关系，在这种新的关系之下，人们由于经济和社会意图的影响，自然会倾向于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活动。而且，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也只能在这种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不言而喻，在这个意义上讲，自觉的社会主义活动乃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马克思在德文第一版《资本论》序言中所说：“一个社会……不能跳过或是以法令排除其正常发展的连续阶段所产生的种种障碍。但它能够缩短并缓和生育时的阵痛。”

在我们看来，这一客观进程必须相应地配合一个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主组织机构。我们认为，只有直接民主才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劳动者民主自治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制度必须通过生产管理方面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应的基层组织发生作用。我国的工人委员会、合作社、公社、垂直地联系着的经济自治组织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和其他社会事业方面的社会自治机构，所发挥的正是这一职能。

同时，这些组织及其相应的社会活动的发展和日益扩大，也是新的民主制度借以逐步建立的一种方式，而新的民主制度则是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有机产物，它所体现的东西不是别的，归根到底正是作为权力和镇压工具的国家的消亡。换句话说，生产资料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必须建立起这样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管理的民主

机构，这种机构能够使劳动群众不是通过某个政党的上层杠杆，而是直接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参与管理社会。……我们只能以这种方式防止官僚主义的发展和充分发挥个人的社会主义创造积极性。

在这种社会结构中，负责有意识地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的并不是狭义的国家行政机关，而是劳动群众直接派代表组成的社会自治机构。国家行政机关必须是一种从属于这类社会自治机构的专门机构。自觉的社会主义战士必须在群众中而不仅是在国家机关内部展开活动，争取使有关的民主机构作出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通过群众的力量保证社会自治机构的决定符合于保卫社会主义和打击反社会主义倾向的需要，符合于不断扩大社会主义的需要。这就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活动所依据的原则……

现在简单地谈一下我们在实践中是怎样实现这一原则的。首先需要决定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各种经济力量自由地互相发生作用。这实质上也就是，如何能最好地保证用公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人们作为自由的工人自由地表现他们的主动性。……保证做到这一点的责任，主要由工人委员会担负。

在我国社会的总方向和全国经济计划的范围之内，每一个企业都是一个独立经营的单位。在扣除生产成本——包括基本工资基金——以后，这些企业的纯收入便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收入，也就是说，它既是企业本身的纯收入，也是集体经济纯收入的一部分。根据联邦法律和联邦计划的规定，这笔纯收入按照规定的比例在国家、公社、有关企业及其工人和雇员当中进行分配。归企业本身所有的那部分纯收入，一部分按生产成绩大小分配给工人和雇员作为红利，其余则作为企业自由支配的资本基金。企业把这部分

钱用于扩大和改善自己的资本设备以及修建住宅等社会福利事业,而关于这些问题,工人委员会都有权独立作出决定。

在这一范围内,企业的活动完全是自由的。任何行政机关也无权决定它的经营方针。它在公开市场上参加自由竞争,独立发展自己的生产,决定和别的同等独立的企业合作的程度及方式。

我们的企业是由全体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来经营的。……委员都由秘密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选出管理委员会,在工人委员会休会期间,管理委员会执行其决定,并负责管理企业的日常经济工作……

因此,就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而言,国家机关中没有管理各个企业或工人委员会的特殊行政机构。不过,企业有权在工业协会和其他同业公会的组织中联合起来,以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和推动生产。它们也可以建立共同的经济和技术服务机构,或者建立导致相同目的的类似组织。

企业的经济政策由工人委员会决定。企业的经理和全体技术人员负责从技术上执行这种政策。……经理当然可以就企业的经济政策问题提出建议。同样,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也都可以就组织劳动生产问题提出建议和意见……

南斯拉夫的市场是自由的,所以各企业处在竞争状态之中。市场上的成功取决于产品的质量 and 价格。竞争对价格和质量的有益影响,加上全体工人、甚至所有公社人员的物质福利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企业在市场上的成功,这就提供了比任何行政监督都更为有力的改进质量和提高产量的刺激……

由于工人按照成绩好坏领取报酬,他们都关心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他们参与分配企业的纯收入——或是以直接的红利形式,或是通过间接的形式,即一部分收入用于修建住宅、卫生设施、

教育和提高地方公社的社会水平——他们都关心企业在财政上的全面成功。

这种做法不仅大大鼓舞了人们的劳动本身，而且推动了他们积极参与管理企业和公社。工人委员会的民主作用和自由市场的竞争结合起来，便使得全体工人有可能发挥干劲，努力争取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我们的经验充分证明，管理我国企业的工人集体能够有效地应付生产的社会管理提出的任何任务。

工会作用的改变是这种情况变化的一个实际后果。工人委员会开始在企业中起作用，生产者院开始在公社中起作用以后……大体说来，作为工人阶级经济斗争工具的工会对于工人便是没有必要的了。

尽管如此，工会仍然具有若干重要的社会职能。首先，工会仍然具有某种保护性的职能。在制订基本工资条例时，其各项重要条款都必须取得工会同意（正如必须由公社批准一样），因此，工资条例便具有集体合同的某些性质。通过这种参与制订基本工资条例的活动，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会统一了同一种工作的基本报酬。在执行基本工资条例过程中，工会也注意保护工人个人的权利不受企业机构或其他地方机构的侵犯。它们另外还争取改善劳动保护条件、采取适当的卫生和其他措施等等。

第二，工会帮助协调全体工人和各个工人集体之间的直接经济利益。它们采取的方法是：竭力使工人享受物质福利和其他权利的机会均等。只要个别的工人集体表现了可能为追求自利目的而牺牲其他集体的迹象，工会就要和这种现象进行斗争。

第三，工会的一个主要职能是为工人提供经济、职业等方面的训练和帮助他们提高文化。譬如说，工会帮助工人完成日常任务、

参加生产自治机构和公社活动、充分理解自己在这些机构中的权利和地位等等。

第四，工会负责或帮助建立食堂、社会服务机构、俱乐部、医院、休养所、体育组织等等……

这就是生产、交通运输、商业和一般经济部门中基层民主机构的一般作用和组织形式。这种制度是以下列两个基本原理为基础的。第一个原理是：任何一个集中的领导，不管它多么英明，整个地和部分地说来都无力指导得不到帮助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二个基本前提是：个人的努力和主动性并不因为加强了对他的指示、监督和检查而相应提高。……每一个从事劳动和自由创造的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物质利益，应该成为这样一种社会动力，它将代替个别资本家的自由资本主义主动性……生产资料公有制能使这样的主动性成为每一个劳动者的生活内容，假如同时存在着生产者的民主自治机构的话。

新政治制度的最重要问题，就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和社会的集体利益。在社会运动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期间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政体的问题，也要取决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在我们看来，生产者自治原则是一切民主的社会主义方针、一切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出发点。没有为这种发展打开大门的革命，迟早都必然要发生停滞，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专制主义。

由此可见，必须如此设计民主自治的方法，以致使生产者能够影响社会决策机构。而且，这种组织形式必须使生产者能够充分意识到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它必须使生产者能够切实了解各种经济和社会关系，从而作出真正有可能实现的决定。一句话，它必须

使劳动者逐渐能够出于自己的觉悟以及物质的和其他方面的利益考虑,发挥一种越来越兼顾个人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一个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社会组织机构,以及这个机构内部运用的民主方法,必须适合于实现上述目的。在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构成我国社会大厦基础的公社是这一责任的主要担负者。

可是,决不能因此就认为,南斯拉夫的中央政府机关没有什么重要作用。与此相反,社会的和国家的中央机构在分配国民纯收入或剩余劳动方面的决定,密切关系到生产者有效地和直接地发挥影响的程度。中央政府机关起着协调和引导全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它们的职能主要是:把国民收入分配给不同的社会基金,并保证整个制度为共同的目的和谐地运行。实现社会计划等等的法令,就是在中央机关制订的……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是从政党的政治垄断跃进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直接参加对问题的决定。这样一种民主的社会管理机构一方面必须实行分散管理,以便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首先是经济领域中,以人们自治的原则逐渐代替“管理人们”的原则,另一方面又要适当地集中,以便保证对物即对公有生产资料和整个社会的物质力量进行最有成效的社会管理。只有这两个过程的平行发展而不是把人变为集中的官僚主义机关的奴隶,才能最后导向这样一个地步,即“对物的管理”不再是社会关系,而将逐渐地变成一种为一切自由人服务的公共社会职能。

因此,我们并不全部反对社会职能的集中。……当代的社会发展不仅要求在各国内部把一些特定的社会职能集中起来,事实上也要求在国际领域内这样做,因为人类正在不断地被推向合作以及全面地解决世界问题。不过,我们认为这种发展的出发点必

须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下的自由生产者，也就是通过共同的利益而不是通过国家强制联合起来的人们实行自治。作为镇压工具的国家只能在这一过程中消亡。这不是一件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做成的事情，而是一项可能需要好几代人完成的任务。

在南斯拉夫，正如我已经说明的那样，由人民委员会领导的公社是这种社会民主机构的基础。另外有工人委员会和其他生产者的直接自治机构作为补充……

公社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作用和力量，首先由于它在经济发展领域中有独立行动的自由，其次也由于它同工人委员会以及生产者的其他民主自治机构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因此，公社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社会经济的机构，而且首先是社会经济机构，它的政治职能注定要日益削弱，社会经济职能则同时日益加强。事实上，一个地区的剩余劳动产品正是通过公社进行分配的。这样，公社便同不断发展本地生产力的工作有了直接关系。

公社和区的主要政治和社会经济机构是人民委员会，其组织方式使它们能够履行上述职责。公社的人民委员会一般都是一院制，由公社管辖地区的全体成年公民通过无记名投票选出。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比较详细地谈一下生产者院在我国制度中的作用。生产者院完全是由直接生产者，也就是参加生产的工人和雇员、劳动农民、独立手工业者等选派代表组成的，也只有直接生产者才能当选为代表。……各级生产者院的主要作用是，纠正陈旧的社会关系对新的民主自治机构所起的不良影响，并且以民主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这样一来，国家对这种关系实行行政干涉的必要性便可以逐渐减少。因此，生产者院所起作用的意义就在于，工人阶级虽然目前还居于少数，却能借助于这一组织在整个社会体系中起领导作用。同时，它还能保证潜在的官僚主义趋

势不会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幌子战胜无产阶级本身，夺去无产阶级的权力。这个目的也是通过民主的组织机构得到实现的……

领导人民委员会各个行政机关的，是一些单独的委员会，其组成人员由人民委员会从公民中选出，他们都具有足够的专门知识或其他资格，能保证行政机关卓有成效地行使职能。他们不是领薪官员，而是志愿服务的不领薪公民。这些委员会负责作出有关原则问题以及比较重要的行政部门（如经济、教育、卫生、内政等）方面的决定。它们也负责监督各部工作人员。作出的决定由这些委员会的秘书处或人民委员会的专门机构负责执行。

这种组织机构的性质以及公社和区的广泛权力，使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直接对公社的活动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发挥巨大影响。随着整个制度内在力量的日益增长，这种可能性也必然愈来愈扩大。

而且，单是存在着这种组织机构和公社在其中所处地位的事实本身，便使得公社成为统一社会的集体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的最适当形式。在工厂中参与决定有关工资和个人社会水平问题的同一个劳动者，也能够参加制订公社就本地的其他社会需要作出的决定。不论是关于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以增加公社收入的问题，或是拨款兴办教育和卫生事业的问题等等，他都有权利提出意见。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个人的程度，不下于工资问题。因为个人消费每一点不适当的提高，都必然要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并减少为普遍提高社会水平所必需的那些部门的投资。

这是每一个生活在公社系统中的人都必须认真考虑的事实。因此，对于这种公社集体利益的认识（一般劳动者的日常思想已经很接近这个高度），便成为最重要的纠偏手段，使要求增加个人收入的盲目压力不致损害整个社会自治系统……

在作出上述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有必要解决教育、文化、科学和卫生这类非经济领域中的社会管理问题。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原则，同样是国家干涉应该逐步减少到最低限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活动中心转移到建立一个相应的自治组织机构方面。

在我国的大中学校、科学研究所、文化机关和其他类似组织中，正在开始实行一种集体管理制度，也就是由各级议会或人民委员会和有关社会机构派代表共同组成管理机关。这类管理机关（管理委员会）根据法律作出原则决定，至于执行决定和领导日常活动等事宜则由有关机构的专门委员会或领导人负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正在按照垂直的或联邦的系统，为这些社会生活的特殊领域发展一种自治行政机构的制度……

在集中履行社会职能的组织形式今后在我国的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将是社会活动各个领域一些垂直地联系着的、特殊的自治系统。我在这里指的是追求共同目标的企业、机关、公社和公民组成全国性协会的组织形式。生产者院、经济协会、社会保险机构和各种专业的联合会等等，就是这种组织形式的体现者。目前由集中的国家机关履行的社会职能，将越来越多地为这些组织所接替。通过它们，社会自治原则将在全国性共同职能的领域中得到实现。因此，公社和这种垂直地联系着的自治机构的发展，归根到底也就是改变中央国家机关的面貌及其组织方式的过程。至于未来的情况如何，我们今天则很难断定，贸然作出预言是不聪明的。

*

*

*

以上就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据以发展的前提。这是一种使得每一个公民都真正能直接参加社会管理的制度，它促进不同意见的争论，刺激个人的主动性，推动社会主义力量的自由发展。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它又能保卫自身不受反社会主义主张的攻击。它所以也是实现各种政治垄断逐渐消亡过程的最适当形式，其原因就在于此。

事实上，古典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直接民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前者是一种**国家形式**，后者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消亡的形式**……

可是，在目前的南斯拉夫，这一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尽管作了巨大的努力，我们也只是刚刚开始摆脱落后。我们不是把主观愿望错当做客观现实的幻想家。我们不用别人提醒，自会注意我国社会中的各种进程和物质力量的发展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我们的日常实践决不越出物质条件限制的范围。这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速度也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因此，我们并不幻想自己能够绕过社会必然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即使我们对以后的发展看得很远。与此相反，正是这种远景使我们充分意识到，需要把那些能够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目前阶段承担负担的物质因素动员和组织起来。这一使命必须由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及其国家来共同完成。放弃这一使命就等于取消革命和社会主义本身。

G. D. H. 柯尔：新修正主义^①

十分重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左派社会党人，对于把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分裂成对立派别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应该抱什么态度呢？许多社会党人认为，对共产党及其一切活动抱一种完全敌视的态度就够了。他们说，共产主义是民主和个人自由的破坏者，它

^① 一位著名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斯大林死后的看法。见《再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World Socialism Restated)，伦敦1957年版，第10—19、44—48页。

把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关进了“奴隶劳动营”横加折磨，它在对自己的领导人实行的无数次清洗（而加在被清洗者头上的政治罪名，在明白事理的人看来大都是捏造的）中充分暴露了它的本质。这的确是对共产主义的一个可怕控诉，企图把罪责推在个别坏人（如斯大林或贝利亚）的身上是不可能为它开脱的。因为事实明摆在那里：整个共产党领导都同这些事情有干系，而且，即使在今天，共产党统治的许多基本特点也都还原封未动，虽然在谴责托洛茨基的同时也谴责斯大林，以及承认过去犯了严重“错误”的做法已经变得很时兴。

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他们就残酷地镇压反对派和维持一党独裁；任何人只要被他们看作政敌或有可能变成反革命，他们对这些人就不会有任何怜悯之心；他们一直大规模地歪曲反对者的面貌，而且往往完全造谣说谎，同时，他们又不让人民了解真实情况，使人民无从识破他们的谎言；如果有非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企图和他们在工人阶级团结的事业中合作，但又不准备完全接受共产党的控制，他们就会毫无顾忌地把这些人出卖。以上这些情况都是明显的历史事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共产国际成立以后，为了追求世界革命的目的，在每一个他们影响所及的国家，共产党都有意识地分裂了工人运动，从而为各种形式的法西斯主义敞开了大门，这样，也就使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德国和巴尔干国家遭到摧毁。这些同样是历史事实。

然而，尽管对共产党提出的这类控诉是可怕的和无可辩驳的，它却失之于片面，因为它忽视了一系列其他的重要事实。第一个事实是：不论共产党人有多少罪恶，他们终究在俄国进行了革命，并且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和消灭它的一切努力面前保卫了革命；同时，俄国革命的确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实现了生产资料

公有化，从而保证早年的艰苦斗争取得的生产力发展的成就，从长远说来能有利于工人和农民，并且使俄国摆脱原始的野蛮状态，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占据一个领导地位。

第二个事实是：俄国革命虽然没有带来布尔什维克所希望的世界革命，却大大帮助推动了亚非各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运动，这种运动正在迅速地把世界改变为一个比过去平等得多的国际社会，并且有助于摧毁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从根本上冲击先进国家剥削不发达国家的局面。

第三个事实是：尽管共产党国家的专政有种种弊端，苏俄工农的生活却无疑地比沙皇统治下的生活要好得多，除政治方面以外，他们的文化与生活水平都比过去大大提高，这方面的改善机会也要比过去多得多。

考虑到这些事实，虽然我极端反对和憎恶共产党的统治和哲学的许多方面，我却不能把它单纯看作必须与之作斗争的敌人。在俄国、东欧和亚洲的一些地区，根本不存在民主的传统和基础，因此，幻想在这些国家能够通过“自由主义”的民主方法成功地进行革命，或是在革命的第二天就建立起西方类型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完全不现实的。这种制度意味着存在一种愿意接受既成事实的妥协精神，可是，在俄国、中国或其他被共产党征服的国家，这样的精神并不存在。说俄国或中国本来不应该“共产党化”，就等于说俄国或中国革命本来就不该发生一样。但我非但不愿这样说，而且把这两个革命看作现代世界最伟大的成就。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国家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坏事，都必须作为革命的不可避免的作用被我们接受下来。……但我也无意于因为这些弊端而谴责俄国和中国的革命；如果那样做，就是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纯粹背叛……

作为一个社会党人，我也必须表明我对于目前苏联、南斯拉夫以及我所知道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倾向，对于不在共产党控制下的各国、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所持的态度。就苏联而言，我自然很注意最近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进程，以及对于“个人迷信”和个人迷信的代表人物斯大林的谴责。但我也看到，这些谴责决不意味着对一党独裁的基本原则的任何放松，或是容忍任何反对党的政策的行为。它们只是以集体领导更换了个人领导；它们是否意味着党本身的有效民主化，是否意味着将使党的政策通过由下而上的途径由一般党员的意见来决定，而不是由集体领导机构把政策强加给广大党员群众，现在还很难断定。我并不认为已经发生的一切使共产党的哲学有了任何根本的变更，虽然我希望它今后会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些领导人在非斯大林化的进程中，未必能够恰如所愿地适可而止。我觉得，他们将会在自由化的道路上身不由己地走得很远很远，就像南斯拉夫人和共产党情报局决裂以后所做的那样。我认为，目前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情就是，非共产党社会主义者应该欢迎这种自由化的每一点表现，即使是比较微小的进展也不拒绝。

就南斯拉夫而言，那里虽然保留着一党制度，却同时容许相当多的自由讨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地方分权，因此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做的时候：非共产党左派社会主义者应该尽最大努力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友好相处，竭力建立一个广泛到足以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西方社会党人以及对目前形式的社会党国际有所怀疑的亚洲社会党人联合在一起的社会党国际。南斯拉夫人已经在工人管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民主制度方面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进展；西方社会党人在批评他们的同时，也应该准备好向他们学习。

就西方的、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而言，它们控制了大部分工会，是国内强大的选举力量，所以在这些国家中，没有它们的合作便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或任何重要进展，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当然，我们并不因此而必须立即和他们结成统一战线（这样做的条件还没有成熟），但我们却决不能排除和解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在不牺牲基本的民主原则的情况下，不放过任何一个改善社会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的机会。在意大利，由于有一个南尼领导的强大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合作，反对唯一得到社会党国际承认的小得多的萨拉盖特党，这就出现了一个特殊问题。南尼的党远比萨拉盖特的社会党更能博得我的同情；在我看来，其他国家的左派社会党人应当准备好同南尼的党进行合作和自由交换意见，因为对于打破国际社会党统一行动道路上的障碍来说，这个党能够起很大作用。

在英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不存在统一战线的问题——由于这个党特别具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特点，这个问题便更谈不上了。但我们必须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共产党人在许多工会中是拥有相当力量的，而且，只要对他们采取排斥态度，他们就始终是一支分裂和捣乱的力量。我并不是不知道，在一个大都是由不热心的分子构成的组织中，一个人数虽少但有高度纪律性、无所顾忌和诚心捣乱的集团能够起多大破坏作用。但是我反对那种把共产党人一律逐出工会办公室的做法，更反对某些工会领袖给每一个左倾工会干部都扣上共产党或“同路人”帽子的倾向。我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运动的方法是，把权力和责任分散给下级机构，不是通过排斥，而是通过扩大积极参与工会活动的会员人数，通过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展开声势浩大的工会教育运动来和共产党作斗争。

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反对共产党哲学的，我认为，在我们这些具有自由主义传统、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以和平手段改变制度自由的国家，共产党的哲学不切合具体的情况。我憎恶作为共产党实践的基本特点的残忍、冷酷和中央集权的独裁主义；我在抨击他们的时候决不闪烁其词。但我也认为，工人阶级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前进的一项必要条件；我能够懂得，为什么许多社会党人——特别是在反动阶级实行极端统治的国家中——由于软弱的改良主义一事无成，会一怒而投入共产党的阵营。我希望我的社会党同志们也都能了解这一点，因为，如果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工人阶级的阅墙之争上，而不利用这些工人兄弟的力量去促进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

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许多正确而尖锐的批评，但他又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日益发展，工人将“愈来愈贫困”，中产阶级将沦为无产阶级，由于那些既不是无产者又不是资产阶级剥削者的分子消灭了，阶级斗争将愈来愈简单化。事实证明他的这些看法是错误的。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地位和保障都有了巨大提高；同一时期，中产阶级的人数也有了巨大增长；阶级结构变得愈来愈复杂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已经有所缓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的革命性都已大为削弱，转而把主要兴趣放到争取一点一滴的改良上面。马克思主义者有时辩解说，所以发生了这些情况，是因为先进国家通过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用剥削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办法取得了自己的繁荣，因此，先进国家中的工人事实上已经变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从而具有了资产阶级性质。他们说，今天真正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不发达国家的工农，先进国家的工人和资本家都是依靠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才

生活得比较好的。

虽然我完全同意不发达国家的人民遭到可耻剥削的说法，我却决不能接受上述论断。诚然，先进国家的经济正越来越多地依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供应原料和燃料，而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得到的报酬也确实很低；但我们也看到，先进国家本身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已经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这些国家的工人享有较高的消费水平，主要是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和工人运动为要求分享这种利益而施加压力的结果。大体说来，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取决于本国的生产力和工人运动力量的程度，要比取决于先进国家按照不等价交换条件取得不发达国家产品的能力大得多。其实，先进国家以较高价格收购落后国家的产品，甚至对它们自己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做能够扩大先进国家产品的世界市场，并且增进所有地区的繁荣。不过，先进国家的资本家当然只愿意拿出他们不得不拿出的钱，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出得起比别国竞争者更高的价格。

帝国主义剥削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不发达国家对此感到的愤怒是完全正当的。但是，马克思所作的先进国家的工人将“愈来愈贫困”、阶级矛盾将日益尖锐和简单化的预言所以没有实现，并不能拿这个作为主要解释。社会党人了解这一点，并且考虑考虑马克思对未来的预言何以会如此错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所以说错了，主要并不是因为他对十九世纪“饥饿的四十年代”的事实认识不清，看错了当时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面貌，而是由于他误认为那个阶段的资本主义表现的趋势会一直继续下去，而且将越来越加强。早期机器时代的资本主义在以牺牲工人为代价，为积累资本而进行不顾死活的斗争时，确实对工人

实行残酷剥削；它也确实摧毁了高级工匠的古老手工艺，主要使用了非熟练工人。但是，在资本已经积累得比较充足以后，资本家便不大有需要把工资压低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这时，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商品找寻群众市场；同时，随着生产技术的日益进步，对新型的熟练工人的需要也越来越大，而付给这些工人的工资必须高于一般工人。现代工会运动主要是在这些熟练工人中首先发展起来的，他们很快就强大到足以要求选举权和发挥一部分政治影响。由于数量急剧增加的不仅有熟练的体力劳动工人，而且有领薪雇员、技师、管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阶级结构变得更为复杂了。经过一段时间，非熟练工人也开始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们也提高了工资和获得了选举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利取得了走向“福利国家”的初步进展。社会主义政党——包括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政党——专心致志于促进这些改良，从而愈来愈丧失了革命性。最后，到我们今天，资本主义被迫向工人阶级的意见作了巨大让步；针对在此以前经常出现的危机，它想出了不少保护自己的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新政”措施，这些措施把它从三十年代初期可怕的大萧条中解救了出来；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度过三十年代初期濒临崩溃的风浪以后，接受了一种高工资和承认工会的制度，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

诚然，尽管有这些发展，世界资本主义仍旧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美国资本主义必须把它的相当一部分产品白送出去，给那些拿不出美国所需要的产品作为交换的国家，才能维持住高水平的生产和就业；而在许多比不上美国富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依靠美元生存。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以下的事实：资本主义始终在发展，它不但没有即将崩溃的迹象，而且大体上已经从战争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因此，社会党人现在如果把自己的政策建立在

一种主观的假定之上,以为他们只要坐待资本主义瓦解、等着收拾残局就行了,那便是非常不现实的。

诚然,这种复兴的资本主义只存在于由美国的巨大经济力量统治着的有限区域之内。相当大的一部分世界经济已经摆脱它的掌握,变成在集体所有制之下进行计划生产的制度,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种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现在必须应付共产党国家越来越大的经济挑战;这些国家之一——苏联——已经证明它有能力赶上最新的科学发展,并且正在以一种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甚至美国)都望尘莫及的规模训练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但是,从经济上说,由于世界大体上分成了两个不同的贸易集团,彼此之间只有很有限的商业往来,这种挑战的影响目前还是不大的,虽然已经有迹象表明,由于苏联越来越有能力向不发达国家提供资本输出,同西方的资本主义供应展开竞争(譬如说,在印度和中东这类关键性地区),这种隔离状态今后很可能被打破。

目前的世界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中间则横亘着被争夺地区),使非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如果它对共产党展开斗争,它就会沦为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盟友。考虑到权力集中在美国手上的事实,这就使它不论在先进的西方国家还是在两个敌对集团互相角逐的不发达国家,都很难展开争取社会主义的运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迫切需要摆脱同资本主义的瓜葛,争取同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达成谅解。它希望打破东西方之间的障碍,根据合作开发世界的政策同苏联和中国和解——如果共产党国家愿意接受这种政策的话。无论如何,目前已经有某些迹象表明,他们正在走向这样一种立场——请看苏联领导人最近已经承认,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这是一种大不相同于早年共产党情报局的态度。社

会党人的政策必须致力于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裁军，并且设法把裁军省下的一部分资源用来共同向贫困宣战（如果有可能，可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这条道路上还存在着重重障碍，特别是美国的参加所引起的问题；因为美国目前提供的任何大规模援助，都同军事目的有密切联系，要说服美国国会帮助开发社会主义的或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用说共产党国家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进行这种努力；因为不发达国家很容易从正当的反资本主义——变而为仇视外国人，联合国的帮助远比美援或其他国家的直接援助容易使人接受，比较容易消除不发达国家天生的猜疑。

总之，积极争取裁军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武器条件下，战争的前景已经愈来愈可怕，同时也因为，不断增加的现代军备费用对于每一个拥有庞大军备的国家（美国是例外）说来，都是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苏联对于裁军的需要，其强烈程度不下于英国或法国。对苏联来说，裁军提供了迅速提高长期受苦的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希望；对于英国说来，裁军则是结束英国经济的长期危机以及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前提下稳定收支平衡的必要条件。而且，裁军也是德国重新统一的必要条件，因为只要东西德在“冷战”中处于敌对阵营，它们便不可能统一。我深信，重新武装西德是一个巨大错误；我这样说不仅是出于社会党人的立场，而且是出于普通常识的考虑。从这条路上返回来是当务之急，但是，如果两大集团之间不能达成裁军协议，便很难有回头的希望。

可是，要想实现裁军，英法两国必须向美国人表明态度，拒绝支持这样一种政策，即寻找种种借口拒绝苏联的每一个建议，继续阻挠东西方贸易，对那些为中国和苏联的和平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实行禁运。禁运没有使美国资本家遭到什么损害，但却使英

法两国的经济蒙受了巨大损失……

继裁军——即使是部分裁军——之后而来的将是形势的缓和，这将大大有助于消除把欧洲隔开的铁幕，从而使目前加强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统一的运动有可能变成一个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的运动。两大实力集团之间形势的缓和，也将大大有助于减少亚洲人对西方帝国主义的猜疑——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东的巴格达条约已经严重地引起了这种怀疑心理。结束两大敌对集团准备总体战的局面，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莫大的好处。事实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非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就永远不能摆脱一筹莫展的窘境，而共产党则将利用它的无能为力，成为不发达国家受苦人民的同盟者，因为在目前情况下，对于这些国家的人民为民族自决和经济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非共产党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给予有效的援助。

另一点是，我希望全世界的社会党人联合起来，一方面共同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残余和军事统治，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党的思想和政策方面自由地和密切地交流经验。共产党人所体现的社会主义运动，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已经取得巨大进展。民主社会主义运动也取得了很大进展，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但是就目前情况看来，在这些国家中，它似乎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才好，而在整个西方世界，它看来已经陷于停滞，在争取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方面，并不比二三十年前进展多少。即使在英国，它也落进了冷战的罗网，结果变成了美国资本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世界的盟友，既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不能在社会福利方面有进一步发展，又由于害怕得罪美国而不敢放手争取社会主义。不过，比起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来，英国社会党人的处境还算好得多，前者的发展不仅受到冷战的阻挠，而且要对付愈来愈有组

织的天主教会的政治力量。

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巨大问题就是，如何设法摆脱目前的这种困境。我敢肯定地说，只要冷战继续下去，或者至少是，只要西欧还是冷战的参加者，就无法找到出路。我们欧洲人无法阻止美国政府的行动，它可以随自己的意长期坚持反共政策，使其他一切都服从于在世界各地遏制共产党的努力，并且不管这样一种国际政策要求给最反动的政府以多大支持。可是，我们本身却可以打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及在中东和美国结盟的束缚，使共产党人要求和平与相互裁军的愿望的真诚性能够得到充足的考验机会，以表明我们不再赞同美国的全球战略观念。我们可以像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一样，做一个苏美冲突的中立旁观者，能够自由自在地着手更好地管理我们自己的事务。

这样一种政策当然带有风险。假如苏联的和平愿望不是真诚的（但我敢肯定它基本上是真诚的），我们就有危险被苏联以武力征服，而美国却不一定来援救我们。但我不认为这种危险是真实的；假如果真有这种危险，战争早就应该在苏联军队能够长驱直入地征服全欧洲的时候爆发了。在今天这个事事难以肯定的世界上，有一件事却看来十分肯定，这就是：不论领导人的态度如何，苏联人民对战争是深恶痛绝的；因此我不认为苏联领导人愿意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作战，或者是，即使他们愿意，他们也不敢发动战争。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一切有机可乘的地方给资本主义世界制造麻烦，特别是在它的殖民地或是有可能进行帝国主义经济渗透的地区。可是，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用武力统治着这些地区或是在经济上剥削它们，并且把它们收罗在一个反对共产党国家的实力集团之内，难道苏联领导人没有权利在这些地区制造麻烦吗？我想他们是有这个权利的；我无意于改变自己的反帝立场以

适应反共运动的需要。

但是，即使抛开苏联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不谈，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目前接受的美国经济援助只是在它们必须加入反共阵营的条件下给与的，因此，它们是否能够不要这种援助而维持下去呢？回答是：它们能够维持，如果它们一方面削减军备，另一方面发展彼此之间的以及同东方国家的贸易的话（目前，由于美国对“战略”物资实行禁运，后一种贸易大部分被取消了）。我们不能认为，美国停止无偿地援助西欧以后，会为了出气而伤害自己，放弃同欧洲国家或英镑区的贸易，正如印度拒绝参加它的实力集团以后，美国并没有停止援印一样。……从经济上说，由于接受美援而被紧紧束缚在冷战的战车上，不得不承担沉重的军费开支，这种代价实在是太高了。

西欧社会党人的第一项任务是：使他们的国家摆脱冷战的束缚，竭力同共产党国家建立友好的交往和贸易关系。第二项任务是：使他们的社会主义运动重新振作起来，作为一个结束阶级统治和经济剥削的有力工具，在人民群众中得到更热烈和更广泛的欢迎，从而使敌人无隙可乘，不再能利用它的畏首畏尾和缺乏把信仰付诸实行的意志而大获其利。

重新振作社会主义运动需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必须既从物质利益方面也从理想方面来打动人心，必须以普通人既能够理解又认为是切中要害的方式，宣布一系列理想的目标。必须从同志情谊的角度展开宣传，号召人们像兄弟一般共同追求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仅要求每一个人在物质条件方面都达到起码的过得去的水平，而且要求人们不再为追逐财富而竞争，把金钱当成通向权力和威望的锁钥，也就是说，要以社会平等的精神感召人们，这种精神的基础是没有阶级差别的教育制度，承认普

通人享有参加经济和政治自治的权利。此外，还要号召人们努力工作和提高生产率，这不仅是为了多挣钱，而且因为提高生产率是重新建立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独立所迫切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

第二件事情是，必须抛开种种偏见，坚决地站在殖民地和其他不发达国家新兴民族运动的一边，拒绝维护那些自命为高于“劣等”民族的殖民者的特权，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剥削殖民地或其他不发达国家（如中东或中美的石油产区）的资源以榨取利润（或美元）。如果只支持殖民地人民的改良运动，而不许他们提出经济上和政治上完全独立的要求，那是非常不够的；因为这无异于仍然把他们看成低等民族，而社会党人却不能不主张完全平等。

第三点是，除非各国工人运动都能够恢复团结，在支持它的事业中牢牢地结成一体，否则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重新振作起来。这在法国意味着，必须设法消除社会党和共产党人之间的裂痕，重新建立一个团结的工会运动。这在意大利意味着，必须承认南尼的社会党事实上是（同共产党一道）意大利工人阶级的主要代表者，同时，欧洲社会党人非但不应该指望南尼手下的社会党员同陶里亚蒂的追随者破裂，而且要欢迎这种联盟，设法把它扩大到包括萨拉盖特的社会党在内。社会党国际不应该疏远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者，而应该尽一切努力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帮助西班牙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对佛朗哥独裁政权采取一致行动。最后，必须加强反对右翼的天主教政治势力，同时欢迎这样一些天主教徒加入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列，这些人——特别是在法国——通过他们对法帝国主义在印度支那和北非的行为所抱的态度，已经表现了他们的正直和真诚。

当人们真正有理由改变心意的时候，对各个政党的支持和政

治信仰是可以非常迅速地改变的。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断言，西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目前的困境就肯定象征着它的动力已永远消失。它的事业的正义性仍然是不可动摇的，问题只在于它暂时走进了反共的死胡同，以致既不能全心全意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又不能保证人民的福利稍有一点像样的改善。目前，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顾虑实在是太多了。它害怕吓走那些可能在一定限度内支持它的人；它不敢得罪所谓的“舆论”，其实那只是反动报刊造成的报界意见。它不敢得罪美国人，害怕在苏联的威胁面前没有他们撑腰。它不敢采取任何使本国的资本主义可能降低效率的措施，因为它并不打算以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来代替资本主义。它不敢同共产党人改善关系，因为它担心自己会为他们更坚强的意志和更大的热情所征服。

这样的态度决不会有助于缔造新社会，因为创造新社会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最需要的就是勇气和敢于冒险的精神。一个不敢大胆行动的社会主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建立社会主义运动固然需要战斗精神，它在争取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这种精神的。对议会活动和宪法手段的利用，并不一定就戕贼这种精神——虽然在合法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一定地位而被承认是本国政治结构的一部分时，以及在工会不再有必要为生存权利进行斗争而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公认的机构的一部分时，时常容易发生这种情况。因此，许多国家中不少优秀的工会主义者和社会党人所以投进了共产党阵营，大都是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在宪法行动的范围内存在的权利被承认以后，往往便抛弃了原来的战斗精神。如果说，这种脱党现象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不算多，那只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取得过坚实的虽然是有限的成就，尽管它对于未来的道路徬徨犹豫，目前

仍然能依赖过去的威望支持自己。可是，它总不能长期依靠自己的历史过日子。它也不能单从一个国家的行动计划中找出新的前进道路。需要重新建立和赋予新的活力的，是一个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个运动将领导着世界人民——不论是在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国家——谋求解放，而且作为一个世界运动，它将摆脱目前束缚着它的重重顾忌和恐惧。

埃尔内斯托·格瓦拉：研究古巴革命 思想意识的笔记^①

古巴革命是一个独特的革命，有些人认为，这个革命和列宁所表达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个革命运动最正统的前提之一不符。应该说，革命理论作为社会真实的表现并不仅仅限制在文字表述的范围内，就是说，即使不懂理论，只要能正确地说明历史现实，正确地使用参加革命的力量，也是能够进行革命的。一切革命，总有各种不同倾向的人参加，但是他们在行动方面和革命最眼前的目标方面是一致的。

很明显，如果领导人在行动之前有充足的理论知识，只要所采纳的理论符合于现实，他们就可以避免犹豫和错误。古巴革命的主角没有完整的理论标准，但是也不能说，他们对今天世界上讨论的关于历史、社会、经济和革命的各种不同观点是一无所知的。由于对现实的深刻了解、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对解放目标的坚定以及革命实践的经验，这些领导人有可能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概

^① 一个革命情绪高涨的不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发言人若干言论的选辑，材料来自许多方面。见《左派情况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第1卷第3期，威斯康辛州马迪孙城1960年出版，第75—85页。

念。

以上所述可以当作一个小引，而本文目的是要说明一种使人感到不解的奇怪现象：古巴革命。一小批人在遭到一支在技术和装备上大大占优势的军队的重创之后还能保存下来，然后逐渐加强，再后来在作战地区比敌人强大，再后来开进新的作战地区，在野战中最终击败敌人，虽然所拥有的军队在数量上仍处于很大的劣势，这到底是怎样可能和为什么可能的呢？这确是现代世界历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事实。

自然，由于我们没有经常表示对理论的适当关心，我们今天不是作为精通理论的人来解释古巴革命的真实情况，我们只想为说明这种真实情况提供一些根据。事实上，应该把古巴革命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1959年1月1日以前的武装行动阶段，从此以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阶段。

虽然这两个阶段还可以细分为若干小阶段，但是我们将不是从历史说明的观点出发，而是从它的领导人的革命思想通过同人民的接触而发生演变的观点出发来理解这两个阶段。这里必须顺便谈一谈对目前世界争论最多的名词之一——马克思主义——的总的态度。如果有人问我们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态度同物理学家对于人们问他是不是“牛顿派”或者一个生物学家对于人们问他是不是“巴斯德派”的态度一样。

有些真理是明明白白的，是人人知道的，根本用不着再去讨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就同物理学中是不是“牛顿派”或生物学中是不是“巴斯德派”的性质一样。必须考虑到，新的事实固然决定新的概念，也决不会使过去的事物失去其真理的部分。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论同牛顿的发现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的发现丝毫无损于这位英国学者的伟大。

由于有了牛顿，物理学才能推进到取得空间新概念的地步。这位英国学者是物理学发展中的必要环节。

社会政治科学的发展像其他领域一样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各个环节相互衔接，不断增加、联结和完善起来。在社会政治科学方面也是这样，从德谟克利特到马克思，各个时代的无数思想家以自己独到的研究逐渐丰富了这些科学并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学说。马克思的功绩是，他在社会思想史上引起了突然的质变；他解释历史，理解它的动力，预见未来，但是除尽到了科学家的预见未来的职责以外，他还表达了一个革命概念：不仅必须解释自然，而且必须改造自然。人类不再成为环境的奴隶和工具，而变成创造自己命运的主人。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就成为一切热中于保持旧事物的人攻击的目标，像以前德谟克利特的遭遇一样，德谟克利特的作品被柏拉图本人和他的学生——雅典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所焚毁。从革命的马克思开始，出现了一个有具体思想的政治派别，这个政治派别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人为依据，通过各个连续阶段得到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苏联和中国新领导人的发展，确立了一整套学说，或者说一整套遵循的榜样。

古巴革命所吸取的马克思的精神是他放下科学而拿起革命武器时的精神；古巴革命之所以吸取这一点，不是本着修正主义的精神，不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以后的学说，不是为了复活“纯粹”的马克思，而仅仅是因为在此以前科学家的马克思处于他所研究的历史之外并作了预言。之后，革命的马克思才处在历史之内进行了斗争。我们实际革命者展开我们的斗争时只不过实行了科学家的马克思所预见的规律。在这条反抗的道路上，在反对旧的政权结构方面，在依靠人民来摧毁这个结构方面，在把本国人民的幸福作为我们斗争的基础方面，我们仅仅是符合科学的马克思的预言。这就是

说，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在古巴革命的过程中也起作用，不管它的领袖们是否从理论观点上完全信奉或者充分认识这些规律。再一次强调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游击战争的每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构成了对古巴现实的各种不同的社会概念和各种不同的认识；它们体现了革命的军事领袖的思想，这些军事领袖将来也会表现出他们有资格充当政治领导人的条件。

在“格拉玛”号登陆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做“主观主义”；盲目相信很快就会爆发群众性的运动，满怀热忱地相信通过一次迅速的武装起义加上自发的革命罢工就有力量来消灭巴蒂斯塔政权，最后使这个独裁者垮台……

在登陆之后接着是失败，力量几乎全部被摧毁，于是重新组合成游击队。一小批幸存者、尤其是富有斗争意志的幸存者体会到那种依靠全国自发的爆发的想法是错误的，是一种幻想。他们也理解到斗争必须是长期的，它需要有大批的农民参加。从此农民就开始加入游击队，最初加入的农民进行了两次战斗，就战斗员人数来讲并不算多，就其心理意义来讲却十分重要，因为在由城里人组成的游击队中心小组中扫清了瞧不起农民的心理。农民们也不相信中心小组，特别是害怕政府的野蛮报复。这个阶段出现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于互相联系着的因素是极为重要的：对于农民来说，他们了解到，军队的残暴和一切镇压都不足以消灭游击队，但却能够毁掉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庄稼和他们的家庭，因此逃到游击队那里获得生命的保障倒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另一方面游击队了解到愈来愈迫切需要争取农民群众……

[在巴蒂斯塔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失败以后，]战争在这时表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两支八十和

一百四十人的小纵队要在一个半月之内，经常在一支调动了几千兵力的部队的包围和追击之下，穿过卡马圭平原，前往拉斯维利亚斯省并开始进行把这个岛劈成两半的任务。

两支这么小型的纵队在沒有通讯联络、沒有机动力量、沒有现代战争中最起码的武器的情况下，能够击败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军队，这件事似乎是奇怪的、不可理解的、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里根本问题在于双方军队的性质：游击队越是艰苦，越是深入到恶劣的自然条件中，他们就越是活动自如，他们的士气就越发高涨，他们的安全感就更大。同时在任何情况下游击队都敢于冒险和自我牺牲，一般说来，每个游击队员对于战斗结束后个人是死是活，是早已置之度外了。

在我们谈到的古巴这个例子上看来，敌人的士兵是独裁者最卑下的伙伴。自华尔街而下有一连串的既得利益者，这些士兵在这些既得利益者中名列最后，只得到一些面包屑。他们准备保卫自己的特权，但是他们要看特权的重要性如何。为了他们的薪饷和补贴，值得去受些痛苦和担当一些风险，但永远不值得牺牲生命；如果说为了保持这些薪饷必须以生命作代价，他们最好还是不干，即在游击队的危险面前屈服。这两种概念和士气的差别造成了1958年12月31日^①的危机……

起义至此结束，然而那些经过两年在奥连特省山区和平原、在卡马圭省平原、在拉斯维利亚斯省的山区、平原和城市中的激烈战斗之后来到哈瓦那的人，在思想上已经完全不同与他们最初在拉斯科劳拉达斯海滩登陆或者最初参加斗争的时候了。他们对农民的不信任已经转变成对农民的美德的热爱和尊重，他们原先完全

^① 巴蒂斯塔被推翻的日子。——原注

不了解农村生活，这时已转变为清楚了解我们农民的需要了；他们原先迷恋统计数字和理论，这时已经用实践来加以巩固了。

这些人以首先在马埃斯特腊山实行的土地改革为旗帜，同帝国主义展开了冲突；他们懂得土地改革是建立新古巴的基础；他们也懂得土地改革将把土地交给所有被剥夺了土地的人，而剥夺那些不正义的占有者；他们也知道，最大的不正义的占有者也就是那些在国务院或美国政府中有势力的人；但是他们已学会了以大胆、勇敢的精神，特别是依靠人民的支持，去战胜困难，并且已经看到了在苦难的另一面等待着我们的解放的前途。

自从古巴人民长期进行的国内武装斗争取得胜利，把独裁者赶跑以后，到今天已经有一年多了。政府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不过，我们还需要分析，需要恰如其分地说明每一个问题，并且把古巴革命的精确范围告诉人民。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革命（它基本上是农民革命，但是有工人和中间阶层的热情参加，今天甚至也得到了实业家的支持）由于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由于人民对它抱着不可动摇的决心，现在已经具有全美洲大陆的、甚至世界性的重要意义。

我们并不打算把迄今通过的全部法律都拿到这里来综合讨论，虽然这样做也许是需要，因为每一条法律都无疑地给群众带来好处。我们只准备对其中的一部分给予必要的强调，同时指出它们合乎逻辑的发展顺序，这种顺序始终以一种循序渐进的和必要的规模存在着，上自国家事务的处理，下至古巴人民的需要问题，各方面都无一例外。

新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便违背了我国寄生阶级的愿望，它一连串地颁布了房租管理法、降低电费法，以及干预电话公司、结果降低了电话费的法律。有的人原来希望非德尔·卡斯特罗和其他

革命领袖只是一些旧式政治家或容易被摆布的傻瓜，其唯一的特点只是长着一嘴大鬍子，这时，他们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嗅到了从古巴人民底层中出现的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意识到自己的特权有丧失的危险。人们在谈论革命领袖、谈论胜利了的游击队人物时，开始使用起“共产主义”这个字眼，这样一来，反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辩证的相反立场，也就开始把一切不正当的权益遭到破坏或取消的人联合起来……

土地改革全国委员会就像是一辆拖拉机或坦克车那样前进着，事实上它既是拖拉机也是坦克车，在前进的道路上夷平了大庄园制度的障碍，并且在土地所有权方面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这次古巴士改具有对美洲影响深远的若干特点。它是真正反封建的，因为除去取缔了大庄园制（在古巴情况下）以外，它还废除了规定以硬币缴付地租的一切契约，并且消灭了主要存在于我国大宗农业生产（咖啡和烟草）中的农奴制状态。同时，它也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中进行的一次土改，目的是要消灭妨碍人们（不论是孤立的个人还是集体）发挥潜能的垄断压力，让人们体面地耕种自己的土地，在不用害怕债主和地主的情况下大大提高生产力。它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保证给予分到土地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以帮助，使他们能得到必要的技术支持、得力的人员和机器，并且通过全国土改委员会或同情农民的银行发放贷款，给予他们以经济支援；另外，已经在奥连特省广泛发展、目前正在其他省份发展着的“人民商店协会”也提供了巨大支持，在这类协会的所在地，国营谷仓正在代替旧日的“剥皮鬼”，用公平的价格收购粮食，同时也能赚到相当利润。

在古巴士改不同于美洲另外三大土改（墨西哥、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的一切特点中，显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作任何让步、

没有任何宽容、一定要彻底进行改革的决心。这次彻底的土改只注意伸张人民的权利，除此以外，它不尊重任何权利，它也不是只针对某一个阶级或某一国人；不论是联合果品公司、大牧场还是黑白混血种人的大庄园，法律对它们都一视同仁。

在这种情况下，目前正在加紧发展对国家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大米、油料作物和棉花等物资的生产，在制订经济计划过程中，它们被置于首位；但是，国家并不以此为满足，它要收回自己的一切财富。成为垄断组织争夺和贪婪压榨对象的地下石油宝藏，已经由于通过石油法而实际得到了挽救。这项法律，就像土改法和革命颁布的其他一切法律一样，目的在于满足古巴不可被剥夺的需要，在于实现古巴人民迫切的要求——他们要求自由，要求掌握自己的经济，要求繁荣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社会发展目标。正因为如此，它成了使石油垄断组织胆战心惊的美洲大陆的一个榜样。事实并不是古巴怎样严重地或直接地伤害了石油垄断组织，因为没有理由认为我国是那种宝贵燃料的中心产地，虽然我们很有希望找到足够数量的石油来满足本国的需要。问题主要在于，古巴的法律给美洲的姊妹国家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这些国家中有许多都是石油垄断组织的掠夺对象，另一些国家则不得不大打内战，以满足互相竞争的各个托拉斯的需要或欲望。古巴的石油法向它们显示了有可能做些什么，也表明了究竟在什么时刻可以考虑实行……

通过一种简单的引力规律，我们这个只有十一万四千平方公里面积和六百五十万人口的小岛，正在充当着美洲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领导者，因为客观上有一些重要的情况使它得以担负这一光荣、英勇和危险的领导任务。在殖民地美洲，有些国家在经济上比古巴要强一些，它们的本国资本主义时断时续地发展着，它们对外

国垄断组织也不断地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有时甚至达到非常剧烈和毫不容情的地步，但它们逐渐落后于我们这个争取自由的小国，因为它们的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把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因为斗争不是简单的事，斗争中不可能没有危险和困难。要想在我们所面临的在美洲的几乎完全孤立的情况下把斗争进行到底，必须获得全体人民的支持，必须有崇高的理想和巨大的牺牲精神。在此以前，一些小国已经尝试过采取这种立场：例如危地马拉，这是一个一旦囚入笼中便很快死亡的克沙尔鸟的国度，是牺牲在殖民主义者直接侵略下的印第安人塔肯·乌曼的国度；还有玻利维亚，莫里约的国度，他是为美洲独立而受难的典型，他在斗争的可怕的困难面前屈服了，虽然他发动了革命，并且为古巴革命作了三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示范，即消灭旧政权的军队，实行土地改革，并且把财富和灾难的最大来源——矿山——收归国有。

古巴看到了这些先例，它知道会遇到种种失败和困难，但它也知道自已正处在一个世界新纪元的黎明时期；在亚非两洲的民族运动和群众斗争的冲击下，殖民主义的统治已经崩溃。现在，各国人民的趋向联合已不再是出于宗教、习俗、欲望、种族纽带的相同或相异，而是出于他们社会经济处境的相似，出于他们要求进步和复兴的共同愿望。亚洲和非洲已经在万隆握过手，亚非两洲就要在这里，在哈瓦那，通过古巴和殖民地美洲的当地人民握手。

另一方面，殖民大国也已经在各国人民的斗争面前让步。今日的荷兰和比利时不过是殖民帝国的两幅讽刺画；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失去它们的殖民地。法国正在一场已经打输的战争中吵吵嚷嚷，而手段巧妙的英国则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统治权，只求维持经济上的联系。在新独立的国家中，北美资本主义取代了老殖民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地位，但它也知道这只是暂时性的，它的财政投

机的新领土并不会真正平安无事。帝国之鹰的利爪已不如往日那样凌厉。殖民主义已经在世界的这一切地区死亡，或者是正在寿终正寝。

美洲是另一回事。在一段时期以前，当大英帝国贪婪的魔爪刚刚放开我们美洲以后，年轻而漂亮的美国佬资本家便给英国的那套政策披上了“民主”的外衣，把二十个共和国全都置于它的统治之下。

这些国家是北美垄断组织的殖民地封建庄园，是“自己的后院”；目前，这就是它们的存在理由，它们可能有的唯一命运。如果拉丁美洲各国人民都像古巴一样举起了尊严的旗帜，垄断组织就要发抖；那样，它就不得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大大减少自己的利润。但是，垄断组织是不愿削减自己的利润的，而古巴的例子——这个维护民族和国际尊严的“坏例子”——也正在美洲国家中散播影响。每当一个国家觉醒了的人民有要求解放的表现时，古巴就要受到谴责；不知道怎么回事，古巴总被说成是有罪的，它的罪过在于指出了一条道路，一条以群众的武装斗争反对所谓无敌军队的道路，一条把敌人诱出基地、利用险恶的地形把他们拖垮和消灭的道路；简言之，一条维护尊严的道路。

* * *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预料，垄断组织必然会发动直接入侵，它们想必要利用和研究调查统计材料，盘算种种入侵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目前可能发生一种西班牙式的入侵。这种办法是：先找寻一种借口，然后由流亡分子在志愿军的帮助下发动入侵；这类“志愿军”可能是雇佣军，也可能干脆就是外国军队，他们将会得到水上和空中的有力掩护；为了保证成功，他们可能得到极其巨大的支持。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由圣多明哥这类国家直接发动

侵略，为了挑起战争，它的一部分人民——我们的兄弟——和许多雇佣军将在古巴的海岸上死亡；于是，垄断组织就要摆出一副和事佬的面孔，宣布它们不愿意干涉这场兄弟之间的“灾难性”斗争，并且假惺惺地表示，它们将致力于把战争冻结和限制在目前的范围以内，它们的主力舰、巡洋舰、驱逐舰、航空母舰、潜水艇、扫雷艇、布雷艇和飞机将在美洲这部分地区的海上和天空巡逻。在这以后，就时常会发生下列情况：一条不会给古巴带来任何好处的船只，可能会在瞒着大陆和平的热心维护者的情况下，设法“偷偷地”穿过“铁”的警戒线。此外，干涉也可能通过美洲国家间的某种“权威”机构来进行，以便结束“共产主义”将在我们的岛上发动的“疯狂的战争”；或者，如果美洲国家间的这类“权威”机构进行的干涉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就可能以它的名义发动直接入侵，以保障“和平”和保护“公民利益”，从而再一次演出入侵朝鲜的那种局面……

使敌人不可能获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有两点是最基本的。第一个是外部原因：目前是 1960 年，这是不发达国家的人民起来斗争的年代，是自由人民的年代，在今天，千百万自由的人民，那些福气不大、没有被金钱和死亡手段的拥有者统治过的人们的意见，终于得到了并且将永远得到世界的尊重。第二个原因更为重要：一旦遭到侵略，六百万古巴人将像一个人一样拿起武器，保卫他们的领土和革命；在古巴战场上，军队只不过是武装起来的人民的一部分；而且，即使敌人的正面进攻突破了我们的防线，也会有几百支游击队展开活动，它们将具有坚强的领导和单一的中央指挥部，在全国各地把战争继续打下去；在城市中，工人将从工厂和工作中心的墙壁后面给敌人送去死亡，在田野中，农民将从每一棵棕榈树背后和每一道犁沟（这是革命带给他们的农业机器犁出的）里歼灭敌人。

天然同盟军)愈是对古巴革命施加压力,这次革命就会变得愈深刻,它将满足人民的要求,采取愈来愈激进的措施。……我们的公报刚刚颁布了“第二号法令”,规定把北美的银行收归国有。这道法令上的油墨还没有干,我们的菲德尔同志就在收拾背包准备去纽约了。我说他收拾背包,首先因为去纽约是一项战斗任务,有资格使用这样一个譬喻。但是,他所以收拾背包,也是为了对付野蛮透顶的北美帝国主义者,这些人甚至打算剥夺他作为联合国代表理应享有的权利,不让他住在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明确宣布:他要随身携带着背包和带有尼龙顶篷的吊床。因此,假如我们明天从照片上看到,我国代表团正在那个地球上最野蛮的国家的中央公园里搭吊床,我们是不应该大惊小怪的。

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很合乎情理。当古巴处于野蛮统治之下、我们为它的解放而战斗的时候,我们曾经在丛山密林里架过吊床。因此,我们今天也可能在那个野蛮文明的中心搭起吊床,以保卫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经济完全独立和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

但是,在他还没有去以前,我们先颁布了这项新的措施,这一措施将加深斗争和带来一些经济问题,可是,我们这样做正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权利。许多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所依靠的就是金钱和银行,通过这种途径,帝国主义一步一步地控制了各国人民,使他们的经济畸形发展,直到把这些国家的人民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

我国规模巨大的制糖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这种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出于北美人的好心,而是因为他们统治着那些生产能力最高的大制糖中心和整个市场。他们付给我们一种优惠价格,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付出这种价格以后,他们便可

以根据一种所谓“互惠”的骗人法律，把我国人民所使用的全部工业消费品运进来；而他们则把条件订得对自己如此有利，使其他生产消费品的国家根本不可能与之竞争。

* * *

但是，北美大亨们干这些勾当时还需要有帮凶。他们不能像古罗马帝国一样，把军团直接开到被征服的地区，然后派去一个代表帝国的总督。他们也需要总督，但必须是一些特殊的总督，这些人的举止是文明的，表面上往往温文尔雅，但却经常暴露出帝国主义的本质。这类“总督”有时是大使，有时是银行董事长或军事代表团团长，但他们所讲的总是英语。

正是在制糖业发生不景气的悲惨年代，银行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一切不景气都会对人民群众发生影响，而大垄断组织正是在不景气时期增加了利润和巩固了它们的经济帝国，在这个经济斗争的海洋中吞食了一切小鱼。因此，在这种时期，银行担负了一项重要的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法律对债务人采取措施，凡是经不住不景气打击的人，都要被它们取消赎回抵押品的权利；这样，它们便迅速巩固了自己的帝国。它们经常是相互争权夺利的美国各大财团的马前卒。

它们属于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摩尔根家族以及其他一切豪门，这些集团在维持美国权力的三大部门，即金融界、军队和政府中都有巨大势力。在上述三个部门中，政府只是一个小兄弟，它同军队都是金融界的代表。但是，金融界并不能代表北美人民，它只代表着一小撮财政寡头和大企业主，一小撮同样剥削北美人民的有钱人。显然，他们剥削北美人民的方式和剥削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们这些劣等种族，这些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混血种”运气不好，我们的父母不是金发碧眼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但他们确实

剝削着北美人民，并且使他们对立起来；北美人民也有黑人白人、男人女人、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就业者和失业者之分……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早期的帝国造成的分裂或不团结，在这里已经被完全消除：我们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肤色羞愧，再不用担心自己的性别或社会出身影响自己的饭碗和收入多寡了。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当我国的农业劳动者联合起来以后，我们便迈出了真正解放的第一步。因为今天和过去一样，古老帝国的格言“分而治之”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战略基础。

第十四章 新开端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变革的动因——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内在的特点。因此，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理想，它不能被强加给一个国家的人民。这是历史的下一个阶段，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它只能够在无产阶级具有了革命意识之后发生。事实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具体理论都力求描述和解释这个中心问题。马克思以后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不论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中——也都是围绕着这一点进行活动的。

(一)

在当代历史的大事变中，我们必须注意两个重要事实：第一，无产阶级的或布尔什维克类型的革命，还没有在任何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成功；第二，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布尔什维克类型的革命，只是在具有专制政府的落后农民社会中取得了胜利。

现在还没有什么重大理由作出断言，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马克思主义革命会在任何一个主要的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事实上，工资劳动者、工会和各个政党的革命潜能——不管对这个名词能够作什么合理的解释——是很微弱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普遍繁荣时期是如此，在世界资本主义大萧条空前严重的三十年代也是如此。

这类事实不应该决定我们对未来的看法，但也不能够以腐化的工人领袖（也就是起腐蚀作用的“劳工迷惑者”）、资本主义宣传

的成功、战时经济造成的经济繁荣等等来解释。即使举出的这些理由都是真实的,情况仍然表明:在沒有重大变动的情况下,生活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资劳动者实际上接受了这种制度。存在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党,不是越来越软弱无力,就是在实际政策和活动后果方面变成了福利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一切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都已经变成一种仅仅奉行自由主义的政党,一种没有什么作为的、永远装潢门面的反对派。

在沒有外援的情况下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革命,在三个国家获得了成功,这就是俄国、中国和南斯拉夫。同马克思的预料相反,这三个国家在革命时都处于极端落后的状态,都有一个专制政府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阶级。斯大林主义政权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并不是本国革命(不论是无产阶级革命或非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这些政权都是由俄国军队(在紧紧追赶退却的纳粹军队时)强加给它们的。因此,我们在康士坦丁诺夫^①的教科书中读到了这样一段话:

“几乎没有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原来存在着高度发达的、已经成熟到能进入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们当中包括波兰和罗马尼亚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资本主义只有极微弱的发展,封建残余的力量相当强大,土地问题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由于苏联军队的帮助,人民民主政权得以在沒有产生重大骚动或内战的情况下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来。……这样,以人民民主形式存在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专政,便执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同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民

^① 费奥多·康士坦丁诺夫是苏联共产党主要的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人》的主编,这一职位是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

民主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苏联的存在及其帮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十九世纪思想家和二十世纪政治家的历史。它也是二十世纪那些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家的人们的历史。可是，在我们简短考察过的几个时代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存在着一个特点。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类政治家的理论素养，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素养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一点毋需证明；只要读一读他们的著作就知道了。但是，要了解情况何以会这样，我们便必须记住以下三点：

(1) 马克思不是向千百万人说话的；二十世纪的政治家却正好相反。(2) 马克思没有执政；这些人却掌握着党和国家、军队和科学的大权。(3) 马克思写作的当时，世界上还没有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这些政治家却正处在一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而马克思对于这个时期则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此，也就难怪这些政治家注意紧密的意识形态而忽视自由发挥的理论，重实际而轻抽象，他们那些理论或诡辩首先注意的是政策、决定和自我辩护等等了。

就这种区别而言，列宁和托洛茨基介于十九世纪思想家和二十世纪政治家之间。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思想家，他们也都居于近百年来最杰出的政治家之列。正因为这样，所以苏联的许多知识分子和整个党都把列宁奉为完人。在他们看来，列宁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此外，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和共产主义未来的理想人物。

从政治上说，这样评价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

正确的。但是，这些知识分子对托洛茨基的看法则不免流于片面和庸俗。这是斯大林时代的极端无知和有系统的歪曲（这种做法今天还保持着）造成的结果。假如党有朝一日大量出版托洛茨基全集，就他在俄国革命中的政治作用和理论贡献问题展开广泛而自由的讨论，那肯定会为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一个新天地。这样的日子现在看来还相当遥远；但是，只有愚蠢的人才认为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密切联系着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使是那些并非公开作出、只是事后才公诸于世的重大决定，也要在理论上受到剖析和引起争论。我的看法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从这些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所起的指导作用，多半要大于自由主义对美国政策的影响。这要归因于：

第一，掌握政权的情况不同。苏联当权集团把持了全部政权，这就使他们比美国当权集团更能够以理论来指导政策。

第二，美国决策者对自由主义的经典著作，不如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那样熟悉。苏联当权集团的传统、训练和选拔，深受理论见解和争论的影响，而美国则不然。一句话，思想而不仅是口号，在苏联所起的作用确实要比在美国大得多，并且不论在上层集团或下层群众中都是如此。

第三，我们不应该因为今天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种种歪曲和幻想就看不到这样的事实：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日常的教育和政治思想领域中都具有正式的权威地位。尽管苏联的意识形态包含着不少它所特有的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的东西，它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对于帮助理解今日世界的社会现实来说，却要比自由主义的那些抽象理论、口号和偶像有价值得多。

(三)

约瑟夫·斯大林在1939年说过：“我们决不能向那距现时四十五年或五十五年以前逝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要求，要他们预见到在遥远的将来，在每一个别国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和任何的历史曲折。”①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0年说得更大胆：“我们生活在一个既没有马克思、也没有恩格斯或列宁同我们在一起的时代。如果我们像小孩子一样，光是学些字母拼点单字，我们就不能走得很远。我们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进行独立思考，我们必须透澈地研究生活，分析目前的形势，从而得出有益于共产主义共同事业的结论。”②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处境和赫鲁晓夫在六十年代有很大不同。斯大林能够把他的观点强加给苏联和全世界的共产党。俄国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俄国和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都处于斯大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但是，赫鲁晓夫的俄国已经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他的控制即使在俄国内部也肯定是偏于政治方面，而不像斯大林那样独裁。现在，苏联的身旁还有一个中国，这个国家的疆域比苏联要小一些，但人口却比它多得多，并且处于一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今天的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同三十年代初的苏联有些相似。中国的理论家对“列宁主义”的解释，也和苏联的理论家不同。

那些对苏联集团的未来抱有希望的人指出：那里的生活和教育水平正在提高，国际形势也可能大大缓和，而苏联集团各国的军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第766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译者

② 见《纽约时报》，1960年6月25日。

事安全又在一天天接近于固若金汤的程度。在取得这一连串发展的同时,这些乐观主义者认为,苏联人民也将使他们的统治制度更具有合法性,从而使民主自由和实践日益增多。事实上,这些人说,那里将出现一种更真实的自由,因为它会既包括政治生活,又包括经济生活。在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们看来,更重要的是民主内容,而不是“西方”民主国家的那种制度会不会在苏联出现的问题。

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提醒我们:不论它在斯大林统治下变成了一套多么死板、单调和不合理的信条,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种爆炸性的和解放社会的理论;马克思所希望达到的、在他的头脑中根深柢固的目的,乃是解放社会的目的。我们在努力“了解共产主义”时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把称为“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切国家和理论都归到一块,统统给它们贴上可恶的“共产主义”这一标签了。虽然苏联集团还没有分裂,它决不是同心同德的。它既不是不变的,也不是坚如磐石的。它的内部变化表明,既不会出现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会出现它的瓦解。重大的变化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苏联内部,赫鲁晓夫主义意味着党恢复了作为统治工具的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斯大林曾经利用过不同的控制工具——各种政府机构、拖拉机站、秘密警察等等。赫鲁晓夫活动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恢复了党作为主要工具的积极作用。

第二,苏联集团不再为一个共产党——苏联的党所把持了。其他国家的其他党在制订“社会主义阵营的总路线”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了,并且有了更大的灵活运用原则和提出不同意见的余地。它们同苏联的关系也比过去多样化,肯定不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俯首听命了。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力量日益增强的事实造成的,但苏联集团本身的规模促使它的成员向这个方向发

展。

第三，像几内亚和古巴这类极端民族主义的新国家，虽然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却决不是“人民民主国家”；现在，苏联集团内部对待这类国家的态度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对于这些国家，它们再不像斯大林统治时代那样，抱一种不联合就打击的态度。

第四，以上三项变化显示了并且密切联系着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事实，这就是：在阵营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正统观念都被打破了。我们应该顺便提一句：这一事实正好同美国官方自由主义的日益僵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还应该记住，意识形态在今后的历史缔造过程中所起的作川将越来越重要，而各种马克思主义则是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的一部分。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的范围，不仅要包括苏联类型的社会，而且要包括先进资本主义和不发达国家类型的社会。对集团内外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有时候必然很难确定什么是“正统”，什么是非正统。我们必须抱着这样的希望：在思想和政治工作方面，苏联五十年来可怕而令人惊叹的历史经验将在集团内外部真正成为一面镜子。

马克思希望在资本主义以后的社会中实现的理想，并没有在苏联化为现实。它们显然只起了一种乌托邦和主观愿望的作用，因为苏联当初并不是完全工业化的社会，而在马克思的预料中，这种社会却是实现一场成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唯一**条件。它今天正在接近这个条件。不管使用的手段如何野蛮，斯大林主义终究完成了使俄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而这在别的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完成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现在仍然是官方信条，是用以证明苏联政权及其组织和政策合法化的根据。因此，我们今天必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 在赫鲁晓夫的世界中，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否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被无耻地用来掩饰赤裸裸的强权？或者是，当权集团认真地用它们来指导政策，把它们看作自己衷心希望实现的目标？

(2) 假如这些实质上属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理想真的得到重视，那么，苏联社会中有哪些可能实现它们的条件和工具？

(3) 在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的苏联世界中，是否有可能通过斯大林主义的曲折道路走向一个符合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社会？这样想是不是单纯的主观愿望？

我想，这些恐怕就是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所能提出的最难解答和最为重要的问题了。

譯名对照表

三 画

凡勃伦, 索尔斯坦 Veblen, Thorstein
 马尔托夫 Martov, L.
 马尔萨斯 Malthus

四 画

乌曼, 塔肯 Uman, Tecum
 贝尔曼 Berman
 贝多芬 Beethoven
 巴贝夫 Babeuf
 巴枯宁 Bakunin
 巴洛夫, 托马斯 Balogh, Thomas
 巴斯夏 Bastiat
 巴斯德 Pasteur
 巴蒂斯塔 Batista

五 画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 Jacques
 卢卡奇, 格奥尔格 Lukács, Georg
 卢森堡, 罗莎 Luxemburg, Rosa
 边沁, 杰雷米 Bentham, Jeremy
 布哈林, 尼古拉 Bukharin, Nikolai
 布朗基, 奥古斯特 Blanqui, August
 瓦勒尔 Worrall
 卡德尔, 爱德华 Kardelj, Edvard
 卡瑟尔累 Castlereagh
 卡斯特罗, 菲德尔 Castro, Fidel
 尼赫鲁 Nehru
 尼古拉二世 Nicholas II
 圣西门 Saint-Simon

弗里斯, 戴 Vries, de
 弗罗姆, 埃里克 Fromm, Erich
 弗拉霍维奇, 维利科 Vlahovic, Veljko
 古契柯夫 Guchkov
 司丁尼斯 Stinnes
 加米涅夫 Kamenev
 加斯贝利 Gasperi
 皮尔苏茨基 Pilsudski

六 画

列维 Levi
 伦施 Lensch
 米德, 乔治·赫伯特 Mead, George Herbert
 米留可夫 Miliukov
 纪德, 安德列 Gide, André
 考夫曼 Kaufman, F. F.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考耳德威尔, 克里斯托弗 Caldwell, Christopher
 西洛内, 伊格纳齐奥 Silone, Ignazio
 达尔文 Darwin
 迈耶尔, 古斯塔夫 Mayer, Gustav
 多伊彻, 艾萨克 Deutscher, Isaac
 齐赫泽 Chkheidze
 汤普逊, 爱德华 Thompson, Edward
 托姆斯基 Tomsky
 托洛茨基, 列夫 Trotsky, Leon
 乔治三世 George III
 华滋华斯, 威廉 Wordsworth, William
 安德拉西 Andrássy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亚历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七 画

肖尔, 彼得 Shore, Peter
伯克, 爱德华 Burke, Edmund
伯林, 艾塞亚 Berlin, Isaiah
伯恩施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库恩, 贝拉 Kun, Bela
库诺夫 Cunow
沙夫, 亚当 Schaff, Adam
沙赫曼, 马克斯 Shachtmann, Max
纽曼, 威廉 Newman, William J.
麦卡锡 McCarthy
麦克唐纳 MacDonald
李可夫 Rykov
李沃夫 Lvov
里谢尔 Riesser
里宾特洛甫 Ribbentrop
弗朗哥 Franco
希法亭, 鲁道夫 Hilferding, Rudolf
希特勒 Hitler
纳托林 Natolin
克伦斯基 Kerensky
克柳也夫 Kliuev
克鲁普斯卡娅 Krupskaya

八 画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杰斐逊 Jefferson
拉萨尔 Lassalle
拉科夫斯基 Rakovsky
拉祖姆尼克 Razumnik
罗宾逊, 乔安 Robinson, Joan
罗迪切夫 Rodichev
帕尔默, R. R. Palmer, R. R.
帕尔富斯 Parvus
罗斯特勒, 奥尔特 Koestler, Arthur

彼得一世 Peter I
季诺维也夫 Zinoviev
波斯特雪夫 Postyshev

九 画

胡滕 Hutten
胡斯曼 Huysmans
柯尔 Cole, G. D. H.
柯尔 Cole, J. P.
柯蒂斯, 托马斯 Curtis, Thomas
柯勒律治, 萨缪尔 Coleridge, Samuel J.
柯洛考夫斯基, 列兹洛 Kolokowski, Lezlo
南尼 Nanni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派克, 詹姆斯 Pike, James A.
柏拉图 Plato
威廉斯, 威廉 Williams, William A.
科尔施, 卡尔 Korsch, Karl
饶勒斯 Jaurès
费歇尔, 路易 Fischer, Louis
洛克菲勒 Rockefeller

十 画

葛斯 Gerth, H. H.
格瓦拉, 埃尔内斯托·“切” Guevara, Ernesto “Che”
歌德 Goethe
哥穆尔卡 Gomułka
莫斯, 乔治 Mosse, George L.
莫里约 Morillo
莫洛托夫 Molotov
海涅 Heine
索列尔, 乔治 Sorel, Georges
莱厄尔, 查尔斯 Lyell, Charles
钱伯斯, 惠塔克 Chambers, Whitaker
席佩尔 Schippel

特鲁希略 Trujillo
爱因斯坦 Einstein
朔尔斯克, 卡尔 Sohorsko, Carl
陶里亚蒂, 帕米罗 Togliatti, Palmilo
涅彼宁 Nepenin

十一画

盖, 彼得 Gay, Peter
盖得 Guesde
梅林, 弗兰茨 Mehring, Franz
梅隆 Mellon
梅特涅 Metternich
雪莱 Shelley
勒维特, 卡尔 Löwith, Karl
萨拉查, 安东尼奥 Salazar, António
萨拉盖特 Saragat
曼海姆, 卡尔 Mannheim, Karl
屠尔果 Turgot
维贝尔, 马克斯 Weber, Marx
维里克, 彼得 Viersk, Peter
维沃尔德, 亨德里克 Verwoerd, Hendrik F.
康士坦丁诺夫, 费奥多 Konstantinov, Fyodor V.

十二画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斯大林, 约瑟夫 Stalin, Joseph
斯宾德, 斯蒂芬 Spender, Stephen
斯维济, 保罗 Swozy, Paul
斯托雷平 Stolypin
斯提布林 Stiebling
斯切克洛夫 Steklov
斯科别列夫 Skobelev
斯塔列维茨, 阿尔托尔 Starewicz, Arthur
斯塔哈诺夫 Stakhanov
葛兰西, 安东尼奥 Gramsci, Antonio

博贝尔 Bobor, M. M.
博克瑙, 弗朗茨 Borkenau, Franz
雅果达 Yagoda
腓力普, 路易 Philippe, Louis
普朗克 Planck
普加乔夫 Pugachev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 Plekhanov, Georg
舒尔采-格弗尼茨, 格哈德·冯 Schulze-Gävernitz, Gerhard von

十三画

赖特, 理查德 Wright, Richard
蒙塔纳里, 卡米洛 Montanari, Camillo
策烈铁里 Tsereteli
福耳马尔 Vollmar
福斯科洛, 乌果 Foscolo, Ugo
路特希尔德 Rothschild

十四画

赫尔岑 Herzen
赫鲁晓夫, 尼基塔 Khrushchev, Nikita

十五画

摩尔根 Morgan
摩里斯, 威廉 Morris, William
德热拉斯, 米洛文 Djilas, Milovan
德谟克利特 Democritus
鲁明斯基 Ruminski

十六画

穆尔, 巴林顿 Moore, Barrington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霍布森 Hobson
霍布豪斯, 伦纳德 Hobhouse, Leonard T.
霍罗维茨, 欧文 Horowitz, Irving L.

十八画

魏菲尔, 罗曼 Werfel, Roman